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5.月號 總61期

No.61 JUNE. 1988

綜合報導

留學生公開信一石千浪

座談會紀要

大陸台灣留學生看中國前途

胡平 中國統一之我見

黎音 上海三、二四車禍內情

劉存 北京監獄的囚犯

中國中小學教育現狀

觸目惊心

回應

鍾春仁

香港「爭鳴」雜誌(四月號)刊登了兩則消息,都和中國之春有關,特予轉載,供讀者參考。

中國有句老話,叫做「偏聽則暗,兼聽則明」。身居高位的中共領導人們,能夠聽一聽不同的聲音,無疑有助於使自己更「明」一些。但是,真正的問題在於:「明」了又怎麼樣?不少人認為,專制統治之所以幹下許多壞事,都是因為統治者不了解情況造成的,似乎是只要「下情」能夠順暢地「上達」,領導們能掌握住真實情況,一切便會好了起來。這實在是對專制統治本質的最大誤解。須知,古今中外的任何專制統治者都是極力希望自己明察秋毫的。否則,還派特務、搞「內參」、按竊聽、鼓勵別人打小報告幹什麼?統治者總是希望自己能夠「兼聽」,他們只是希望老百姓們都「偏聽偏信」。所以他們才要把控制輿論視為治國第一要務。專制政治的理想狀態是:上面知道一切,下面一無所知。小說「一九八四」中無處不在的電視眼,便是讓「老大哥」知道一切的最新工具,歷史上秦始皇焚書坑儒,連三兩人交頭接耳講悄悄話都嚴加禁止,則是為了使老百姓一無所知的古老手段。在公安部門明令禁止國內廣大人民閱讀中國之春的同時,中南海的高級領導人都人手一冊「反面材料」,這並不是一件好事。

據說,當局正在研究對付中國之春的新辦法。研究的結果如何,我們尚不得而知。不過,從以往的經驗看,要讓這批領導人真正懂得尊重人民的基本權利,確實還十分不容易。這就十分危險了。衆所周知,由於過去那一套搞得糟糕,我們的領導者們正在大力推進改革。他們也知道「不改革就沒有出路」的道理。可是,改革自有改革的規律和邏輯:當改革順利時,人們的欲求會受到鼓舞而提升;當改革受挫時,人們對現制度的弊病會看得更清楚從而強化他們的批判態度。因此到頭來,改革的洪流必然要把統治者們帶到他們原來根本沒有打算去的地方。由於專制制度固有的不透明性,統治者很容易高估自

參考消息

胡啟立批

中國之春

三月初,胡啟立在聽取統戰部工作彙報時,對統戰部主要負責人發表講話。下面是這篇講話的部份內容:

我們在海外宣傳統戰工作方面,目前有兩個挑戰,一個是香港的「爭鳴」,罵得最兇;一個是王炳章的「中國之春」,風風雨雨,搞得最熱鬧,美國、台灣,都有不少人為他們說話、打氣。怎麼看這些問題,在我們集中精力搞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怎麼樣對待這兩個挑戰,確實需要做具體工作的同志們,認真地、仔細地分析研究。當然,我們並不怕,什麼麻煩我們法……

高層增閱海外三刊

據有機會接近趙紫陽的人士透露,十三大後,中央書記處成員和政治局委員以上人員都定期增加了三本「反面」的海外雜誌:「爭鳴」、「九十年代」和「中國之春」。據說,趙紫陽的秘書,都要抽時間認真閱讀這三本雜誌,把其中重要文章的內容大要,利用一個晚上的時間向趙紫陽匯報。中宣部和國家安全全部有關部門,也都定期對這三本「反面」雜誌進行分析研究。(何方士)

(轉載自「爭鳴」)

己的力量,結果往往是,當統治者們應當妥協的時候,他們自恃有力量而一味硬幹;而當統治者們自己都感到非妥協不可的時候,再妥協恐怕都已經來不及了。

看來,中國之春和中國民聯的存在意義,已經越來越受人們的重視。這畢竟是令人愉快的。在此,我們向一切同情和支持我們的人致以謝意。

變風士

天下變

· 觀察家 ·

邊 路

國內的報紙天天說建設「高度民主」，我們今天要說的是低度民主，最低度民主。民主離不開兩個原則，其一是對最高權力的一定限制，其二是對公民的自由權利的切實保障。所謂最低度民主，就是要有獨立的輿論。

三十多年來，中國大陸根本沒有自由、根本沒有民主。一個最明顯的標誌就是，偌大一個中國，竟然連一份民間的報紙都沒有，連一份表達與當局不同政見的刊物都沒有。這不但

比不過西方的英美，比不過現在的台灣，甚至比不過所謂「解放前」，更甚而還比不過晚清！有些人動不動就把一切歸咎於「生產力不發達」，歸咎於「封建文化傳統」，公平嗎？

國內有人爭論，人民日報究竟首先是「人民」的報紙抑或首先是「黨」的報紙。這種爭論乍一看去很有意思，其實並無價值。人民日報該怎麼辦，這並不是個要緊的問題，因為它橫豎都是受黨的直接領導。不錯，人民日報也確曾發揮過某種批評監督作用，但那都是領導批評群眾、上級批評下級、第一把手批評第二把手、以及這一任最高領導批評上一任最高領導。指望著靠這幫官方刊物能夠起到對現存最高權力的制約作用，好比指望一個人用自己的嘴巴去咬自己的鼻子——看來近得很，但永遠夠不着。

過去，我們投入「北京之春」，辦民間刊物，有人就不以為然地說：爲什麼不投稿給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呢？既然它們現在都很解放，一發出來，影響也更大。後來，我們投入「中國之春」，仍有人不以為然地問：爲什麼不去入黨、不去當幕僚呢？既然改革派在掌權，在他們領導下搞改革，能立竿見影，事半功倍？

怪不得當年唐太宗觀察考場時會說：「天下英雄，盡入彀矣」。索爾仁尼琴感嘆道：「要做一個獨立的人，需要的條件是太多了！」問題的關鍵就在這裡：並不是我們很多人、很多知識份子不懂得言論自由之美妙，但是只要官方那裡給你那麼一點發表自由言論的機會，不少人就寧肯捨此而趨彼、捨寂寞而赴繁華、捨獨立而就依附。魯迅早就說過，世界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中國

現時的問題恰恰就是走自由獨立之路的人還太少，所以一直還沒成路。倘若我們的知識份子們只有在自己被逐出黨外後，才想起以黨外民主人士自居；只有在自己無法在官方刊物發表文章後，才想起要呼籲呼籲出版自由。那麼我們就永遠不會有強大的「黨外」，我們就永遠不會有民間的刊物——這也就意味著我們永遠不可能形成對最高權力進行制約的社會力量。

我們並不否認有些人在黨內也幹了不少好事，有些人在官報上也發表了很多好文章。我們也不否認今後還有一些人會繼續在黨內官報上做出些利國利民之事。但是我們必須強調的是：中國的真正希望不在「社會」而不在「國家」，在民間而不在黨。這也是對兩千年前孟子的名言「民貴君輕」的現代詮釋，也是對美國傑弗遜的宏論「寧肯無政府，不可無報紙」（當然是民間報紙——引注）的洋爲中用。

中國的民主運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仍處於「初級階段」（我們也來趕趕時髦）。其表現之一便是，許多自認爲有民主思想的人，至今仍要對我們這些始終堅持在「一元化領導」之外爭取自由民主的人提問：爲什麼不入黨？爲什麼不去申請當幕僚？爲什麼不爭取在正式（即官方）刊物上發表東西？等到有一天，事情倒過來，人們不再是問我們，而是問另外那些總是尋求在「一元化領導」之內搞改革、搞民主（？）的人：你們爲什麼不去當「黨外」，既然你並不信仰馬克思主義？爲什麼不嘗試辦民間刊物？爲什麼不努力走出一條獨立於既成權力體制之外的路？那將意味着中國人的獨立意識和批判精神業已提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古人云：士風變，天下變。

中國之春刊頭係中國民主運動先驅孫中山先生墨跡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P. O. Box 243, New York, N. Y. 10185.

Tel.: (718)507-6442
(718)429-6777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創刊·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主辦·中國大陸留學生創辦的第一份民運刊物

一九八八年六月號總六十一期目錄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日出版■

"CHINA SPRING" (ISSN 0735-8237) is published monthly for \$24 per year
by China Spring Research, Inc.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
Second-class postage paid at Flushing, New York. POSTMASTER: Send
address change to China Spring,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

● 觀察家 ●

3 ■ 士風變，天下變

路邊

● 讀者 ● 作者 ● 編者

6 ■ 不容中共盜用全體留美學者的名義

陳衛東等

● 本期專題 ●

9 ■ 留學生公開信一石千浪
15 ■ 貧困的辯護和辯護的貧困

李雲霞

17 ■ 沒有流動就沒有安全
——紐約領事何龍與波士頓留學生聚會

房志遠

20 ■ 評中共使領館的三板斧
19 ■ 從葛駿鋒案件看中國知識分子之命運

李奮強

● 特 輯 ●

28 ■ 台灣、大陸留學生座談中國前途

丁學良、王克文等

● 專 論 ●

35 ■ 中國統一之我見

胡平

● 國內參考消息 ●

44 ■ 龍年伊始車禍多

黎音

● 民運報導 ●

46 ■ 民聯在美常委監委及總部成員聯席會議

呼延民

46 ■ 海內外民運發展及中國民聯近期活動

民聯總部文宣組

49 ■ 他們在哪裡

知了

43 ■ 中國統一聯盟成立

李台彥

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多元
縱橫談之十三

50 ■ 規則重於勝負

王炳章

● 思想論壇 ●

52 ■ 一面之詞

胡平

56 ■ 論知識份子與中國現代化的目標

成中英

編者的話

編者的話

三月底大陸留學生鑒於留學政策的緊縮而發起了簽名公開信，希望北京當局改弦更張。雖然在簽名信醞釀期間即引起領館一再派人到各校進行遊說，但留學生們並沒就此放棄表達意見的權利。本刊為了使讀者對這事有一深入的瞭解，於是採訪了一些簽名信的聯絡人，就公開信徵求簽名時，官方和留學生兩方面的看法、動向，做一綜合報導。

三月底由台灣「聯合報」主持的一次座談會，分別邀請了十位大陸留學生和四位台灣留學生共聚一堂談論海峽兩岸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兩岸留學生在美國校園裡不乏這類交流；但大陸留學生公開接受國民黨中常委辦的報紙的邀請，參加座談，却是個大膽的創舉。這是否意味著多數大陸留學生對台灣及其執政當局的想法的轉變呢？或是台灣方面近兩年來大幅度致力民主化造成的呢？讀者不妨從座談會摘要一窺究竟。

知識份子在中国的現代化上有何責任？起什麼作用？中英教授對比中西方知識傳統，為現代中國知識份子典型提出四項要求，並直指中國統一知識份子的職責所在。

與此同時，胡平針對日見激昂的「統」、「獨」爭論，提出他對統一的獨特看法。兩岸民間的直接接觸已成事實，官方接觸也指日可待。統一是否為我們追求的終極目標？如何統一？都是讀者關心的問題。我刊希望藉此引起大家的深思，共同尋找出一條最可行的途徑。

在眾多讀者的愛護下，一個月來我們收到了不少捐款及訂閱單，使我們的經濟困境得到一些緩解。在此一併致謝。

61 也談「再造中華民族」

賈亦珍

27 共產黨的悲劇在於只能依靠自己糾正錯誤

64 知識分子是民主運動的中堅

林濤

66 把爭取「出版法」作為我們的第一個目標

林峰

人物

21 閱讀與思考

蔡宏

——推荐「無所畏懼的波蘭政治活動家米奇尼克」一文

23 無所畏懼的波蘭政治活動家——米奇尼克

邁克爾·考夫曼

大陸專欄

70 關於中國中小學教育的一些討論

劉存

74 北京監獄的囚犯——一個老紅衛兵的回憶

陳亞英

83 飛城撲火——五十年代歸國留學生的命運

丹曾朗傑

87 與王亞軍談西藏問題

中國革命同盟國外特派組

89 被中共掩蓋的民盟軍事史

肖曉

雜文

14 復旦獲亞洲大專學生辯論會冠軍

朝開牆

65 勿將剩勇付相煎

狄狄

18 不稱心的婚姻

何邊仁

90 妙哉，李鵬之言

畔之

63 旅美札記

愚民

91 多向北京施壓力

徐松林

文藝園地

91 建議海外學者政客學朱高正，到北京去爭民主

張潤

92 X狗（紀實小說）

不容中共盜用全體留學生名義

最近以來，常常看到北美的一些報刊報導台灣準備邀請大陸留美學者、學生訪問台灣。他們訪台的目的主要是，對比海峽兩岸的現行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找出大陸落後的直接原因，推動大陸的民主化進程。

正當我們關注大陸學人訪台計劃何時施行之際，忽然發現中共當局一反極力阻撓大陸學人訪台之常態，竟然代表留美的全體學人以聯誼會、聯合會的名義發表聲明，要求台灣當局在批准訪台人選時對所有學者、學生能一視同仁，不附加任何條件和限制，並表示聯合會願意協助並承辦中國大陸在美各類留學人員應邀訪台事宜，並聯絡有興趣者組團前往。最後，聲明還以十分強硬的态度表示正在等待台灣當局的進一步決定（見人民日報海外版八八年三月廿一日第一版）。

在美國的一些大學中確實有一些所謂中國學者、學生聯誼會這樣的組織。不過，這些組

織（大部份，不是全部，好的也有）是中共爲了控制留學人員的思想和行動，用出錢、派人、打入、或用封官許願、改變身份爲誘餌等手段收羅了留學人員中的一些敗類拼湊而成的。是專用來對留學人員打小報告的。這樣的聯誼會始終都未曾被留學人員所承認，其頭頭亦受到留學人員的唾棄和譏諷。目前，在全美的大多數學校內，由於廣大留學人員的抵制，這種官辦的聯誼會至今未能正式成立。現在，中共竟然假聯誼會名義代表全體留美學人發表聲明，此舉根本就是違法的。

中共這次盜用全體留美學者、學生名義發表聲明，可見留學生訪台事件已成爲中共堅持獨裁統治的一大威脅。爲了破壞大陸留美學人訪台，中共才提出由其官辦的聯誼會負責組團前往台灣。從這裡，我們不難看出中共打的是以下如意算盤：第一，利用廣大留美學人對中共的懼怕及對官辦聯誼會的憎惡心理，迫使留學人員打消訪台計劃，以達到阻止大陸學人訪台。第二，利用台灣當局害怕共產黨滲透的心理，以強行要求由中共官方組團前往台灣爲由，脅迫台灣當局放棄邀請大陸學者、學生訪問台灣，以達到中共破壞大陸學人訪台的目的。但是，中共的如意算盤打得再好，只怕不僅留學人員不買中共的帳，恐怕連台灣當局也難買這樣的帳呢！到頭來，中共不知又要找個什麼台階才能訕訕下台呢？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陳衛東

寫「我是你們的反對黨」的動機

前寄上「我是你們的反對黨」一文，承蒙刊出，足證你們擁有容忍反對意見的雅量，很是欽佩。並承王炳章先生在百忙中寫了一篇「警惕泛民主傾向」，真是不吝賜教，尤深感激

。既承示「歡迎來函批評」，自當遵辦。但批評實不敢當，今我想對何以寫「我是你們的反對黨」一文的動機，作一些說明：

貴刊總四七期所載法國耿長所作「閉嘴！共產黨的布袋偶」文中，有「先是那個國民黨原駐泰國大使李鐵錚，你不滿國民黨當年政治的腐敗，投了共，倒不是什麼可指責的事……一段話。作者茶座的一位好友，廿幾年前和我都是在康州大學研究，深深知道李鐵錚的投共，並不是爲了國民黨的腐敗不腐敗，而是由於事業（他在康大教書，英語發音不標準，美國學生聽不懂而紛向學校當局怨訴）家庭（他常常在我們面前訴苦，太太是女王，女兒是公主，我在家中毫無發言權）兩不得意。我友即將此項投共的前因後果，撰文一千餘字，寄給貴刊。像這類更正式文字，我曾向紐約時報寄去過二次，都經紐約時報照登無誤。但貴刊却原件退還給我友。理由是「文章太長」。

月前又見到貴刊總五七期十八頁有：「中國第三種勢力的崛起，是國共兩黨長期統治失敗後，歷史的必然結果」一句，致有「偏見太深」的不敬之辭。這也難怪，貴刊同仁在大陸受到中共長期片面的歪曲宣傳。來美後，又看不到國民黨執政六十年來的真實史料（共產黨最拿手的是宣傳，國民黨却相反）。即使看到些，都是些偽裝中立而實際是共產黨用不同形式所寫的污蔑文字，使你們無法瞭解真相。於是再有一次「閉了眼睛說瞎話」的不敬之辭。真是抱歉之至。

在此，必需再聲明一次，我不是國民黨員。由於國民黨是執政黨，凡與當時政治有關之事，都不免涉及到國民黨。我撰文的目的，並不是爲國民黨呼冤，而只是想忠於歷史和事實而已。

何不鳴

讀王炳章與何鳴文有感

閱讀貴刊五十九期中王炳章先生的「縱橫談之十一」以及何不鳴先生的「我是你們的反對黨」之後，感慨良多。我個人認為王炳章先生的確是位有雅量、有思想的學者。

由於我是台灣來的留學生，對何不鳴先生之所以會產生如此「不平之鳴」的心理背景尚能體會。但是，從何先生頗為情緒化的言論中，也深深地感覺到現代中國知識份子，比不上西方人的一大缺點，便是容易將學術或政治問題的探討情緒化，不能夠就事論事。同學朋友常在政治問題的辯論後翻臉；在學術性的討論會上，常將別人的質疑想成是對自己的攻擊，而爭辯得面紅耳赤。這種情形不只是發生在中國學生身上，連一些在美國待了十幾、二十年的中國教授也常犯這個毛病。

要想使中華民族早日享受到民主、自由之果，此種沒有民主風度、沒有科學精神之行為應該徹底改正，否則走向民主之路程必將更加曲折。

台灣留學生丁立華

於美國

錯誤的類比

貴刊一年來多次把中共政權比作菲律賓馬科斯政權，認為後者的倒台預示著前者遲早也會同樣下場。這樣的比附，反映了一種政治上的無知、盲目的樂觀和天真幼稚。

馬科斯政權與中共政權完全不同，菲律賓與中國也完全不同。馬科斯政權是軍事獨裁型

(AUTHORITARIAN) 沒有中共(專制極權型, TOTARITARIAN, 比前者更甚)那樣

一整套的意識形態和一整套的密布全國的「黨綱」。菲律賓畢竟還有西式(主要是美式)民主的架子在那裡，有「總統選舉」、有國會。與中國相比，菲律賓是個多元的國家，有各種反對黨，有個強大的羅馬天主教會，而後者在削弱「王權」方面極為重要。再有就是，菲律賓並不是像中國那樣的封閉的「中央大國」，而是一個受美國嚴重影響的小國，政治、經濟、文化命脈都操在美國手中，馬科斯、阿基諾夫人都與美國關係密切。馬科斯迅速倒台，是美國在背後推波助瀾，馬科斯逃亡是逃到美國夏威夷，實際上是被美國用美空軍飛機護送去的，後又被軟禁在夏威夷，沒有美國國務院和美國移民局的許可，不得越雷池(夏威夷)一步。

菲律賓從獨裁走向民主的條件，在中國都不存在。不去探討中、菲；中共、馬科斯政權之間的巨大差別，一味一廂情願、想當然地將二者混為一談，只能模糊了對中共政權和中國國情的清醒的認識。

洪流

對邱垂亮文的反應

「春三月號總五八期邱垂亮教授的「中共統治三十八年的書生命運」一文，真是寫得痛快淋漓。如其中說：中國的知識份子，只有一兩個敢譁諫言、少數沉默寡言、明哲保身，多數是左右搖擺、東倒西歪，不只是諾諾的無用書生，甚至是朝秦暮楚，翻雲覆雨，為虎作張，賣友求榮，落井下石，幫助中共政權整肅異己，推行暴政的御用文人。有的到了寡廉鮮恥，喪心病狂，出賣靈魂的極端程度。這真是

中國知識份子的大悲劇。

中國弄成這個局面，固然主要是毛澤東，但我們知識份子實應負大部份責任。當年國民黨的腐敗，知識份子紛紛左傾，投懷於共產黨，才使國民黨崩潰。但中共政權成立，專制壓迫甚於國民黨，而知識份子反取如前段所述之態度，一言以蔽之還是欺善怕惡，貪生怕死。老舍是大歌德派，吳晗在當年對民主人士之作威作福，不可一世之態度，連較有修養之共產黨員也看不上眼，而加以暗示，使之收斂(見某雜誌記錄吳晗追悼會見聞)。所以他們之死也可說是死在他們自己捧起來的偶像上。

我期望貴刊和邱教授再進一步搜集材料作具體的報導，懲前毖後，使知識份子接受歷史教訓。

杖朝於美國

為胡平辯護

今年中春第五十九期肖漢著文認為，胡平「把馬列主義、毛思想，作為理論基礎，仍未脫軌，是嚴重缺陷」。我並不贊同此意見，論據如下：論「言論自由」的「時」的背景是一九八〇年初，「地」的背景是在北京，而不是在美國，「人」的對象是剛歷文革後的中國人民。若不以「馬列毛」主義為論據，不但「劫後初醒」的中國人民「太虛而不受補」，難以接受，而且胡平也馬上會有入獄之災。如今胡平在美國發表文章就不是漸漸「原形畢露」。越來越少使用「馬列毛」的論據了嗎！這

是因為中國人民的覺悟比幾年前提高了很多，以「馬列毛」論據為發表的「初級階段」也勝利完成了。

(中國大陸留學生·加拿大)楊廣昆

我的「狗尾續貂」

——讀胡平「一面之詞」有感

既然我們認識到人性中有惡的一面，我們需要理解：不論制度如何周全，惡人總有辦法將制度「古為今用」，或乾脆另造制度。

人性中的善惡之爭可能是永無休止之爭；人類的唯一出路在如何揚每一人心中之善，抑每一人心中之惡。要做到這一步，需先提高每一人之認知，此所以孔子、耶穌和佛祖都教人從修身開始。而在大眾的認知未到達此一階段以前，需要有一制度來幫助我們過渡到那時期。

目前西方式的民主絕非一完美的制度，但其有力處在於它承認自己的不完美，為將來的進步和改善留了後步。

設計制度的思想家，當你設計的制度能防你自己心中之惡的時候，那制度方才接近有效。

當一制度能控制當政者己心之惡時，此制度就接近完美了。

社會為一動態體，專制制度為一靜態體，以一靜態體長期統治一動態體，結果的悲慘是必然事：

不是制度將社會裝進了框框，使得老百姓在框框中受煎熬；

就是社會掙脫了制度的枷鎖，將制度炸得粉碎。

前者的結果是社會停滯不前，看看世界上

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就可明白。

後者的結果是造成浩劫，惡人作惡更容易。回顧一下文革，應可理解。

最危險的是，如果堅持不變，自然發展的趨勢是從前者過渡到後者。

人類的自私心來自生物進化過程中所產生的遺傳，其目的為保存自生的延續，其源遠流長，深印在我們每個人的遺傳因子中，非任何制度或信仰可將之徹底消除的。當一個人能真正做到無私之時，其生命之能否延續就頗成疑問。

人類的同情心和自我犧牲精神來自生物遺傳過程中的進化，其目的為保存整個種族的延續。當一種制度或一群瘋子使一個民族失去了對其他同類的同情心和自我犧牲的精神時，亦就是此民族滅亡的日子。

小老百姓

龔品梅主教「悔改」

八十年代初，在中共進行「落實政策」之際，曾釋放一些天主教神父（這些神父不久大多重新投入監獄），為一些教徒「平反」。在一次由中共宗教局召開的會議上，宗教局局長在報告中對各宗教界人士說：有人說現在許多神父都放出來了，為什麼不放龔品梅？我們不是不放龔品梅，而是他自己不要出來。龔品梅說放他出來要有三個條件：一、釋放因他而被關押的全部神父和教徒；二、歸還沒收的全部教會財產；三、允許他被釋放後立即去梵蒂岡向教宗報告中國天主教的現狀。前兩個條件我們能夠接受，第三個條件不能接受，所以不放他出來。時隔不久，龔品梅在世界輿論壓力下獲得假釋，中共報紙大肆宣傳，說他有認罪表現，深感過去對不起國家、對不起人民。二種說

法都是出自官方，前後竟如此自相矛盾。中共當局撒起謊來真正做到了「面不改色心不跳」。

一個知情者

蘇聯政治笑話

野兔在飛快地跑，狐狸看了很奇怪，問：「喂，你在跑什麼？」

野兔說：「政治局下了命令，所有的山羊都要被騙掉。」

狐狸說：「你不是山羊，你跑什麼？」野兔說：「唉，等到弄清楚你不是山羊再給你平反，那已經太晚了！」

環球汽車修理行

地址：112-21 Roosevelt Ave.
Corona NY. 11368

電話：(718)429-1400
(718)429-1442

華人經營

精修各種引擎、線路、
板金、噴漆、換油、保
養、舊車買賣、歡迎比
價。

小閻主持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上午八時至下午七時

信公開學生留

浪千石一

丁楚

霍浦金斯大學聯絡人——張慧

記者：我是中國之春記者，想對您進行電話採訪，主要請您談談你校簽名活動的實際情況，可以嗎？（以下記者問話省略）

張：可以。

我這裡沒有多少人簽名，霍浦金斯大學大概一個也沒有，DC有幾個，我只收集到五、六個簽名。有的人是想簽名的，但大部份人只想瞭解一下情況，並不很踴躍，我們這也沒有舉行什麼會議之類，好像並不很熱烈。我是聯絡人。我從哈佛過來以後，馬上大使館就開始找我了，他們準備利用這個風，來一個槍打出頭鳥。

大使館找我，叫我別做工作，我說那人家要簽名就只有叫人家簽，我沒有別的辦法。

他們這樣說，你看你簽了名了，我們還是給你延長了一年半。

其實還沒有批准，還沒有發下來，他說是一年半，但我還沒拿到。

他說是從三月中旬就是一年半，沒有其它的，又說，你有什麼問題就給我講嘛，我說覺得教委會的文件沒有道理。

他說是有這個文件，但我們是酌情處理，他說這其實是大使館的事。孫燕和我同時都被大使館找了。都談了話。

他是打電話找的。電話上講了講。有幾個人講得比較厲害，有兩個是管教育的。

同學還是同意公開信的，但是不想捲入，我想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個原因是，我把意見告訴大家，他們不願簽名，覺得簽了名對我不好，我說沒有關係，你們簽好了。

記者：你參加了哈佛的會議。

張：對，我參加了。

這個會議主要說國內卡的問題。比例減少，大使館說沒減。我說二五%從哪跑出來？他說從公派跑出來。……簽名有的沒有通知到，有的也看不到「世界日報」和「中報」。非常關心。我想主要是大使館離得較近，工作方法也有問題，聯絡人被大使館找了，就不太好工作，不想和大使館頂著幹。

芝加哥大學聯絡人——李三元

大家都認為簽名運動是一次非常好的活動，政策是一種非常無理的政策。好多人不簽名，為什麼？兩個原因，一些最關心的人馬上面臨上領館延護照。據說在延護照時，因為在胡耀邦事中簽名，就被拒絕了。有人走後門，特別大的後門都走通了。後來一查，在胡耀邦事上簽過名，又給拒絕了。不管消息是否確切，反正大家都這麼傳。所以一動真格的，還得想一下。雖然牢騷滿腹，還是決定不簽名，也有簽的，芝加哥大學有十個左右。加上假名有五、六個，還接到其它一些大學的簽名。

領館來做工作了，但我不在。找一些可爭取的對象，說得特別好。就說你別簽，延護照來找我，我保證。當時「人民日報」黃辛白那篇文章還沒出來。大家很不痛快，有人毫不猶豫就簽了。領館的人倒沒有否認那份文件，但是說非常靈活，是一個非常鬆散的文件，是一個參考。沒有組織什麼討論會，只是領館找了二十來個人勸阻了一番。

領館召集會是一個全美性的行動。各個大學都有。

據我所知，領館召集大會的地方，全都是簽名最多的地方。

當時領館要叫我去就好了，因為我當時有

文件。後來好些同學又看了黃辛白那個，又覺得領館說的事不頂用。

你用個人擔保，中央下個死命令，你個人擔保頂屁用。

他們的職位和黃辛白沒法比，他們說話的可靠性不行。

這個問題上很多人出於個人利益考慮，想白坐車，就這麼一回事。

賴斯大學聯絡人——呂凡

我們這兒不是很熱烈。有三十五人簽名，後來第二批有七、八個。同學都對這事很關切，但有無力感，認為簽了名也沒有什麼用。這種形式我說不上來，反正能躲儘量躲。領館沒有找我，有沒有找其他人不知道。

衣阿華州立大學聯絡人——謝維勤

真名五十人，假名八十三人。議論時反應熱烈，動真格就不行了。有人認為和我沒關係，表現在F1上，和我們沒關係，不懂得唇亡齒寒，今天可以用這個辦法對付J1學生，明天也可以對付F1學生。有些J1學生也不認為和自己有關係，這很奇怪，為什麼呢？我某某人不是公派，我是自費，這是個中文理解的問題，文件上沒有講什麼自費不自費，文件上只講公派和非公派，文件沒有講自費可以例外，只講非公派可以例外。他們沒看到，中國政策變來變去，變到現在，用了一個新辦法。這個辦法過去是沒有的，即利用美國現有移民政策來對付自己的學生，這是我的體會。我們這兒有個學生，在國內沒有單位，大學畢業還沒有分配，他就出來了，但他仍拿J1簽證。這

種例子很多。第三個原因，有些人過於樂觀，有些人說這一次一萬人簽名沒有問題，少我一個沒關係。還有一種是赤裸裸的自私的。如果我的名字簽了，以後中共政策讓步了，簽名的不讓延，不簽名的還會給延。有好處我有份，有壞處我沒份。還有一類認為公開信要求太多達不到，還有人認為公開信太軟，不願簽名。有一個個案，很有意思。有一個自費生，他說文件雖然跟我沒關係，但我反對這麼做，所以我簽名。後來他又撤銷簽名，也很有理由，他說這事本來和我無關，我簽了，現在J1生自己都不簽，關我什麼事？他的話很有理。

我想如果真的簽了名的就不延護照，不簽就延，我們是不能罷休的。

許多工人運動就是這麼開始。我們應該有一個保護留學生利益的團體，和政治沒關係，解決一切困難，是需要一個團體。現在官辦聯誼會除了發表效忠信，別的事都不做嘛。

使館有一個陰謀，他不說這封信是正義或非正義，而說這封信和什麼組織有關係，這是胡攪蠻纏。你管他和中春有關係是和國民黨有關，先說這封信對不對嘛。要是承認這封信是有道理的，和什麼政治勢力有關又怎麼樣？用這個棍子打人，牛頭不對馬嘴。我想對付這個陰謀的最好辦法就是大家就公開說，只要我們幹的事是正義的，與什麼組織有關我們不在乎（DON'T CARE），他們支持，我們歡迎，你看著辦吧！

最後應指出，自費生認為沒關係，所以不簽名，這種觀點是錯誤的。今天沒關係，明天有關係已經晚了。像老毛整三家村，彭真認為跟自己沒關係。後來整彭、羅、陸、楊、劉、鄧、陶認為與己無關。最後，全被打倒了。

匹茨堡大學聯絡人——劉宏

我們這裡簽名人相當少，一向是死水一潭。這兒一向是平靜的地方，老生都延長過了。新生嘛，猶猶豫豫，總想人家鬧成了，自己也可以沾光，鬧不成，自己也不吃虧。大多數不想介入，尤其是理科。中國人的哲學是「明哲保身，但求無過」。

加州伯克萊大學聯絡人——徐邦泰

你是要知道整個過程是吧？

哈佛同學與我聯絡以後，我就把這些情況告訴有些同學了。

把東部的情況介紹了一下。一開始的時候，大家還弄不清楚究竟是不是有這回事，有沒有這個文件、規定，不太明確。聯誼會通過領館消息說沒有這個文件，而且領館也不會按四五年那個年限限制學生，所以大家覺得還是看一看，把事情搞清楚再說。當時有學生表示假如確有其事的話，他們願意簽名，覺得信寫得非常委婉，是一種對話的姿態，不牽扯政治，純粹是為學生的利益考慮，希望能對有關政策進行調整。後來拿到文件以後，大家覺得這個事情是確有其事了。

有的同學把教委文件考貝寄來。寄來後，聯誼會就討論了，他們覺得先召集會議，在會上進行民意測驗，根據民意測驗的結果看看大多數人的意見怎樣？聯誼會再決定他們怎麼做。我覺得他們的做法是比較穩健的，後來，一個星期六的晚上，召集了一百四十幾人的會議，領館也來了七、八個人。這個消息「中報」「世界日報」都報導過，我就不介紹了。領館介紹了一下，高領事說，你們手中的東西都有

了，我不多說了。但還是解釋了一下。大家接連不斷的發言，就有關問題提出一些質詢。結果領館官員開始回答一些問題，後來就不回答。他說我們把問題記下來，回去向中央匯報。他們主要講了兩點，一是文件是暫行的，我們在執行中都有保留，沒有按照那個文件卡留學生，希望大家不要簽名，理由是那個簽名信中央領導不一定看得到，我們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同中央保持聯絡，我們可以把你們的意見滙報上去。大家哄笑起來了，這明顯的是開玩笑，因為不可能看不到信的。由於氣氛還是很輕鬆、和諧的，沒有很對立。大家都講，爲了不連累領館，因爲他們不執行文件的精神，將來有可能會把官給撤了，所以大家覺得你們不執行是一回事，不能指望你們個人的開明。文件有毛病，還是應該向中央反映，要求把文件廢除掉。會上進行了民意測驗。

領館還把民意測驗公佈了一下，大部份的人都是基本上擁護公開信的內容的。具體的百分比我現在還沒有算出來，大概百分之七、八十的人是支持公開信精神，因爲當時還有訪問學者在裡面。明確反對的大概沒有。即使不同意，他也不是反對。民意測驗當中有一條，你同意聯誼會出面還是用其它辦法？主張聯誼會出面的不超過半數，所以聯誼會沒有出面。這次我覺得比較好的是因爲伯克萊的學生素質都不錯，都很通情達理，原因是公費生很多，自費生很少，所以簽名比例相當高。可能是簽名最多的一個學校。

具體數字有一百二十六人。斯坦福開始也是領館做了工作，給他們講沒有這個文件，所以他們都平息下去了。但他們一旦知道有文件，好像憤怒了，這是怎麼回事啊？他們在伯克萊開會後又開了個會，也是請領館去了，領館

解釋。他們就提出自己的問題，當場進行簽名。他們的總數是五十五人，我覺得也不少。出乎我意料。以前好多活動，斯坦福是不動的，好像是沒有什麼反響的。我原以爲二、三十就差差不多了。結果一百二十六，搞了這麼多人簽名，現在還有人繼續簽名。

有同學提出，這個文件是違憲的，是完全可以起訴的。現在提出寫公開信的做法，已經是一種很軟弱的做法，寫公開信是我們的一種權利，有什麼不好？不妥當？這種做法，是很溫和、很文明的，不應當把它看做是不妥當的。

領館開始也蠻有趣的。他說「我們伯克萊的同學覺悟都很高的，我們過去都有自己的主見的。」應該自己有自己的看法，他沒有講什麼理由，只是說簽名信中央不一定看得到，我們二十四小時同中央保持聯繫，你們告訴我們，我們就反映上去。學生問，你們原來不是說沒這個文件嗎？你們這樣的表现，我們對你們有點不太信得過。不過話講回來，你們還是可以反映意見，我們寫信跟你們也不矛盾，寫信也可以作爲你們反映意見的一個佐證。你們領館可以說，你看，我們有簽名信嘛。會開得比較好，沒有很對立的氣氛，反而簽名的多。搞得太緊張，就會把中國人嚇跑了。從這個角度，我覺得開得很成功。現在都很和氣，簽名也就無所謂。所以一下子簽了很多。另外一些學校，灣區有十幾所學校，主要是缺乏聯絡，有的看不到「中報」、「世界日報」，消息比較閉塞。我想第二波重點應放在這些學校。哈佛的同學爲了使簽名運動易於被大家接受，強調這次事件和任何政黨、任何政府都沒有關係，爲了最大限度減低它的政治色彩，所以就謝絕了中國民聯提供的協助。

我希望你們中春在處理這事的時候能夠冷靜一些，從大局出發。

普渡大學聯絡人——丁子江

簽名情況到八日爲止，有九十多人，有五十人簽真名，有四十多人簽假名，這是陸續報的。

同學們一般都不認爲這個文件是對的，但在方法上，有人不同意簽名，不同意公開信。有的人認爲可以直接寫信給人大、國務院、或者是中央、教委，不必公開。形式很重要，只有這樣，才能重視。之所以簽名，是感到這個文件確實不像話，一是和國策不符，二是跟法律不符，也沒有科學態度。影響了切身利益，不結合切身利益的人，出於正義感，也簽了名。領館的人這兩天正在，我想領館第一件事，會來開大會，來當面接受學生質詢，正面回答問題。但他們沒有開大會，只是找聯誼會的頭頭開了小會。另外，我也想可能找兩方面的人，支持簽名和反對簽名的人，個別談話。結果也沒有找我談，也沒有找聯絡人談。好像迴避這些人。

在印第安那普渡的一個分校，聯誼會就阻止簽名。他們消息不靈，什麼信息都不知道，所以有心理壓力。打小報告的人少，但不關心的人多。簽名的人選開過會。爭得很厲害，也有簽了名又退的，要尊重每人的意見，聯絡人只是把信息告訴人家。普渡的消息閉塞，很多人看不到「中報」、「世界日報」。牽扯到國內的親友、配偶，也受到影響。認爲制定政策的人沒有理性。訂了到底行不行得通，行不通乾脆不要訂，這樣弄得自己惹火燒身、被動。

威斯康辛大學聯絡人——趙鐵成

有四十三人簽了名，領館來了一次，講了一點不痛不癢的事。簽名的事中國人軟弱性多一些，九十九%對政策不滿，有些出於怕，有些覺得沒有用。我們沒有開大會。同學比較灰心。看得到「世界」「中報」，簽名比想像要差。

紐約州立大學聯絡人——陳燕南

我們這邊有十幾個人，學生總共百來人。只有三、四個用真名。其它學校還在報有十幾個人。領事館據說有人下來過，主要是找了聯誼會的頭，叫做點工作，聯誼會說這工作不好做，因為這是牽扯到切身利益的事情。領事館開頭是否認這個文件，後來我們把文件弄出來以後，他又說這不是執行性文件而是試行性文件。同學們大部份覺得對他們切身利益影響很大，都不同意，但是真正要想簽名甚至用假名簽有顧慮的也很多。我估計十成有九成是不同意這個文件的，但真能簽名的，十成中只有一成。

肯塔基大學聯絡人——任松林

簽名那一天大使館管教育的人正好來了，學生會提前通知是演電影。簽名信是提前貼出的，演電影的時間一到，領館的人都在那，當時當然也就沒有人敢說了，參加會的人好像基本上都沒有簽名。

我碰上的每一個人，都支持這件事情，估計總有九〇%都支持這件事。但是大部份人出於兩種情況，一種是自費生漠不關心，不太干

他們的事；再一些大部份人出於害怕，因為有親戚正好要申請出國，或者護照快到期了，怕惹出麻煩。好多人跟我們談過，有的是打電話，有的是面談，都是特別猶豫。一般最後簽名的幾個人，也不是說他們沒有顧慮，主要是覺得這種事情不得不站出來，責任心比較重。我發現這個學校也有些不太使人滿意、使人猜不透的舉動，大部份簽名的人都是文學和藝術學院的。農學院、工學院和醫學院雖有人響應，但人數少，簽名也是簽假名。其中，簽名的大多是數學、化學等基礎科學系的。

當時領事館方面沒有什麼動作。我去了，領事館就跟我談。說，是誤解了，根本就沒有變化。我說，沒有變化更好嘛，我們就是怕有變化，所以我們是督促政府別產生變化以及引起大家思想的波動，假使有變化希望能改正！領事館沒有明確否認那個文件，但他那個態度是否認的。因為當時我沒有得到那個文件的具體號碼，只知道文件內容。他說：「你說的哪個文件呀？我記不住了。教育部文件多了，沒聽說過你談的這個內容啊。」

由於我沒有這個號，所以沒法提出來說×××文件，沒有準備。暑假回去探親的同學，他找領事館的人辦事，領事館的人對他們說，你可不要簽，別上任松林的當。好像我在這發動、挑撥學生和政府之間的關係，同學們告訴了我這方面的事。當然他們害怕，因為我也瞭解他們暑假就要回國探親或明年春天就要回國，總而言之，領事館是想堵住，我估計領事館的人在這住了十天吧。

「大家都給延嘛。」好像就沒有不延的這回事。那天開會先談的都是回國買東西，免稅證怎麼辦，反正主動避開這個問題。在會上有些人說，「好像政策變了，其實沒變。」把文

件內容不痛不癢說了幾條，很重要的就一掠而過了。當時看電影的人大部份是新來的，好像情緒還比較穩定，因為是新來的，護照延期還是五年以後的事。

我打電話到外校，有些是一些偏僻的學校，大使館很少去的，他們都是支持的。昨天阿拉巴馬還給我打電話，他們知道的很晚，問現在能不能補簽。所以我覺得從簽名的這件事情來說，現在的學生基本上是支持內部自發的這種民主的活動。大部份的人有一種恐懼感，他們的參與心不太強，有些多少年來家裡面囑咐在外頭別鬧事，儘量躲開政治活動。但是他們心裡頭是贊成的。幫著散發、影印，都很積極，但是輪到自己簽名總有些畏懼。這是可以理解的，慢慢來。據我知道，人的層次是不斷地變化的。前一段簽名運動的時候，有很多人是支持的，到現在，慢慢變得積極了，有很多上回積極的，現在却不知為何變得消沉，我猜想可能是領館主動作了些工作吧，感到壓力很大，和我們接觸都覺得害怕。這次關係到學生切身利益問題，特別是快到臨期的，他們都感到一種壓迫感。大家都認為，回國不回國是另外一個問題，這種做法就是強迫的作法，大家很難接受的。還有，當我問領事館，有些人畢業去延期被大使館拒絕時，他說，只要國內沒有研究課題等待回去的，都讓延期了，我具體指出讀物理系的兩個人都被拒絕延期。他說，他們情況特殊。其實沒有什麼特殊，他們都是一般的學生，沒有研究項目，連單位都還沒有。

我知道的起碼有一個人就被拒絕了。他申請一次被拒絕了，後來大吵，又申請一次，又被拒絕了。他是南京大學七八級的學生，走的時候，國內不要說研究課題，連單位都沒有。

他也不知道到哪去批去，也不知道到哪申請，到底誰給拒絕掉了？不過，現在他沒回去，反正他不聽這一套，他的護照可能到今年十月份就到期了，這些問題好幾人都指出來，比如我們這兒有個聯誼會會長，讀了六年了，還給他延。但是別人就不行，也是六年的，就得要回去。這些問題，好像大使館在用護照拉攏一些人，成爲他手中的一種工具。老百姓延護照應該是公民最基本的權利，它是一個公民在國外的身份證。但是到大使館手中，就變成了殺手鐮，控制人的手段，讓人覺得這種作法很卑鄙，強人所難，勒索人，這種作法難以讓人接受。我對大使館的一個人講，一個政府，也同一個人一樣，在美國應當建立他的信譽。如果你發的這些文件，幾天一變，你不相信老百姓，老百姓也不會相信你。共產黨剛解放的時候很有信譽，但是現在一天一天把信譽都失掉了。我說你們現在就不敢再失信譽了，如果再失去，就沒有信譽可言，就不能讓人相信。有些事情，我指出文化大革命、反右鬪爭失去信譽的事，他們也承認。但一接觸到留學生這個具體問題，他們覺得好像是應該的，好像文件還是受歡迎的。

我覺得大使館還有最卑鄙的一件事，他玩數字遊戲，他說出國人中有三千公派生。我想這個數字是正確的，但是三千這個數字是真正拿國家的錢，有的是考上研究生、有些由國家或各單位派出、有幾個國際銀行有名額，這些名額加起來可能就是三千。但他沒把大部份公費生列入。拿美國獎學金的留學生，在我們州大概就有好幾百，如果說把個人申請到美國的獎學金的這些人加起來就絕對不止三千，而且是三千的好幾倍。說到公費生，中國有公費公派、自費公派，還有單位公派。他現在說的公

費生三千，如果連在國內這些自費公派都算，那就絕不止三千。當他們別有打算的時候，他們就說公費生就只有三千，當他們要炫耀自己的時候，就說中國的開放政策特別好，派出的學生二萬多人，他的數字出入太大了。

如果說大使館真要執行這個政策，我們也不反對，但他必須數字公佈清楚，他的公費公派生到底有多少人，他的自費公派生到底多少人，完全自費的有多少人，單位公派的有多少人，要區分開。現在他說所有持外交護照的全是公派生，持大使館護照的是自費生，他在這裡頭亂攪。他說「不減」恐怕就是不減公費公派這三千吧，然後自費公派全等於零了，這其實是減了好幾倍。我想他是在玩數字遊戲，大家沒有這個數字，就不好反駁他，好像他說得對似的。

這次簽名運動又顯示出學生的一種自發的、本能的、敢於說話的傾向。繼續發展下去，這個民族敢說話了。這個民族的趨向是漸進的，隨著人們的觀念變化或者政府的做法引起反饋，中國老百姓按道理說大部份是害怕的，不敢做些什麼事的。但是關鍵對民主運動不在於老百姓，而在於政府犯不犯錯誤。如果它繼續犯錯誤，錯誤犯的越多越大，不敢說話的人最後也會敢於說話。因為關係到他的切身利益了，再不說話，革命可能就革到他頭上了。

在美國的留學生應該建立起一種自己的聯繫和自己的自發的團結形式，像團結工會這樣的，不要讓大使館控制的黃色學生會左右，學生應該有一個自己的核心，我覺得通過兩次簽名運動，這種核心已經自然形成了。

這個簽名運動不能這樣就完了，完了就好像不簽名一樣。假如說那些簽名的人真的受到迫害了，真的拒簽了，這些召集人還可以繼續

鬪爭。

就我個人是願意這樣做的，其他的簽名召集人還沒有聯繫，但我想大部份人也願意這麼做，因爲這關係到大家的利益，而且召集人還要對他的聯繫人負責。

我想至少應該得到政府明確的答覆，才能結束這場運動。你不能到時候隨便使虎頭蛇尾就完掉。共產黨做事老是各個擊破，他說大部不抓、大部不殺，抓幾個你也沒辦法！要組成一個自援會似的，來支持公開簽名的這些人。公開名字的這些人當然不會都被逮捕，但回去以後相當程度上也會受到一些迫害，誰都知道建國以來這種共產黨的檔案制，檔案制好像每個人背著一個口袋。而且這些聯繫人本來就冒了很多風險，共產黨、大使館一直說是少數人在煽動這些事，那麼這少數人可能就是指這些聯繫人，所謂「破壞政府和留學生之間的關係」。這回大使館批得很高，說有些人在挑撥中美兩國關係。這回好像事情小，不像上回簽名運動，這次只關係到一個留學生的政策問題，但這回大使館提的高度却比上回提的高得多。每個人都給戴上「破壞了融洽的氣氛，破壞了安定團結」的帽子。在中國，破壞安定團結罪名是相當大的。我覺得應該繼續保持聯繫，建立起一個通訊網絡，一旦有人受迫害或者被拒簽護照的時候，其它人要聲援。

至少應該有這樣一個統計數字，有一個名單：大概有多少人被拒絕了，而且情況怎麼樣，發簡報、通報，讓大家都知道。這樣起碼他就能考慮他未來的命運。

凡是簽名運動簽了名的就拒簽，以後就拒絕延期護照，不簽名的反而就漏網過關了，這樣就造成一種不鬪爭好像還得利，而鬪爭的那人反而吃了虧的局面。如果能造成一種印象

，簽了名的中共都不能夠拒絕他們，那麼就勝利了，大家就懂得鬭爭是有好處的。

現在學生面臨的教委對手很強硬，想做到每個簽名的人能得到應該得到的東西，目前來說是很難達到的。因為命運不掌握在學生手裡。要想成事的話，就要得到社會的支持，比如說，得到美國的華人教授的聲援。我認爲這次簽名運動是學生把握自己權利的機會。而且我覺得應該像有些學生說的那樣，這些聯繫人就這個文件的正確性是否可以向人大常委會提出起訴？因爲既然你要搞民主，不管這文件對與錯，老百姓都有權利對它提出看法，如果你要否決掉你就應該有否決的理由，如果你要說這個文件是對的，你也應該有對的理由。像有的同學提出的，如果大家聯合起來，以聯繫人的名義做出書面的而且有法律依據的申訴，反正不能這麼結束了。如果出現那種簽名的人就被拒絕的現象（這種現象是很可能會出現的，因爲這是瓦解這種事情的最好的辦法）。我覺得現在這個滙總的聯繫人應該和大家打個招呼，給每個人互相都通個信息，然後再集中一下。簽名還應該再堅持下去，一直堅持到這個事情勝利爲止。如果近期中國官方有什麼人訪問，一些聯繫人可以到大使館去當面展開一些談判。因爲現在這些聯繫人起碼代表了二千多人，並不代表個人，這麼多人被代表，我覺得也有資格向政府提出一些意見。現在應該正面的坐在談判桌上解決問題，不應該好像簽了名報上一登他一看就完事了。

普林斯頓大學聯絡人——問 焱

我們這裡簽名的第一批二十多人。大約有三分之一用真名，三分之二用假名。大家對文

件反映都很激烈，但一旦涉及採取行動就有顧慮，妻子和孩子沒出來，儘管支持你，還是不敢出來，這裡共有七十八個學生，有三分之一簽名。比例也算可以了。領館來了個人，沒辦法和那個人講道理。他說是試行，到目前爲止，護照都給延了。我說姑且不論是不是簽了，我們關心的不是目前的情況，是以後的情況。不在於你給不給的問題，在於國家有沒有法制的問題。反正他說沒有變，有什麼辦法？這麼大一個文件，涉及到學生的利益，文件訂之前，既沒有和大家商量，文件下達後，你還保密，人家問你說沒有、撒謊。總書記一再說要和群眾對話，現在有了政策又還保密，這叫什麼對話呢？跟他爭也沒有什麼意思。

復旦

獲亞洲大專學生

辯論會冠軍

肖曉

前不久在新加坡舉行的亞洲大專學生辯論會已經結束，復旦大學隊與台北大學隊均獲分組冠軍，在決賽中，復旦戰勝台大而獲得冠軍，台大獲亞軍。

值得一提的是，在比賽期間對雙方參賽的青年進行訪問時，問到一些在政治事項上先後順序時，兩岸學生竟不約而同地作出了相同的選擇，即以人民的幸福安寧爲第一，民族統一爲第二，「黨」居第三，國旗國號居第四。

亞洲大專學生辯論在兩年多前也舉辦過一次，那次比賽台灣方面沒有參加，北京大學隊獲得冠軍。有關那次辯論會的消息在國內報刊予以介紹，電視台也播放了辯論比賽場面，很受觀衆歡迎。

那以後，國內興起了一股辯論熱。北京電視台一馬當先，在八六年下半年組織了一次名爲「北京——走向二〇〇〇年」電視辯論。報名單位多達二〇〇多個。由於時空限制，北京電視台只好確定了十二個隊參加正式比賽，其中包括九所大學、兩所中學和一個事業單位。辯論的題目有：「物價上漲的趨勢是否可以遏止」、「北京市乘車難的原因是車少人多」、「獨生子女有無培養優勢」等。最後，外資大學隊贏得冠軍，北京大學隊得亞軍。參賽的兩支中學生隊——景山學校隊和北京四中隊獲特別獎，不少觀衆認爲中學生的辯論水平在很多方面比大學生還強。

北京——走向二〇〇〇年」電視辯論邀請了五位評委，其中之一是當時在北京市社科院工作的胡平。電視節目播出後，觀衆反應很好。這次復旦隊在亞洲大專學生辯論會取勝，估計又會刺激國內人們的辯論熱潮（在八六年下半年，在社會上大辦沙龍的同時，許多大中學校也都成立了辯論隊）。

辯論熱的興起是人民，尤其是青少年一代的民主意識增強，獨立思考能力提升，議政參政熱情高漲的一個突出表現。許多人都感慨說，要是中國的政壇、黨代會也好、人代政協也好，也能夠舉行公開的辯論，不同政見的各方也能像參賽隊員那樣彬彬有禮、滔滔不絕，中國的政治就一定能搞好了。

貧困的辯護和辯護的貧困

——紐約領事何龍與波士頓留學生聚會

李雲霞

三月二十三日晚，中國大使館教育參贊何龍面對本次有關留學生政策公開簽名信的發起地區波士頓地區的留學生，與國家教委近日的政策作了一番答辯辭。由於何參贊在講話中明確表示對「錄音留證」一事「有看法」（下文將有交代），故本文將只根據記憶與筆記整理。如有不實或遺漏之處，請衆多（數百人）在場者補充校正。

何參贊的第一通辯護辭，便對有關「中國緊縮留學政策」的「傳聞」來了個「釜底抽薪」。他舉起當日的兩份報紙——「中報」與「世界日報」，上面均載有留學生們對該項政策的「擔憂」或「抗議」，何參贊對此（是對報導，還是對「抗議」？不甚清楚）搖搖頭表示不以為然，甚至還無可奈何但却寬容地笑了兩聲。之後便鄭重宣布：最近並沒有過這樣的一個文件，正當底下學生為此鬆了一口長氣時，參贊又輕描淡寫地補充了一句：這些不過是一個「工作細則」而已。

「工作細則」？是的，只是「細則」。何參贊大大方方地將有關條款唸了一遍，無非是我們早已知道的那些：在國內有碩士學位者，

出國唸博士不得超過四年；有學者學位者，不得超過五年。大家實在弄不清「文件」與「工作細則」有什麼根本性的區別，紛紛發問。何參贊則一口咬定：細則就是細則，不是文件，有人說有文件，根本不對！然而，直到會議終了，相信在场的絕大部分人依舊不明白何為「細則」何為「文件」，作用有何不同。按理，「細則」應該是在執行「文件」的精神，無有文件，何來細則？想來不通。即使確實沒有文件，「細則」想必也是根據上面的「指示」或者「精神」來製訂的吧？那麼，這個「細則」的頒布難道不是說明上面有什麼新的有關出國留學政策的「精神」嗎？「文件」也罷「細則」也罷，作用都是細綁留學生手脚的繩索，何參贊避開實質，在那裏搞名詞偷換的遊戲。

雖然說不清「細則」與「文件」有什麼根本性的區別，但事情已經很清楚：上面的「精神」已經有所變化，否則，為什麼近兩年來逐漸從前些年強調「放」出轉為強調「收」回？何參贊於是作了如下解釋：「國家的留學生工作包括「派」與「收」兩個部分，前幾年光顧了「派」，現在也應該考慮到「收回」了，

所以才有這一細則的製訂」至此，何參贊已和盤托出，並且說得嘴滑，順便抨擊了前幾年的中央政策。「國家的基本政策——對外開放，包括對外派出留學生——不變，所以留學生政策沒有任何變化。有人說，我們要削減派出留學生的名額，特別要削減派往美國人員的名額，根本沒有這麼回事！」何參贊有事實為證：「國家公費出國人員每年三千——從八十年代初至今，持續數年，在人數與派出地區比例上基本不變，至於自費生，國家從來就不卡！」

何參贊說的倒的確是事實。但不知是不是有意疏忽，何參贊忽略了留學生中的一大群，亦即當時台下坐着的大部分人——介於公費生與自費生之間的「自費公派」留學生。的確，由國家出錢的公費生，想派出什麼地方，想讓他們什麼時候回來，還不是憑國家的一句話？對這區區數千人（都是國內精挑細選的先進分子）又何苦來鄭重其事地下達各種文件、條文？事實上，在美國留學的大部分「公派」學生，都是由美方出錢，甚至自己打工掙錢的「自費公派」留學生，他們在國內已經有了碩士學位或者是一定級別（僅僅是本科畢業生可以拿F-1簽證辦成自費生），而上述「工作細則」影響到的，也主要是他們。

鑒於何參贊一口咬定「派出留學生的精神未變」，（為什麼要變？何參贊反問道，別人替我們國家培養人材難道還不好？）而且也不認有過任何限制出國留學的「文件」，一位留學生站了起來，掏出一份註明了「一九八六年一〇六號文件」字樣的材料（這回確乎是「文件」了），唸了下述幾條：①公派留學生出國讀博士，有碩士學位者不得超過四年，只有學士學位者不得超過五年；②一般不得讀博士後，③單位中的工作人員，未經上級批准，不得

沒有流動就沒有安全

房志遠

中共最近收緊留學生政策的作法確有點令人啼笑皆非。不過仔細一想，這又絕不是偶然現象。從歷史上看，這種蠢事，中共確是經常為之，而且頗有傳統。

由此我聯想起一九八四年中國銀行的外幣存款政策，兩件事可謂異曲同工之妙。八十年代初，特區建立以後，港幣大量湧入廣東省，並在市面上公開流通。於是，海外華僑在接濟國內親屬時為避開官價匯率兌換的損失，大量帶現鈔直接入境，於是造成通過中國銀行匯寄的「僑匯」大幅度下降，而民間老百姓手中的外幣現鈔則大筆沉澱。

為了將這筆游離在外的外匯掌握在國家手裡集中使用，中國銀行在特區的分行首先公佈了外匯存款政策，後來又推廣到廣東和福建境內。這個政策的絕頂聰明之處在於：錢可以自由存入，但不能自由取出。

按這個政策規定，老百姓將外幣存入銀行確是相當自由的，手續也很簡單，條件優惠：本來持有外幣是非法行為，現該行一概不予追究，存款時無須驗明身份，也不須出具任何證明，利息頗為誘人。總之不會為存款者帶來任何麻煩。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進步。

可是取款時條件就多了。在一般情況下只能提取人民幣，而且按官價匯率。如果你想提取外幣，必須出具一系列證明。例如要醫生證明，家裡人得了某種病國內無藥醫治，非要花

外匯到海外買不可。甚至連出外留學也不能取走本人名下的外匯存款，非要移民海外方能提走這筆財產。

顯然，這個政策的效果是不言而喻的。只有世界上頭號的傻瓜才會把他的外匯存進中國銀行。不錯，存入銀行的那筆錢是屬於你的名下的，可是你只有所有權而沒有支配權。你把財產放進了玻璃櫃，看得見，摸不着。以這種方法引吸外匯，真是聰明之極。不過聰明反被聰明誤，存款額了了無幾。人們寧願把錢放在枕頭底下，不要利息。

按西方經濟學原理，人們對手中的財產有兩種基本心理：一種是安全偏好，另一種是流動偏好。安全偏好是最基本的要求，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財產首先安全，這很容易理解。可是流動偏好同樣重要，因為沒有流動就沒有安全。道理很簡單，無論股票、債券、不動產，只有當它可以出手轉移產權的時候才是安全的。一種鈔票只有當它可以隨時兌換成黃金或其它貨幣時才是可靠的。同樣，存款只有當它能自由提取時才是安全的。世界上的邏輯常常是十分幽默的，錢是否能「自由地」流入完全是取決於它是否能「自由地」流出。那種只願錢流入，而不許錢流出的「聰明人」是永遠也集不到資的。

人材的道理也是一樣。人們在選擇職業、選擇居住地和國籍時，同樣具有安全偏好和流

動偏好。每個人都會考慮：一旦當我的這一選擇失敗了，是否有可能流動，並作重新選擇。如果重新選擇是可能的，那麼第一個決心才有可能下。要知道，世界上的賭徒並不很多。

根據沒有流動就沒有安全的原理，凡是人材濟濟的地方必是讓人們離開很方便的地方，而凡限制人材外流的地方，肯定吸引不了人材。美國能聚集世界上第一流的人材，很重要的一點是取決於它允許人們自由地流動。其實今天的美國，流出絕對自由而流入未必自由，可人們還是爭先恐後地流入。相反，中國大陸出國要經層層關卡，最近還要交押金擔保，同時用贈送路費的優惠吸引留學生歸國，可結果却是人們爭先恐後外流，外流人員徘徊海外不歸。

是中國的知識分子貪圖生活享受嗎？那麼怎麼解釋一九五七年之前當中共並不限制人才外流的時候（那時去香港是自由來回的），知識分子內流多於外流，大批海外留學生放棄西方優厚的生活條件和前途回國服務，而當五七年後限制人才外流的時候，反而人才外流又遠遠大於內流了。很多中國第一流的專家學者寧願在美國餐館洗碗也不願回國服務。

美國的西部開發是相當成功的。人們說這是由於美國人具有冒險精神。而中國近四十年來開發邊遠地區的移民嘗試總是失敗，上千萬的知青最終倒流回城，人們把這歸咎於中國人沒有冒險精神。這真是天下奇冤！

美國人之所以敢冒險，因為他們是安全的。他們可以自由流動，命運在他們自己手裡，當他們失敗了，他們有退路，還可以回到東部。而中國人所冒的險比美國人大一百倍，他們被戶口制度所限制住了，不能自由流動，每一個移民的決定都是終身的、永遠的、不可反悔

的。他們之所以不願冒險，因為他們沒有安全，而最大的不安全感是不能自由流動，命運不在自己手裡。

目前中國留學生的心情頗為相似。是他們不想回去嗎？從統計數字和表面現象看確實如此。可是更深一步研究未必如此。我接觸過很多留學生都表示不喜歡美國，表示最終還要回國。他們並非口是心非。他們之所以「賴」在美國是想有了「綠卡」再回去。爲什麼？顯然爲了安全。有了綠卡就可以自由出入，道理很簡單。

中國留學生今天所冒的風險，一點也不亞於當年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在美國，他們是弦上的箭，引而不發，尚有重新選擇的主動權，可是一旦踏上歸程，就成了出弦的箭，再也沒有選擇餘地了。

如果中國大陸當前的政策是可以自由出入國境，如果人們在那裡可以自由選擇職業，我相信大部分留學生會毫不猶豫地回去，他們會想，大不了混不下去還可以出來（美國方面要卡也可以先把老婆留在美國自己回去）既然有退路，何不妨回去試試。可惜這只是「如果」，在這個如果沒有實現之前，大部分人還是在觀望、徘徊。

可惜中共政府永遠也不懂得沒有流動就沒有安全的原理，就像他們永遠也不理解最基本的人性特點，總是一廂情願地拔苗助長一樣。如果他們能聰明一點，把贈送歸程機票改爲贈送回程機票來吸引留學生歸國，一定會產生奇效。錢不多花一分，局面將會扭轉。

不過……，如果中共真能聰明到理解人性的地步，那麼，我懷疑，他們還能被稱爲共產黨嗎？

不稱心的婚姻

狄狄

到明年，他們就結婚四十年了。

應該說，這樁婚姻——我指的是中國人民和共產黨的婚姻——是一樁不幸的婚姻、不稱心的婚姻。雖然他們曾經有過熱戀、有過蜜月、有過山盟海誓、如膠似漆；但是現在，只剩下牢騷和怨氣、不停的吵架，甚至動手動腳。

有的人現在是一心要脫離，哪怕從今往後打光棍，儘管對於一個結過婚的人來說，重新當光棍更痛苦。這就是爲什麼近些年來國門半開，有些人就拼命往外跑，再也不想回去，即便是人過中年，今後在完全陌生的環境中生活，日子分明不會過得太好。

有的人則認爲，和誰結婚都可以，只要不是她！幾年前，有些地方自由競選，非共產黨員幾乎總是能戰勝共產黨員。台上人說，我不是共產黨員（倒未必是出於炫耀），台下立即報以掌聲。

有的人則不免想起了前妻，「看來，那位勝似這位。」更何況，「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那一位還比早先大不相同了呢。

有些人說：吃不着的葡萄是甜的，老婆是別人的好，這都是人之常情。但如果當了真那就未見得明智了。「國民黨就真的那麼好？」「可是」，另外有人反駁說，「台灣現在是多

黨制，台灣人民有了離婚自由和再婚權利，這就是他們的福氣。」對於這個回答，誰都沒話可說。

扮演忠實丈夫角色的自然也還有。你覺得奇怪嗎？其實並不奇怪，因爲在這些人看來，既然她天生又悍又妒，惹是惹不起的，離又離不掉（一說離她就要跟你拼命），倒不如回過頭來改善關係。這也是一種現實主義嘛。況且這二年來，她妒性如故，悍性却也有了一些收斂。過去一天揍三次，現在三天才揍一次，能說不是進步嗎？

至於說到她自己，她有她的難處。雖說還不到半老年紀，姿色却已全無。再說自己是天下第一美女，要求別人忠心不二，確也不太好看得出口。唯一的辦法是絕不讓丈夫有機會接觸到別的女子。「離了我，你不就成單身漢了嗎？一個人總得有老婆！」偶爾，她也念及當丈夫的實在可憐，有意略施溫存的。可是一旦收了兇相，露了笑臉，對方就不免想入非非，以爲有了另結新歡的機會。真是「人不宜好，狗不宜飽」，對男人必須嚴加管束。這當然是傷感情的事，而且年老力衰，是不是管束得住，那也是個問題。

現在，我們還不知道這樁婚姻會如何結局？

從葛駿鋒案件

看中國知識分子

之命運

李奮強

三月十四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第四版刊登了上海法院判決一例出國人員違約案：上海外國語學院葛駿鋒，赴日進修，期滿後，提出繼續進修的合理要求，校方無理拒絕，葛因而逾期不歸，其家屬被判罰款二萬元。

作為一個在國外留學即將期滿的留學生和上外的校友，對葛駿鋒的遭遇深表同情，並對上外的唯利是圖的做法，深表義憤。

在局外人看來，確是葛不對，他違反了一條約，應受其罰。但如果深入瞭解實際情況，看法就會有所不同。首先，所謂的「條約」本身是否合理？它是平等、自願的合約，還是變相的賣身契？

葛駿鋒有沒有爭取長期進修的正當途徑？近年來，在中國大陸，出國風盛行。然而在當前情況下，「出國」並不是提高普通教師業務水平的正當途徑，而是當權者對下屬的一種恩賜，這種恩賜取決於其對象在權力交易中對上司效勞的程度。真正的知識分子，尤其是那些不願意賣身投靠的知識分子，與這種「恩賜」是很難有緣的。

本人與葛駿鋒有一面之交，他給人的印象

是忠厚老實，熱愛專業，是個典型的讀書人。這次赴日留學延期未歸，無非是放不下他心愛的專業。至於說什麼學校「缺」教師，也是一種借口，事實是，上外日語系教師超編，另外還有新的研究生將畢業，因此，用不着遠水救近火。

還有所謂「合同」本身也有問題，它表面上是一種「協議書」，但實際上在上海外語學院，已蛻變成一種變不講理的「賣身契」。公證所需的保證人，被篡改成「親屬聯保」；罰款金額翻倍加碼，擅自提到二至三萬；回國服務，改成回上外服務，服務期延長到八年以上，並不能調離原工作單位。它既有上海流氓敲竹杠的霸道作風，又有在敵偽時期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搞的「聯保制」的強盜習氣，一點「協議」的味道都沒有，而且這些蠻橫的規定會變得越來越苛刻。

上述葛駿鋒案件的情況，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可見一斑。其功過是非，明眼人自有公正的判斷。上外的校友，海外留學生及一切知識分子，應團結起來，相互支持，相互幫助，為自己的命運而抗爭！



東湖



HUNAN EAST RESTAURANT

● (LEESBURG PIKE PLAZA)
3501 S. JEFFERSON ST.
BAILEYS CROSSROADS, VA 22041

TEL: (703) 820-3901
(703) 820-3902

● 9546 OLD KEENE MILL ROAD
BURKE, VA 22015
TEL: 703-567-7600

● FOX MILL SHOPPING CENTER
RESTON, VA 22071
TEL: 703-476-1666

名廚主理 · 豪華筵席 · 有口皆碑 · 近悅遠來

評 中共使館的三板斧

公開信簽名者之一

大陸留美學生公開簽名信的行動，使中共使領館着實驚慌失措。於是紛紛派出「救火隊」到各院校熄火。救火隊使出了「三板斧」，在此值得一書。

第一招是矢口否認文件的存在，當面說謊。這是砂鍋搗蒜式的孤注一擲，一旦謊言戳穿，從此信譽掃地。所以連對中共估計極低的人也沒有想到要出這三板斧「絕招」。結果當學生們出示文件複印本時，使領館的工作人員便狼狽萬狀，只能絞盡腦汁圓謊，諸如把文件狡辯為「試行」、「使領館可靈活掌握，甚至拒不執行」等等。這些狡辯既不能抹殺文件存在的事實，想貼「抗上」的金，反而抹了一臉鍋灰，引起學生會心的哄笑。中共下級為上級賠本效命，也煞是可憐。

第二招叫「分化瓦解，軟硬兼施」。使領館人員到處約人談話許諾，表示他們「也不同文件的執照，所以具體執行時會手下留情」。有的人還拍着胸脯作個人擔保：「到時候找我老×好了，保證你們的護照可以延期。」這是動之以情的苦肉計，迎合留學生的不滿，說辭也頗為動聽。另一方面，這些人又找已簽名的同學談話，要他們考慮後果。這一拉一打，便鬧得學生們人心惶惶，很多人在猜測，既然可以「靈活掌握」，會不會凡簽名者就不予延期，而不簽名者就可以放過？留學生生命如懸絲

，全在使領館的一念之差，這就唬住了一些膽小的人。

如果說中共使領館第一招是愚蠢至極的話，那麼這一招不能不說是相當刁辣的。不過這一招並非毫無破綻。其一，所謂「靈活掌握」，其實就是人治，即使文件規定不合理，畢竟還有統一標準，有章可循。而「靈活掌握」就麻煩了，豈不是平時和使領館關係好者就得益，而反之就倒霉。其二，個人拍胸脯的許諾究竟有多大的可靠性？中共大幹部打的保票可謂多矣，往往後來自己也不知去向。現在小小使領館人員的保票究值幾何！不說他們變動如走馬燈，將來打燈籠難尋，即使來日路狹當胸揪住，他豈肯為兌一張保票，給學生請命而失掉烏紗帽？

然而，這一招的毒辣處却在利用各人的不同利益進行分化，願者上鉤給甜頭。如果今後真出現簽名者的護照被拒延，而沒簽名者都可以過關的事，那麼這便是明顯的政治迫害。我認為所有簽名發起人和聯絡人對此絕不能坐視不理，應當繼續利用這次簽名活動形成的聯絡網，組織學生，為爭取自己的權利而鬪爭。推車的倒霉而反是搭便車的人得益，對這種情況絕不能聽之任之。否則，今後再也沒有人出面為同學們的利益而戰，結果，使所有的人一齊遭殃了，變成聽任宰割的綿羊。誠然，未簽

名的同學的苦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是有一個淺易的道理人人都應當明白：先不說使領館人員的保證是否可靠，就算它可以兌現，你逃得「初一」，就能躲得過「十五」嗎？如果下一次大家都想搭便車，不想出面力爭自己的權利，那還有什麼「便車」可搭？！所以，破使領館這一招的唯一辦法就是團結堅定。首先是所有聯絡人要團結堅定，既然發起了這個運動，就要對廣大簽名同學負責。萬一簽名的同學受到迫害，要立即互通消息。為此，還可以成立真正代表學生利益的學生會，出面與官方談判。其次，無論簽名還是不簽名的同學，都要團結。唇亡齒寒，休戚相關。萬一簽名的同學受到迫害，占大多數的未簽名同學要起來聲援。這是責任、是良心，實際更是為您自己的權利而戰。需知，今天輪到他，明天就會輪到您。

使領館的第三招「三板斧」是轉移視線，借帽壓人，他們不再正面論述廣大留學生的要求是否合理，是否正義（這方面他們確實理屈詞窮，無言以對）而是指責這次簽名運動和「中國之春」以及國民黨有關，企圖以此嚇退簽名的同學。如果我們說這三板斧第一招蠢，第二招刁的話，那麼這第三招就有點蠻了。

只要有頭腦的人仔細想想就會發現以上指責的荒謬。一件事與什麼政治勢力有關和它本身是否合理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把

它們扯在一起是毫無道理的。況且，何謂「有關」，定義模糊。支持就可以認為是「有關」。試問，如果「中國之春」支持某項世界和平運動，那麼所有海外留學生是否就不能舉辦維護世界和平的活動了？「民聯既被定為反動組織，那麼凡是民聯擁護的，我們就要加以反對……」真是如此，民聯若要什麼人垮台，只要「支持」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民聯擁護了教委文件，使領館便立即收回了，豈不方便！

可以說在這三板斧中，這一招是有一定效果的。一些主要發起人因此而謝絕「中國之春」提供幫助。（事實上，「中國之春」雜誌在留學生中的覆蓋要遠遠超過「中報」、「世界日報」，這樣一個有利的傳播工具不利用是可惜的）其次，確有相當比例的同學就是在這種恐嚇之下不敢簽名的。

其實，有一個道理只要一點破是非常明白的。簽名運動的參加者，無論怎樣避嫌中國之春，都是徒勞無功的，都無法避免中共的責難。有一次王炳章到我校演講，曾在回答問題時說「只要是共產黨不喜歡的事，無論中國之春參與與否，中共都會把功勞歸在我們頭上。」道理很簡單，中春是否與事件有關中共並不真正關心，他們用意只是要用這根棍子來嚇人。說「有關」就「沾邊」，沾邊就意味着將來回國挨整，目前親屬倒霉（「有關」的恫嚇，是以專政手段違憲整人的先例為後盾的。）我敢保證，什麼人今後只要幹了共產黨不喜歡的事，他肯定逃不脫「中春」的嫌疑。「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避嫌既是百口難辯，那只有什麼也不幹。然而，中共在不斷地損害留學生的利益，却又不能不自衛？奈何？

退一步來講，希望「中國之春」不要參與簽名運動的要求也是沒道理的。且不說人家中

國民聯有權利幹自己認為符合自己宗旨的活動，而且據說他們的成員中也絕大部份是留學生，憑什麼不允許人家為自己的成員說話。參加了民聯的留學生不也是留學生嗎？不也有自己的權利嗎？

綜上所述，對付使領館的三板斧，退避絕無出路，唯一的辦法是衛護自己的正當權益。

首先要什麼政治勢力的干預與簽名運動的合理性、合法性、正義性區分開來。不和使館討論前一個問題，而只和他們論理第二個問題，咬住不放，不讓對方轉移視線。

其次，改迴避為歡迎，公開宣稱只要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歡迎任何政治勢力的支持。他們支持我們，只說明他們認同我們的目標，並不等於我們認同它們的目標。如果說，這弄得大家都有嫌疑，那麼「人人有份」也就「法不責眾」。那時所有的人就都將是安全的了！

最後我對「中國之春」有一個建議。反正中共會把所有的「功勞」歸功於你們，何必躲躲閃閃呢？與其蒙受不白之冤，不如名符其實，乾脆開動全部機器，動員你們所有組織系統和宣傳渠道支援簽名運動。你們不願連累簽名留學生的好意我們領了，可是這樣就能保證他們的安全嗎？只有一切都公開化了，大家才是安全的。

只要有一半簽名者取得與我相同的共識，我就公布我的名字。絕不戲言。本人不在乎和「中國之春」「有關」。



推荐

蔡宏

閱讀 思考

《無所畏懼的波蘭政治活動家

—米奇尼克—



「無所畏懼的波蘭政治活動家——米奇尼克」非常值得一讀。
(接下一頁)

有兩個問題應該引起我們自己的認真思考：一、米奇尼克的思想演變歷程，他如何從一個正統意識形態的虔誠信仰者轉變為體制內的批評者，又如何進而轉變為持不同政見者，以及最後，成爲反對派的政治活動家。

二、米奇尼克關於在波蘭爭取自由民主的基本策略思想。他的非暴力式的自我約束的革命，他對公民基本權利和獨立性的大力強調，以及他提出的和各種派別、傾向、包括一向被共產黨正統教育斥爲「反動」的傳統的天主教勢力的大聯合思想。

讀一讀，想一想，我們相信會對我們有很大的啓發。

波蘭和中國都是社會主義國家。波蘭發生的一切，對於我們中國，都有着很大的借鑒意義。我們強調這一點，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爲現在有不少人在討論中國問題時，往往有意無意地低估了從一九四九年以來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作用，而把很多毛病過多地歸咎於傳統文化、歸咎於國人素質太低、歸咎於我們底子太薄等等顯然次要的原因上去。

當然，波蘭畢竟不是中國，波蘭的經驗和教訓都未必完全適合於中國。比如說，波蘭一直處於兩個軍事強國（德、蘇）之間，其獨立性一向受到嚴重威脅。正像許多人指出的那樣，如果不是來自克里姆林宮的威脅陰影，波蘭一九八〇年團結工會早就獲勝了。在這一點上，中國比波蘭幸運。

一定會有人說，中國共產黨現在很開明，改革搞得不錯，所以我們和波蘭的情況不一樣。持這種說法的人多半對波蘭的情況毫無所知。這裡，我們不妨簡單介紹一下。

事實上，波蘭的改革要比中國的改革早二十幾年！

從一九五六年十月，波蘭就糾正了斯大林時代的極「左」錯誤。波蘭的鄧小平——哥穆卡爾，在結束了五年的監禁生活後，在萬眾擁戴之下當上了波蘭黨的第一書記。從此開始了所謂「波蘭的十月」的充滿希望的新階段。在那時，波蘭便已着手進行經濟改革。領導改革的是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家奧斯卡·蘭格——社會主義國家第一位經濟改革理論家。在政治上，一九五七年一月進行的新的議會選舉，開始實行了差額選舉制（早於中共十三大整整三十年！），而且還公佈了得票結果（這一點中國至今尚未做到）。文化生活方面也有一系列重大突破，人道主義研究的興起，一些深刻反映具有重大政治敏感性的歷史事件的電影的公映。可是很快地，那些具有自由化傾向的活動就遭到哥穆爾卡的壓制。掌權者先是同知識份子、隨後同大學生、最後同工人發生了衝突。大學生自己的報紙被查禁，大批大學生在華沙的示威遭到警察的殘酷干預，一些享有國際聲望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如哲學家亞當·沙夫）被解職，許多優秀的作家和藝術家開始退還黨證（這點中國人不一樣，他們一再被開除還一再要求加入，生怕受冷落）。一九七〇年冬天，由於經濟改革引發的物價上漲，導致了大規模工人罷工，罷工遭到了鎮壓，但哥穆爾卡也因此而下了台。

新上台的蓋萊克執行一條遠比哥穆爾卡更改革的路綫。波蘭的經濟確有進展，人民生活也有明顯提高，波蘭的人均收入已達到三千美元，從而成爲中度發達國家，一九七〇年每七十一人有一部汽車，一九八〇年每十八人就有了一部汽車。在政治上，蓋萊克幾乎每天都會見群眾代表，並四處視察。政府的「透明度」也大爲提高，人人都知道，政治局每個星期二召

開會議，並發表公報。文化領域，開始出現爲數不少的一批非官方出版物（油印、複印），人們互相傳閱，一些持不同政見者組成自己的組織（例如保衛工人委員會），發表文章尖銳地批評政府。而當局對此表現了照中國人看來是相當大的容忍態度。一位波蘭安全部的官員說（在一九七八年）：「我們掌握了一切地下出版物和地下組織的名單，我們可以在一夜之間把他們一網打盡，但是「上頭」不准我們這麼做。」這個「上頭」就是指蓋萊克。當然，有時當局也對這些活動採取了壓制，不過並不經常。

但是，波蘭人民並沒有滿足於蓋萊克的「寬鬆」，他們追求的是真正的自由民主。於是，他們搞起了團結工會。團結工會的特點是，它是一場政治活動，是一場以反專制、爭民主爲宗旨的政治活動。它聯合了廣大人民群眾，從直言不諱的持不同政見者到馬克思主義派哲學家，從無神論者到天主教徒。儘管人們對後來波蘭團結工會採取的策略是否得當有很大的爭議，但是他們對於團結工會的誕生的早期發展策略還是一致欣賞的。

很清楚，波蘭的領導絕不會比中共領導做得差。但顯然，中國的知識界，尤其是以精英自居的知識份子們的獨立意志和批判意識還落後於波蘭人。

據說在所謂「困難時期」，劉少奇說過一句話。他說：「要不是中國的老百姓好，早就發生匈牙利事件了。」劉少奇後來的慘死，當然也是因爲「中國的老百姓太好」造成的。其實倒不必怪老百姓，應該怪一怪作爲社會意識表達者的知識份子。在高壓之下發不出聲，這是一回事，但要是我們自己本來就沒有堅定的批判精神，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無所畏懼的 波蘭政治活動家 ——米奇尼克

邁克爾·考夫曼 著 程晨橋 譯

亞當·米奇尼克 (ADAM MICHIK) 是位多次入獄的波蘭人權運動人士，政治理論家暨作家。兩年前他因煽動民衆而受審時，波蘭法庭照例收到了一份關於該被告人物的分析報告。這報告是由一位名叫安德柴·薩勒克基的駐華沙中城警察局 (ANDRZEJ SOLECKI) 警長寫的，米奇尼克沒關禁閉時便住在華沙中城。

警察和米奇尼克的欣賞者都對這個四十歲的波蘭人作了描述，不出所料，兩種描述截然不同，這些欣賞者包括：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參議員愛德華·M·肯尼迪 (EDWARD M. KENNEDY)、意大利前總理貝帝諾·克拉西 (BETTINO CRAXI)；也有作家如阿瑟·米勒 (ARTHUR MILLER)、威廉·斯泰隆 (WILLIAM STYRON) 及喬納森·希爾 (JONATHAN SCHELD)，希爾把米奇尼克稱爲是世上屈指可數的創造性強，想像力豐富的政治思想家；曾獲諾貝爾獎的詩人柴斯如·米諾茲 (CZESLAW MILOSZ) 把他比作甘地 (MAHATMA GANDHI)。也有人把他比作湯姆·杰佛遜 (THOMAS JEFFERSON) 和約翰·斯圖亞特·密爾 (JOHN STUART MILL)，也有人因爲米奇尼克那種跨越時代的思想與行動而把他比作安德魯·馬爾羅 (ANDRE MALRAUX)。

然而這些人從來沒有像警長薩勒克基那樣到華沙米奇尼克的朋友圈子中去訪問過米奇尼克的鄰居。從這些訪問中，那警察向格但斯克 (GDANSK) 法庭作了如下報告：米奇尼克獨自住在一個一百又二分之一平方米的公寓裏，此人收入來源不明，失業約有二十年；男女客人整天訪問他，此人不修邊幅，一心想推測社會主義。那警長還繼續寫道，此人「有猶太血統」。米奇尼克可從來沒有隱瞞過自己猶太血統，他聲稱自己的國籍是波蘭。

我很同情警長薩勒克基，因爲他受寫作體材的縛束。不過他真的可以自由發揮的話，他仍然會發現米奇尼克的個性，思想及其影響還是很難捉摸的，要恰如其分地表現出來也是不容易的。

有個波蘭詞 DZIAŁACZ，意思是指一個以

天下爲己任的全職政治家。用這個字來形容米奇尼克很是貼切：他曾組成一個維持會來幫助被解雇，被毆打的工人，他曾編輯過未經刪減的資料，他做過非法團結工會的顧問。當他是政治犯時，政府會提議以移民爲條件而給他自由，被他拒絕了。不過這個字眼並沒有解釋：爲什麼許多書籍，文學評論文章以及他那日益增長的國際聲譽都是把這位哲學家 and 提倡非暴力反對專制的策略家「聯繫在一起」。

這個詞也沒有使人想起這樣一種人；愛玩，心情開朗且又合群。米奇尼克在少年時就是一個縱橫家，從那時起米奇尼克就爲着人類的自由而鬪爭。在談笑間，他時而公開表態，時而出謀策劃，時而又東奔西走網羅人材。

同捷克的伏克拉夫·海伏爾 (VACLAV HAVEL) 和匈牙利的喬基·孔納特 (GYORGY KONARD) 及簡諾斯·切斯 (JONOS KIS) 一起，米奇尼克描繪了怎樣使用非暴力的手段從共產主義的死胡同裏闖出來的藍圖。是米奇尼克首先有這個設想，把沮喪的無神論者，信奉不可知論的左翼份子及民族意識熾烈的天主教徒聯合起來，這便爲團結工會的興起鋪平了道路。他還提出并發展了其他一些理論，例如「自我克制的革命」。根據這種理論，面對着那個由地緣政治學造成的可悲又可怖的政權，人們既不是當順民，又不是當叛逆，而是堅持公民的自然權利。同樣地，他也嘲笑過烏托邦式的國家，他督促人們努力向前寧願生活在不完美的國家裏，從中學會怎樣盡量少吃虧，少受罪。他提出過一個保障人權的「新進化」的建議，這樣在與共產黨領導人談判社會契約時，契約便有了根本的內容。

在試圖描寫這個不可捉摸的作家及其思想時，我很幸運他有着警長薩勒克夫所缺乏的東

西一與米奇尼克的友誼，雖然我僅有接觸他的鄰居，但我們自己倒經常見面。去年十一月，他在我家舉辦了他的通宵生日派對，參加的人有三百五十多個。其中有煉鋼廠工人、作家、前科犯、製片人及詩人。五十五年前，我們倆的父親因是戰前地下共產黨而一起出庭受審，隨後在獄中和出獄後都在波蘭共患難，這種關係把人聯得很緊。我到米奇尼克的家中告訴他我希望寫點東西，這是為那些不知道他，很可能從來沒有讀過他的書或是文章的人而寫的。我問他是否知道，為什麼美國人民會對他的生活及思想感興趣？他說他將考慮我的問題。

自從去年夏天大放出獄後，米奇尼克公日程表緊湊得使人覺得活受罪似的。當前，波蘭的反對勢力正處於休眠狀態。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MIKHAIL S. GORBACHEV）目前的政策與波蘭工人那種沉悶的牢騷相比，看來會更有前景。米奇尼克眼下閱讀着一切他能找到的俄語期刊。他每星期要會見好幾十個人。他試圖在波蘭工人運動中緩和局勢，彌補裂縫，並正在寫一篇關於反對派與教堂之間關係的論文。這位 DZIALACZ 說，「你知道我在獄中起居有節，我可以寫作，但是一旦自由了，有那麼多事要做，很難寫作了。」

米奇尼克有意花了不少時間來對作家、詩人、演員、印刷商及地下禁書商笑臉相迎。他有時表揚他們，有時又責備他們。他支持他們，鼓勵着波蘭這種獨立得令人驚訝不已的文化。這種文化包括了所有非法生產及發行的書籍，舞台作品和錄像帶。

與此同時，米奇尼克已經，建立並保持了同外國的名流強人的聯繫用他的話來說，是「豁出去了」，把他們與波蘭的解放事業連結起來。在過去的幾個月中，他在波蘭會見了法國

外交部長吉恩·伯納德·雷蒙（JEAN-BERNARD RAIMOND）、美國代理國務卿約翰·C·惠特海德（JOHN C. WHITEHEAD）及紐約眾議員史蒂芬·J·索拉斯（STEPHEN J. SOLARZ）。在五月間他預期會見參議員肯尼迪，肯尼迪將帶來一九八六年的羅伯特·F·肯尼迪人權獎，米奇尼克與他的密友比克紐·布克（ZBIGNIEW BUNJAK）前地下團結工會的逃亡領袖同獲此獎。

在獄中米奇尼克偷運出一批文章，後來這些文章發表於歐美的名雜誌上。米奇尼克說他很高興地發現，在獄中時他自己的知名度高了很多，遠勝過那些把他投入獄中的官員。他把這歸功於友人與支持者組成的聯絡網。其中有牛津大學及芝加哥大學的哲學教授萊斯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 KOWSKI），波蘭杰出的歷史學家諾曼·戴維斯（NORMAN DAVIES）及米諾茲（MILOSZ），後者曾為米奇尼克第一本英語版書「獄中來鴻及其他」寫了前言，該書去年已在美國出版。

最近，當簡·芳達（JANE FONDA）在波蘭時，米奇尼克花了好幾個小時，試圖說服她拍一部關於最近波蘭事件的電影。在那到處是書籍的房間裏穿着寬鬆的牛仔褲和運動衫（僅有兩件運動衫）的米奇尼克很激動地堅持說，拍這樣一個電影的效果勝過寫一百本書。芳達小姐對他那番熱情洋溢的開場白給了讚許，接着問他準備不準備參加這電影的演出。米奇尼克結結巴巴地說：「雖然有人講我的我的發一發一發音有問題，我總覺得由於反猶太主義的存在，我做演員成功的可能性不大。」

他又與芳達小姐的丈夫湯姆·海登（TOM HAYDEN）暢談了一整個上午，回憶着他們在一九六八年身為學生運動領袖時的情形，當時

他們一心想創建一種道義上的政治。這兩人以後的遭遇却正是如此的不同。海登曾一度竭力支持暴力行動，現在却成了加利福尼亞州州會議員，美國這個各派共存的民主社會接受了他，而他也溶入其中了。米奇尼克雖然從來沒有提倡過暴力，但他至今還處在理性鬭爭的衝動中，雖說社會主義政權堅如頑石，他還試圖尋找缺口。他對警察仍是提心吊膽，警方對他也仍是虎視眈眈。

幾個星期後，米奇尼克請我去看他，他雖然是要想炫耀一下教皇二世題贈給他的新約全書。這個禮物放在離床很近的書架的一個很重要的地方，還面對着他稱之為自己「虛度青春紀念品」的馬克思的半身像。在這幾個星期中他一定在考慮着我的問題，因為他突然從教授開新課的語調演講起來了。他說生活與思想中最具有啟發性的是自己怎樣從一個體制內的批評者演化成一個持不同政見者，進而又演變成政治反對派中的一員。

米奇尼克說道：「我發覺我是那幾個經歷過這些階段的人之一，因為在波蘭所有這三個階段——都有過它自己的歷程。俄國人建立了一個高度發展的持不同政見者的文化，其中有一個人獲得過諾貝爾獎，他們分別是索爾仁尼琴（SOLZHENITSYN）和薩哈羅夫（SOKHAROV），但是他們的觀點不能從道義上轉移到政治上來。一些捷克人和匈牙利人是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家同時也是持不同政見者。」

米奇尼克邊徘徊邊講述着，我想這是他坐牢六年所養成的習慣。他談到自己人生的很多片斷就像當年盧梭（ROUSSEAU）在「愛彌爾」（EMILE）中描寫愛彌爾怎樣受教育一樣。「請想像一下，在一個共產黨國家中，有一個年青人從小就受這樣的共產主義的教育，

以致於他相信周圍的一切口號。「米奇尼克說道，「他所看到的書都說共產主義是反對戰爭的，他便信以為真。他看到過的書都說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相反，共產主義意味着正義和公正。他相信這點，他相信共產主義是真理。」米奇尼克生長在一個把共產主義當作是救世主的家庭裏，個人的犧牲與約束都是為了達到公正。當他六歲時，斯大林死了。八年後的一天，有個遠親帶他去公園散步。他告訴米奇尼克，蘇聯軍隊把里蘇愛尼亞 (LITHUANIA) 反法西斯游擊隊繳械後把他們放逐到西伯利亞多年。米奇尼克還獲悉了波蘭官員在蘇聯被謀殺之事以及里賓特洛浦—莫洛托夫 (RIBBENTROP—MOLOTOV) 條約「即一九三九年蘇德條約」。

米奇尼克繼續回想着說，「有一天這個年輕人在課堂裏站起來說，『對不起，老師，我所瞭解的是蘇聯在一九三九年以幫助波蘭為理由來解釋自己的行動。但是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幫助呢？你到一個國家去，把波蘭士兵繳械，然後把他們送往俄國最遠的地區去。』那個老師望着那位學生，彷彿他不是發了瘋就是一個內奸似的。然而那位學生知道他自己共產主義者，因為共產主義意味着事實真相。後來這個事件便以米奇尼克被迫轉學而結束。」

十二歲時米奇尼克參加了「紅色」童子軍，這是個由約二百個男女少年組織的名叫華爾特雷滋 (WALTERITES) 的團體。華爾特雷滋是波蘭共產黨員卡勞爾·斯威克柴斯基 (KAROL SWIERCZEWSKI) 的假名，在西班牙內戰時他領導着西班牙忠於共和政府的軍隊；歐尼思·海明威 (EARNEST HEMINGWAY) 的小說「戰地黃花」(又譯「鐘為誰鳴」)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中高爾茲將軍

即是他的化身。

在我們的童子軍中，我們有下列的觀點：你不喜歡你所在的世界嗎？很好！共產主義者是永不滿足的，他是不喜歡這個世界的。他的任務是把自己捲入世事中積極參與與捍衛真理。

「對於普通的波蘭人來說這種說教就像麥塞人 (MASAI) 人 (東非洲一種游牧部落) 口中念念有詞一樣。普通的波蘭人都害怕共產主義，因為他們知道共產主義意味着恐怖，共產主義就是撒謊，共產主義要把人關進監獄。我們當時還不知道那些，我們只知道共產主義意味着人類的解放、真理的來到。當時我們中間出現了這種謬論，它荒謬得令人疼愛。我的那些朋友們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因為如果我們真的知道百分之九十五的波蘭人所知道的，我們就不會那麼勇敢了。我們不知道真相，那是因為我們基本上是生長在共產黨員家庭裏的。」

滿十五歲時，米奇尼克就組成了一個高中生討論社，該社後來被稱為「矛盾的追求者」。幾十個青少年每星期都見面，並邀請不同背景的人來演講。米奇尼克邊講邊回想着，「你可以猜到我們的論題，不是共產主義的人道主義，就是人道主義的共產主義。我們都真的很急切地想學到點真理。」據米奇尼克所說，這個討論社對政府毫無敵意，只是求知心切。然而那時是六十年代初期，波蘭政府在五六年解放後正在加緊控制，這個團體被打成「顛覆政權」的組織，遭到遣散。該團體的領頭米奇尼克是個臉龐瘦削，舉止緊張而且講話有點口吃的十六歲的少年。共產黨領袖瓦拉底斯勞·哥穆爾卡 (WLADESLAW GOMULKA) 在一次重要演講裏點了米奇尼克的名把他稱之為社會

主義的敵人。

「雖然警方對米奇尼克愈來愈注意，他仍然認為自己是個共產主義者，是共產主義系統中的批評者。」米奇尼克繼續着他的政治史詩，「批評者的階段在一九六八年完全結束。那年每件事都證明是胡說八道。那種制度宣稱有自由，却唆使暴徒和治安維持會毆打學生；那種制度宣稱要解放全人類，却把坦克開進捷克；那個社會到處懸掛「世界友誼萬歲」，却發動了波蘭也是戰後歐洲首次令人髮指的反猶太運動。就在那時，我對自己說，別忙，等一下。我要與這種制度一刀兩斷。我不是個持有相同政見的人，我割斷了我與共產主義之間的紐帶，共產主義支持的就是我反對的。」

於是米奇尼克的持不同政見者的階段就開始了。「我們不再試圖在官方那裏尋找一席之地。」米奇尼克解釋道，「持不同政見者建立自己的制度，創造適合自己的環境，你不再把材料交給官員中的自由派，你自己去印刷、去發行。當你路見不平，你不再向官方伸冤，你自己就聯合受害者，幫助他們。」

把這些主意系統化這要花很長時間。在這期間米奇尼克坐過牢，又經歷過警方的多次訊問，這更加深了他對政治的認識。他首次入獄是十八歲。在一九六八年，他率領一群學生到波蘭民族詩人亞當·密凱依維茲 (ADAM MICKIEWICZ) 紀念碑前放了個花圈。當時很多活動都是象徵性的，波蘭當局就把這種姿態認定為是對審查制度的對抗。拿一九六八年世界上發生的事來比較，這是一個很溫和的抗議，然而在波蘭這却是前所未有的。波蘭黨內有一派人唆使暴徒毆打那些學生，並借此事件以全力反猶太人為名，發動了一場全國性的肅清運動。

米奇尼克又被捕了，在獄中度過了幾個月，並不准返回大學。他被勒令到羅沙·盧森堡 (ROSA LUXEMBURG) 一家電燈泡廠做兩年電焊工。他還記得那裏可愛的女工，但是他說早上，五點起床比坐牢還苦。他承認那份工作給予了他無產階級的經歷。「現在我明白了這點，但是當時要我早上五點起身真太苦了。」

離開這家廠後，米奇尼克被波蘭最偉大的作家暨才子之一 (已故世) 安東尼·蘇羅尼斯基 (ANTON SLONIMSKI) 所雇用。米奇尼克說朋友們對他總是很幫忙。事實的確如此，他有辦法使自己人見人愛。在他年輕時代遊覽歐洲時，他與不少人交了朋友：比基尼·布熱津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此人當時還是個默默無聞的教授。讓·保爾·薩特 (JEAN-PAUL SARTRE) 邀請他到巴黎遊覽，還有流亡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批評家萊斯柴克·科拉克夫斯基 (LESEK KOLAKOWSKI) 以及意大利社會黨魁貝蒂洛·克拉克西 (BETTINO CRAXI)。

在這段期間裏，米奇尼克這個持不同政見者的縱橫術正日趨完善。一九七六年間他與為數不多的持不同政見者們組成了「考爾」(KOR) 保衛工人委員會，華沙附近的工人經常被解雇，遭毆打及逮捕，工人們叫苦連天，「考爾」便應運而生。他們抗議物價上漲，便遭到警方的夾道鞭打，「考爾」為工人家庭籌集錢款，把知識份子與工人聯繫了起來，其意義十分深遠。

與此同時，有許多地下印刷所開始翻印內容不經官方刪除的書籍和小冊子，「新星」(NOVA) 就是其中之一。在一個紙張要配給，言論被控制的國家裏，米奇尼克開始學習怎樣

編輯不同政見者舉辦的文化刊物，怎樣接近印刷設備，怎麼買紙張，怎樣籌集資金，怎麼發行。不久他就可以教別的持不同政見者怎麼做。他與他的同事和有些工廠建立了關係，部分工人們同意分發，出售小冊子。

天主教的傳統在米奇尼克的家庭中及社會上給人們的印象是天主教是約束人的，是蒙昧無知，甚至是反動的。然而就是在米奇尼克處於持不同政見者的階段時，他開始考慮建立一個聯盟，把他那種對凡事都要批評的左翼和天主教的傳統勢力聯合起來。他在一九七七年把他的手稿「教堂，左派及其對話」偷運到法國出版。對許多波蘭人來說，這本書提供了組合團結工會思想意識上的橋樑。

米奇尼克回想道：「這個從小接受馬克思主義教育的持不同政見者既遠離政府又懷疑宗教。不過這兩位用心善良的持不同政見者開始注意到周圍的事物來，他注意到有些人見到波蘭政府壟斷信息的做法便鳴不平，這些人又演講又撰文要人們衛護人類自由的權力，衛護自身的尊嚴及正義。這些人就在教堂裏。」

在他所有扮演的角色中，米奇尼克發覺最輕鬆的是持不同政見者的生活。「持不同政見者生活的引人之處便是它的簡單而且是純潔的生活方式，然而這也可能導致把世界分成只是善與惡兩派即導致摩尼教主義 (MANICHAELISM)。持不同政見者的活動不是政治性的，做一個持不同政見者意味着始終堅持一種道義立場，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動搖。政治就不同了，政治總是需要妥協的。」

米奇尼克說道，「持不同政見者有自身的局限性。如果到達了某一點，我不能找出一條政治出路的話，我就會變成一個索然無味的說教者，成天在那裏翻來復去地講大實話，似乎



Adam Michnik, center, is greeted in Gdansk, Poland, by his friends and supporters after his release from prison. 米奇尼克(穿深色衣服者)和他的朋友們。

那是什麼了不起的政治思想。那樣的話我就完了。」

米奇尼克確切地記起他從持不同政見者變成政治反對派，他說那天是一九八〇年八月三十一日，在格但斯克 (GDANSK) 列寧造船廠波蘭共產黨代表同意自由工會要求并允許擴大人身自由的範圍。「從那以後，我不再公開為某一道義上的事而表態，我開始從政。」

這個轉變不是說變就變的。從事政治活動所需要的計謀與手段不是從波蘭的經驗中所以學到的，至少肯定一個有影響的持不同政見者的品質在政治家上不適用。米奇尼克說道，「突然，要取勝這一點變得十分重要。在美國，人們羨佩政治家的那種說服力及取勝的本領。然而在波蘭最重要問題仍是：當警察訊問他時，他將怎樣對付？他會保持沉默嗎？這聽起來荒謬，但是在波蘭是這麼回事。」

「當你代表着一百萬人而不是幾千個人時，情況就不同了。」米奇尼克繼續說道，「你會突然間覺得你非要贏得人心不可，你便會尋

找同盟，你非要對許多事表態不可。我以前都不會幹這些事。」不過當精明且具有從政本能的萊克·瓦文薩（LECH WALESZA）及其他工人在政治舞台上露出頭角，米奇尼克高高興興地後退一步成爲顧問和分析家。

自從團結工會被鎮壓後其反對派的作用變得更加隱晦。「我們雖然不只是持不同政見者，但是我們好像比過去少了點什麼。」米奇尼克說道：「目前的運動當然是政治運動，但希望不大。在團結工會內部，人們正在作重大的抉擇，有人出走，新人參加。有些人則正在作各種嘗試。我感覺很好。」

米奇尼克說他的看法是瓦斯愛克·雅魯澤爾斯基（WOJCIECH TARUZELSKI）將軍的政府試圖減少人們與反對派的聯繫，以便把反對力量化爲持不同政見者。他說道，「我想這不會發生。正如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所說的，你不會兩次都走到同一條河裏，將來發生的事情將是另一種模樣。」

在他的整個演講中，沒用過革命這個字眼。我問他爲什麼。「我不用這個字眼，決非偶然。整個運動不像革命。衆所周知，集權政權正是革命的產物，革命意味着暴力，然而暴力帶來更多的暴力。一切革命行動都可以以一些高尚的名義而進行。我們的運動沒有烏托邦式的幻想。這是個從團結工會代表大會產生出來的自我管理的共和國，我們要每天做一點，添磚加瓦地把它建成。」

米奇尼克說他餓了，他可能是不修邊幅的薩勒克斯基警長要是知道米奇尼克一有機會還是很講究吃喝的，一定會很感興趣。可能這也是米奇尼克吃了六年監獄飯的緣故。我們出門去吃了魚子醬，喝了香檳酒。

共產黨的悲劇在於 只能依靠自己糾正錯誤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越人

胡平先生在「楊巍案件討論會紀要」中指出一個很有意思的「憲法悖論」：萬一執政黨違法，怎麼辦呢？誰能出頭來加以反對呢？不對，就沒有維護憲法的權威；反對了，就是「違憲」，這是憲法的兩難推理。

這個問題是容易解決的，那就是靠共產黨自己來糾正。

記得有關共產黨領導的合法性論點的一條就是：黨雖然會犯錯誤，但歷史一再證明，我們黨員能夠自己糾正這些錯誤的，並且這些錯誤也只能依靠黨的領導才能得以糾正。

其實，共產黨容不得別人來指出並幫助糾正自己的錯誤，相反，只能依靠自己的最終醒悟或無可奈何來糾正錯誤，這正是她最大的悲劇。

黨的歷次重大錯誤，例如導致數千萬人民餓死的「三面紅旗」和人類近代史上最黑暗一幕的「文化大革命」，在事先和過程中都有許多國際（包括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和國內的黨內、外人士加以批評和勸阻，但可惜黨的最高領導人失去了接受他人幫助糾正錯誤的能力，非要到錯誤犯到無法再繼續下去的地步才收場。

是的，黨員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來糾正錯

誤的，然而這代價太大了，人民的犧牲，民族的損失太多了！幾千萬人民的生命和幾萬萬人民的青春！數十年光陰的滯留！民族復興和起飛之歷史良機的一再喪失！總之，只能等待自己來糾正錯誤，那麼，錯誤發展的程度，所延緩的時間，都太太太長了。中國人民、中華民族實在是再承受不起這種糾正錯誤的方式了。

從老百姓的立場來看，如果只是等待黨自行糾正錯誤，那就好比在任何歷史上的黑暗年代中，都抱着「歷史終會進步」的心情消極承受和等待一樣。

是的，歷史終會進步。但進步可採取各種形式，落伍者或者奮起趕上，或者被無情淘汰。這對於歷史本身都是一樣的，無所謂的，但是對於在歷史中生活過的具體的個人和民族却是性命攸關的事了。

我希望中國共產黨以人民利益爲重，以民族前途爲重，不計較一黨權威和少數領導人的面子得失，勇敢地接受他方力量的批評以幫助自己糾正錯誤！什麼時候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能胸襟開闊能容忍和歡迎別人糾正自己的錯誤，中華民族就有救了。

不知「不能接受別人指出和糾正自己的錯誤」的錯誤，共產黨是否能自己去糾正？這可以說是「糾正錯誤」的悖論吧。

台灣、大陸留學生座談

中國前途

台海兩岸關係現狀之檢討及未來互動之影響

主辦：聯合報系美加新聞中心

時間：民國七十七年三月二十日

地點：紐約世界日報總社

出席人（按姓名筆劃序）：

來自大陸的十人：

丁學良：哈佛大學社會系攻讀博士

于大海：普林斯敦大學經濟系攻讀博士

李少民：普林斯敦大學社會系攻讀博士

吳牟人：紐約市立大學攻讀語言分析哲學博士

胡平：「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主席

徐邦泰：柏克萊加州大學攻讀東亞政治

博士

陳平：奧斯汀德州大學

喬依德：哈佛大學攻讀公共政策管理

程鐵軍：賓漢頓紐約州立大學攻讀社會

學

楊小凱：耶魯大學經濟系博士後研究

來自台灣的四人：

王克文：史丹福大學歷史博士

吳嘉隆：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博士候選人

周陽山：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博士候選人

人

高永光：紐約大學政治系博士候選人

兩位列席指導教授

胡佛：台灣大學政治學教授

鄭竹園：印第安那州博爾大學經濟學

教授

政黨之轉化

政治組 討論主題
可否帶動

政黨之轉變

主席：丁學良

王克文：討論題綱上列有「政黨之轉化是否可帶動政策之轉變？」但根據海峽兩岸的發展，一般知識份子感到興趣和關心的是，政策上累積的變化是否大到足以改變政黨的性質？我認為政策變化先於政黨自覺的性質轉化。這個過程在台灣方面更為清楚。

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在廣州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內部組織型式採取「列寧式民主集中制」。可是近幾年來，台灣國民黨政策變化已經大到讓人認為國民黨的「革命民主」性格，民主成份大過革命成份。

周陽山：西方過去十幾年來研究威權性

格政黨（Authoritarian Party）轉化問

題，提出兩個概念：一是自由化；另一是

民主化。自由化是指威權政黨逐漸放鬆控

制體系，讓各個社會部份逐漸自主獨立。

自由化不包括開放政權，容許公開、平等

合法的政黨競爭。民主化則是政權容許以

民主程序改變執政黨的過程。

國民黨在一九六九年到八六年是自由化

逐步擴大的過程；一九八六年後，民進黨

成立，則是民主化的重大分水嶺。未來是

實施民主化，達到民主目標。

目前中共改革，仍侷限在自由化那一部

份，短期內還談不到民主化。

楊小凱：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轉變不是同

一性質的。共產黨是極權性質，政治、經

濟、文化、社會都由一個組織控制。大陸

面臨的政治轉變是共產主義的極權政制能

不能轉成專權性政制，這個問題尚無答案。

但是由於文革創傷、台灣挑戰、蘇聯式經

濟體制危機、以及中國歷史特殊原因，使

大陸政治轉化有一定的可能性。

大陸政治當前問題是政治改革，最好情

況下，能從極權政治轉變為威權政治，離

政黨政治還差得很遠。比台灣政治低了一

個格調。台灣朝野接受政黨政治，大陸最

終要推許政黨政治，才能統一台灣。

中共推行的開門政策之一，是放學生出國

留學。留學生是獨立於中共直接控制之下

的力量。台灣民主化過程必然會對大陸留

學生組織政黨有鼓舞作用。遲早海外會出

現反對黨。到那時台灣和在海外有大陸背

景的華人以及大陸地區構成一個三角關係。

三角競合遊戲上，任兩角都會考慮爭取第

三角的向心。國共兩黨競爭就會注意到海

外意見，海外獨立力量就能夠發揮影響作

用。

李少民：中共提「一國兩制」，准許台

灣行資本主義，大陸採社會主義。長期下

去，兩邊不平等現象越來越嚴重。最近

台胞返鄉探親就把不平等差別待遇顯現出

來。大陸交通很擠，可是要讓台胞優先買

車票；台胞丟掉一個錢包，動員大批公安

人員去找；搶劫台胞的罪犯被判死刑。這

些都是很危險、行不長的政策。「一國兩

制」等於是把差別待遇固定化、擴大化。

楊小凱：中共沒有開門政策，「一國兩

制」還說得通。有了開門政策，海外人多，

越來越獨立，他們有選擇能力，在兩制中

當然選擇好的一制。海外第三角的作用可

以發揮左右力量。台灣可以打中國大陸留

學生牌，大陸學生也可以打台灣牌，那時

候就不能聽一方決定。中共說「一國兩制」

可行，必須得到台灣和海外力量的共同贊

成，才站得住。中共的開門政策會有深遠、

預計不到的後果。

吳牟人：我仍然要提出政黨轉變上政黨

性質的限制性。國民黨有「開放黨禁」一

詞，至少在理論上承認反對黨可以存在。

可是共產黨理論上根本不能容許另外

政黨與它合法競爭。另外政黨成立就是共

產黨在完成歷史任務上的失敗。所以共產

黨很難和平的轉變。

胡平：談到中國共產黨的轉化，應注意

整個共產主義國家的特性。馬克思列寧主

義是社會主義國家建國的指導。當國家把

馬列主義當作唯一指導方針時，它必須

參加座談會的全體人士。前排自右至左：傅依傑、楊小凱、周湯山、程浩軍、胡平、徐邦泰、丁學良、王克文、于大海、李少民、奇依德、吳岳、張作璠。



決定那一種解釋是唯一的正確的馬克思主義。所以在社會主義國家，人民不僅是要信馬克思主義，而重要的是，必須信現在最高掌權者欽定的解釋唯一版本。假如有人想在大陸成立另一個共產黨，同樣信仰「四個堅持」，一個不少，也絕對沒有存在的餘地。就因為意識型態的解釋權掌握在最高權力者一人手裡，自然容易導致個人崇拜的如狂如癡。一個社會如果不想通過程序化、形式化過程來確定人群規範，必然需要通過一個機構或一個人作最後仲裁，以他的言論作裁決標準。

馬克思主義作為學說是要人信服，作為統一執政方針是要人服從。簡單的說，當一個自稱為共產黨的組織奪取國家政權，它意味著以下三點：第一點，這個組織的最高領導將統治一切，除了他的意志之外，沒有其他政治組織和活動有合法存在的餘地。共產黨的權力就有不容反對、不容交換的絕對性。第二點，這個最高領導會把他所作的一切貼上馬克思主義標籤，不斷以馬克思為自己行為作論證。他的一切，也只有它的一切才能被認為是馬克思的。第三點，這個最高領導受到的唯一限制，就是他不能公開的放棄馬克思主義旗號，他不能明確放棄消滅私有制或建立共產主義等基本主張。但是他可以把這些主張實踐的時間任意的提前或無限期的擱後。所以，他可以用初級階段理論說一百年後再實行，但是它不能不要共產主義。

它既然可以把實踐共產主義的時間表提前或擱後，那麼它依然可以把經濟變化控制在它希望的範圍內。當然它最後控制控制得住是另外的問題。所以社會主義社會要起轉化作用，除非能夠對最高權力有所約制，或是對公民基本權力有所保障，否則它的一切變化都可以回到始終不變的、最高權威不可動搖的這個根本性質上。于大海：胡平說共產黨有本質很難改變，但是中國大陸與許多其他國家不一樣。台灣的存在是其中一大因素，從地理位置和歷史淵源上形成鮮明對比的強大壓力。此外中共對外開放政策，留學生團體也產

生很多意想不到的結果，這些因素都可能對中共造成影響，中共或是從根本上改起，不然它會被淘汰。

程鐵軍：由於文革深刻的創傷，使中共不能不變。開放和改革就是形勢逼迫下的變。統一的要求也要共產黨變。所以如果共產黨沒有在民主化上前進，早晚會喪失執政地位。民主化是時代潮流之所趨，中共只有順勢也許可以挽救存亡危機。大陸出來的海外知識份子，人身安全不受中共立即直接威脅，應該站出來推動民主運動。也有同樣認識，但是他們比較敢有公開作為。中共會改，但是改到什麼程度？能不能超過不許成立有組織反對力量界線？現在還看不出來。因此台灣民主力量有極大的推動大陸民主化的可能性。

胡平：極權主義的概念是不會變的，否則就不是極權主義了。但是具體的人和事都是可能變的。共產黨對自由化和民主化的變化是不願意的，但是在一定形勢下，它可能也會朝著這樣的方向變。任何和平的民主改革能夠實踐，對當權者來說，都是半推半就。

吳嘉隆：以台灣經驗看政黨轉任，台灣民進黨在成立前，海外台灣人組織確實發揮第三角影響功能，逼使執政的國民黨讓步。黨外在選舉前後，總要到美國走一走，國民黨深為不喜，希望黨外人士放棄告洋狀的作法。但是海外力量是黨外整體力量的主要來源，直到民進黨成立之後，台灣民主運動主導權逐漸從海外移到島內。海外的重要性降低是結束過渡時期的表徵。民主的主角是國內人民手中握有的選票。政黨轉化主要因素來自國內。經濟發展與建設成為衡量政治成功的標準時，政黨勢必放棄革命時期的政黨性格。因此促成轉化不完全來自海峽對岸，而來自處理實際問題的需要。吳牟人：共產黨可以朝自由化轉化，但是共產黨能不能有民主化的轉化？這是一個問題。

胡佛：自由化與民主化是表裡相輔的兩個概念。自由化是政府少干擾，政府扮演過極的角色；民主化是民眾積極參與政府的決策。政府必須先不干擾社會與個人活動，把自由化空間擴大。所以自由化與民主化是密切相關的發展過程，我們不宜把自由化與民主化分得太清楚，以為共產黨只有自由化而不能民主化。

徐邦泰：台灣的轉變令人鼓舞。大陸共產黨轉變的可能性則要從歷史發展中得到一些解答的線索。

共產政權成立以後，馬克思主義以消滅私有制為最終目標，個體戶大量被壓迫。四九年個體戶有三千多萬，到了文化大革命時只剩下十五萬，比右派人數還少。最近個體戶發展到三千五百萬，數字很可觀。紅色資本家超過個體戶的資產標準已經有二十萬了。這是經濟的重大變化。有人建議修改中共「憲法」，包括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這些變化是半推半就的情形下形成的。未來的發展是一步步嘗試，改革能否擴大，現在還看不出來。

高永光：台灣政治發展與政黨性格有關。國民黨性格中有列寧式民主集中制色彩，但這只是國民黨部份性格。國民黨在權力集中上始終不徹底。地方上山頭派系林立，中央階層差異也很大。國民黨在地方上，為求選舉勝利，實際妥協的色彩遠大於革命民主政黨的性格，國民黨的控制留下很多空間，社會有相當自主性，使民主發展與時俱進。在中國大陸，中共現任的控制已經比較鬆了，是不是也存在可以利用發展民主的空間？政黨轉化的關鍵就在剩下的空間大小。

喬依德：八七年初，大陸留美學生千人上書中央，支持學生運動。當時有人說與其在海外嚷嚷叫民主口號，不如回去作萬元戶。這段話透露出，經濟是改變政黨性格的主要因素。台灣有堅實的中產階級之後，反對黨才能出現。政治多元化離不開經濟多元化。共產黨宣佈現在是社會主義初期階段，「憲法」要修正，土地可以

轉讓，個體戶增加到三千萬，雖然名義上是國家所有制，但是內涵變化太大，政黨性格必然會不同於從前。

陳平：我對以上討論有些問題。許多人強調概念。概念之後都有基本假設。可是這些假設本身是否能成立，值得懷疑。另外對於現狀的歷史來源，不夠注意。

第一，假設國民黨、共產黨有至高無上的領袖，可以任意指揮黨的方向，可以用自己的意志決定對意識形態的解釋。這種假設是有疑問的。第二點，楊小凱看到的台灣、海外、大陸三邊大三角關係出現，恐怕也是一廂情願居多。中西歷史重大不同之處之一就是西方有政教分離傳統，容易產生多元政治、多元經濟和學術獨立。

連蘇聯的學術獨立傳統也比中國強。例如一位蘇聯科學院院士被莫斯科大學解職，所有蘇聯院士在莫斯科大學有教職者集體辭職。這種情形在中國就很少。中國知識份子始終依附政治集團，沒有成為獨立聲音的傳統。直到現在，因為被文革整怕了，知識份子才會一起反對批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但是獨立存在壯大的可能，還是很微弱的。

李少民：經濟制度的區別才是國民黨社會與共產黨社會的不同根本原因。世界上各種政治制度和經濟體制雖然相異。但是沒有經濟實行國家所有制，而政治能行民主的，東歐國家國民平均所得早已是共產階級社會，教育也很普及，可是它們不是民主國家。共產黨為什麼一定要一黨專政，必然要控制，主要因為它是實行公有制的計畫經濟，計畫者要全國人聽命，不能不壟斷政治權力。

喬依德：經濟對政治的影響，除了國民平均所得之外，所有制也有關係，公有制有許多形式，集體所有制與國家所有制對經濟影響還是很大不同。程鐵軍：那些具體因素可以導致中共政治變革？我想首先是基層選舉。大陸上次黨代表選舉，許多「太子黨」都落選。有了國外和台灣民主化的例子，以及潛存大陸民間草根運動的推動，這是一股力量。

台灣開放探親、文化學術交流，也會對大陸變化造成衝擊。

陳平：我對私有制和民主關係有些問題要提出來。香港是私有資本主義地區，但沒有民主。未來的民主是否一定應以西方多政黨為基礎，我也懷疑。我聽說台灣選一個立法委員要花上百萬美元，大陸沒有一個平民有如此財富。所以中國大陸的民主是否能走另外途徑，以專業協會、學生選出代表？我認為中國政協可以成長為民主的機構。

楊小凱：台灣實行政黨政治對大陸人心造成非常大的刺激，比我們在表面上，新聞媒體上看到的嚴重多了。中國大陸民主化路途十分遙遠，但因為台灣存在，過程會加速，像方勵之成為中共第一個公開異議份子，官方不敢迫害。台灣兩位記者訪問起了很大作用，使異議份子合法化。

于大海：台灣官方正在研究大陸留學生希望訪問台灣的「意圖」。從我自己說，盼望有機會學習台灣經濟發展經驗，促進大陸改革、進步。大陸留學生關心的主要還是大陸上的變化。他們對台灣的看法是，台灣如果獨立，大陸社會的轉變就喪失一種壓力。大陸留學生希望台灣多關心大陸，不要走上台獨的路子。

楊小凱：我也想去台灣訪問。台灣經濟如此成功，政治改革又相當順利，我真是非常高興。幸虧還有個台灣，否則中國人走在外面真覺臉上無光。台灣的經驗教訓應該讓大陸好好吸取。我對台灣拒絕「三通」實在很失望。最近俞國華說，中共不放棄四個堅持，台灣就不與大陸接觸。這種態度太消極。華爾街日報最近報導，返鄉探親比國民黨反共宣傳有效得多。人民親眼看過之後，對共產制度失望比什麼都深刻。台灣說中共不放棄共產主義就沒有希望，這句話原是對的，可是大家主動覺得它是宣傳，效果大減。如果台灣主動一點，提出反要求，要求讓國民黨在大陸上合法與中共競賽，這種提法比較動性的「中共先放棄四個堅持才可以接觸」，不是高明有力得多？

丁學良：大家對獨統發展的趨勢，討論得還不夠。台灣獨立的傾向若越演越烈，有可能導致大陸極權化傾向在相當長時間內變得十分厲害。台灣獨立之威脅如果很明顯，大陸採取極端反應可能性很大。獨立威脅使中共極權作法得到合理的藉口。我們承認在台灣的人發展成就是中國人的光榮。大陸可以學習、受益。假如這是自己內部的發展的前提不存在，則台灣經濟發展和政治、文化多元化對我們而言，就沒什麼意義。

如果只把台灣國民黨政治體質和大陸共產黨相比，我們會對大陸政治發展前景悲觀一些。大陸比台灣困難得多。但是如果把中共與東歐、蘇聯相比，我們又可以樂觀一點。東德、南北韓都已經默認對方是獨立國家的事實。可是中國文化中「天無二日、人無二君」的觀念影響很大，始終使海峽兩岸政權認定天下應定於一，雙方都得堅持自己是中國人民唯一合法代表，雙方在各方面都在進行比賽。這種老觀念在今天特殊時空條件下，反而促進大陸在各方面必須朝好的方向去改。

我們在美國的大陸留學生，口口聲聲的談利用台灣經驗促進大陸改革，好像我們只是在打「台灣牌」而已，我認為大陸同學這種考慮不是自私，而是合理的。台灣好不一定馬上能使大陸好。假如大陸知識份子把台灣發展當作重要刺激因素，用來推動大陸的發展，這對台灣只有好處。中國問題解決主要還在大陸，而不在于台灣。大陸能一天一天更好，台灣就不必要憂慮。

胡佛：今天會議十分成功，大家坦率發言，兩方面留學生都增加了瞭解。

我們討論的重點之一是兩岸在求變的時候，雙方交往有那些影響？我首先感覺到台灣、大陸是同一民族兩種政治。大家對國家認同，符合中國傳統文化的特徵。大陸學人想去台灣看看，把台灣經驗帶到大陸，可使大陸加速現代化。另外一面，如果台灣獨立，可能引起大陸更走極權化道路，對台灣造成不利，台灣也只有以同樣極權來應付大陸的威脅。台灣辛辛苦苦走出來的民主就會犧牲掉了。

假如大陸在民主化上停滯不前，台灣民眾會不願與大陸交往。假如大陸以和平方式對待台灣，同時大陸內部走民主化道路，台灣就比較願意與大陸接觸。現在大陸人民厭惡極端共產左派的作法，大陸政治逐漸開放，台灣可以比較不畏懼，「三不政策」已經稍稍修正了。大陸越走向民主，台灣越感到有希望，對台灣民主也有刺激作用。我們希望兩方關係發展出良性循環，使中國統一容易完成。

鄭竹園：今天上午的討論肯定了：第一、台灣在民主化和經濟發展比大陸走前一步。第二、大陸和台灣有互動作用，台灣可以刺激大陸發展，最近海南特區，中共宣佈土地可以轉讓七十年，七十年後可以續約，這就是換一種方式說土地可以私有，而且海南經濟不一定要以公有為主。未來大陸所有制可能更主動。

今天沒有討論思想意識形態的障礙。大陸的四個堅持和台灣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招牌始終沒有拿下來。這是未來交往中必須面對的障礙。



會場一角

大陸經濟改革與 台灣經驗

楊小凱：以前很長的一段時間，我對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持悲觀但仍充滿希望的態度，近來這種悲觀愈為強烈。無論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角度來看，蘇聯式制度可說是人類從未經驗過的一種制度，更廣義的說，這可能是人類產生的一種新文化，是一個相當奇特的東西。蘇聯式經濟制度危機，就某一角度而言，正由太平洋地區的發展，尤其是台灣、南韓的蓬勃經濟發展的差距，更反映出這種制度的危機。我認為，中國大陸經濟改革的動力，不是來自內部，而是來自外部，特別是與它對峙的台灣在經濟上的差距。這種壓力促使中共進行改革。

我認為蘇聯制度的特點之一，是財產所有權沒有明確界定。中國大陸所謂的「國有財產」與台灣的「國有財產」有相當差別。而大陸的「國有財產」更沒有明確界定。在此制度下實際上是很難放權的。國有財產制若不廢除，推行改革十分困難。一九八四年出了亂子後，大陸就有學者及官員提出這個問題，趙紫陽本就提出國有財產誰是代表的問題。之後又進行股份化試驗、承包試驗，最近又有沿海地區轉移大循環的策略。也就是說，中共認識到國有財產制問題後，曾經試驗各種策略，但都失敗了；雖在試驗過程中運用各種策略，但或沒有被採納，或在試驗中變形，主因就是不願承認私有財產制。從這些失敗得到的結論是：中國大陸若不面對目前仍被列為禁忌的私人財產制問題，改革將長期在痛苦中搖擺，不可能成功。

吳嘉隆：我首先要探討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曾在「知識份子」雜誌中楊小凱訪問耶魯大學費景漢教授一文中提及，即台灣經驗對大陸經濟改革到底有沒有參考性？費教授在訪問中回答，台灣在經過土地改革後，基本上即是私有制及市場經濟，因此，台灣的經驗，嚴格的說，不是改革的經驗，而是發展的經驗，因為它並非像中國大陸先從社會主義出發，而現在要從體制上開始改革。

假定如楊小凱所言，中國大陸在建立起私有財產制後，還有一個根本問題，就是如何去發展？而這種發展將處於愈為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下。因此，現在的問題可分為兩個層次，一為體制改革，一為發展策略。大陸在體制改革後，在如何選擇發展方向時，台灣經驗自然有其參考性。而台灣經驗，或更廣義的說，東亞四小龍的經驗，如果更有其參考性的話，反過來也可印證私有制及市場經濟有其存在價值。在經濟發展的條件方面，有一個重要問題是：是否需要民主政治作為推動經濟發展的社會架構？從實證尋例，兩者關係並非是一對一的。但有一觀念值得提出，在工業現代化過程中，可區分為先來者及後來者兩種。先來者因在摸索、探討各種可行的模式，要開發各種機會，因此要放任個人主義、放任企業家去找尋各種機會，在此情況下，民主政治是非常需要的。但後來者追前人，所需時間就短得多，譬如日本追趕美國，花費五十年才趕到目前的地步，而台灣只需卅年，中國大陸則可能花更短的時間來追趕。因此，若能將體制

改革作好，奠定日後發展基礎，則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是樂觀的。

胡平：依照在座許多人的看法，中國大陸經濟改革能否成功，取決於能否轉到市場經濟這個軌道上而定，據此，我認為有下列兩個嚴重的問題：

(一)在大陸原有經濟制度下，人民持有一種惡性預期，不相信真會實施私有制。一旦有這種惡性預期，就會有相對的反應，因而導致惡性的循環，從而證實原先預期是對的。

因此，中共不可能公開承諾說要進行私有制，這是理論上做不到的事；即使作此承諾，人民也不會相信。中共在理論上就是要共產的，而實際上也共過無數次產，這兩點加在一起，就使推行私有制成為不可能。

現在談第二個嚴重問題。我們稱市場經濟為「看不見的手」，而中共的體制稱為「看得見的手」，或者又稱為「替天行道」。現在「替天行道」做不下去了，不得不退下去，但真能退得下去嗎？以前中共強行拉平歷史或自然造成的不平等，現在人民是回不去的。人民可以忍受自然的、歷史造成的冤無頭、債無主的平等，卻不能忍受冤有頭、債有主的平等。因此，從「看得見的手」到「看不見的手」，其間有一個極大的障礙。

上述兩個問題加在一起，我認為改革是極不樂觀的。

喬依德：我同意小凱的說法，中國大陸經濟改革容易的階段已經過去了，譬如農村改革部分；現在已到了複雜階段，而最關鍵的問題就是所有制的改革。

現在的問題就是所有制不能改，怎麼個改法？我考慮到下列幾點：

- (一)先讓個體戶自我發展；
- (二)讓集團所有制成為真正的集體所有制，或以勞動力入股，或以設備入股，讓其成為獨立的經濟實體，促使進一步發展；
- (三)至於國營企業，也不妨試驗股份制。

在上述幾點實施一段時間後，可依層次、依產業逐漸過渡到市場經濟。

陳平：我留學在美，當然明白市場經濟的優越性，但是中國大陸所以不能發展市場經濟，實在是計畫經濟有其強大之處，譬如蘇聯仍是當前強國，而中國大陸與實施市場經濟的印度相比，也要比印度為強。中國並非沒有發展過市場經濟。在沿海地帶，特別是上海，也曾有市場經濟出現，造成的結果是內陸經濟破產，沿海與內地差距愈形擴大，最後以戰爭解決問題。

于大海：我認為目前大陸經濟上最大的問題，確實就是經濟體制走向如何取決的問題。但我想提出另一個看法。我認為中共有一個很大的毛病，就是好大喜功，想學最先進的東西，譬如想學「第三次浪潮」（台譯「第三波」）及「大趨勢」這些書。

但這是工業化以後社會才有的東西，與現在的大陸毫無關係。譬如中國大陸現在國民產值不過三百多美元，台灣是五千，美國是兩萬。若以一個人受教育的程度來比喻，美國若是大學畢業，台灣可能剛進大學，而大陸不過只識幾個字而已，小學都沒畢業（眾笑），所以根本不可能學台灣現在要做的事，只能從頭學起。從這個角度來看，這意味著中國最需要發展的，不是最尖端的東西，而是台灣丟下不要做的東西，譬如鞋這些項目（眾笑），這樣對經濟長期發展才有助益，另外也可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對於社會主義最基本的原則——收入分配平等，也會有些幫助。

李少民：在大陸反自由化運動後，常有個人提出資本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我想這個問題很簡單。台灣也是中國，台灣人也都是中國人，為什麼台灣可以實施資本主義呢？又有人說中國領土太大，不適合資本主義，但這這是政治問題，美國也很大啊！所以我不同意大陸人民就是命苦，不能實施資本主義（哄堂大笑）。

楊小凱：私有制所以如此重要，成為經濟發展的根本，可從四小龍經濟的起飛獲得證明。一個國家若確定了私有財產制，

那麼它就確定了一個選擇制度的制度。怎麼說呢？以美國為例，美國計畫經濟比大陸多得多，但差別在於，美國的計畫是由買賣權利產生的，而中國的計畫卻沒有自由買賣的權力。私有財產所具有的功能，就是可以選擇制度。如果選擇制度的制度設計好了，什麼都不必擔心。如果國營是好的，買賣權利自然就會選擇；若是沒有選擇，那一定因為賺的錢少。所以這是選擇制度的一種機制（mechanism），它的基礎就是私有財產制度。所以美國在立國之初就設計了一個非常好的選擇制度的制度。

王克文：我提出幾點觀察：

(一)市場經濟與政治選舉競爭是相通的，許多西方政治學家指出，政治選舉與政黨政治競爭，事實上就是市場經濟的政治化，精神上也是相通的。

(二)從歷史角度觀察，中國農村與城市的分政確是一重要問題。

(三)我發現在座的大陸留學生，對市場經濟幾乎達到一種狂熱支持的地步。這是一個相當諷刺的現象，同時也是一個有趣的反映。

潘依德：我們是從社會主義國家來的，和生活在西方國家的知識分子有所不同，我們同時也看到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現況。因此我認為，在探討中國的弊病時，我們會看得比較清楚……當然有人也可能有情緒上的問題，這是可以理解的……我們在國內時總認為資本主義不行，來美後有人說只要實行私有制，一切問題都可解決……我並不完全相信這種說法。我自己感覺，這兩種制度可能會長期同時存在，現在所謂的中央計畫經濟，每個國家都在改，包括蘇聯在內。蘇聯也在吸收資本主義國家的作法，現在大陸上的問題是，在經濟、政治上，必須讓人民有更多的選擇。

丁學良：台灣支援大陸沿海的發展是雙方互利的行為，可從經濟、政治、軍事三方面來看。(一)經濟方面：台灣的豐富的資

金可在大陸沿海尋求出路。如果擔心共產黨政策轉變，台灣可與海外華人或東南亞商人聯合起來，透過國際安排，以避風險。(二)政治方面，台灣的投資在大陸沿海獲利後，可大為減少台灣尋求獨立的意識；同時也可迫使大陸的共產制度從「硬性」朝向「軟性」發展。

(三)軍事方面，台灣與大陸經濟利益的連接，可以減低雙方引起軍事衝突的可能。吳嘉隆：大陸沿海地區發展成敗的因素，除了制度的改革與充沛的勞動力外，還須其他條件，如國際市場的尋求，資金、技術的獲得等。而台灣或南韓的技術、資金及市場，則是最適合、也最容易為大陸所接受吸收的。

就國際情勢而言，目前美國與日本經濟關係摩擦甚甚，為了牽制日本，美國希望北京在經濟上適度的壯大，從而對日本作一制衡，所以樂於看到中國經濟的發展。但是目前全世界能真心誠意對大陸經濟改革提供助力的，一是台灣，一是南韓。美國是心有餘而力不足；而日本則絕對不能對它抱任何期望，因為與日本投資合作，絕不可能獲利。因此只有台灣、南韓有誠心，也有力量對中國大陸提供助力。

程鐵軍：若從反面來看，中國大陸若不進行經濟及政治改革，其產生的後果，可能比向前進要冒的風險不知大多少倍，所以現在大陸可說處於生死存亡之秋，只能往前，不能向後；只能成功，不許失敗。

高永光：我對台灣資金、技術流向大陸並不感到樂觀。以民進黨對外匯的態度即可顯露端倪。假設台灣將部份外匯投資大陸，民進黨及許多台灣人很可能加以挑戰。商人必為利之所趨。因此，問題的癥結是，整個大陸的投資環境是否值得台灣工商業者前往？如果確實有利可圖，無需鼓勵也自有商人暗中進行。所以這個問題須從實際的商業眼光，以及對台灣內部造成政治的影響這些方面來看。但我並不認為現在是前往大陸投資貿易的適當的時間。

吳嘉隆：基本上，我對台灣與大陸經濟結構的互補性及將來的互動是感到樂觀的，所以我必須澄清高永光提出的一些問題。他提到台灣民進黨或省籍人士對以外匯投資中國大陸有所疑慮，但這並不是主要問題。主要關鍵是，經濟的規律引導經濟的活動，如果海峽兩岸經濟確能產生互補及合作，這種擔心上就是多餘。大陸沿海的發展，在一定程度就是多餘。大陸沿海所空出來的市場，既然如此，大陸有必要在一定程度改善投資環境及修改法令規章，否則難以吸收外資。所以我覺得，大陸應先起帶頭作用，以實際行動改善投資環境，爭取台灣資金，才能使兩岸經濟的互補與聯繫發生作用。

丁學良：我認為海峽兩岸的經濟互動是彼此有利的。一方面，日後大陸沿海地區將發展為一個比東南亞其他地區更佳的投资地點；同時，以台灣目前在輕工業上的優勢，也足以制窺一個前往大陸投資、優劣，不至於日後造成對本身產業威脅的經濟策略。

鄭竹園：趙紫陽所以在大陸沿海地區推行經濟大循環，我認為有兩個動機：(一)沿海地區與內地存有爭原料、爭市場的問題。

(二)有幾千萬剩餘勞動力必須安置。以上兩點促使大陸必須向外發展，才能解決問題。但是推動大循環必須有一個靈活的經濟結構，同時要有一個具效率的官僚系統，而這都是中國大陸所欠缺的。

至於大陸經濟發展所需資金及技術的問題，我一直建議成立「大中華共同市場」，以台灣、大陸、新加坡、香港共同組成，這四個成員去年總貿易額達四千億美元，若能結合，必然成為世界第三勢力。

在台灣對大陸投資方面。由於利潤的考慮，台灣對大陸的投資，我認為現在不會採取主動，可能會視南韓的行動而定。我提出「間接貿易」、「迂迴投資」兩種方式，目前直接與大陸進行貿易，可能仍不成熟。

胡佛：我提出下列幾點看法：
(一)推動經濟自由化也就是推動政治自由化，兩者是同時並進的；(二)經濟自由化必須建立在政治民主化的制度上（憲政制度），才有穩固基礎，兩者是互補的；(三)無論政治或經濟的自由化，必須根植於文化之中。中國傳統文化強調集體主義，對民主自由有不利影響。應將社會、政治、經濟轉化以個人為中心，視個人為目的而非手段，並以個人主義為基礎，才能使政治經濟自由化落實生根。



會場全景

工業化衝擊下 中國社會文化轉型

丁學良：我想就我了解的範圍，介紹一下一九八五年初到八六年底學生遊行這段期間，大陸上學術界、知識界中掀起的文化熱大辯論，以及我自己對這些現象的一些感受。

從一九四九年至七十六年文革結束這段期間，真正意義上的文化討論並不存在，因為這段時期，是以階級理論做為主要分析框架。

文化熱成為大家關注的主題，是在七十六年後大陸宣佈現代化，眼光向外。這股熱潮在八五年初尤其突出。我個人認為這段時期不論是在分析的水準、資料利用、對問題探討的深度上，並未比四九年前，在中國的文化思想界中諸多的爭論有任何實質意義的進展。最主要的原因，我認為是大陸上沒有充分的學術討論的自由，這是一個很基本的因素，因此許多問題的本身，就不允許人把話講明白；話無法講明白，就需要創造一些術語。一些新名詞，兜著圈子講話。當人們把精力放在怎麼說，而不是說什麼的時候，真正說的主題反而模

糊了。模糊的主題，又加重了誤會或誤導的可能性，形成惡性循環。

在這種情況下，常常使人不了解發言的人究竟想說什麼，以及什麼是他真心想說的，什麼是他不得不說的，或不得不繞圈子說的東西。許多很簡單的事，若允許大家把話講明白的話，大家立刻就知道要點在什麼地方，而把注意力集中，用各種分析的方式達到更深入的理解。

在文化領域方面，大陸出了許多叢書，都是用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或歷史唯物主義來分析问题。但在另一個層次上又說，因為馬克思主義應該是不斷發展的，需要綜合新資料，包括從西方引進的一些新概念。在第三個層次上，有些人對馬克思主義厭惡，又沒辦法，就掛羊頭賣狗肉，所寫的文章，硬加一些馬克思主義的定語、概念，但實際上是以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架構分析问题。

更深的一個層次是，甚或許多作者自己都不自覺受正統意識的影響，因為大陸這幾年，一代代的知識份子都是在一種意識形態主導的地位中培養起來，即使在結論上、目標上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意識形態，但多年來的潛移默化，思路還是常常不自覺的落入馬克思的分析邏輯中。這點上，表現特別突出的就是一元決定論。因為一元決定論，再加上民間的逆反心理，使事情容易走向極端。

譬如說，大陸官方希望青年人在討論文化時，不要徹底的反傳統，不要徹底的西化，不要全盤接受西方價值。但由於一元決定論及造反心理的影響，青年人不自覺會為反對而反對。

另外就是把現實中一切的困難，全部歸因於中國傳統，結果得出徹底的、偏激的、甚至過激的理論。

胡平：我認為大陸上一些有見識的人，大體上還是能擺脫一元決定論的想法，雖然有藉文化打政治、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現象，但許多人在那個環境下長大，已經訓練有素，能在字裡行間尋找背後的意思。

在台灣的人看大陸書籍，就不一定能夠抓到重點。

陳平：我同意丁學良的看法，我認為台海兩岸有關文化的討論，都未能超過二十年代胡適、魯迅的水平。基本的因素，是中國沒有純粹的社會科學家，沒有建立科學規範及科學方法。

李少民：大陸自改革開放後有一些現象，其中之一是中國文化與共產黨領導下社會結構的衝突，大陸自共產黨執政以來，所提倡的一切社會制度的改革，都是以集體主義為宗旨。而中國人在本質上，是以個人或家族為中心，但四九年後，家的概念也普遍被打破了，只剩下個人。中國一盤散沙的民族性，一定要擺在集體的模式中，是非常不適用，我認為這是大陸社會結構必須要改的一個原因。

王克文：台灣文化如周陽山所說，受到美日文化影響很深，這一方面是國民黨在大陸上主要是走沿江沿海的政策，遷台後仍延續了以工商業社會為中心，以沿江沿海西化社會為中心的重點。

因為西化的影響，使得台灣來的知識份子比較容易與大陸來的知識份子溝通，大家思考的範圍都是西化社會的問題，我們思考的許多中國的現象，也是西化社會的現象。

鄭竹園：對兩岸三、四十年來的變化，我個人的觀察，第一是社會結構的變化，台灣中產階級興起，成為相當強的力量；大陸新階級興起，包括幹部、萬元戶等，這些人有特權，或者生活水準比較高。

第二是意識形態的變化，崇洋媚外。大陸的崇洋媚外與向錢看比台灣更嚴重，台灣究竟在工商業發達後賺錢的途徑比較多，大陸發財途徑少，對錢就格外重視。

第三是台海兩岸道德都墮落，台灣的暴力、詐騙案多。大陸有假菸、假酒、盜墓一夜發財、見死不救。最後一點與孟子的「人有惻隱之心的說法，完全背道而馳。第四是傳統力量仍然很雄厚，但好的傳統沒有了，壞的傳統卻都捲土重來，四維

八德都沒有了，不講信義、自私自利、互相欺騙、迷信風行。過去中國人做生意講究老字號、貨真價實、童叟無欺，現在不論兩岸，都是眼光短淺，沒有長期考慮。整體來說，中華民族意識形態、思想、文化水準在過去三十年都在降低，這是中華民族的悲哀，我們實在需要一個道德重整運動，如果道德水準不能提高，工業化也是非常浮面的。日本在維持舊傳統上，就比我們做的好得多。

陳平：對鄭先生憂國憂民的心情我頗有同感，因為他提到的事我都注意到了，但是他的結論我不同意。看一個民族的文化，你不能看那些最底層的東西，譬如共產黨過去以妓女充斥來指責西方社會腐敗，但這不能代表西方文化的基本部份。中國大陸這幾年來是有許多事情做得很糟，但有一件事情做得不錯，就是我們這代人崇洋卻絕不媚外，我們這代及下代的主要責任是為了爭取中國的大國地位。我們現在跟日本、美國學，將來要超越他們，我們希望中國成為強國，與日本爭短長，與俄國爭短長。中國有這個信心，我們要學到這些國家為什麼強，什麼地方我們不行。

鄭竹園：我所說的忠孝仁愛，並不是就字面來解釋，就以信義來說，民無信不立，無信則無通商行為。忠是盡責任，對事的忠誠。我了解陳平的意思，是把人情轉為法制。我所強調的是，社會上還是需要一個規範。

楊小凱：文革後的意識形態與文化變遷，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對文革的反應，像歐洲中世紀在黑暗時期後有文藝復興一樣。大陸在文化黑暗時期後的反作用非常燦爛，我稱之為「中國的文藝復興」，許多的現象及文、史、哲學方面的變化都是相當深刻的。

胡平：匈牙利一個作家曾提到一種「軟禁文化」，就是社會主義在解凍之後，大家都知道有一個界限存在，不過尺度比較寬，因此許多知識份子並不是熱中於追求思想上及學術上的自由獨立，而滿足於網

開一面的條件，不願去惹麻煩，於是自我限制，絕對不談官方不希望談的內容。

我也認識一些大陸上青年理論家，對於許多現象都非常了解，但他們都不願意寫不能發表的東西，把自己限制在框架內，實際上這些人發表的東西並不是自己思想最深刻的東西，這是大陸社會很畸形的一個現象。

如果知識份子對思想及學術的自由獨立，並不熱中追求，而傾向自我限制，就會造成整個文化水準的下降。

索忍尼辛曾說：「魚群從來不會為了反對捕魚者而集體鬥爭，他們只是想從網眼裡鑽過去。」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文網太密成了布了，誰也出不去了，大家都覺得要爭取自由，得等這網有網眼兒可鑽，只要你個兒不要太大，不要太笨，大概都能找到個活路。因此我一直擔心在這種網開一面的情形下，大家就安於現實。中國幾千年來的知識份子都是這種心態，大家都知道，皇帝那兒有文網的控制，但大家都知如何爭取生存空間，這種心態極其正常，但也正因如此，軟禁文化可以長期持續，這樣一來就難能產生劃時代的作品。

徐邦泰：從歷史上講，中國古來就講「文以載道」，譬如劉賓雁、王若望的作品，基本上還是表達他們的思想及政治主張。這種現象的表現，原因之一是因為中國沒有新聞自由，許多對現實的想法與看法，無法透過新聞媒介直接表達，所以採迂迴的方式，藉著文學的形式發表。正如丁學良所說，是藉文化打政治，藉文學來表達其政治見解。老毛曾說：「寫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我覺得這成了一個傳統。

喬依德：我認為我們在評論文化現象時，應該把社會變化與經濟變化結合起來看，不能孤立討論。

有些人贊成經濟對外開放，但對隨著經濟開放帶來的社會現象又痛加聲討。譬如說，有人提倡市場經濟，要刺激經濟，當然要向錢看，除非相當不合理，不必過份

責難。又譬如說，大陸一方面鼓吹向西方學習，一方面又斥責到外國領事館申請留洋的人大排長龍，這是雙重標準。

陳平：來美國唸書的許多大陸留學生還有一個困擾，我們一方面想好好靜下來研究學術，一方面對大陸的落後又憂心如焚，想參與政治，但研究還沒成功，拿不出新的理論出來。也有人想用一套新的意識型態替代舊的意識型態，仍然是一元決定論，若我們跳不出這個圈子，中華民族的前途將很可悲。

我希望在我們這一代可以形成一個良好的學術氣氛，大家能夠不情緒化，不分派別，嚴肅的進行客觀的討論與批評。

同時我也希望與台灣的學者交換意見，譬如李亦園先生所研究的中國人類學，楊國樞先生以心理學的調查研究中國民族性格的形成等等，我都非常有興趣。

楊小凱：經過一天半的研討會，我發現台灣與大陸同學間的了解相當缺乏，我來美國五年，現在對台灣的認識與五年前完全不一樣，但是了解還是相當有限。

在與台灣同學接觸後，我也不得不痛苦的承認中國文化分歧了，多少年的相隔，使得許多用字用語、價值觀都有很大的不同。彼此也沒有應有的關心，譬如大陸人對「高雄事件」沒有感觸，台灣人對「五一六」也不了解，現在透過交流，相信會有一些改善。舉例說，台灣現在出版金觀濤的書，若金觀濤有一天受到共產黨的批判，就會受到兩岸人民的關心，成為一個共同事件。

周陽山：與大陸學生、學者的交往，從台灣的角度來看，我們也有相當深刻的感受，一般來說，台灣的學者學生眼界比較淺短，胸襟比較狹隘；大陸方面，除了一些特別傑出的人，如在座各位，大多數是志大、才大、氣粗、學疏。這也可以看出海島文化與大陸文化的不同。就相互了解來說，我覺得台灣對大陸的了解，遠遠超過大陸對台灣的了解。

程鐵軍：大陸的知識份子有一部份的人是完全否定自己的文化，贊成全盤西化，一部份的人懷抱著老祖宗的孔孟之道，贊成發揚固有文化。

我認為全盤西化根本不可能，但在與西方文化比較後，發現其優點、缺點，才能吸取其精華，也會體會自己文化也有值得保留、值得寶貴的地方。

喬依德：我認為兩岸的學術交流非常必要，這種交流不只在訊息上的交換，也是在思考方式的切磋，從而自我反省。

楊小凱：在學術交流方面，我希望台灣能採取主動，邀請大陸文、史、哲方面的學者前往座談，我相信對「匪情研究」也會很有幫助。（眾人大笑）

吳嘉隆：我認為兩岸學術交流，實現的可能性非常大，國民黨的政策正在調整中，我相信開放只是一個速度問題，方向是可以期待的。

我認為兩岸交流，還有一個重點就是互相關心，並利用兩岸過去成功及失敗的經驗做參考，以免重蹈覆轍或走彎路。譬如現在大陸許多青年人認為現代化搞不起來或搞得一塌糊塗，就是因為傳統文化的牽絆，因此有強烈的逆反心理，贊成全盤西化。但若與台灣交流，就立刻可以看出傳統雖然有其不好的一面，但也可以幫助其工業化的成功。若不能交流，這個「結」就不容易紓解。透過交流，看事情就能夠清醒一點、全面一點。

丁學良：如果說大陸人對台灣的情況了解有限，對台灣本地人的心態及情緒了解的就更少。這是一個很壞的現象，大陸人聽到有本土傾向的言論就認為是台獨，本省人因為害怕中共統一，有意刻上人為的界限，否定台灣文化是中原文化下的次文化現象，表示自己不是中華文化，而是台灣文化。

因此我認為如何冷靜下來，藉著交流，把內心深處的恐懼情緒、對立情緒、誤解情緒、怨恨情緒化解掉，對今後減少兩岸在政治層次上的衝突，將有很大的意義。

吳牟人：在兩岸進行交流，希望達成互相理解的過程中，我想提出大陸一直有一種中原心態，認為台灣幅員小，算不了什麼，走上極端就以武力佔領。台灣則有地域心態，加上長期隔閡，對大陸產生許多反感，走上極端就是宣佈獨立。

在這一點上，我覺得意氣用事不足以解決問題，而最好的解決方式是在民主的價值基礎上，共同協商討論。

周陽山：做社會科學研究時，基本上一定需要有一些親身經驗才會覺得親切，如果與自己的生活經驗相差太遠，就不容易學得真切。譬如說，西方自由主義的最主要價值，是把人當人，不能把人當做工具，這種觀念，台灣在過去三十年，由自由派學者極力提倡，一直到最近才有一些成果。所以我認為在這點上，大陸要走的路仍然很漫長。

胡佛：就整體來說，台海兩岸現在都處於變動中，對大陸轉化過程的缺點，大家談得很多，但轉化本身就是一個很好、很珍貴的現象，也就是因為有轉化，大家今天才能夠相聚一堂。

當然，愈往後，推動轉化的困難就會愈大，因為那時候遭遇的將不只是觀念的問題，更是現實的問題，屆時學術的研究、實際的行動，阻力都會愈來愈大。談文化很容易，但要將文化落實到生活層次就不那麼簡單了。兩岸的交流，今後遇到的挑戰也將更多，雙方保持積極的心態非常重要，在這層意義上，我個人認為更需要互相交流，互相激勵，並做到經驗互補。

（轉載自「世界日報」）



中國統一之我見

胡平



一

近來，關於海峽兩岸統一的問題，日益引起人們的關注。

幾年前，共產黨領導人改變了「解放台灣」的口號，主動向台灣當局提出和平統一的建議，這一點是應該肯定的。

然而，與此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在實現和平統一的道路上，的確還存在著許多障礙。

具體說來，障礙存在於何處呢？

有人說，海峽兩岸經濟水平差距太大，故難以統一。

這種說法未必正確。古今中外，在一個統一的國家之中，各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絕非罕見。倘若說均富是統一的必要條件的話，上海和甘肅歷來同屬於同一個中央政府就是一個明顯的反例。

有人說，兩邊的意識形態不同，所以無法統一。

這種說法也欠準確。別的不說，即以今日台灣為例，即以台灣島內已有的政治力量為例，國民黨的意識形態和（譬如說）工黨的意識形態就很不一樣，但那並沒有妨礙它們彼此都共存於一個統一的政治實體之中。至於說英、法、北美等國家，意識形態的多元化更是其顯著特徵。

有人說，大陸與台灣不能統一的根本原因在於雙方的政治制度不一樣。

這種說法固然不錯，但未免失之籠統。因為：第一，政治制度相同者，未必就能夠和平統一，魏蜀吳三國在政治制度上沒什麼區別，但最終還是靠武力解決問題。第二，政治制度不同者，未必就不能夠和平統一，在美國就有一些小型政體，它們並不與大型政體同構。

兩個政治實體能否和平統一，關鍵在於它們彼此是否具有必要的包容性。而要判斷某一個政治實體是否具有足夠的包容性，當然不能以它在統一之前向對方作出的美好許諾為依據，必須要考察它對於在自己內部的不同政見和不同政治力量能否實行寬容。就此點而言，共產黨方面顯然遜色於國民黨。衆所周知，台灣現在已經有了不止一個的反對黨，而在偌大的大陸，連一家不同政見的刊物都還沒有。兩相對比，誰是妨礙統一的主要方面，不是清清楚楚的嗎？

現在，中共領導不斷呼籲和平統一，再三表示他們願意和宿敵國民黨攜手合作，「相逢一笑泯恩仇」；但與此同時，他們又執意要把一群以大陸留學生為主體的、沒有迫害過共產黨，而只受過共產黨迫害的、堅持用和平方式爭取自由民主的一個團體「中國民聯」打成反動組織；在這種情況下，中共當局力圖要讓世人相信它對台灣方面提供的優厚條件不是「放長綫釣大魚」，豈可得乎？

二

我們主張統一。但是我們認為，統一本身並非最高的價值，並非絕對的價值。

法國作家雨果在「一九三年」一書中，借主人公郭文之口道出：革命不是至高無上的。在革命之上，還有人道。

我們還可以說，統一不是至高無上的，在統一之上，還有人民的幸福。

台灣與大陸分裂近四十年，這是一個不愉快的事實。但是，請大家平心靜氣地想一想：假如台灣在三十年前就被大陸統一了過去，台灣人民後來的處境，是會比現在更好，還是會比現在更差？當初的分裂，究竟是絕對的壞事，抑或還竟有其好的一面？

我們不贊成台灣獨立。不過我們多多少少也懂得產生台灣思潮的特殊歷史淵源。因此，我們認為，要解決好「統一」「獨」的問題，需要各個方面共同作出努力。

作為來自大陸的中國人，我們注意到，有的人之所以主張台灣獨立，還有一些人，雖然不主張台灣獨立，但卻不願意馬上和大陸統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不喜歡共產黨的專制統治方式。因此，對於我們來說，促成兩岸統一就和我們一向從事的推動大陸民主化緊密聯繫在一起了。如果大陸能較快地走上自由民主之路，統一大業便會水到渠成。否則後果將是不幸的。

前面說過，中共領導主動提出和平統一的建議，總有其積極的一面。只是，從台灣方面看，鑒於大小的懸殊以及共產黨方面不容異己的習性，因而採取「三不」政策，平心而論也是可以理解的。

專制是否一定比民主更利於戰爭，這在學術界或許還是個有爭議的問題。不過，一般而言，專制比民主更利於外交，那恐怕倒是已成定論。一個專制的政府，由於它可以在最大程度避免來自內部的壓力，所以它在對外事務中往往具有超乎尋常的靈活性。迄今為止，非共產黨政權在和共產黨政權打交道中，總是吃虧的時候多。

「三不」政策當然是一個消極的政策。但是作為大陸人，我們應該對許多台灣人偏於自保的心理有所諒解。海峽兩岸人民的利益雖然根本一致，但彼此位置不同、角度不同，因此有時對同一問題，雙方考慮的側重點會有所不同。

在統一問題上，許多大陸人可能比台灣人更為熱心。這些大陸人喜歡台灣的自由經濟和政治民主。他們認為，台灣與大陸統一，必然會給大陸帶來很多自由化的因子，因此會促進大陸的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化。可是，台灣人却擔心他們原有的經濟水平和政治民主會由於統一而受到削減。香港問題就有類似情況。在香港搞「一國兩制」，對港人而言是「表叔南下」，未必是可喜可賀之事；對大陸人而言却是「港風北上」，因此總是值得歡迎的。

兩岸利益也有某些不一致之處。也許，最能說明這一點的莫過於當年北京與華盛頓建交一事，那對台灣無疑是個沉重打擊，可是對大

陸的開放却是一個有力的推動。倘若北京與華盛頓一直不建交，不要說這幾萬學生留美將是不可能，便是現今中國共產黨執行的向西開放（雖然是有限的開放）的整個方針恐怕都無從談起。倘若如此，大陸向自由化民主化方向的轉變豈不是更加倍困難了嗎？

當然，絕大部份大陸人不希望台灣在統一的旗號下被「吃掉」。他們希望台灣能保持自由經濟和政治民主。然而，他們確實希望台灣方面能更主動些，盡可能對大陸施加影響。因此，他們很願意和平統一這齣戲唱得更熱鬧些。老是說「三不」，掛免戰牌，無異於甘心放棄主動影響大陸內部發展的大好機會。但台灣許多人的想法也許不一樣，他們可能會認為，最重要的是保住我們自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主動出牌，能贏點固然不錯，但萬一輸了呢？

注意到兩岸人們在觀察問題時可能產生的角度差異，有助於使我們盡可能地站在一個更為持平的立場上考慮問題，從而作出盡可能地對雙方都有利無害的抉擇。

「三不」政策雖然可以理解，但不等於說無可修正。這是因為：

一、世變時移，攻守勢異。在今天海峽兩岸的對比上，台灣具有若干優勢。非專制政權在和專制政權打交道時常常是吃虧，不過決不是注定要吃虧，必然要吃虧（否則，人類的前途就很黯淡了）。以往吃虧的一個很重要原因在於整個大形勢，而如今這個因素已經根本改變。在大形勢改變的情況下，再設想出更恰當的策略，主動出牌還是值得一幹的。

二、台灣島內的變化。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社會壓力，將使得台灣當局很難再堅持「三不主義」。台灣現在民主了（儘管還不完善），

而在一個民主社會中，執政者是很難一意孤行的。

因此，不論是從積極方面，還是從消極方面，台灣都應考慮對「三不」政策作出調整。

四

有人批評說，共產黨既表示要和平統一，它就不該繼續用武力相威脅，同時也不該在國際組織中處處排擠台灣政府。這種批評不甚得當。因為共產黨的這些作法和它的和平統一主張並不矛盾。

第一，共產黨提出和平統一的主張，意思是說，它將努力謀求用和平方式解決統一問題；但這並不排除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可能動用武力。這些特殊情況包括外國入侵、島內暴亂和台灣獨立等。

共產黨的上述立場，從邏輯上講是站得住腳的。假如夏威夷遭到入侵，華盛頓不會不考慮用兵；假如北愛爾蘭發生暴亂，倫敦不會不派人鎮壓。這大概無人見怪。至於說一國內某一地區的政府宣佈獨立，中央政府是否應該動武，可能有不同的意見。有人主張中央政府有權動武，有人則否認中央政府有權動武。在這個問題上，台灣當局恐怕應該是否認地方政府有權獨立的。例如，台灣的某縣宣佈獨立，國民黨當局未必不會動用武力去制止。既然如此，它又怎麼能說共產黨拒絕作出絕不對台灣用武的許諾是和其和平統一主張相矛盾的呢？

第二，既然北京堅稱它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並且堅持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因此它在國際組織中排擠台灣政府就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簡言之，誰要是站在北京代表中國的立場

上，誰就會認為共產黨的上述作法（不放棄對台灣用武，在國際事務上排擠台灣）是合乎邏輯的。台灣自然是反對北京代表中國這一立場的，因此它可以從立場上反對共產黨的上述作法，不過它却不能從邏輯上對之進行批評。

有人說，不管怎麼說，共產黨的上述作法會引起台灣方面的反感，因此對和平統一不利。

台灣會反感，這當然是真的。但若說因此便不利於實現共產黨心目中的和平統一，那却是未見得。也許，共產黨的本意就在於使台灣的處境越來越困難，從而不得不回頭來接受一國兩制的和平統一方案。共產黨人很清楚，無論是香港還是台灣，都缺乏自願與共產黨統治下的大陸統一的意向。因此，要完成統一大業，不能指望港台人民的心甘情願。香港的事情好辦，九七年一到，英國人自然會走，主權自然會回到自己手裡。麻煩的是台灣，台灣自己搞得好好的，何苦和你共產黨治下的大陸搞統一呢？所以，共產黨人相信，要使國民黨人走到和談桌上，最好的辦法是搞得國民黨混不下去。五十年代共產黨在大陸搞過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和平改造。為什麼這種改造能以和平的方式完成？就在於當時的資本主義工商業者在實際上已經別無選擇。用當時的話就是「三面架機槍，只准走一方」。

有人說，共產黨對台灣威逼交加，會把台灣推向獨立的方向。可是，共產黨人可能會認為，台獨的傾向越強，國民黨接受一國兩制方案的可能性就越大。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所副所長李家泉在「再論台灣與大陸統一的模式」（《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八八年三月廿九日》）一文中，告誡國民黨當局不要硬是以「中華民國」的名義撐下去，否則，「將來被別人取代改

一下「國」的稱號，其結果必將是禍國殃民，成爲中國的歷史罪人」。這句話的含義很清楚：既然「中華民國」在國際上不被承認，台灣的處境將日益艱難，爲了謀求生存和發展，台灣要麼只有統一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要麼只有宣佈獨立，另改國號。照共產黨的分析，如果是後一種情況，國民黨將負「歷史罪人」之名，並失去在台灣執政之實，反不如取前一出路，除了在名義上由一國政府降爲一省政府外，其餘一切不變。

到目前爲止，共產黨鼓吹一國兩制，主要是針對國民黨。這是因爲它相信在台灣處境艱難的條件下，民進黨比較容易宣佈台灣獨立；而國民黨很難公開宣佈台灣獨立。同時，台灣呼聲越強，民進黨勢力越大；台灣若獨立，國民黨很可能會被取代。有鑒於此，趁着國民黨還在執政的情況下，加緊對國民黨實行(1)給壓力(2)給出路（一國兩制）的攻勢，或許會取得理想中的成功。

假如我們對共產黨的意圖分析得不錯的話，那麼這裡面包含有一系列問題：

一、在得不到各國外交上承認的情況下，台灣是否會困難到無法生存和發展？

二、如果台灣人寧肯冒獨立之險也不肯冒一國兩制之險的話，國民黨（假若它仍在執政）是否一定會拒絕扮演有關的角色？

三、如果台灣獨立將導致國民黨下野，它是否可能接受這一局面並準備東山再起，還是願意爲保住自己一時的權力而接受一國兩制？

四、台灣一旦宣佈獨立，共產黨方面究竟是否會動武？如果動武，其後果將是如何？

五、在台灣的現狀發生重大危機（假如說要發生的話）之前，大陸內部國際形勢會不會出現重大變化？

六、一國兩制到底對台灣意味着什麼？

五

對於上節提出的幾個問題，我們注意到下列一些事實。首先，是台灣的執政黨、在野黨和相當一部份民眾都不願意接受共產黨的統治，不信任「一國兩制」，同時堅持「一個中國」。其次，台灣在外交孤立的情況下，注意發展和其它國家的經濟與技術聯繫，從而爲自己爭得了一定的生存與發展空間。再者，國民黨強調「憲法就是法統」、實行本土化，用以克服所謂「法統危機」；國民黨正在轉變爲民主政黨，它明確宣佈要遵守民主規則，承認其它黨有合法獲取權力的機會與可能性。在民進黨方面，則強調，除非國共片面和談、出賣台灣人民利益，除非中共統一台灣，除非國民黨不實施民主憲政，民進黨將不主張台灣獨立。根據上述事實，共產黨的「逼和」策略（假如它確有此打算的話）還是很難奏效的。

至於說到動武的可能性，這主要不是一個理論問題或邏輯問題。更重要的是：一、雙方軍事力量的比較；二、台灣方面的抵抗意志；三、大陸人民對用武的支持程度。要求共產黨方面保證絕不用武，不僅在理論上辦不到（坦率地講，國民黨方面也很難作出絕不對大陸採取軍事行動的保證，儘管它採取軍事行動的可能性很小），而且意義也不大。本世紀的歷史表明，不論是單方面的保證還是雙方面的互不使用武力的條約，到頭來真能起到防止戰爭之效的，似乎並不多。

毫無疑問，廣大大陸人民對台灣並沒有什麼敵意。他們一般不會贊成發動一場對台灣的戰爭。不錯，在今天的中國人那裡，民族主義

和大一統觀念仍然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力量，但我們必須看到其中的狂熱成分已大為減少。可以肯定的是，人民對政府決策的影響力越大，政府發動不受歡迎的戰爭的可能性就越小。防止海峽兩岸再動刀兵的最大保證是兩岸人民彼此加深瞭解以及在各自的社會中擁有更多的發言權利。另外，我們不妨順便指出，共產黨關於放棄對台灣使用武力的公開聲明，在很大程度上是作為其「逼和」策略的一個有機部分而提出來的。因此，不可不鄭重看待，但也不必過分認真。

六

關於「一國兩制」。

乍一看去，一國兩制的方案很是公平合理、現實可行。它承認「差別」、既主張保存「兩制」、同時又共為「一國」、這就把目前海峽兩邊都承認有「兩制」的現實和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這兩點全都包括進去了。按照這種構想，你搞你的資本主義，我搞我的社會主義。大不吃小、小也不吃大、你不干涉我、我也不干涉你；取長補短，長期共存。共產黨一再表示，雙方都不要把自己奉行的主義強加給對方，不要把別人「統一」到自己的制度下來。

按照中國共產黨對「一國兩制」的解釋，統一後，台灣的一切其實都維持不變，唯一變化的只是國旗、國號和政府級別（由原來的中央政府變為地方政府）。顯然，這僅有的變化對廣大的台灣人民是沒有多大關係的，恐怕只有執政的國民黨才會對此過分計較（有趣的是，台灣方面確實也有人表示，對一國兩制方案最感不滿的一點便是台灣當局將會「被貶為地

方政府」）。但是，統一帶來的好處都是明顯的，統一有助於使包括台灣人民在內的中國人在國際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有助於促進台灣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有助於加深兩岸人民的親情關係，有助於台灣各界精英在更廣闊的天地裡施展抱負。如此等等。（有人否認統一會給台灣人民帶來任何好處，這種說法未免過分武斷）。

不錯，「一國兩制」看來的確很好。但是我們要對它提出如下批評。

首先，「一國兩制」缺乏可靠性。無可否認，現在共產黨的信譽是很低的。這不僅由於它有着大量的食言記錄，而且更在於它至今為止仍是一個無限權力，因而也就是一個任意的權力、反覆無常的權力。

許多中國人在政治問題上最常犯的一個錯誤也許就是，他們過分看重統治者的誠意，因此他們最容易被那些故作姿態性的言行所迷惑。我多次強調，對權力懷有戒心是在政治上成熟的基本標誌。比如說「反右」運動，當毛澤東號召大家給共產黨提意見並信誓旦旦地許諾言者無罪時，人們首先應該考慮的倒並不是去猜測毛澤東本人究竟是否真誠，而是要考慮「假定」他是不真誠的，我們不是有辦法、有力量予以抵擋。基於同理，現在我們要考慮的，不是去爭論共產黨關於「一國兩制」的許諾是否出於誠意，而是要考慮，萬一某一天共產黨變了主意，我們有什麼辦法去對付。我們當然希望共產黨說話算話，但是，我們在考慮自己的對策時，必須要假定統治者說話不算話。民主、法治的整套構想，就是建立在對統治者不輕信這一基本假定之上的。

有人提出用制定法律的方法來確保「一國兩制」內容的落實，這是無濟於事的。法律只

有在實行法治的地方才有效力，在實行人治的地方就沒有效力。這應是一個常識。而沒有分權與制衡，就不可能有法治，這也是明明白白的。從四九年至今，大陸上光是憲法就換了好幾部。在那裡，立法、執法、司法都集於一身，集中在不超過十人的一個小圈子之手。不要說別的，連一點輿論的監督都不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希望用立法的形式有所作為，顯然意義不大。

還有的說法就更有趣了。前面提到的李家泉在自己的文章中抬出了十三大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宣稱這個理論是「實行一國兩制最大的與最可靠的保障」。我們都知道，三十多年來，我們的「基本理論」已經換了五、六次（譬如，新民主主義論、社會主義過渡時期論、三面紅旗論、社會主義條件下階級鬥爭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論、抓綱治國論、初級階段論，等等）。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不過是現在這一屆黨中央在一九八七—八八年度公開亮出的旗號，它對於任何人，首先是對中央自己毫無約束力。把這個理論當作「一國兩制」的最大保證，實在是很不嚴肅的一種態度。

共產黨領導人多次重申，一國兩制政策，五十年不變，一百年不變。如前所說，這種許諾缺乏可靠性。此其一。第二，共產黨領導人根本沒有權利宣佈它單方面制定的什麼政策「五十年不變，一百年不變」，因為那顯然是對廣大人民的權利、對我們下一代、下幾代子孫的權利的非法剝奪。凡是關係到全國人民的事，必須由全國人民來決定，而不能只憑少數幾個人來決定，子孫後代的事，必須由子孫後代人來決定，而不能由前輩包辦代替。共產黨領導人搞專制搞慣了，當他們拍着胸脯說「五十年

不變，一百年不變」時，他們壓根沒有想到他們原本是沒有資格、沒有權利為五十年、一百年以後的事情打包票的，因為那時的一切屬於那時的人民。前輩人能為後代人所作的，不過是為他們留下一個更能讓他們自由選擇、自由發展——這也就意味著他們可能改變前人的章法——的社會環境。他們可以而且應該對後人進行忠告，但無權搞包辦代替。我們並不想誇大「代溝」的現象，不過我們總得承認，現代社會是一個多變的社會，動不動宣稱「五十年不變」甚至「一百年不變」，拋開其有無誠意這一點不談，那也是對自己力量無限誇大的一種幻想和專制性格的一種不經意的流露。

也許，共產黨領導人會說，因為一國兩制是符合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的，所以我們有把握「五十年不變，一百年不變」。不錯，歷史上確實有些深得人心的東西得以長存不變。例如美國憲法。但是，它們並不是由上代人單方面宣佈不變，而是經由每一代人的重新肯定方得以延續下去的（美國憲法的明智之處恰恰在於它承認每一代人民均有修正的權利）。所以，共產黨人若真心相信他們的一國兩制對全中國人民都是福音，那麼，唯一有效的使他人信服的辦法，就是，讓每一代中國人，經過民主程序，自己來決定這個問題。因此，千言萬語，歸到一點，那還是，實現真正的自由民主，這才是解決好兩岸關係問題的唯一正道。

七

一國兩制的缺點，不僅在於它的無保障（見上節），而且也在於它自身的不對等。你搞你的資本主義，我搞我的社會主義，看來是對

等的，實際上却是不對等的。必須看到，包括中國（大陸）、蘇聯等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其最基本特徵並不是它的那套經濟活動方式，而是它的政治結構，是它的集權制度，也就是共產黨的絕對權力。共產黨說大陸搞社會主義，但在大陸分明也可以搞些資本主義經濟，而且大陸還歡迎地地道道的外國的或台灣的「資本主義」經濟來大陸安家落戶。由此可見，這裡所說的「大陸搞社會主義」並不是說大陸搞社會主義經濟，而是說大陸要堅持它的那套「社會主義」政治。

不久前，台灣方面有人提出建議，國民黨應向大陸謀發展，具體的辦法是在北京、上海、南京、廣州等地成立辦事處，發展組織，推動黨務。對於這個建議，共產黨方面可能會作出什麼答覆呢？共產黨可能會說：「很好，讓我們互相在對方設立辦事處。不過，按照一國兩制，我們彼此應該互不干涉。這就是說，你們不許可在我們這裡從事任何有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法律的活動，同樣地，我們也不會在你們那裡從事違背你們法律的活動。」

這樣的答覆意味着什麼呢？衆所周知，依據台灣現今的法律，人們可以辦不同政見的刊物，可以組織反對黨。因此，共產黨的駐台北辦事處有着相當多的機會從事批判和反對台灣政治的活動。而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一切人都必須服從共產黨的領導，「和黨中央保持一致」。因此，國民黨的駐北京辦事處將沒有任何機會從事批判大陸政治的活動。這樣的辦事處，其功用不會比外國使領館的功用更多。

一國兩制的絕妙之處就在於此！所謂「你搞你的資本主義，我搞我的社會主義」，實際上是你搞你的民主，我搞我的專制。你那裡搞民主，這意味着我可以在你那裡反對你；我這

裡搞專制，這意味着，你不能在我這裡反對我。香港便是一個實例。以報刊雜誌而言，共產黨的報刊可以暢通無阻地進入香港，而香港的報刊却不能自由在地進入大陸；共產黨可以或直接或間接地在香港從事各種政治活動，只要不違反香港的自由的法律，但香港人在大陸却必須忍受北京當局規定的一切束縛，和其它大陸人一樣。結論很清楚，一國兩制並不對等，因為自由和專制並不對等。

八

「一國兩制」方案的缺點有如上所述。但正像有人指出的那樣，台灣方面「確實尚未找到一個對付一國兩制的可行方案」。

當然，台灣及海外一些不滿於一國兩制的人也提出過不少替代方案，如「一國良制」、「兩制一國」、「兩國兩制」、「一國兩治」、「一國兩席」等等。不過這些替代方案都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一國兩制」方案之所以受到人們較多的注意，實在不是由於它比其它方案更正確，而是因為：

- 一、它是共產黨最高領導直接提出的，因此它能調動全部宣傳工具為之宣傳，並且始終保持一個同一的聲音，從而迫使輿論為之注目。
- 二、它具有一種對等的、公正的外貌，再加上它背後有強大的軍事力量，這就使許多人認為它是必須認真加以考慮的，同時也是值得認真加以考慮的。
- 三、它注意到針對台灣目前存在的一些實際困難，注意到針對台灣上下的某些心理負擔

，換言之，它注意到使自己和台灣的內在壓力相結合，因此加重了自己的份量。

四、共產黨方面採取了一系列與之配合的行動（從修復蔣氏故居到鼓勵直接通商），造成了一個比較全面的攻勢。

反觀台灣方面，則有如下缺點：

一、台灣當局提出的「三不」，是純粹防禦性的、消極的方針，既缺乏進取性，自然不會引起人們積極討論。

二、共產黨方面提出一國兩制，容易給人造成「在大實力下提小要求」的印象，而國民黨方面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則容易給人造成「在小實力下提大要求」的印象，這就使不少人因懷疑其現實可行性而不予重視。

三、有些方案雖然要求不高，但畢竟過分依賴於共產黨方面的善意，因此它們只能贏得一些人的贊同而不能被眾人認真看待。換句話說，這些方案並沒有注意和大陸內部的壓力相結合，所以顯得軟弱無力。

四、在其它方面，台灣當局也傾向於消極防禦而極少採取主動態度，因此它不能造成一種廣泛的聲勢。

九

我們主張統一。我們認為，統一必須基於民主、基於法治。

有人之所以對一國兩制感興趣，無非是因為他們以為一國兩制能兼收並容，但正如我們在前面指出的那樣，一國兩制並不具有包容精神，事實上，共產黨到目前為止連中國民聯這樣和平理性的政治組織都毫不寬容，足見其所言為虛。只有明確地提出民主和法治，我們才有希望建立起真正的民族和解和國家統一。

有人之所以贊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是因為他們認為三民主義就包含了民主主義的思想，因此三民主義不同於四項堅持而具有廣泛的包容性。可是問題在於，三民主義者們應當看到現今大陸上絕大部份人並不熟悉和並不信仰三民主義這一事實，更應該懂得廣大人民（尤其是大陸人民）對各種主義均持存疑心理，不肯輕言信仰，十分重視自己的選擇權利這一普遍心態，因此當今首要之務並不是急匆匆地把自己以為不錯的信仰加給別人，而是努力地建成一個人能夠在其中自由比較、自由選擇的政治構架，也就是說實現民主和法治。

我們高興地看到，很多人、很多黨派、很多組織都贊成民主統一中國。目前真正反對這一主張的，說來很遺憾，不是別人，主要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

今年第三期「爭鳴」雜誌發表了一篇李玉先生的文章「和平民主統一中國」。這篇文章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引用四十多年前毛澤東關於統一中國的意見來批判當今中共領導人的錯誤主張，頗有意思。當年毛澤東力倡和平民主統一中國，要求廢除一黨專政，確保公民各項自由，建立起自由選舉的聯合各黨派的中央政府，實現軍隊國家化等等。可惜的是，毛澤東這些正確的意見（不要因人廢言），毛澤東自己並不實行，今天這些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的中共領導人們也不實行。非但不實行，他們還一定會把這些意見扣上「自由化」的帽子。正是共產黨領導者的這種錯誤立場，使得和平民主統一中國的大業困難重重。

十

兩岸統一，不是一個朝夕可就之事。這是

一個主要由共產黨方面造成的不愉快的事實。在通往統一之路上，我們可以分成三個階段：一、間接談判；二、直接談判；三、統一。顯而易見，目前仍處於第一階段。在這一階段，兩岸當局，或國共兩執政黨，乃至於兩邊的政治力量，除開台灣雷渝齊與新華社的一次接觸外，都尚未進行正式的接觸與磋商。但是它們紛紛發表聲明、發表文章，表示對統一的意見，表示對談判的意見，且彼此間有問有答。這雖然還不算談判，但無疑是在談「談判」，或曰討論談判的先決條件。雙方走到這一步來，離統一目標固然還遠，但畢竟較之以前的軍事交鋒和毫無動靜是一個進步。

現在的問題是，共產黨急着談判，國民黨拒絕談判；對於談判，共產黨沒提什麼先決條件，國民黨則提出了一系列先決條件——這些先決條件如此嚴厲，以致於會被認為是變相拒絕。所以有越來越多的人，包括台灣島內許多人，對國民黨當局的這種態度不滿。如今，台灣各界對當局的壓力都不小，昔日的全面抵禦政策（如三通）事實上已有較大的突破，在這一變化過程中，國民黨當局自己也採取了一些積極的措施，只是仍嫌不足和不夠主動。在這種情況下，讓我們立足於整個民族的根本利益對於這些問題展開認真細緻的研討，那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首先我們要指出，國共兩黨對和談的態度冷熱不一，固有其各自的原因。一方大，一方小，小的怕被大的吃掉，這自然是一個因素。另外還有一個原因是，在對待和平談判的問題上，共產黨本來就擁有的比國民黨更多的迴旋餘地。眾所周知，和平談判的目的是化敵為友，因此，單單是走到和談桌前這一舉動本身，即已表明你懷有和對方消除敵意的願望。共產黨

既是主動倡議與國民黨和談，那便意味着它已有意解除對國民黨的敵對關係。可是我們要知道，共產黨在大陸搞了幾十年政治運動即政治迫害，從本質上講都是共產黨對國民黨政治壓制的繼續（文化革命中，毛澤東就說過，文革的鬪爭是國共兩黨鬪爭的繼續）。一旦承認國民黨不再是敵人，那便意味着在中國（大陸）將沒有任何政治性的敵人存在。國民黨是最大的「反革命組織」了，一旦國民黨不再是「反革命組織」了，全中國就很難再有誰能按上「反革命組織」這個罪名了。

話是這麼說，道理是這麼推，但共產黨辦事，實在是靈活得令人嘆為觀止。就在共產黨領導人對國民黨稱兄道弟之際，上海市公安局作出了中國民聯是「反動組織」的判決。當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出黨中央的指示，「昔日對中國人民犯有罪惡之國民黨人員」，不究既往（也不要求他們一定要聲明悔過），歡迎來大陸；但與此同時，中國駐紐約領館警告我，如不退出中國民聯，將禁止回國。直到現在，共產黨在下面攻擊中國民聯時，仍強調其「國民黨背景」。這不是明顯的雙重標準嗎？

由於共產黨在其治下對人民實行了無微不至的全面控制，因此它可以說一套，做一套，今天一是非，明天一是非地隨心所欲地變化而不致招來明顯的內部壓力。對比之下，國民黨顯然無此靈活性。因此它不大敢輕易走到談判桌前。

不少人提出，建議國共雙方停止敵對宣傳，降低敵意。這個提議自然很好。不過需要強調的是，我們要求於雙方的，不是權宜性的改變宣傳口徑，而是要真正地改變態度；不是出於「將欲取之，必先予之」的計謀，而是出於對不同政見政派的人格尊重。我們當然希望國

民黨方面能夠改變對共產黨的敵對態度，這是我們發自內心的願望。不過，在共產黨方面連中國民聯尚不肯容忍之前，我們並不急於對國民黨單方面提出過高的要求。

應該承認，要求國民黨像共產黨那樣不講任何條件地走到和談桌前，恐怕是不妥當的。依我們之見，眼下台灣方面可做之事還不是談判，而是談「談判」，亦即在提出談判條件上下功夫。當然，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就需要向世人講清楚何以還不能直接和談的原因。下面，我們來討論一下談判的先決條件問題。

十一

談「談判」的重要意義在於，它是一種向對方施加壓力、施加影響的有效手段。台灣方面如果不在間接談判上作努力，那不僅會失去對大陸影響的機會，而且會招致越來越多的來自島內的和海外的壓力，勢必使自己陷於益發被動的境地。

間接談判不同於直接談判，討論統一的條件不同於討論談判的條件。比如說，關於大陸一定要真正實現完全的民主法治、自由經濟，這應是統一的條件，不能作為談判的條件。

關於談判的條件，不宜太高，否則總是進入了直接談判的門，那會削弱向對方施加壓力的份量；也不宜太低，否則會自亂陣腳。既然共產黨在和談上歷來容易占便宜，所以必須設法克服這一點。

如前所述，共產黨之所以在和談上容易占便宜，是因為它在其治下能一手遮天，它能免除任何來自內部的壓力。因此，間接談判的目的就在於對這一局面來一個貌不驚人的，但具

有釜底抽薪意義的扭轉。

我在前面曾經指出，當一方要使自己提出的要求對另外一方產生壓力，它必須能夠找到對方統治的弱點，必須能夠和對方社會內部的壓力相結合，必須能夠以其公正對等的姿態贏得盡可能廣泛的各派人士的支持，並且能夠採取其它一系列活動予以配合。

台灣方面可以公開向中共當局提出嚴肅的要求，要求中共當局立即實行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新聞自由。根據在於唯有在不同政派不同政見的人們的基本自由權利得到真正保障的情況下，民族的和解、國家的統一才不是一場騙局。

提出上述要求的好處在於：

一、它對準了大陸專制統治目前的最大弱點。今日的極權統治早已不能控制住人們的批判意識，它只是靠壓制這些思想的自由表達而強撐度日。

二、近些年來，大陸人民，尤其是知識界和年輕人，對言論自由等基本權利的要求十分強烈，他們不僅有着堅定的自覺意識，而且還不害怕公開提出自己的這一要求。這後一點很重要。在政治中，只有公開顯現的力量才是算數的力量。台灣方面如能提出同樣的要求，那就會和大陸社會內部的壓力迅速結合，互相呼應，彼此加強。假如台灣方面提出的要求超出大陸人民能夠正大光明地予以肯定的程度，則會失去大半力量。這一點至關重要。

三、這一要求，由於它對各種派別傾向的人都一視同仁地予以尊重，故能博得極其廣泛的認同和響應。例如說，海外的各家左派報刊也都是贊同這些要求的，它們也必然會對台灣提出的這一要求持積極態度。畢竟，台灣自己在這方面的進步是舉世公認的。那更會增加這

一要求的說服力和影響力。另外，提出這一要求，也表明台灣方面不是局限於一黨一派的私利，而是從整個民族的利益出發的。

畢竟，解決統一問題的關鍵是促進大陸自由化民主化，而促成大陸自由化民主化的主要力量只能是大陸人民自己，但是包括台灣在內的大陸之外的力量却能夠在其中起到相當特殊的作用。台灣不可能代替大陸人民自己爭自由爭民主，但它有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在釋放大陸內部的自由化力量的過程中給予一個有力的推動。

也許有人會懷疑，僅僅提出言論出版等自由作為談判的先決條件，是不是太低了些。我們要說的是，對付一只大氣球，你其實只消鑽一個針眼。不要忘記，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是在什麼情況下招致蘇聯坦克的入侵的，那就是當杜布切克政府廢除了書報檢查制度，打算實施出版自由和新聞自由的時候。當然，要實行統一，僅僅是這些自由還不夠，但作為走到和談桌前的先決條件，它們絕不太少。有了它們，你就可以和對方好好談了。當共產黨在自已地盤上有一支越來越強大的監督制約力量時，它還有什麼可怕的呢？

問題就在這裡。我們應當看到，當一個專制政體向它的對手發出和談的邀請時，那首先是表明了它的弱而不是表明了它的強。另外，專制政體之所以容易在談判中占便宜，無非是在它內部沒有對之批評監督的力量。所以，採取主動的而非被動的措施，不失時機地（這一點很重要）、積極地從外部施加影響去推動內部的自由化民主化，無疑就是一種最佳的選擇。

不妨設想一下，假若台灣方面正式提出這樣的的要求，會出現什麼樣的局面呢？

它將構成對中共領導的一項極為嚴肅的挑戰。如果中共領導採取完全迴避的態度，拒不出任何答覆，依舊自說自話，重覆「一國兩制」的老話，或者說乾脆明白否定這一嚴正要求，再彈什麼「社會主義言論自由」和「資本主義言論自由」一類陳詞濫調，那必然會使自已陷於非常被動的地位。

與此同時，大陸人民一定會對台灣的這一要求產生熱烈的回響，因為這正是他們多年來一直公開提出的基本主張。再加上海外華人及台灣島內各派力量的一致贊同，這就造成了一股內外呼應、廣泛聯合之勢。它必將對促進大陸自由化民主化衝出「瓶頸」造成極大的效果（一旦衝出「瓶頸」，大陸的自由化民主化就將一瀉千里，勢不可遏）。

如果中共領導在這種形勢面前，能夠不是為時太晚地接納這些要求，那就意味着大陸的自由化民主化將進入更為波瀾壯闊的發展階段，同時也意味着兩岸民主統一跨越了最艱難的障礙。這既是大陸人民多年鬭爭的結果，是中共當局明智抉擇的結果，同時也是海外人民和台灣人民支持幫助的結果，也是台灣當局積極推動的結果。它將對未來中國統一的格式的形成及各種政治力量的前景產生深刻的影響。

十二

上面所說，是第一階段即間接談判階段中可做之事。這個問題不解決，不宜匆匆進入直接談判。因此，對於台灣方面來說，提出這樣的要求，應是一種在確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極富進取性的措施。下面的問題是，在間接談判階段，還有那些事好做？

共產黨方面提出了「三通」「四流」。台

灣方面先是拒絕，爾後漸有開放，尤其是這大半年來，民間的流通已有可觀的進展。對於這方面的問題，似乎也有研討的必要。

早在四十年前，英國作家亞瑟·柯斯特勒就告誡西方，在和蘇聯打交道時，一定要強調思想和信息（各種書報、廣播、影視）的自由交流。他強調這個要求一定要不厭其煩地提出來，在聯合國上提、在安理會上提、在每一次高峯會議上提，它應當作為東西方任何談判的先決條件。

四十年過去了。在此期間，東西方之間舉行了無數次會議，簽訂了一系列協議，但是被柯斯特勒再三強調的關於思想和信息自由交流的要求，却始終未能實現。並不是西方人都不重視這個要求。事實上，這個要求多次被人們鄭重其事地提出。只是，面臨着對方毫無妥協餘地的強硬立場，他們不得不再地予以放棄。到了後來，許多西方人已經把提出這一要求視為例行公事的虛晃一槍，並不當回事了。

這是共產黨人在談判上取勝的又一實例。和共產黨人在談判桌上驚人的靈活性相輔相成的是，共產黨人在談判桌上也具有一種驚人的頑固性。凡是他們認為對自己絕對權力有損害的，他一概加以拒絕。這當然也是因為它可以最大程度地擺脫內部壓力。很多要求，對國家、對人民都大有好處，只是對他們一小批人的無限期威沒好處，他們就不顧一切地堅決拒絕。一旦人們在他們的這種頑固性面前沮喪屈服了，他們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我們同意，在兩岸尚未和談、尚未統一之前，有些事情可以先「通」起來。我們也認為在這些「通」裡面，最重要的是思想信息的流通。台灣可以公開流通大陸的書籍，大陸可以公開流通台灣的書籍。這一點現在似乎很有進展

，我們甚至看到，兩岸打算合作編書。這些當然都很好。但可惜的是，迄今為止已經着手的「思想信息交流」都局限於非政治性的方面。因此基本上不具有像柯斯特勒等人所期望的那種意義。

現在，海內外都有一種普遍的意見，認為「流」和「通」宜先從非政治性的方面入手。台灣的一些執政者，從執政者的眼前角度出發，以為讓對方的政治性的東西進入島內，可能會給自己添麻煩，因此也傾向於接受非政治性流通的概念。但實際上，這無疑是一種非常短淺的見解，它必然會招致嚴重的後患。

道理很簡單。因為非政治性的流通對於每一方面而言都可能是有利有弊。既然專制的一方具有更強的對內部異己因素的壓制能力，它就能更有效地把那些交流帶來的副作用予以有效的抑制；而不專制的一方就不大容易這麼做。其結果自然便是前者常常在流通中得到了更大的好處。我們在上幾節反覆強調，民主的社會在和專制的社會打交道時，除非它能致力於促進對方的自由民主化，否則總是得不償失；而促進對方自由民主化當然是政治層面的事情。因而，放棄了政治層面上的交流無異於放棄了自己成功的唯一可能性。更何況，一個專制的社會乃是一個政權力量可以支配一切的社會，因此它不難給任何活動都賦予政治的使命，或者是從政權利益的角度加以調控。這樣一來，所謂政治與非政治的區別就只有單方面的意義了。與此類似，最近台灣不少人提議在兩岸交流中，區分官方和民間，官方繼續「三不」，民間不妨「兩不」（不迴避、不退讓）。這樣導致的後果便是，一方可以假手非政治性交往，假手民間交往向對方施加政治影響和政治壓力，另一方却無此便利。這種不對等的

交往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實在是值得深思的。

從旁觀者的角度看來，台灣方面的這些想法，其基本點首先是立於自身安全，其次則是迫於壓力、迫於島內的壓力。整個對策明顯地缺乏進取精神。所謂「坐以待變」，當然有它的道理，因為大陸自己確實在變。但是，如果我們真的相信大陸內部有變的趨勢和力量，從外邊去促一促豈不更好？今天的台灣，固然是非守成不能進取；但另一方面却又是，非進取不能守成。

十三

我們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感覺：中國在變。海峽兩邊都在變。有些哲學（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喜歡談什麼「變化的客觀規律」。按照這種理論，變是變，但變的方向和結果却是早就確定了的。其實，真正的變就是意味着不確定。未來會是什麼樣子，部分地取決於我們現在的抉擇，而抉擇的困難以及它的引人入勝之處在於我們總是有着不止一個的選擇方案。在這樣一個富於挑戰意味的時刻，我們提出我們的分析和意見，希望能對局勢的發展有所裨益。



中國統一聯盟成立

—陳映真當選執委會主席

四百多位隸屬不同黨派的人士，四月四日在台北耕莘文學院成立「中國統一聯盟」，並舉行建盟大會，通過組織章程，同時選出執行委員及監察委員，由獲最高票的陳映真擔任第一屆執委會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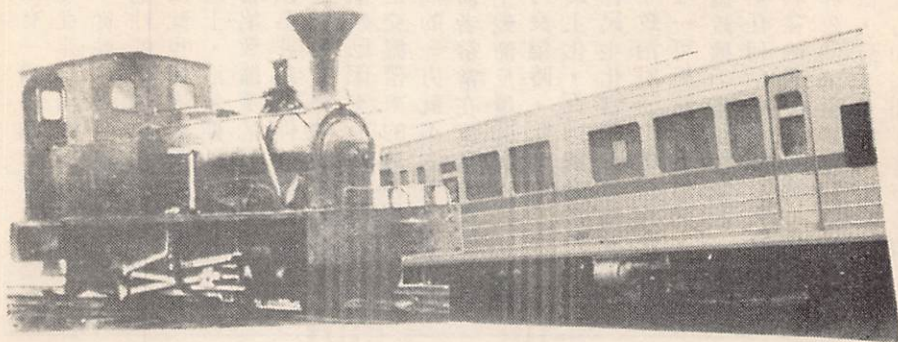
包括中華、夏潮、人間、遠望、海峽、前進週刊等雜誌社的各黨派人士，四日上午在建盟大會中通過組織章程，重要主張包括：（一）推動兩岸探親、旅遊、互訪，增進兩岸學術、科技、文化、藝術、體育的交流，直接商貿投資發展及郵電航運開展。（二）促進海峽雙方停止敵對宣傳，降低雙方敵意。（三）促進召開海峽兩岸共商民主統一的會議。

下午繼續進行執行委員及監察委員選舉，於下午五時產生廿一位執委：陳映真、蔣碧玉、林書揚、黃溪南、劉喬木、謝學輝、李旺輝、曾祥鐸、鄧可謹、尉天聰、王曉波、錢江潮、侯立朝、簡永松、胡秋原、高華、謝正一、繆奇虎、劉源俊、皮介行、李根道。接著又選舉監察委員，由何文德、林玉潔、盧兆麟、康橋、張曉春等人當選。

張玉先

龍年伊始車禍多

大陸「三、二四」鐵路車禍



黎音

今年是十二生肖的龍年，據說龍是吉祥的象徵，為一年之計的好兆頭。那麼，按說中國的「四化」建設應當有個龍騰虎躍的新形勢。可不知怎麼着，今年一開頭就儘出些倒楣、喪氣的事。不僅物價龍飛鳳舞般地漲上了天，連那火車也像堵氣似的總是二龍戲珠般地往一塊硬撞。

今年僅頭三個月，就連續發生了四起重大鐵路事故，死傷三百多人，這在中國鐵路史上是罕見的。頭三起事故發生後，鐵道部部長丁關根引咎辭職。可他下台沒幾天，又出現了震驚中外的「三、二四」鐵路車禍，這下更造成了嚴重的國際影響。

李鵬：怎麼偏偏這時候出事？

第七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已於三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召開，七屆全國政協會議於三月二十四日開幕。正在舉國上下忙於迎接兩會召開之際，三月二十四日午後兩點二十分，在距上海真如站七點三公里的外環線匡巷站附近，南京開往杭州的三一一次旅客列車與長沙開往上海的二〇八次旅客列車發生正面衝撞。三一一次列車掛有十六節車廂，其中三節軟臥車廂裏乘有日本高知市學藝高校一百九十三名師生組成的修學旅行團。這些日本師生都抱着到中國進行一次愉快旅行的嚮往，他們正準備去參觀姑蘇城外寒山寺，遊覽西子湖畔岳王祠。萬未料到中途列車相撞，當即造成六十四名師生傷亡，其中死亡二十七人，重傷五人，死傷者中除一名是教師外，餘者都是十六歲左右的男女高中學生，個個青春年少，稚氣活潑，不期遭此慘禍，實在令人痛心惋惜。當時，中國方面也有一名檢車工死亡，六十三名旅客和列車工作

人員受傷，一時成了轟動世界的惡性交通事故。據說正在參加七屆人大預備會議的李鵬代總理接到電話後，登時火冒三丈，近乎暴跳如雷，他將電話機一摔，頹唐地坐在沙發上說：「怎麼偏在這時候出事！」是啊，怎麼偏在這時候出事？「人大」就要開幕，這個「獻禮」來得不早不晚正趕在節骨眼上，可真讓人窩火。怎麼向代表交待？怎麼向全國人民交待？難道明天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還要加上一條檢討？

鄧小平：人禍還要橫行到幾時

「三、二四」車禍發生的當天晚上，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了臨時緊急會議。會上除了聽取事故情況彙報，研究處理措施，討論涉外事宜，與會者重點議論的另一個問題，就是今年頭三個月連續發生四起鐵路交通事故，能看成是偶然的嗎？黑龍江省的列車相撞與上海附近的列車相撞，據報都是由於列車的制動系統失靈而闖入運行禁區所引起的，從事故發生的時間、原因背景分析，不能排除人為破壞的可能性。因此，李鵬在安排組成「三、二四」鐵路事故調查領導小組的同時，又指示公安部參與分析破案工作。

儘管鄧小平十分重視這次交通事故，但出乎人們意料，他并未像往常那樣發脾氣。他在聽取李鵬和張勁夫的彙報時，插話說：「天災常常不可防，人禍難道就不能防？死了這麼多娃娃，什麼人聽了都覺得可惜。今年是人禍橫行啊！人禍還要橫行到幾時？」鄧小平雖然說話的語氣是平和的，但在場的人都看得出他的內心很激動。當然鄧小平所說的「人禍」並非單指鐵路交通事故而言，從各方面看目前中國都是「人禍」比天災更讓人頭痛，難怪鄧小平憂心忡忡。

日本老人：

破爛機器出不來好產品

「三、二四」車禍發生後，日本的各電視台當即就用「新聞速報」進行了報導，立刻引起全國的重視。不僅高知市學藝高校修學旅行團的師生家屬通宵達旦地圍坐在電視機旁，急切地想從電視中瞭解親人的安危，而且這一事故當時也成爲全體日本國民的頭號新聞。許多人放棄了自己最喜歡欣賞的電視節目，聚精會神地收看這次事故的報導。可是來自中國的消息却非常遲緩，事故發生二十四小時之後，竟然報不准傷亡人數，當然更講不清傷亡者的姓名。甚至常常出現誤報死、傷者姓名的情況。搞得那些師生家屬坐臥不寧，焦急萬狀，望眼欲穿，恨不得一頭鑽進電視機裏去弄個明白。可是中國的報告始終滯鈍不暢，可以想見當時搶救遇難者以及報導的現場是何等紊亂不堪。

關於「三、二四」車禍原因的報導方面，中國至今的說法也是顛三倒四的。開始時對外公佈，是由於列車的制動系統失靈而造成車禍；後來又公佈是司機違反行車規定闖過紅燈，與迎面開來的列車相撞肇事，列車制動系統并未失靈，爲此，已將三一次列車司機周小牛依法逮捕，副司機劉國隆收審；不久前，鐵道部副部長李森茂把發生事故的原因歸咎於鐵路部門安全管理不善、設施落後以及人員素質下降。他的說法似乎較爲全面，但認真推敲一下，他並未言中問題的要害。記得事故發生當天傍晚，東京銀座街頭許多民衆圍着電視收看有關撞車的報導。一位日本老人默默地看完以後，自言自語地講了一句話：「破爛機器出不來好產品！」當時筆者并未立即理解老人語中涵意，如今却感到回味無窮了。

人們都在議論：

看看龍尾怎樣甩

雖然中日兩國領導人都再三表示，不會因「三、二四」車禍而影響兩國的友好關係，但是這次惡性事故所造成的各方面嚴重後果，不可能不給兩國的實質關係又罩上一層陰影。不但社會輿論一時難以平息，罹難者家屬的心理創傷無法消弭，而如何解決受害者的賠償問題，又將是擺在雙方面前最棘手的問題。

據日本報載，日方「三、二四」車禍死傷者家屬已委託律師前往中國談判賠償問題。日方初步提出的索賠款額是，死亡者男生每人五千一百五十萬日圓（約合四十萬一千四百四十四萬美圓）女生每人四千一百五十萬日圓（約合三十二萬一千三百四十四萬美圓）據說日方提出的數字比中方原計劃的數字高出十多倍。因此，要想談得攏，做到雙方滿意，恐怕沒那麼容易。

北京高層對「三、二四」車禍在日本社會所引起的反應很重視。新華社、人民日報駐東京的記者都得到國內的指示：要密切注意日本各界對此次交通事故的反應，定期經常向北京匯報。大陸某報東京支局負責人說：「自從中國驅逐共同社記者邊見和出現光華寮事件之後，日本輿論界有一股不正常的情緒，他們早就想找個機會一轟，這股情緒代表了日本政府中的右派勢力，所以「三、二四」車禍的真正處理難題還在後頭。」

俗語說：「龍頭怎麼擺，龍尾就怎麼甩」，今年這個「龍頭」沒有擺好，多事之春顯示流年不利。

「看看龍尾怎樣甩吧！」人們在議論大陸局勢時現在常常這樣講。當然這不僅是指對「三、二四」車禍的處理問題，而是包含着對未來更多的擔憂和更深的疑慮。

林口
印刷公司

彩色報紙 各型雜誌 宣傳刊物 大型海報

☎：718-937-5141

718-937-5301

🏠：50-22 23 ST.

L.I.C., N.Y. 11101

Linco Printing Co.

民聯在美常委、監委及總部成員 聯席會議

四月三十日，中國民聯在美國的常委、監委及總部成員，在「中國之春」編輯部召開了聯席會議。

出席會議的有：主席胡平、監委主任黃仕中、副主席柯力思、常委王炳章、林樵清、余叢、呼廷民，監委委員黃奔、錢達、孟振華，以及總幹事丁楚、經濟開發委員會主任宗繼祥等共十二人。會議歷時十小時以上。

胡平主席主持了會議，監委黃仕中、錢達、黃奔等發言，對總部前一階段工作進行了質詢。有關的常委作了答辯，總幹事和總部成員報告了工作。會上還宣讀了常委姚月謙、張俠及監委童著、何明的來信。

會議就中國民聯的政策、財務、組織等方面問題進行了嚴肅認真、熱烈坦率的討論。

會議對中國民聯的近期政策和策略（尤其是台灣問題）進行了討論，獲得了共識。

會議認為，全盟應當重視開發經濟，搞活財路。

會議認為，今後應定期舉行類似會議，以討論和解決內、外各種問題，使中國民聯進一步民主化。

有關這次會議的公報及發言摘要，將在下期「盟員通訊」上發表。

（本刊記者呼廷民）

民運發展及中國民聯

近期活動

北京學生靜坐示威、貼大字報

四月十日分別來自三所大學的十八名學生和一名教員，在天安門廣場示威，示威者坐成一圈，展開一幅寫着：「在教育上多花一點錢」的標語，要求改善知識份子的待遇。

從三月底，北大、北師大校園出現批評李鵬的大字報以來，不斷的有「大字報」出現，北大校園，批評共產黨的知識份子政策和教育政策，要求增加教育經費、改進工作環境、給教職人員加薪。

四月七日一張署名「研究生擦鞋俱樂部」的大字報，指出：「昨日六名北大研究生前往天安門廣場替人「擦鞋」，因沒執照而被禁止。大字報呼籲北大學生去人大會堂為人大代表擦鞋賺錢。」

四月十一日「紅帆」貼在北大的大字報寫道：「馬克思預言的美麗的事物並不存在。許多幹部貪污、獨裁……但是馬克思主義這種灰色的理論和空洞的教條，仍然在向失望的靈魂灌輸。」並呼籲北大師生以蔡元培校長為榜樣，為改革努力。

方勵之教授反對限制出國留學

方教授認為，人才外流在現階段是不可避免的。

中國民聯總部文宣組

免的。即使留學生不回國，對國家也可有幫助。作為「國際儲備人才」，在外國吸收先進科技，等將來中國經濟發展得好時，他們自然會回來。他們留在國外也可發揮訊息交流作用。他說，從來沒有一個國家會因人才外流而令經濟衰退，反而是有好影響，如歐洲、台灣等，但不開放就肯定會對經濟有影響。

他認為，大陸留學生人數絕非太多，而是太多了！台灣留美學生有三萬人，而大陸留美生只有二萬人。

今年二月，湖南科技出版社，在未得到官方的批准下，出版了方勵之教授兩度被查禁的論文集，並於四月份公開銷售。

國際筆會緊急基金給車少莉捐款

國際筆會緊急基金 (FOUNDATION P. N. EMERGENCY FUND) 主席伯恩萊夫先生 (J. BERNLEF) 一九八八年三月廿五日於荷蘭寫信給楊巍的妻子車少莉，向她捐助伍佰美元。信函全文如下：

親愛的車少莉女士：

從國際筆會的辛普森 (K. V. SIMPSON)

先生和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得知了您的地址和有關您、您的丈夫楊巍的一些信息。我寄上伍佰美元作為捐助。我們的基

金旨在幫助那些因意識形態問題而處於困境的作家和他們的家屬。

如有可能，請給我您的收據，並給我一些有關您更多的情況及您的丈夫在中國的生活狀況。

等待您的答覆。

忠於您的

丁·伯恩萊夫

於荷蘭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民主基金會頒獎

三月廿六日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在舊金山頒獎給方勵之、王若望、費希平、李柱銘等四人，對他們在中國民主化上所起的推動作用表示敬意。

民主基金會由評選委員會每年評選在中國推動民主運動最有貢獻的人士。去年得獎者為魏京生、王若水、劉賓雁，三人的頒獎典禮邀請函、獎金均遭拒收退回。今年，來自台灣的費希平（民進黨創黨人之一，立法委員）和來自香港的李柱銘（律師，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極力推動八八直選）均親臨舊金山領獎。方、王兩人雖不能來，但分別書面委託陸鏗（老報人）及夏雨（王的學生）代為領獎。方勵之還寫了書面發言稿，對得獎表示感謝。

典禮完後，還舉行了國是座談會，由楊力宇、馮勝平、鄭宇碩等主講。

李柱銘在美西、美東奔波演講

香港立法局議員、基本法起草委員李柱銘

律師近年來主張「民主拒共」，強烈要求八八年直接選舉香港立法局議員，在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上力爭港人權益、為港人說話，而受到港人的普遍尊崇。

三月廿六日李律師在加州接受「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頒發的「推動民主獎」後，隨即應舊金山、洛杉磯、華盛頓、波士頓、紐約等地的香港同學會邀請演講，並拜會僑界及美國人士，呼籲支持港人爭取民主。

紐約市長郭德華四月八日接見李律師，對李為香港的民主所作的努力表示欽佩，但郭德華說，「香港的命運已為英國及共產中國決定，任何努力都是白費」，而邀請李到紐約定居。

李律師婉拒郭德華的好意，並在各地演講會上強調，逃避不是辦法，港人需面對現實，港人的命運應該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應讓別人操縱。

鄭念在紐約演講

四月廿三日下午鄭念女士在紐約中華公所演講，吸引了三百多中外聽眾。

以「上海生與死」一書轟動美國的鄭念女士強調，陳述個人實際遭遇的經歷比任何對共產制度的批評都更有力量，更容易為人所接受。

鄭女士原任職英商設在上海的殼牌石油公司，一九六六年因此成為「帝國主義特務」受批鬥，並監禁在上海市第一拘留所長達七年。在獄期間，她唯一的女兒，因不願與她劃清界限，指她為「資本主義的特務、走狗」，而遭毒打致死。母女倆生離死別終不能再見最後一面。

胡平在紐約僑社座談演講

中國民聯主席胡平的觀點、作法為大陸留學生所熟悉，而僑界則對他較陌生。為在僑社擴大民聯的影響，爭取僑界對民聯的支持，四月初胡平在紐約與僑社進行了兩次座談。

四月二日，由「大紐約地區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和「大陸移民聯誼會」合辦的「中國統一問題座談會」，在中華公所舉行，邀請了胡平、柯力思、丁楚與會演講。參加座談的還有耶魯大學留學生叢大長及來自台灣的學者陳憲中、劉添財、范揚盛、陳長霖等。與會人士的看法或有不同，但都肯定唯有民主才是兩岸統一的基礎。

四月三日，胡平應紐約史泰登島重光社邀請，由柯力思、林樵清陪同，和該島僑胞就中國民主化及民聯的發展交換意見。胡平並在會上呼籲捐款贊助民聯，重光社社員即席響應，捐贈了一筆款項。

王炳章對洛杉磯僑界演說

一九八八年四月上旬，中國民聯常委王炳章赴美西和南展開募捐活動。四月三日，王炳章在洛杉磯金龍酒家對洛杉磯僑領及新聞界，就「結成反對專制爭取民主的聯合戰線」為題，發表了演講。

演講會由中國民聯洛杉磯聯絡站舉辦。參加的僑領有洛杉磯中華會館主席黃振華、美洲各地中華公所聯誼會秘書長黃金泉以及李紹倫、蔡國良、林舉、周鴻炎等先生。中國民聯舊金山支部負責人錢達、郭平，洛杉磯聯絡站負責人伍凡、朱春福等，也參加了演講會。

王炳章在演講中指出，中國民聯的宗旨是改變中共一黨專制局面，建立民主制度；在經濟上保障私有產權，促成均富國強。要實現這一目標，一切反對專制爭取民主的力量應該聯合起來。

在談到中國的政治現狀時，王炳章指出，現今中國存在兩個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政權和中華民國政權。衆所周知，這是一個現實，我們必須正視。過去數年，國民黨執政的台灣朝自由民主的方向邁進，而中共却在政治上倒退，大搞反對精神污染和反對自由化，鎮壓知識份子和民主力量。

王炳章呼籲各界人士、包括台灣朝野和僑界大力支持大陸的民主運動。大陸民運壯大一分，對中共的牽制就增加一分，台灣的安全也就多保障一分。

王炳章博士演講完後，僑領黃振華、黃金泉等起立講話，他們對中國之春的精神表示欽佩，呼籲僑界慷慨解囊，支持大陸民運。

王炳章在加州理工學院演講

四月五日，中國民聯常委王炳章應邀到加州理工學院，就中國大陸的改革及民運發展情況發表演講。演講會由中國大陸研究生、加州理工學院化學系博士候選人王尤崎主持。王尤崎講，他以私人名義請王炳章先生來，目的是交換意見，增進了解。七十多名聽衆參加了演講會。

在演講中，王炳章先向大家介紹了中國大陸七屆人大的一些情況，隨後，他講解了大陸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困境及應該採取的克服辦法。他指出，東歐共產黨國家的改革都有明顯的周期性，都在改革一段時間後出現了不可

突破的瓶頸。他擔心中國的改革也會陷於這一周期。他指出，只有動員人民的力量，實行民主，放手讓人民參與改革，共產黨國家的改革才能成功。

王炳章演講受到與會者的鼓掌歡迎，與會者並展開熱烈討論，中國大陸留學生發言踴躍。會後，一位留學生說：「出國前就受到中共宣傳影響，認為中國之春是個可怕的組織。見到王炳章並聽了他的演講，才發現中國之春、中國民聯是個很有理性、的確定追求民主的團體。」

普林斯頓國際特赦組織 邀胡平演講

一九八八年四月廿五日，普林斯頓大學國際特赦組織邀請中國民聯主席胡平，前往講解中國大陸的人權問題。陪同胡平前往的，有中國民聯總部常委王炳章和總幹事丁楚。

晚八點，胡平在伍德羅·威爾遜學院（WOODROW WILSON SCHOOL），對大約一百名聽衆，以「政治迫害：中國人權問題的一個重要方面」為題，發表了演講。

胡平說，在中國，一直存在着嚴重的政治迫害。政治迫害的種類大致可分爲以下四種：

一、前政敵。中國共產黨經過長期的武裝鬥爭後奪取了政權，它以鞏固自己的政權爲名對前政敵——國民黨的黨政軍人員——進行鎮壓。由於這種鎮壓的絕大部份對象早已停止抵抗，許多還被作爲起義人員和留用人員而已經在爲新政權服務，因此具有明顯的政治迫害性質。

二、身份罪。根據階級鬥爭理論，定義一大批在刑法意義上完全無辜的人爲「階級敵人

」。例如地主、富農等等。這種迫害還往往延伸到他們的子女。

三、思想罪。因持有不同政見或被領導指斥爲持有不同政見而定罪，進行迫害。

四、通過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製造出一批又一批新的「敵人」。如右派、走資派、五一六分子等。

此外，還經常有一些因偶然事件引出的政治迫害。同時還有對各種批判性活動的鎮壓，動不動就打成「反革命組織」「反動集團」等。

胡平歸納出政治迫害的一般特點。

一、不依據任何法律程序。

二、確定罪名的任意性。

三、廣泛株連。

四、最殘酷的肉體摧殘。

五、大量的冤假錯案。

胡平指出，中國大陸政治迫害之嚴重，令外界人士難以置信。由於長期消息封鎖，外界鮮有所聞。近年來情況有所改進，但病因並未根除，大規模恐怖轉變爲有選擇性的少量示範性鎮壓。借助於廣大民衆由於過去大恐怖而造成的恐懼感和冷漠繼續維持專制狀態。

胡平最後呼籲國際間關注中國大陸的人權問題。

演講會後，胡平、王炳章、丁楚對中國民聯成員與參加演講會的一批中國大陸留學生深入細緻地交換了對中國大陸改革及民運發展的看法。

在演講會前，胡平、王炳章、丁楚還接受了美國 SCRIPPS HOWARD 新聞公司記者約翰·伯納特先生數小時的新聞採訪。這家新聞公司下轄三十多個美國地方報紙和電視台。■

他們在哪里

知了

的。這時，一位女記者站將起來，大聲發話：我要提個意見，我反對提問題都要走後門。斯言一出，滿堂大笑。在此情勢下，安排會議者不得不讓這位女記者發言。

這位女記者是誰？她就是北京日報的劉娟。一九八〇年北大自由競選活動中一位著名的女活動家。另一名著名的女活動家是張曼菱，現為天津市作協專業作家，發表過幾部小說，電影「青春祭」係根據她的中篇小說「有一個美麗的地方」改編。這兩位女同學同為北大七八屆中文系本科生，劉娟是新聞專業，張曼菱是文學專業。

當初北大競選的那一批人物（香港「七十年代」雜誌稱他們為「新一代政治家」）現在都在幹什麼？王軍濤，天安門事件英雄，北京之春雜誌副主編，團中央候補委員（競選後自然被刷出團中央了），在競選講壇上公開批判毛澤東，八二年從技術物理系畢業後，先是在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然後自動留職停薪去了南方，參與辦公司、搞實業，還出任了一段時期的武漢的江漢夜大副校長。八五年又回到北京，參加了一個民辦的政治研究所，去年春天反自由化之風來勢正猛之時，他們搞了個民意調查，也算是對那股風的一個還擊。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北京市各個「山頭」的年輕的政治活動家們大聚會，會上王軍濤作了一篇題為「中國政治改革與中國政治文化」的學術報告。香港「鏡報」、北美「中報」均有報導。被懷疑為「官方代表」的張煒，當時的北大學生會主席（解放後北大第一任學生會主席是胡啓立），後來又當校園委書記，八二年從經濟系畢業後去了天津，當過天津市政策研究室主任、市團委書記，天津市搞開放、辦特區，他被任命為開發區的第一把手。

同出經濟系的夏申，畢業後兩度考研究生不取，不是成績不夠，而是有「歷史問題」（參加過競選，發表過自由化言論，他的口號是「整體改革」，和後來方勵之的「全方位改革」一樣）。直到八五年秋，國內形勢有了鬆動，夏申才得以進入北京對外貿易大學研究生院，該大學能在北京的電視辯論比賽中奪魁，也有夏申的一份功勞，因為他是該隊的教練。

哲學系楊利川畢業後在「經濟日報」工作，爾後自願申請去河南輝縣當地方官，北京人戲稱之為當「新星」（一部暢銷小說及獲獎電視劇名，寫一位年輕的縣委書記的故事），幹得不錯，最近已離任回京，聽說又回到了經濟改革的陣營中去。

國政系的楊百揆進了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這些年來頗有些著譯問世，在建所只有幾年的政治學所中顯然是一位頂尖的人物。

當時北大選舉，出面競選者多達三十幾位。其中有兩位那時剛滿十八歲——中國法定的公民最低年齡。一位是易志剛，一位是于大海。他們生長於動亂年代，沒有受過什麼嚴格完整的教育，但却都以十六歲的稚齡考入中國最好的哲學系和物理系。于大海後來考取李政道的研究生來到美國，兩年後棄物理學經濟，就讀於普林斯頓，他和楊小凱、錢穎一等同學發起組織中國留學生在美的第一個學術團體——經濟學會，並出任首屆會長。

那次競選活動中另外兩個活躍人物，胡平 and 國政系的房志遠——曾草擬出版法、徵集過包括許多香港學生在內的衆多簽名，在預選中僅以一百票之差落後於第三名張煒而未進入正式候選人之列——均在一、二年前來美，現都在中國民聯擔任重要職務。

七屆人大開完後，李鵬總理舉行記者招待會答記者問。台下記者紛紛舉手，但顯而易見，獲准提問的都是經過「上面」事先安排好了。

民主縱橫談之十三

規則重於勝負

王炳章

胡平在中國之春第五十九期的「專論」文章中，闡明了「權利先於是非」這條重要的原則。這裡，我想再略談另外一條原則，即「規則重於勝負」。

前些日子，南韓舉行全國大選，進行數十年來第一次權力的和平轉移。由於反對派金大中和金泳三的分裂，執政黨盧泰愚坐收漁翁之利，獲選總統。很多人惋惜地評論說，南韓的民主化進程受到挫折。似乎是，只有反對派把執政黨趕下台，才算實現了真正的民主。我却不能單地做這種結論。我認為，重要的不在於誰勝誰負，而在於是否建立了一套政黨平等競爭的規則。只要規則建立了，並得到競爭各方的公認與遵守，一項民主的原則即已確定。

如果中國共產黨在公認的、平等的規則下與其它黨派競選，即便中共連連獲勝，我們也必須承認中國的政治已上了民主軌道。

因此，規則足至為重要的，它重於勝負。

規則應有的特點

什麼叫規則？按一般的理解，規則是人們就某一事項制訂並遵守的規章制度。行車有交通規則，體育較量有比賽規則，政治人物、黨派的角色也有競爭規則。

合理的規則應有如下要素：

一、辦任何涉及到兩人以上的事，都應有規則。規則本身是一個「盲人」，它對有關各方平等相待；

二、有關各方應通曉規則，自覺地遵守規則；

三、犯規應受到懲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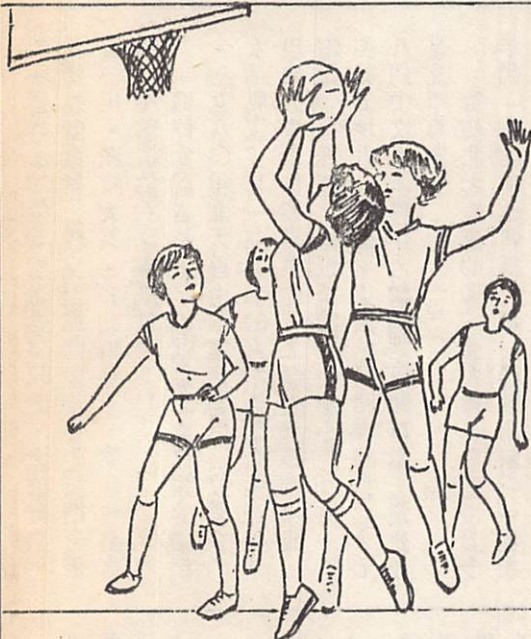
四、要有超然的裁判；

五、規則應相對穩定，其修訂要有一套既定的程序規則，要有相關各方的平等參與。

由於篇幅有限，我不能逐條論述規則的每個要素，只想談一下我體會較深的幾點。

維護規則重於取勝

全美大學籃球聯賽剛剛結束，傑出的黑人運動員曼寧帶領堪薩斯大學男籃榮獲冠軍。在



堪薩斯大學與奧克拉荷馬大學的冠軍爭奪戰中，堪大並非一帆風順。主力隊員曼寧上場不久就連續犯規兩次，為了保護他，教練不得不把曼寧換下來。因為，按照比賽規則，個人犯規五次，就要被罰下場。教練必須遵守這項規則。他不能說：曼寧是主力，犯規五次也不能出場，因為我們要贏球。如果為求勝利而不顧規則，籃球比賽就可能出現如下場面：故意擊傷對方主力隊員；被判犯規後死不認賬；抱球全場亂跑；甚至派一名高大隊員捂住籃框不讓對方進球……如此一來，籃球比賽就成了一場沒有規則的混戰了。

政治競爭同樣要小心地維護規則。目前，美國一九八九年總統競選活動已經展開，兩黨總統候選人的提名戰進行得如火如荼。黑人民權領袖傑西·傑克遜在民主黨內頗有斬獲，取得頭兩名的領先地位。他在四年前曾經出馬角逐過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結果比這次差得多。不論上次和這次的提名戰，傑克遜都嚴格遵守了競選規則。如果他在上次用買選票、造假票的方法爭取獲勝，那他可能早就被淘汰出局了。因此，只要遵守了規則，雖然這次失敗了，還有下次獲勝的機會。一旦嚴重地違反了規則，就可能斷送一生的政治生涯而永遠失去了取勝的可能。

民主國家的多數政治家都深知「維護規則重於取勝」的道理，他們是不能接受「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這一原則的。民主黨人始終認為里根的政策是「錯誤」的，但他們不能因為堅持自己的「真理」而強行攻占白宮、奪取總統寶座。他們只能暫時容忍里根推行「錯誤」政策，等待以後總統大選的機會。由此可見，維護規則比取得優勝、甚至比實現自己的主張更為重要。維護規則本身是更為崇高的民主理

念。

規則重於是非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得知，從某種意義上講，規則不但重於勝負，而且重於是非。行為規則如果被賦予國家強制手段，則稱為法律。違反了規則，性質如同犯法。

前幾年，美國出了一件很轟動的案子。案情大概是：一位有糖尿病的老婦人突然死亡，她的兒子懷疑其父另有別戀而用過量的胰島素將她致死。她的兒子請了私家偵探，偷到了注射過量胰島素的針管，可謂證據確鑿。然而，法庭最後判決其父無罪開釋，因為，他兒子取得證據的手段是違法的，從而不能算是證據。這裡體現了一個重要的原則：如果破壞了規則（犯了法），即使你「有理」，即使從局部的眼光看你是正確的，也要輸掉全局。因此，維護規則乃是最大的「是」，而破壞規則則是最大的「非」。

觀眾的重要性

規則的維護除了需要高度的理念外，還要有超然的裁判（法官），同時，也要有正義的觀眾。兩隊相搏，只要大多數觀眾有正義感，別說隊員犯規會受到譴責，就連裁判有偏向，也會被及時制止。反之，如果觀眾都昧着良心，並毫無理性，公正的裁判反而難當。

我們承認，目前，中國民聯正在與中共進行着政治競爭，而多數人採取觀望態度。我們並不奢望多數人公開參加或支持民聯，我們僅希望多數人做個有正義感的觀眾。當中共無視規則或嚴重犯規時，有正義感的旁觀者應當就

規則問題（而不是是非問題）說出公道話。如果能夠達到這一點，中國的民主前途也就有望了。

就政治競爭、政治制衡而言，中國大陸當前的現狀是極為令人失望的。共產黨公開否認政治需要公平競爭、需要互相制衡。對待黨外的政治競爭者，共產黨根本就不給你競爭的機會。你還沒上場，它就把你「扼殺」了。像中國民聯這樣追求民主的團體，北京政府沒有經過任何法律程序，就下令公安局（執法機構）宣佈為反動組織，予以取締。民聯只是討論組黨的問題，離真正組黨還差得很遠，中共就宣佈民聯要籌組「反動」政黨。這相當於說，嬰兒還沒生下來，就斷定它是壞蛋。

對待黨內的政治競爭，共產黨也毫無規則可言。華國鋒下台，胡耀邦失勢，都是明證。因此，在中國大陸，承認應該有公平的政

從自身開始做起

我們崇尚民主並推展民主運動的，一定要從自身開始做起。除團體與團體間的競爭之外，我們也承認團體內有政治競爭。問題的重要性不在於誰是誰非，誰勝誰負，而在於是否有一套合理的競爭規則，是否大家都遵循這套規則。民聯三大上，三位候選人競選主席。胡平僅以過半數一票當選。唱票完畢後，反對胡平當主席的人熱烈鼓掌，向他祝賀，民聯立即整合為一個整體。這說明，我們這一代人還是能夠學會民主的。

規則重於勝負，我們應時刻記住這一條民主的原理。



VIP
ORIENTAL
INC.
旅遊公司

718-539-0700
539-0448

135-23 40RD. FLUSHING, NY. 11354

特廉機票

↔上海
紐約 ↔ 北京
↔廣州

美國付錢
中國國內取票

台北·香港·北京·上海

※美國國內各種廉價票，電腦訂位。
※代辦各國簽證，機場接送。

- 巴士旅行團，華盛頓DC，尼加拉瀑布，波士頓。
- 大西洋城，天天出發。
- 佛州迪斯奈樂園，三天二夜旅行團。

紐約市區遊覽 ● 紐約近郊遊覽

一面之詞

——哲學隨感

·3·

一〇一
按照杜甫的描寫，李白酩酊大醉，「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

果然好一付醉態，他竟以為自己是神仙了。不過，在如此醉態中，他還記得自己是臣子。
「文化革命」中，有成千上萬的人成了瘋子，這些人整天胡言亂語，但從來不會喊出所謂「反動口號」。

一般瘋子和醉漢都清楚：在有些問題上是瘋不得和醉不得的。
一〇二
經歷不等於經驗。經歷豐富者不等於經驗豐富。經驗離不開經歷，但又不止於經歷。

經驗 || 經歷 + 思考。
一〇三
對於「壓迫愈深，反抗愈烈」這句話，必須加上一個簡短腳注：「在彈性限度以內。」

一〇四
現今中國，有四種類型的妻子。

胡平



第一種是賢妻良母型，她們的弱點是不夠獨立。

第二種是事業型，她們的弱點是不夠體貼。

第三種是前面兩種的相加：既是賢妻良母，又有獨立精神。

最後還有一種，也是前面兩種的相加，不過却是兩者弱點的相加：她們既不能幹事業，又不肯當內助。

一〇五

某些人衡量一種觀點是否具有現實性的唯一考慮是：
這種觀點投合領導人們的心意嗎？

一〇六

走老路是最便當的。

這就是為什麼有些人能很快成功的基本原因。
既然有那麼多人熱衷於追求簡捷的成功，這就注定了這個民族總是復歸老路。

一〇七

「作威作福」一詞的本意是，一切權力統統歸「王」所有，一切恩惠唯有「王」才能施

子。

但，漸漸地，「作威作福」一詞却改變了它的本意，它後來的意思是指橫行霸道、壓榨欺凌、驕奢淫逸。

細細想來，這種詞意的變化是那麼微妙，那麼自然，那麼深刻，那麼正確。

把「作威作福」一詞本來的意思和後來的意思兩相並列，你正好就得到了歷史學家的那句名言：權力導致腐化，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化。

一〇八

從「載舟之水可覆舟」這句話，完全引不出應當施行仁政的結論。它所導致的合乎邏輯的唯一結論乃是：讓我們有節制地壓榨他們。

一〇九

「多行不義必自斃」，本來無非是一句詛咒，它和「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一樣同屬自我安慰。因為歷史上有的是多行不義却善終的可憎先例。即便我們承認它是真理吧，但，「行不義」一定要到了「多」的地步才「自斃」，這也就是等於說，在一個相當的範圍內，行不義是可以安然無事的！

善良的人啊，一定要學會自衛，學會抗擊邪惡；而且，務必要從「不義」初行之時就開始。

一一〇

當小車剛剛下滑時，要阻止它的運動並不容易；小車下滑的功夫越長，為阻止它所必須付出的力氣和代價也就越大。

阻止暴政也是如此。

一一一

如果「退後一步」果真都是「自然寬」的話，世上就沒有人會進取了，既然退後顯然比進取來得更容易。

一一二
壓迫可以引起兩種相反的運動：

正義的怒火是向上升的，它燒向壓在自己頭上的兇暴之徒；

卑怯的臭水却是向下流的，它只會糟污在自己之下的更爲不幸的人。

一一三

在發生過八級地震的地方修建高樓大廈，難道可以不考慮其是否具有可靠的抗震效能嗎？

在發生過「文化革命」的國土上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難道可以不考慮對最高權力施加必要的制約嗎？

一一四

倘若不是心甘情願，「多奉獻」就絕不是什麼好事，它不過是「被掠奪」的一種冠冕堂皇的說法而已。

難道不是嗎？什麼叫掠奪？掠奪就是強迫人家作奉獻。

一一五

在談及道德問題時，我們不可忘記：

道德有一條基準綫——正當的個人利益；

道德有一個前提——主體的自由選擇。

不承認正當的個人利益，剝奪人們的自由選擇，乃是從根本上否定道德。

一一六

要求一種體制過份道德化，必然使得其中的個人非道德化。

一一七

平均主義力圖做到財富上的平均，但它首先導致的權力上的最大不平均。這就是說，平均主義爲了克服一種惡（貧富懸殊），而引入了另一種惡（權力懸殊），一種更大的惡。這

本身就是一種諷刺。不僅如此，一旦實現了權力懸殊，貧富懸殊也會隨之再現：壟斷了權力的人一定會壟斷金錢。因此到頭來，平均主義沒有消除掉任何一種惡，它只是使各種惡的力量互相聯盟、變本加厲了而已。

一一八

清官當然比貪官好，賢君當然比暴君好。

但是，好皇帝常常帶出壞規矩，好的作風可以掩蓋壞的制度，人格上的優點可能遮蔽體制上的弱點。問題在於：與其寄希望於當權者個個清正，不如建立起一種制度以使得他們不得不清正；而設計這種制度的一個基本思路就是，假定當權者是很容易傾向於不清正的。

應當按照清官的尺度去選任幹部；

但絕不要按照清官的尺度去建立幹部制度

一一九

經院哲學家奧卡姆曾經和巴伐利亞皇帝結成反對教皇的聯盟。他對皇帝說：「請你用劍保護我，我將用筆保護你。」

可是不久，皇帝決意與教皇妥協，政治家就毫不猶豫地出賣了哲學家。

歷史表明，政治家與思想家的聯盟往往以後者的被拋棄爲結局。用中國的古話就是鳥盡弓藏。

思想家希圖利用政治家來實現自己的思想，政治家則希圖利用思想家來獲得自己的權力。在這種相互利用中，思想家很少能占便宜。沒有真正獨立地位，沒有思想自由，思想家很難擺脫悲劇的命運。

後來的思想家們，當以此爲戒。

一二〇

當你遭受厄運的時候，有些朋友可能會和你疏遠。

不要責怪他們不夠朋友，因爲他們確實還是朋友，只不過不是頭等的朋友。

和其他許多事物一樣，友誼也是分等級的

一二一

我們不可能駁倒絕對的決定論。因爲絕對的決定論只是一個陳述，它沒有證據，所以我們不能從理論上駁斥它；它不涉及任何具體的因果判斷，所以我們也不能用實驗來駁斥它。

但是，我們却可以駁倒絕對的決定論者。因爲幾乎所有的絕對的決定論者都相信，如果別人接受了他們的觀點，事情將會發生某種改變。既然他們提到了「如果」，這就意味着他們從理論上默認這世界有着另一種可能性；而在一個真正的絕對的決定論的世界中，「可能性」根本是不存在的。

一二二

思想家最好在他的思想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但尚未被普遍接受的時刻死去。

死得太早，他會感到孤苦，死得太晚，他會感到失望。

當一種思想被普遍接受時，呈現在人們面前的往往是一幅令人尷尬的諷刺漫畫。

也許，只有一種思想家能避免上述倒霉的結局：他立志要消滅一種昭著的壞，同時並不期待一種十分的好。

一二三

不被衆人注意和被人普遍誤解，哪種滋味更難受？

一二四

最貼近的比喻都被前人用過了，因此出現在今天詩人筆下的比喻大都十分離奇。

一二五

人類社會有兩個最重要的問題：在享有自由時如何保持自由，在失去自由時如何贏得自

由。

也許，後一個問題比前一個問題更重要。因為沒有再生能力的東西遲早會滅亡的。

一二六

使人愚昧的最好辦法不是讓他得不到知識，而是不斷地向他灌輸錯誤的知識。

使人遺忘的最好辦法不是讓他想不起往事，而是不斷向他提供被歪曲了的往事。

一二七

生態平衡問題並不是現代工業文明社會才出現的問題。正如癌症並不是二十世紀的人才患的病。

一二八

在「文化革命」前夕，林彪說過一句話：我國有七億人口，需要一個統一的思想。

這個觀點當然不是林彪說了以後才存在的，遺憾的是，它也沒有隨着林彪的消失而消失。

一二九

孔子說：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但是，庶人不議，未必就是天下有道。

一三〇

緩解一種痛苦的最有效的藥劑是再添加一種痛苦、一種更大的痛苦。

一三一

年紀越大，夢想越小。這好比一張畫布，已經畫的部分多了，留下的空處就少了。

一三二

應該投身於正義的一方，而不管它是否會勝利。

有的人不是這樣，他們總是投身於勝利的

一方而不管它是否正義。

一三三

皇帝既然把風調雨順都算作自己的功勞，

人民也就會把自然災難視爲他失敗的徵兆。因此，在古代，嚴重的自然災難不僅造成了國家財政經濟的危機，而且也造成了政府道義權威的危機。

咎由自取。

一三四

有時，兒童似乎比成人更爲明智。

和成人一樣，兒童也會爲一種尚未到來的快樂而先行興奮，從而使一次幸福變成了兩次幸福。

但是，和成人不同，兒童很少會爲一種尚未到來的不幸而先行悲哀，他們並不把一次痛苦變成兩次痛苦。

一三五

「領導一切」，難道把批評監督也要包括其內嗎？「你們可以批評我，但必須按照我的指示來批評；你們可以監督我，但必須在我的領導下來監督；你們有權撤換我，但必須經過我自己的批准」（！）

這是一個簡單的邏輯問題：我們的權力既然是受命於民而非受命於天，所以它必須承認人民的批評監督權利；而批評監督權利之爲權利，它必須獨立於被批評監督者的權力控制之外。所謂「領導輿論」、「領導出版」，都是權力的濫用，都是對權利的侵犯。

一三六

中國人並不比外國人笨。但遺憾的是，我們似乎也不比別人更聰明。以爲我們能在不及別人自由的情況下也能幹得比別人更出色，以爲我們捂着半個嘴巴還能夠比別人放開喉嚨唱得更宏亮。我看是證據不足。

一三七

誠如魯迅所言，中國古代的「士」，多半是替治人者出主意。因此，雖然他們和西方的

自由思想家們看到了相同的東西，但却會提出相反的主張。

譬如，管子早就認識到某些商品經濟的特點和某些市場規律，他已經知道，如果讓商品經濟自主運行將會導致「民富」。然而，管子並未寫下他的「國富論」，他也不主張限制國家干預經濟。恰恰相反，正因爲管子發現了「民富」難治，「民富」則「君弱」，所以他極力主張限制商品生產和控制市場，主張用政治權力支配與壟斷經濟生活，也就是說爲了「君強」而有意識地造成「民貧」。

再如，韓非早就懂得，政治，應該「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不能指望爲官者個個忠誠，而要使得他們不得不忠誠；不能指望當皇帝的個個都具有聖人之資，而要使得中常之才便可勝任愉快。古人何嘗不明白爲了防止權力的濫用需要彼此制約的道理，所以他們才實行了官員的迴避制、調任制以及同級權力中往往並設兩名官員一類措施。可惜的是，所有這一切聰明的考慮都是着眼於無限地鞏固帝王的專制地位。它們都是只對下不對上的。其結果便是使古代中國的專制主義達到了西方社會望塵莫及的完善地步。

許多「士」總是抱怨治人者未能很好採納他們忠誠而聰明的全部建議。然而，我們後人難道不應該爲這一點而感到慶幸嗎？

一三八

老話說：亂世出英雄。

這無異於承認，所謂治世，原本是壓制人才。

一三九

在歷史上，治世，往往意味着一切都受約束；而亂世則意味着一切都不受約束。結束這種「治」、「亂」的惡性循環，我

們需要的是第三種狀態。

一四〇

專制君主確有好壞之分。壞皇帝是亂殺人，好皇帝則只殺那些真正比他強的人。

一四一

在理論上，專制主義是能夠做到無懈可擊的。

幸運的是，在事實上，專制主義者們常常沒有把事情做到像應該做到的那麼完美。

一四二

「回歸自然」的號召之所以富有魅力，恰是因為我們生活在高度發展的文明之中。

因此，爲了保存「回歸自然」這一號召的力量，我們必須保存現代文明本身。

如果說這個號召是有道理的，那正是由於它沒道理。

既然它確實顯得有道理，所以它的確是沒道理。

一四三

當十個太陽被射落了九個之後，人們要求保護太陽。

今人要求保護野生動物（包括毒禽猛獸），也是出於同一緣由。

一四四

一張文網，在中國社會存在了兩千多年。中國人並不是不聰明。可惜的是，絕大多數的人寧可把他們的聰明才智用在盤算如何從網眼裡鑽出去，而不是考慮着如何粉碎這張網。

當然，虧得這批魚長得都不太大。爲了求生，它們也不願讓自己長得太大。是故，自春秋之後的中國，再也沒出現過世界性的第一流的大思想家。

撒網是爲了捕魚。首先是要捕大魚，因此

總有那些個子較大的魚以及那些不夠靈活的魚被網捉了去。但是，它們之中的大部份也只是自認晦氣罷了。想掙破魚網的魚自然也是有的，尤其是那些長得很大的魚，不過總嫌勢單力薄，因爲那些漏網之魚對此並無興趣，它們有的戰戰兢兢，有的說不定還在笑你呆氣呢。

終於迎來了旨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文網過密，網成了布，小魚小蝦一律在劫難逃。

於是乎，有較多的魚們決意要粉碎那張網了，而這時網的被粉碎也不再是不可能的了。

一四五

以信任的名義侵犯他人的隱私，乃是對信任的濫用。

一四六

信任，如同忠誠，是一種主動給予的熱情。它不應該、也不允許被勒索、被強求。

強求別人信任，充其量能夠得到坦白交待，但絕對得不到信任。

強求別人忠誠，充其量能夠得到順從依附，但永遠得不到忠誠。

一四七

蔑視民主的人總是說，民主不過是少數人的奢侈品。廣大人民用不着那套玩意。

以人民的名義否認民主，大概是二十世紀的一個發明。

順便一提：民主本身要求保護少數。

一四八

辛亥革命後「威與維新」的情況表明：在中國這種保守的社會裡，真正的保守主義者其實是很少的。

中國式的保守派，常常是勢利派的別稱。

一四九

我不知道誰和我更接近：是那些贊成我的

觀點而對別人氣勢汹汹的人，還是那些不贊成我的觀點，但願和我平等討論的人。

一五〇

對中國改革的幾點思考

毛澤東思想的最新發展

毛澤東有句名言：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國。

然而，幾十年過去，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上都遭遇到巨大的困難，結果是，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都不得不上經濟改革之路。改革的一個基本原則是，大力學習資本主義，盡可能直接從資本主義社會那裡獲得幫助。

於是，我們可以得出下述結論，那無疑是對毛澤東思想的最新發展：

——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只有資本主義才能救社會主義。

第二次革命

鄧小平說，改革是第二次革命。

的確是第二次革命：革第一次革命的命。

假如第一次革命是對的，第二次革命就是錯的；

假如第二次革命是對的，第一次革命就是錯的。

二者必居其一。

「太早了」與「太晚了」

問：光緒在一八九八年進行的改革（即戊戌變法）和慈禧在一九〇五年進行的改革有什麼區別？

答：沒有什麼區別。唯一的區別是兩者相差了七年。

問：爲什麼這兩次改革都失敗了？

答：前一次太早了，後一次太晚了。

論知識份子與中國現代化的目標

美國夏威夷大學哲學系教授 成中英

什麼是知識份子？什麼是中國的知識份子？為什麼中國必須走向民主、法治、富強和統一？為什麼中國的知識份子有責任去追求中國的民主、法治、富強和統一？這些都是咄咄逼人的根本問題。在本文中我只能就我思想所及簡單的加以闡發。

知識份子是一個現代名詞，是與英文的 INTELLECTUAL INTELLIGENTIA 相應的一個名詞。英文中的 INTELLECTUAL 一詞指有智能且掌握知識的人。在西方文化及學術傳統中，有智能且掌握知識的人雖非一定掌握政治權力或擁有財富，但却常為掌握政治權力及擁有財富者所用。在古代希臘與羅馬，知識份子 (INTELLECTUAL) 是詩人、悲喜劇作家、哲學家，甚至是立法者。他們對社會有相當大的影響。在中世紀，知識份子成為神學僧侶，基於對上帝啓示的信仰，掌握了引導社會、教化社會的實權。文藝復興之際，古典哲學復興，知識份子反而扮演了反對宗教權威的角色。傳統西方的知識份子在西方歷史中堅強的樹立了抗拒權威、追求知識與真理的道德楷模和知識傳統。

自宗教革命以後，西方社會逐步趨向功能的理性化，知識份子也逐漸取得了受到俗世權威保護的社會地位，成為西方發展知識、開拓資源的主力軍。這是西方現代理性主義的開端，也是十八世紀啓蒙運動的先導。在啓蒙運動

中，典型的西方知識份子已擺脫了神學權威的束縛，開始積極地追求一個理想的政治和經濟秩序，為個體的人在宇宙自然及社會國家中的地位作新的界定。若不發展整套的知識理論作論爭武器是不為功的。為了反權威，也為了迎合社會發展的潮流，更為了創造一個理想社會，十八世紀的歐洲知識份子發揮了巨大的啓蒙功能，他們在古典哲學的理性傳統上，重新塑造了現代的理性傳統。從道德意識之說到私有財產之論，從民主思想到功利主義，清楚的刻劃出現代西方的國家意識、社會意識以及個人意識。

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造成資本主義的勃興(1)，也帶來歐洲社會貧富的懸殊，更導向達爾文物競天擇論、馬克思階級鬥爭說的發展。他的階級鬥爭說和共產主義思想透過他實際的政治活動無疑的造成了西方理性化社會和理性知識傳統的分裂。他的學說更透過俄國革命直接的影響了現代中國的命運。西方知識傳統雖遭受馬克思主義的嚴厲批評，但仍能保存發展迄今。系統化的理性哲學和經驗主義仍是今天西方社會的精神支柱。理性與經驗的自我批評與相互批評更成為西方知識傳統與知識份子思考的特質。

從十九世紀以來，西方的知識份子逐漸走上專業化的道路。知識成了牟利的商品和企業的工具，知識份子也就成為商業組織和政府組

織中的僱員。知識往往轉化為技術，喪失了批評權威、展現價值的的能力。現代西方社會結構的僵化與西方知識份子的中立化都是其可悲的現象。如何把知識與人生和社會的基本價值結合起來，重振理想主義與道德勇氣，來面對人類社會的危機與人類歷史的蛻變，乃是目前西方知識傳統與知識份子面臨的最大問題。

西方知識傳統是西方社會進步和進化的推動力。知識份子發揮了塑造西方現代社會與國家的潛力。西方知識傳統的特徵是理性主義：用理性來界定真理，用真理來釐訂制度，批評現實，解決問題。此一理性主義也導致了現代科技的發展，為現代西方社會提供了一個物質基礎，同時也構成了一套求知方法與一套知識標準。在這個知識傳統的發展中，知識份子突破了傳統權威，樹立了以理性與知識為核心的現代化世界。西方的知識傳統是強大的。西方的知識份子也擁有強大的知識良心，在「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信條下創造了輝煌的成果。現代西方社會的基本價值可說都來自此一知識傳統的傳播與知識份子的創造。二十世紀的西方知識傳統和知識份子不幸染上專業化、狹隘化以及僵硬化的疾病，顯示其內在的理性智慧與知識活力已逐漸喪失。如何重振理性和道德，進行知識的整合與批評以克服危機，發展生機，正是西方知識份子面臨的最大挑戰。

知識傳統的中國特色

反觀中國歷史和中國社會，知識傳統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發展，知識份子在不同時期也處於不同的地位，並扮演不同的角色。首先必須指出的是：中國的知識傳統在東周孔子以前並未與政府的權力體系分開，這是所謂政、學不分時期。孔子是第一個把知識傳統（暫名之為「學統」）獨立起來，不但成為民間授學的創始人，也成為知識份子基於理想以謀求政治改革的代表人物。孔子以前政統與學統雖未分開，但並不意味學統與政統沒有區分。周公攝政制禮作樂，後又選政於成王，顯然在周公眼中掌握政權是一回事，推行人文教化却是另一回事。「尚書」中天命之說已將王道與人道分開。人道包括了為政之道以及為人處世之道。但無論為政之道或為人處世之道都已假設了一個可依循的實體準則。此一準則先為天命，繼為內在於人的人性。「中庸」言「天命之謂性」，天命與人性，外在的道和內在的德已合而為一。

以上所舉「中庸」中的儒家哲學命題經過反省體驗逐漸發展為一套完整的價值體系：包含了生生不息的本體哲學，民胞物與的仁愛情操，禮樂教化的社會道德，天人合一的修養功夫，以及天下為公的大同思想。這也就凝聚成為一套完整的「道」的體系和傳統，可簡稱之為「道統」。所謂「道統」就是儒家對「道」的體認和認知的傳承。自孔子而孟子，不但儒家哲學已建立了一個「道統」，古代的經典經過儒家的整理與詮釋，也成為民間授學的內容，故儒家的「道統」又再以「學統」的方式出現。迨及漢武帝，不但儒家的「道統」被定為一尊，儒家的「學統」且發展成為普及官學的

古今文學派之爭了。

現代中國的知識傳統

基於儒學定於一尊之後的影響，儒學成了中國的知識傳統。從這個角度看，我們也能夠比較清楚的說明中國知識傳統與中國知識份子的特色。首先可以指出的是：中國歷史中包含的知識傳統顯然強大於其包含的反知識傳統。中國歷史中當然有反智的現象，如秦始皇焚書坑儒，漢高祖鄙視當時的儒生，都可引為反智的例證。但李斯用韓非之學，高祖用商山四皓，這是顯出對知識傳統及知識份子的倚重。其次要指出的是：中國歷史中以儒家為代表的知識傳統並未能真正發揮其原初的活力，也未能實現其原初意含的理想。我們應嚴格分辨儒家或中國知識傳統中的「道統」的傳承與「學統」的傳承。「道統」的傳承是指堅持哲學主張以求改革政治與轉變社會的活動；而「學統」的傳承則只是研究學術以為時用。在後一意義下的知識份子往往附合權勢，用其學術為帝王效犬馬之勞。這是把儒家知識傳統中的「道統」淪喪殆盡了。魏晉玄學興起，佛學輸入。此後儒家的「道統」固然早已不存，就是儒家的「學統」也若斷若續了。

真正繼承及發揮儒家知識傳統的「道」與「學」的精神者應推宋明的儒者。宋明儒對國家的危機、社會的危機、思想的危機，可說受到極大的刺激。透過深入古典儒家經典之學的啓示，自然引發了續亡繼絕，恢復道統的雄心大志。但宋明儒雖有大志，並在學術思想上開拓了高遠的境界，但他們仍無法以其理想的儒家道德來規範與改革當時的政治與社會。朱王都是儒家知識傳統中「道」與「學」的發揚者

——但他們影響於後世者的似乎仍只限於其學術思想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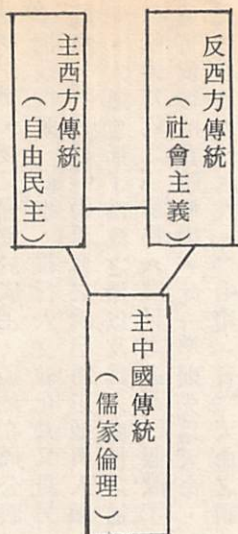
真正體現了儒家知識傳統中的「道統」精神的知識份子應是明清之際的四大家：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和顏元。他們身負亡國之痛，抱著仁心和氣節，堅不與入侵的滿清妥協。他們也未放棄知識學問的追求，並在知識學問的追求中深切地檢討中國歷史上政治社會制度的得失，從而對人心、良知與道德實踐有更深切的體會，這是儒家知識傳統內在理性化的一大推進。

清中葉以後，政治上的閉關政策逐漸為西方強權打破，而中國也面臨了千古奇變，在堅兵利砲下，中國喪地辱權，陷入半殖民地的悲慘局面而不自知，對此一處境深刻的認識並發出警號者首推孫中山先生。中山先生不但有敏銳的國家民族危機意識，他並能激發強烈的憂民憂國之心，放棄現實的安頓，而倡導並獻身於為民族求生存、為國家保獨立、為社會謀福利的國民革命。他參考了中西學術，殫思竭慮提出解救中國政治、經濟與社會問題的根本之道。中山先生有這般眼光，有這種抱負，有這項勇氣，有這番胸襟，可說具備了多重劃時代的意義。他不但是現代中國的開創者，也是中國現代化運動的創始人，更是一個中國現代知識份子理想典型的塑造者。

中山先生具備西方知識傳統的優點，他看重知識與理性，並敏於批評思考。但他保存了以儒家為主導的中國知識傳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有深切的體驗。他之倡導革命並獻身革命也可說是中國知識傳統中的道統精神的一個高度表現。換言之，他不但看重知識與理性，且能基於良知和責任變為實踐的行為。因之，中山先生所塑造的知識份子典型是結合中西

兩項知識傳統的，不但具備了現代化，而且充滿了前瞻性，自然更爲中國傳統的知識傳統帶來了新的活力和新的智慧。

不幸的是，中山先生結合中西學術的知識理想在二十年代的中國並未獲得普遍的支持，當時也未爲其後繼者貫徹實現，用以解決中國面臨着的諸般問題。因而五四運動產生了主張西方知識傳統的全盤西化的觀點，也導致了反對西方知識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在現代中國因而形成了三重兩極化的對立：西化（西方知識傳統）與中國本位文化（中國知識傳統）的對立；傳統西方（自由民主）與反傳統西方（社會主義）的對立；反傳統西方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對立。



這三重兩極化的對立造成了現代中國知識的混亂、無序、失向、複雜與糾纏，也造成現代中國知識份子，在政治立場上，在學術與政治之間的種種疑懼，種種徘徊以及種種矛盾。現代中國份子一方面被要求爲時代的先知先覺，另一方面又被政治勢力利用爲達到政治目的的工具；一方面被要求爲文化價值的傳承與傳授者，另一方面又因其卓犖不群遭受慘烈的迫害。

中國現代知識份子的角色自我認定也是混亂與模糊的：是繼承傳統？或是打破傳統？是主西化或是反西化？是主右或是主左？是反右

還是反左？經五四到文革六十年間，中國現代知識份子所遭受的痛苦和迫害何止於顛沛流離！中國現代知識份子所面臨的處境又何止是迷失徬徨！

總結以上吾人對中國知識傳統變革的認識，我們可以歸納中國知識份子的兩大典型：一是以儒家哲學爲核心的知識份子典型，一是以中國現代化運動爲核心的知識份子典型。儒家心態的知識份子典型雖有其持久的歷史與理想意義，但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却喪失其理想的規範性而淪入空疏，甚至還產生負面的影響。在另一方面，現代化心態的知識份子典型（不論是偏右或偏左）雖爲中國現代化的中堅，但却未能團結凝聚，內化爲堅強的理性力量。相反的，它却在時代與世局的外力下，趨向極端與陷入膚淺，爲中國的現代化帶來重重困境與種種危機。因之，如何建造一個兼顧傳統與時代的、綜合東方與西方的，兼能接受西方之長與批判西方之短的，兼爲整合一致而又收放自如的新知識份子模式類型仍是中國現代化與現代化中國所面臨到的最大難題。

提煉精華陶鑄典型

爲了開拓兼顧傳統與時代，綜合東方與西方的新知識份子典型，我認爲我們不能不重新肯認上述兩種知識份子典型的理想性格，並從其中提煉出理想的精華，用來陶鑄新的知識份子典型，也用來開創新的知識傳統。下面我就上述兩項知識典型的理想價值分別加以展現和強調：

(一) 以儒家哲學爲核心的知識份子典型：無論「士君子」或「士大夫」，都具備了一項整體性的原則信仰（名之爲「道統」），此一

原則信仰是根植於宇宙本體性與人生本性的體驗，發而爲經國濟世之學。此一原則信仰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結晶，雖非理性與知識的展開，却並不排除理性與知識在本體思考中的展開。對此一原則信仰的實質體現者是孔子。孔子也就是中國知識份子的理想人物。孔子深信「天生德於予」，對天不欲之喪的斯文有重大的使命承諾，甚至認爲「朝聞道，夕死可矣」。他十分看重力求修身的君子之道，主張「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他的弟子曾子又發揮「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的致道哲學。孟子繼承孔子道的傳統，用「大丈夫」來說明「士君子」的理想：「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謂之大丈夫。」孟子又界定孔子爲集大成的聖之時者，包含了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處則處，可以仕則仕」。

儒家哲學規範的知識份子理想型態顯露了兩項重要的特性：良知與責任。良知是對整體價值的肯認和承諾，責任是沒有私心和偏見的追求整體價值的實現。我認爲中國現代的知識份子仍當採取這兩項傳統典型中的理想價值，作爲關心社會改造社會的主體動力。

(二) 以現代化思想爲核心的知識份子典型的特色在於突出認知中國在現代世界上之地位而力謀拯救之道。此項認知包含對現代世界的認知，對西方知識傳統之認知，藉此認知來吸收西方先進的富強之道，並以之爲促使中國進步，立足於世界之道路。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就有借鏡現代西方知識傳統以發揚中國道統、促進中國現代化的精神。他的三民主義因而結合了西方知識傳統中的科學與民主思想，也重建

了中國傳統的道德倫理與民族信念，把儒家的知識傳統（良知與責任）賦予了西方科學理性的意義。這樣一個現代化的思想方式無疑的提供了一個現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價值標準；中國現代化的知識體系必須是中西合璧的，中國現代化的知識份子必須是同時掌握中西知識傳統之長且將兩者結合並用的。我認為這是一項深厚的灼見，在中國現代化運動各種型態中最能通過歷史的考驗的。台灣三十年來經濟發展之成功不能不歸功於此一現代化的知識模式。

有了以上兩項對中國知識份子理想典型的詮釋，我們應當追問今天中國知識份子的理想典型為何，此一理想典型的中國知識份子又面臨到何等時代課題。明顯的，今天中國知識份子的理想典型必須具備傳統典型的歷史智慧，掌握其良知與責任，又必須具備現代化典型的世界眼光，開拓其理性與知識。他亦要善於結合兩者來鑽深歷史智慧，來擴大世界眼光，從而提煉出對人類未來命運的透視與對世界潮流動向的理解。在這種雙管齊下的認知和體會下，我們就能看出中西傳統的潛力、特點、優勢與缺失何在，以及兩者如何互補與互動，藉以開創出一個理想的世界知識傳統。作為一個現代化的知識份子，必須以理性為方法，以知識為基礎，以良知為動力，以責任為支柱去追求理想，解決問題、實現自我。從此一立場來看，做一個現代化的中國知識份子，必須對自己所屬的傳統與文化關心與負責。知識是不能獨立存在於人類生活之外的，因之並不真正具有所謂價值的中立性。所謂價值的中立性也只是個抽象的建構而已。知識是與價值有機的結合在一起的。知識份子也不能自外於社會與歷史，對包含社會與歷史價值的知識傳統漠不關心。因而，良知的責任與理性的知識對一個

現代化的中國知識份子將是同等的重要。

四項新典型的要求

總結我們對現代中國知識份子典型的要求，可以列舉下列四項：

- (一) 用理性的分析與綜合來思考和認知問題、認知世界、與認知歷史。
- (二) 建立一個完整而正確的知識體系，以掌握世界潮流與歷史智慧。
- (三) 從人性體驗與歷史反省中，確立行為的是非標準，並做出良知的價值抉擇。
- (四) 基於對社會國家的關懷，發為道德責任

，投注自我，貢獻自我以達到理想的目標。

以上這四個要求可名為理性、知識、良知與責任的要求。這四個要求是結合中西兩大知識傳統而來的，也是結合古今中國的知識傳統而來，它們是今天中國知識份子應該滿足的基本條件。把這四個條件密切的結合起來，必能陶鑄成一個理想的知識份子的人格，也必能開創出一個震古鑠金的知識傳統。

有了以上對現代中國知識份子的要求，我們就很容易看出中國知識份子與中國前途的關係。我們一開始就提出中國知識份子應發揮理性知識、良知與責任的力量來追求中國民主法治富強而統一的現代化目標。這是一個應然命題，但却已先行假設了事實的認定、價值的判斷與目標的抉擇。換言之，這個應然命題已經假設了理性、知識、良知與責任的運作，而為今日中國知識份子所必然獲致的結論。首先我們先回答為什麼現代中國要走向民主、法治、富強與統一。

如果我們用理性客觀冷靜的考察人類歷史的發展軌跡以及世界潮流推動的方向，我們將

不難發現政治民主化是現代國家發展的自然而趨向，也是現代社會與人民基本的要求。我們可以舉出三個重要理由來說明政治民主化的必要性：一是經濟的理由：為了提高經濟生產力，為了促進社會管理的品質，沒有民主的參與，開放的政治是不能動員廣大群眾的主動創造力的。二是教育的理由：人類知識日增，人類參與決策與管理的要求也日益提昇。參與成爲人格實現的一個要件。故教育與知識的普及勢必成爲政治民主化的一個動力。三是安全與安定的理由：政治民主化是政治權力控制、分配與轉移的和平手段，也是解決衝突與維護社會安定，平衡與安全的最佳辦法。故政治民主化是解決政治權力諸般問題的理性途徑，其效果在人類歷史中獲得最大的證驗。英美與西歐的政治民主制度所造成的社會成效提供了說明的楷模。基於以上三個理由，現代人類愈來愈具有理性思想與人權意識，因之也愈來愈不能容忍獨裁專制與極權等桎梏人性的制度。故政治的民主化要求已是當今世界各國普遍的呼聲。反觀中國歷史，改朝換代的時代業已一逝不返，專制極權的災禍已使人們產生極高度的民主參與意識。無論從理性思考或歷史認知來考察，政治民主化既適合人性的需要，又順應世界的潮流。

一個國家步向民主，就必須同時步向法治以保障民主體制的持續與穩定。法治是民主秩序的規劃，正如民主是法治權力的來源。有民主沒有法治將流入暴民政治；有法治沒有民主，則將造成合法獨裁。民主是權力來源與改變的途徑，法治則是維護穩定秩序的工具。兩者都是理性的運用，但代表了不同的理性功能，一是權力產生的理性化功能，一是秩序維持的理性化功能。但法治的合理性要民主來保障，

民主的合理性也要法治來保障。事實上，兩者都是理性制度化、社會化的結果。因之，理性教育、理性知識發展與傳播是同時維持民主法治的根本條件，經濟生產與分配的平衡以及財富的社會化也都必須借助理性化的法治為手段。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能夠實行財富社會化政策也必依靠理性的立法與司法為基礎。中國既要走向民主，也就必走向法治。有民主與法治的相互依恃維護，人民大眾自然就獲得人權的保障和財富平均化的利益了。

中國統一 是職責所在

中國應追求富強，從清末民初的自強維新運動之時對此就已有認識。清末中國積弱，備受西方列強侵略欺凌。中國人民大眾也普遍貧窮，變成了西方強權的俎上肉。中國必須富強才能自保，也才有力量向世界和平體系提出貢獻。我說的富強不只是指的國家的富與強，也兼指國民的富與強。就國家而言，國富才能充實公共福利，國強才能促進世界和平。就國民而言，民富才能發展經濟，民強才能推動文化。在今日談富強之道，當有別於在十九世紀談富強之道，十九世紀英國帝國主義的富強之道乃是靠弱肉強食，征服他國而來；今日國家的富強之道則有賴於資源的開發，資本的積聚與運用以及市場的發展，也有賴於國際經濟的合作，環境的保護與消費者的保護。此兩類活動及其配合都必須借助理性知識的應用和可靠策略的運用。中國必須走向富強，亦即中國必須接受現代化的要求。中國現代化有賴於工商業的高度與平衡發展，此一發展自然導向富強的奠基，也為民主法治提供了必須的依恃。今日中國的知識份子當不難看到民主、法治與富強

三者發展的相互依恃性與推動性。故考慮發展民主、法治的條件就不能不考慮到發展富強的條件，同樣考慮發展富強的條件，也就不能不考慮到發展民主、法治的條件。若用中山先生的話來說，民權或民主問題已涉及民族與民生問題，正如後者已涉及前者，而後者却正是富強問題。

中國的統一 是中國知識份子必須從理性、知識、良知與責任四個角度來肯定與追求的價值目標之最後一環。為何中國的統一 是中國知識份子必須認知的價值目標？首先我們從知識著眼，認知中國原有的統一性本是一個不爭的歷史事實。然後我們從理性出發，可以判斷中國的未來統一將是同時符合中國人的利益與世界國家體系的利益的。就後者言，如果中國不統一，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對立將造成地區性的不安定，而兩者投注於國家建設及世界和平維護的力量也會相應減少。若有人認為兩個中國不必對立，這將是有味於中國歷史的看法。若有人認為可以利用國際力量來製造一中一台。從歷史看，此一目標也將必遭受中國人永遠的抗拒與唾棄，且勢必導至種種死結，構成歷史與世界的負擔。

中國的統一 是中國民族血緣和中國文化向心力的要求，因之是根深蒂固的中國歷史要求。故不可引用英國殖民美國之例以附會與錯解之。至於中國如何走向統一？回答是：中國必須在民主、法治與富強的基礎上實行統一，也就必須在追求民主、法治與富強的道路與政策上謀求統一。如果今日台灣已先進於民主，已先進於法治，已先進於富強，今日台灣也就已先進於統一之道。統一之道並非獨立之道。台灣的民主化、法治化與富強化將是統一中國的力量，而非台灣獨立的條件。吾人若運用歷史

眼光與世界眼光來做理性的認知與判斷，很顯然，台灣民主化、法治化與富強化將具有對全中國之民主化、法治化與富強化的號召性與示範性，因之具有極重大的象徵意義。如何發揮此一情況的重大的象徵意義，正是今日中國知識份子可以用心的焦點。如何辨明及促進此一認識，以避免非理性的錯覺以及環境的誤導，也正是今日中國知識份子的職責所在。

台灣的前途與全中國的前途都繫於全中國知識份子的覺醒與攜手奮鬥。

(1) 德國社會學家麥克斯·韋伯 (MAX WEBER) 認為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是基督教新教 (清教) 倫理之所賜。但此處吾人也要指出近代歐洲知識份子 (並非一定為清教徒) 的理性主義與知識追求也是促使資本主義發展的一項主要因素。

編輯說明：

成中英教授「論中國知識份子與中國現代化」一文，原係由兩個部份組成。第一頁第六段落之前轉自成教授「傳統與現代化的理論的結合」一書的代序，其後均轉載自台灣「中國論壇」一九八八年元月號第二九五期。兩部份係成教授剪輯合成寄至本刊，本刊發表時，因為本刊篇幅容量的關係，作了部份刪節，特此說明。



也談「再造中華民魂」

賈亦珍

北京街頭常見到這樣的標語：爲了您的安全，請不要違反交通規則。

我常常對朋友們說：爲了您的身體健康，請不要讀人民日報。

爲什麼不要讀？因爲讀了要惹您生氣。醫生說，怒傷肝，對身體不好。

出國後，不時自己就要「違戒」，讀一讀人民日報。沒辦法，中國只有官報沒有民報，你要想知道一點國內的消息，不看它還不行，儘管你明知上面謊話、假話連篇。

萬分不幸，今天又讀了人民日報（四月九日海外版），果然又惹了一肚子不痛快。趕快提筆寫成一篇文章，試着在「中國之春」發一發。能不能刺痛那幫說謊話、說假話的人，我不知道。起碼總能給自己出出氣，用心理醫生的話來說，這叫做「自我疏導」，有利於身心平衡健康的。

人民日報上登了一篇報導，題目很動人，叫「再造中華民魂」，副題是「訪人大、政協會上的三代知識分子」。文章的中心思想無非是說我們的改革事業既偉大又艱巨，我們人民必須要有艱苦奮鬥做犧牲的思想準備。

按照這篇文章：

中國目前「最大的問題是國民素質低下、社會空氣不好」（中國社科院美國所所長李慎之語）。

引導中國走出困難，再造民魂的最大希望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趙復

三語）。

現在我們必須要做的事就是「發揚一種民氣，勒緊褲帶幹現代化」。（李慎之語）。

這些話說得真是豈有此理！

中國（應該說是大陸）搞得這麼糟，老百姓的日子過得這麼苦，到頭來還是我們自己的錯！一棍子打到十億人身上，那些幾十年如一日地搞整人害人（現在還在反什麼自由化，把「有遠大的理想、無私的奉獻精神和現代意識」（范曾語）的楊巍們抓進牢內，方、劉、王們逐出黨外）的人們反倒一身輕鬆。豈止是一身輕鬆，據說我們要「再造中華民魂」還非得靠這幫人領導哩！放眼世界，炎黃子孫遍布天下，凡是沒有「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地方，咱們中國人幹得都還不錯，這說明了什麼，難道還需要解釋嗎？

「勒緊褲帶幹現代化」，這條口號真可怕。人民日報真是思想解放了，連這種話都敢登。可以與這句話相媲美的還有中國社科院院長胡繩的一句話，他說，「從現在起到本世紀末，我們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最艱難時期」。好傢伙！「大躍進」餓死了幾千萬人，「文化革命」整死了幾千萬人，鬧了半天都還算不上「最艱難」，苦日子、難日子還在後頭呢！這怎麼能不叫人不寒而慄呢？

不錯，我們知道，在新舊體制轉軌期間，會引發較多的社會矛盾，這是難以避免的。比如說搞經濟改革，搞市場經濟，一段時期內難

免會有些東西漲價。象胡繩說的「堅決加快改革」以縮短這種痛苦的過程，我們也并非完全不同意。但是，我們必須指出：

第一，所謂「舊體制」，並不是「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或者什麼「幾千年的封建傳統」留下來的，而是共產黨一手創建的，換句話，由舊體制所造成的種種禍害，只能由共產黨來負。

第二，由於共產黨領導集團依舊堅持極權專制、壓制人民的政治權利，這就使得他們可以以把改革所引起的巨大痛苦完全轉嫁在廣大人民頭上。最明顯的實例莫如上次調整工資。誰都知道，在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十分稀缺，而不學無術的幹部則太多濫。按照市場經濟的特性，前者的身價就該大大提高，後者就該大大貶值才對。但是工資調整的結果却剛剛相反。這能夠叫做「改革的必要陣痛」嗎？叫苦了三十幾年連氣也沒喘過的老百姓（包括知識分子，中國的中年知識分子死亡率之高，舉世皆知）再去「勒緊褲帶」，去爲那班官老爺們交學費、付代價，豈不是太不公平了嗎？道理很簡單，只要沒有真正的自由民主，只要沒有真正民間的組織和活動，權勢集團就一定會毫不留情地把改革帶來的沉重負擔壓在普通老百姓的身上，同時他們也一定會把本來就少得可憐的財富毫不客氣地抓在自己手裡。看到這一點，你才會懂得爲什麼普通老百姓竟然會越來越不支持經濟改革。懂得這中

問的道理，一個主張經濟自由化的人就再也
會同時去反對政治自由化了。

這兩年來，許多人，包括主張經濟改革的
一些領導人、幕僚智囊們，一直在呼籲人民作
犧牲、要人民付代價。他們總愛指責老百姓光
想「現得利」，似乎深化改革的一個主要障礙
就是「社會（指老百姓）缺乏對改革代價的必
要承受能力」。經濟學家董大林說得更妙，他
說，在這二十世紀最後一段時日裡，「我們要
全民奮起，僅僅領導層有紧迫感是不行的。」
事實却是，中國的主要問題恰恰就在這個「
領導層」上。名不見經傳的嘉興市女副市長范
巴陵倒說了一句中肯的話：「沒有一個廉潔的
政府，怎能有一個奮起的民族？」

中華民族的素質的確在下降，而我們的「
領導層」就是促成這種下降的最大力量。八六
年冬天，幾十萬學生上街遊行；海內外人士見
了無不振奮；這不是垮掉的一代，不是只知道
吃喝玩樂的一代，不是沒有理想、沒有熱情、
沒有勇氣、沒有正義感的一代。但是，全世界
人民都高興的事，偏偏就是中南海的幾個人不
高興，還說要「不惜流血」，又抓又打又開除
。到後來，一些參加過遊行的學生頹唐了，不
問國事，只管吃喝了，於是乎，「領導層」也
就放心了。一批一批的中國人，讓共產黨整的
寒了心、破了膽，在「領導層」看來，這就是
「思想改造好了」。

共產黨掌權不到四十年，其腐化的速度之
快實在驚人。「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化」，
這句話可是一點不假。時至今日，共產黨「領
導層」還不趕快順應潮流，實行分權制衡、承
認人民的基本權利。老老實實在人民的監督下
彌補以前的過失，恐怕將來想改人民也不肯給
你機會了。

再過十二年就是二〇〇〇年了，到了二〇
〇〇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就成立五一週年了。
當初毛澤東說，假如我們這個社會主義，搞
了四、五十年，還比不過一個英國、比不過一
個美國，那還有什麼優越性？到了那時候，我
們就被開除球籍。周恩來在四屆人大上說，到
本世紀末，我們要建成是有四個現代化的社會
主義強國。鄧小平則說，到二〇〇〇年，我們
要達到小康水平。標準是越降越低（實事求是
嘛），早知道到最後中國共產黨只打算在二〇
〇〇年弄到人均八〇〇〇美元的水平，當初那批
革命烈士拋頭顱、洒熱血又是何苦？

聽說前些年，當鄧小平提出他關於本世紀
末的「宏偉」（?!）構想時，一位西方專家就
提出：按照這個構想，到本世紀末，中國將進
入第四世界（意思是說會比大多數第三世界國
家還落後）。這話越來越不像是嚇唬人。人民
日報四月七日一篇文章，引用了上海世界經濟
報導披露的幾個數字，看起來不能不怵目驚心
，茲抄錄如下：

「一九五五年，我國國民生產總值佔世界
份額是百分之四點七，而一九八〇年下降到百
分之二點五；

一九六〇年，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與日本
相當，而一九八〇年只佔日本的四分之一，至
一九八五年下降到五分之一；

一九六〇年，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超過我
國四千六百億美元，而一九八五年超出額達到
三萬六千八百億美元。」

幾年前，甚至僅僅一年前，許多人都還對
中國的經濟改革十分樂觀，但到了去年，特別
是十三大之後，樂觀派幾乎絕迹了。前不久，
經濟學家劉國光撰文宣稱，從現在起，用三年
時間搞調整，再用五年時間完成改革。嗚呼，

八年功夫又「彈指一揮間」地下去了（記住，
這八年還只是現在計劃所需要的時間，根據以
往的經驗，實際上一定還要用得更多）。八年
一過，就是一九九六年，離二〇〇〇年只有四
年了。改革與調整時期既是最艱苦時期，自然
不能指望人民生活有多大提高，能不下降就謝
天謝地了，最後四年功夫，坐火箭也來不及現
代化。如此看來，二〇〇〇年，這個曾經使億
萬中國人心神嚮往的時刻，帶給中國人民的，
將是一片黯淡。

幾年前國內時興過一陣子「改革文學」，
裡面的改革家都動不動「立軍令狀」。這倒不
壞。可惜的是共產黨從不立「軍令狀」，毛澤
東那句「開除球籍」或許可以算個軍令狀，但
他沒講明到時候該由誰來宣布這個開除令。因
此更可能的情况是，一旦發現社會主義的無比
優越性兌不了現，趕緊搞「反資產階級自由化
」以堵住別人的咀。引咎辭職？共產黨從來沒
這個習慣。共產黨只是不斷地說大話，却從來
不說要是大話落不了實它將何以自處。我們看
到的事實是，它越是搞得一場糊塗，它越是要
拚命強調它的領導，似乎是越錯反倒越有理，
越錯別人越不能批評它反對它。

說來也是，天下哪有不能反對的黨？當今
世界，政黨多如牛毛，有幾個像中國共產黨這
麼無能而同時又像中國共產黨那麼霸道？美國
的共和黨、民主黨，英國的保守黨、工黨，日
本的自民黨，還有台灣的國民黨，這些黨的執
政紀錄誰個不比共產黨強？可是它們都可以反
對，它們都承認別的黨可以和它們競爭，要是
自己的票數沒有對方多，自己就老老實實下台
。共產黨憑什麼要逼着別人喊自己「萬歲」？
這難道不是欺人太甚了嗎？

今年是一九八八年，離二〇〇〇年只有十

二年了。共產黨一定要抓緊時間，趕快改正錯誤。怎樣改正錯誤？那就是趕快實行民主，趕快制定一個時間表，先承認人民的言論、出版、結社等基本自由，然後再承認反對黨的正當存在，全面改革權力結構，把中國大陸變成個真正的自由、民主、法治的社會。非如此不能建立起最起碼的信任，不能建立起最起碼的團結，而沒有最起碼的信任和團結，任何事情都決不可能成功。

中共領導人的幻想是，趕快把經濟搞上去（所謂搞上去，自然不是奢望搞得多麼出色，只求能混得下去而已），以便回過頭來好好打擊那些搞自由化的人。去年鄧小平就說過，等到改革成功了，社會主義優越性更明顯了，就能更「理直氣壯」地反對自由化了。這就是為什麼他們一手狠壓政治民主、一手猛搞經濟改革的原因，但是這個幻想注定是要失敗的（現在敗象就已經很多了），那麼，中共領導人是否決心要專制到底呢？它是不是要為了保持手中的絕對權力而不惜把中華民族拖入破產、混亂和崩潰的深淵呢？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假如他們真是要繼續一意孤行，同時他們又極其幸運地維持到了二〇〇〇年的話，那時候，中國人民討論的問題就再也不會是改革派與保守派，經濟與政治改革等一類問題了。那時候，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的問題必然是：

■ 要中華民族，還是要中國共產黨？



旅美札記

畔之

美國人很愛他們的星條旗。政府部門、公共廣場自不待言，許多普通百姓人家也懸掛着它，尤其是在節假日裡。

相比之下，我們中國（大陸）人對我們的五星紅旗的感情就要淡薄多了。

原因之一也許是：美國人的星條旗，不帶任何黨派色彩，每個美國人都認為國旗（其實也就是國家）屬於自己。而我們的五星紅旗却大力突出共產黨的地位，因此，當人們不再認為共產黨代表了自己的一切時，他們也就疏遠了五星紅旗。

二

聯合國（總部）在美國。

美國就是一個「聯合國」。

在美國，來自不同國家、地區、屬於不同種族、膚色、持有不同宗教信仰和政治觀點、帶着不同的文化傳統和風俗習慣的人們，生活在一起。

中共領導人總是說，為了使國家安定統一，全體人民必須信仰同一個主義。

你只要在美國呆上一個月，你從此就再也

三

不會相信這套神話（或鬼話）了。

在美國，你發現有另一種愛國主義。這種愛國主義不是把它全部的熱情貢獻給盲目的命運為你安排的那塊祖居故土，而是貢獻給你的自由意志所主動選擇的這片立足之地。

四

只有參觀了中國的小鄉鎮，你才會知道中國有多窮。

只有參觀了美國的小鄉鎮，你才會知道美國有多富。

五

我納悶，當初毛澤東滿懷悲天憫人之情宣佈要「解放全人類」時，我們那些駐西方國家的使節們，心底裡是怎麼想的？

六

什麼時候，中國的電視節目主持人，能像威廉·巴克利（公共電視台「火綫」節目主持人）那樣，面對着「黨和國家高級領導人」，屁股深深陷入轉椅（而不是小心翼翼地只占用椅面的前三分之一），二郎腿翹得高高的（而不是兩腿並攏，雙手緊撫膝蓋不放），時而心不在焉地（不是畢恭畢敬），時而咄咄逼人地（不是誠惶誠恐）向對方提問或辯證，中國的民主政治就不錯了，中國人的公民意識就不錯了。

七

美國的蒼蠅都特笨，不用蠅拍也很容易打死。估計這和其先輩未受過除四害運動鍛煉有關。

知識份子 是民主運動的中堅

林 濤

讀了中國之春五十六期政治學教授邱垂亮
的文章「民主政治與知識分子」一文，頗為中
國大陸知識分子感到不平。把多數中國大陸知
識分子說得毫無骨氣，這是一種必須糾正的偏
見，因為它不僅是不公道的，而更主要的是它
不利於對中國民主運動形勢的估計。如果不能
正確估計中國民主運動的真正力量在哪裡，海
外中國民主運動必將被引入歧途。

我深信邱教授是十分關心中國前途的。但
我却不得不說，邱教授作為政治學教授，這篇
文章政治遠見是不足的，對中國民主運動起不
到政治指導作用。如果該文發表在中國大陸的
刊物上，恐怕會引起全國性的抗議和批駁。

其實邱教授這篇文章都在寫中共對知識分
子鎮壓的血腥與殘忍，按說應該得出中國大陸
的知識分子是反抗中共最力的一群，否則知識
分子怎麼會遭受中共一次又一次血腥的鎮壓呢
？可惜邱教授却得出了相反的結論，原因何在
？大概邱教授想看到屠刀下依然亭亭玉立的英
雄，而實際看到的却是，一些人的頭已經被砍
掉了，而另一些人則俯首躬身，屈就着那項後
依然帶血的刀。舞台上英雄昂首挺胸，迫使創
子手們不得不掂起腳來托住那架在英雄脖子上的
屠刀的場面，在大陸竟然找不到！因而邱教
授得出結論：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骨頭不硬，
脖子太軟，竟然連共產黨的屠刀都抵不過。既

做不了英雄，那就一定是做奴才了，所以邱教
授就在大陸知識分子與共產黨御用文人之間劃
了等號。

中國有幾千萬知識分子，怎麼可能都成了
共產黨獨裁的御用文人了呢？御用文人當然有
，但那畢竟是少數。文化大革命後，尤其是近
些年來，還肯為共產黨塗脂抹粉的人已經屈指
可數了。即使歷史上曾經歌頌過共產黨，跟共
產黨跑過的人，也不能就咬定他們是共產黨的
御用文人。看歷史的人要有歷史眼光，否則的
話，連提倡聯俄連共的國父孫中山先生恐怕也
摘不掉共產黨御用文人的帽子了。自中共建政
以來，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後，許多知識分子都
在以不同的方式反對着中共的獨裁統治。不過
他們畢竟是在共產黨的屠刀下鬪爭，旁觀助戰
者不應該，也無權要求他們一定要採取以血試
刀的方式。其實像方勵之式的人物，中國大有
人在，然而許多人在他們的聲音還沒有被世人
聽到之前，腦袋就已經搬了家。魏京生被判了
十五年徒刑，那還算幸運，因為他畢竟發出了
呼聲，被世人所知，所以共產黨沒敢把他秘密
處死。至於方勵之，君不見他本人早有明示：
「要得到發言權，必得先取得知名的學術地位
。」因為共產黨最怕洋人，否則，方勵之等人
的氣管恐怕也早就被共產黨割斷了，共產黨根
本不需要他的學術，更不需要他的肉體存在。

看中國的事情要學會「說話聽聲，鑼鼓聽
音」。如今大陸「三家村」、「四家店」到處
都是，一個稍有政治眼光的人絕不難發現，自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來至今，文藝界的作品沒有
幾篇不是鞭笞共產黨的。至於有人說他們把希
望寄托在共產黨的改革上，那也不見得就是希
望共產黨萬歲，如今共產黨好比一只餓鼠，飢
不擇食，不得不試圖從鼠夾上取食。我可以斷
言，鼓勵老鼠到鼠夾上取食者一定是捕鼠的人
。中國民聯不是也希望中共的改革要深入發展
嗎，那並不是因為天真地相信中共會通過改革
把中國引向富強、民主，而是深知，只有當中
共的改革達到一定的程度時，民主運動才會衝
破堤壩，才會反過來結束中共的獨裁統治。
同邱教授有相似看法的海外僑胞仍然不少
。在他們的概念中，中國大陸的農民是文盲、
是無知的一群，工人是拿着鐵飯碗的懶漢，知
識分子是軟骨頭，幹部是貪污、腐化、墮落的
一幫，共產黨員更是共產黨獨裁的打手。所以
我感到，中國民聯應該讓海外的同胞都知道，
中國民主運動的真正力量在大陸。那裡佈滿了
乾柴，也到處有火種，問題是，共產黨有一支
強大的滅火隊。我們成功的訣竅在於，發現並
造就一個能使火種點燃同步化的途徑，這一招
有了，中國的民主運動也就成功了，切不要再
散佈離心離德、自毀自謗、消極悲觀的錯誤觀
點了。

勿將剩勇付相煎

朝開牆

從中共與烏拉圭建交談起

二月初，中共宣布與南美小國烏拉圭建交。至此與中共有外交關係的國家增到一百卅五個，同時與台灣仍維持外交關係的國家只剩廿二個了，其中稍有影響力的也不過南韓、南非、梵蒂岡等。作為一位持中國護照的官派生，我似乎有充分理由為中共的外交成就感到驕傲，但在同時我又覺察到其中有不少隱憂。

一個地區之所以能稱「國」，一般都有兩個條件：一是內在的，即那個地區具備國家的一些基本特徵，如政府、軍隊、獨立的經濟；二是外在的，即其他國家給予承認。按照這個條件，台灣無疑是個國家，（前番有人說台灣不是國家見中春五十七期）；而且衆所周知，它叫中華民國。這裡問題稍微複雜一點是，中華民國仍聲稱，它亦是中國大陸的唯一合法代表，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則聲稱，台灣問題是該國的內政，正因如此，兩國展開了長達四十年之久的你死我活的鬥爭，也因為同時各持己見，大陸和台灣才有統一的希望。

然而中共的一些作法却在削弱這種統一的希望；或曰在給台灣獨立製造契機。中共統一台灣的手法有三：一是軍事威脅

；二是統戰；三是國際上孤立台灣。我們先考察北京的外交策略。如前所述，在北京的進逼下，台灣外交一直呈頹勢，在拉丁美洲只有巴拉圭仍與其有外交關係，另外其

他地區還有幾個反共國家。最近頗有風聲說，中共正在抓緊與南韓、以色列、沙特阿拉伯，甚至南非、梵蒂岡聯絡，大送秋波，欲與之建交，以達到國際上徹底孤立台灣的目的。應該承認，這對中共來說并非難事，十年之內有望如願。

但關鍵問題是，台灣將作出何種反應呢？台灣領導人將日益面對現實，放棄反攻大陸的美夢（連輿論方面都放棄）。國際上它自己不會甘為寂寞。它的島國經濟特徵決定了它須有廣泛的國際聯繫，它決不會長期生存在中共外交陰影下，要改善自身的形象，要挽回面子，要給島內二千萬人民鼓氣，結果是台灣將被逼上梁山——宣佈獨立（切斷和大陸最後的藕連），重新走向國際舞台。

在世界現代史上，由一國之地區發展成獨立國家之事并不罕見。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就是最好的例子。先是巴基斯坦從印度分裂出去獨立成國，後又有孟加拉從巴基斯坦分裂出去而另組國。其實台灣要獨立，條件更多，經濟上外匯存款世界第一，人口二千萬，領先於一百多個國家之前，國家制度十分健全。它之所以還沒有獨立，純歸功於部分台灣領導人仍眷戀大陸。

在此一情況下，中共方面也應聰明點，現實點，外交上不要再控台灣方面於死角，讓它

和廿多個國家保持外交關係，其意義就如同台灣國大中仍保留大陸籍代表一樣，使台灣一方面有面子，另一方面仍和大陸有關係。否則相煎太急，只會使台灣加速獨立。筆者估計，當與台灣有外交關係的國家只剩十個不到時，台灣即會宣佈獨立。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中共的另外兩個手法：軍事威脅及統戰。據毛澤東自己承認，此二法乃中共成功的法寶，自然特受中共獨珍。但此一時彼一時，早已境過時遷。統戰只能使人越來越認識中共的虛偽與無能（爲什麼不統民聯？）。趙紫陽如真有決心改革，首先該將統戰部撤銷，因為它根本無助於和平統一台灣。中共最後一招是軍事了。不是自滅自家威風，我實在對我國軍事實力持保留態度。短短的對越一戰，人員損失達五萬，開支逾億。攻打台灣就是拿五十萬或一百萬中國青年墊底，中共也不見得能跨過台灣海峽，就是登了陸，也將陷入以全台灣人民爲敵的困境。對越侵略中，已有不少士兵流露厭戰情緒，現在要去打無辜的同胞，我敢說會有無數的倒戈。事實上中共也無法長久打這場戰爭，不出三個月，中共內部就會四分五裂，改革也就自然徹底夭折，那時中共必自身難保。如果中共自知火力不夠，放棄攻台，那又必將導致威風、信譽掃地，當然不可想像大陸人民還會對中共抱有半點幻想。

筆者的淺見是：大陸改革成功最大的阻礙還不是來自保守派，而是台灣是否獨立。如果台灣獨立，中共便岌岌可危也。因此，爲民族計，爲台灣計，爲中共計，最好不要在外交上去繼續孤立台灣。給台灣一條活路，也就不會拿起石頭打自己的腳。

最後順便指出一點，中共與烏拉圭一樣的，小國建交是要付出相當大的代價的。台灣爲了

和僅有的幾國保有外交關係，都下了血本。如在烏拉圭，台灣有不少援建項目。小國家講究實利，中共不付出比台灣更高代價，烏國豈願與你建交？據報導烏國是在中共承諾予以請人

把爭取「出版法」

作為我們的

第一個目標

——民運策略之研討

林峯

在對奕中，誰不願意讓自己的棋子一下子佈滿整個棋盤，但我們只能一步一步地走。因此，重要的問題不在於我們要說些什麼、做些什麼，而是我們要先說什麼、先做什麼。

——胡平——

回顧七六年以來的民主運動歷史，曾經有過七九年西單民主牆運動、八〇年以北大為首的一批高校的學生民主競選人民代表的運動、八五年九·一八各地學生反日爭民主大學潮、以及八六年底合肥、上海、北京等地學生爭取民主自由的大遊行等很多次高潮。這一次次聲勢浩大的民主運動高潮都曾經在全國造成很大

貸款和援建一批項目後，才答應建交的。昔日中共爲了在國際上爭取阿爾巴尼亞一票，而將數百億元付諸流水。如今還要重犯舊錯？中國的外匯都是靠農民抓鱈魚，賣王八掙來的。而的影響，但也都當權者羅織以種種罪名，施加高壓手段，很快遭到剿滅，沒有取得持久的效果。這固然主要是由於當權者把民主運動視如洪水猛獸，必欲滅之而後快所致，但是從我們民運的策略方面，是不是也有值得檢討的地方呢？本文即想從這個角度入手，對當前的形勢和民運的策略作一探討。

一、集中力量爭取言論自由 是中國民主化最可能的 一個突破口

民主運動的第一個目標定在哪裡，這是一個極端重要的策略問題。

在過去的十年裡，國內的民主運動頗有過幾次激動人心的高潮，但是長遠的效果並不顯著，有時在高潮過後的一段時期，人民的民主自由權利反而比高潮到來之前還要小。就如同海水的漲潮和落潮，漲潮時，波濤洶湧，排山倒海，可一旦潮水退去，沙灘上仍然是空空如也，什麼也沒有留下。轉了一圈，幾乎又回到了原地。這樣的教訓是很深刻的。這裡面除了敵強我弱的客觀因素外，我們自己的失誤在於沒有提出明確的目標和採取適當的策略，在形勢高漲時，不懂得藉機提出具體的法律要求，以爲那樣胃口太小，也太書呆子氣，因而失去了就具體問題要求政府公開答覆的良機。而一旦高潮被壓了下去，官方對言論的壓制更加變本加厲，人們反而連爲自己辯解的權力都沒有。

國內人民吃肉仍靠配給，筆者在外交戰綫多年，對此深有體會。中共目前當務之急，是宜將剩勇搞改革，民主實現了，統一何愁不實現？

民主化需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在做的時候一定要有步驟，講究策略，一定要想清楚什麼話可以先說，什麼話應當等一等才能說。尤其在民主運動的高潮中，特別要冷靜地分析我們的法律處境，把我們的要求集中在一個基本的目標上，利用民運高潮的強大氣勢，務求在基本目標上有所突破。

那麼民主運動的第一個目標應當是什麼呢？我們認爲應當首先爭取言論自由。因爲第一，言論自由是人民自由權利當中最基本的一條，是天經地義的，在衆多的民主要求中，言論自由是最能夠獲得絕大多數人民真心擁護的一條；第二，言論自由也是各項民主要求中最廣泛、威力最大的一個，槓桿原理的發現者阿基米德說過這樣一句話：「給我一個支點，我就能舉起一個地球。」在政治生活中，言論自由正是這樣一個支點；第三，在我們的各項民主要求中，只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是憲法明文保障的，按照現行法律，只有這一方面的爭取是合法的；第四，從目前的實際情況看，言論不自由也正是遏阻着民主事業發展的一個瓶頸。因此，集中力量首先爭取言論自由，將是中國民主化最可能的一個突破口。

爭取言論自由有兩個特點，一是「高效」，一是安全。列數當權者對民主運動歷次鎮壓中所使用過的理由，雖然各種各樣，五花八門，但沒有一次是以「人民要求言論自由的權利」作爲公開理由來鎮壓的。當權者每次都是在

我們的其它方面找「短處」，利用我們的一些「過激」言論，在「是非」問題中尋找藉口。我們應當揭露和譴責他們這種「是非掩蓋權利」的卑劣作法。但另一方面，我們是否可以更謹慎一些，在國內暫時不要公開提出可能「違憲」的口號，而把目標先集中在言論自由的權利問題上？這樣，就易取得成功，而當權者也難尋到鎮壓的藉口。

二、爭取言論自由的關鍵 在於爭取「出版法」

在一個法制的社會裡，人民的權利必須通過具體的立法來保障。在中國，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原則幾十年來沒有能夠實現，也正是因為沒有相應的具體辦法來規範和保障。

中國歷來憲法中的言論自由度是可憐的。當權者採用「抽象肯定，具體否定」的辦法，用「反革命宣傳煽動」「反動言論」（凡批評四項基本原則的言論，都屬於上述範疇）等罪名，把「言論自由」規範為說對統治者有利無害的話，從而在實際上取消了言論自由。因而，過去曾有人提出過「立言論自由法」的要求。

近年來，當權者對群眾私下場合的言論，已不如毛澤東時代控制那麼嚴，這確實是一個進步。但是對於見諸文字的大眾媒介的「言論」，則仍然橫加干預。從反精神污染到反對自由化，目標所向是文教新聞出版學術界的「言論」。他們仍企圖用強權來一統言論，影響人民的思想，使其籠罩在統治者的思想裡面。可見，沒有出版和新聞的自由，就沒有真正的言論自由，而沒有真正的言論自由，則群眾甚至沒有思想自由的選擇。因為人們淹沒在連篇累

牘的假大空話裡，最後只能用統治者的消息和思想去代替事實的認定和是非的選擇。

就事而論，過去的大字報曾給了群眾某些「出版自由」。想的事，說的話，一抄一貼就可以得到一批批圍觀的讀者，這不就是自由出版了他的著述、自由發佈了他的獨家新聞？現在，則局面完全不同了。

他們把本應屬於國家和人民的國營出版社，統統由執政黨的宣傳部來控制，出版的內容必須由該黨來劃定，稍有與該黨不一致的言論，就立刻會受到「停刊整頓」，甚至解散出版社的嚴重制裁。另一方面，他們又不允許辦民營出版社，普通公民若想辦一個出版社，發行自己的期刊雜誌，不可能獲得合法註冊，因為根本就沒有關於出版、註冊的法律規定。於是，輿論完全被控制在一個政黨的手中，而不再是人民的喉舌了。

言論自由問題的核心是出版自由，即公民個人或團體興辦出版事業的自由。有人認為，言論自由主要是要有幾個開明的領導人，以為一九八六年下半年中國輿論界的狀況就達到了一九八六年下半年中國輿論界的狀況就達到了言論自由。其實，那只能稱為「言論寬鬆」，而根本不是言論自由。在出版事業完全被政府掌握的情況下，人民的某一種言論不能在一份報紙或雜誌上公開發表，歸根到底，要由這家報刊的所有者，即政府來決定，所以即使真的寬鬆了一百倍，也僅僅是政府的恩賜而已，是沒有任何保障的，一旦政府不願意寬鬆了，這種「自由」就可以被收回，於是人民的言論便就再也找不到一家報刊可以發表了。合理的不合法，就站不住腳。

爭取言論自由，最重要的是爭取保障言論出版自由的立法，即「出版法」。「出版法」是憲法（母法）之下的一部子法，用來對憲法

中關於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條款做出具體解釋，並指導和規範與此有關的一切行為。由於「出版自由」概念十分明確，因而出版法有其特殊的地位。一部出版法必須對下列事項做出明確具體的規定：

- (1) 公民個人或團體可不可以興辦出版事業，公民自己創辦報紙或期刊需要具備什麼條件才能合法註冊，應當到什麼部門、通過哪些手續進行註冊？
- (2) 對民辦出版物的內容有哪些限制？（限制的標準應儘可能明確具體）
- (3) 民辦出版物每期發行之前是否要經過政府機關的檢查？
- (4) 民辦出版物可否申請通過國家郵局發行，應當通過什麼手續，或有什麼限制？
- (5) 在哪些情況下政府可以對民辦出版社進行制裁，由哪一個部門來制裁，如何制裁？
- (6) 公民或團體可否購買和擁有印刷設備、複印設備和其它印刷出版所必須的機器設備？如何獲得許可？
- (7) 委託國營或集體所有印刷廠承印民辦刊物需要什麼手續，有什麼限制？

當然，「出版法」還應包括有關國營出版業的條款以及其它一些事項。

法律的語言必須是簡單明瞭的，各種限制的判別標準必須是儘可能明確具體的。如果我們能夠爭取到一部制訂得比較好的「出版法」，人民的言論出版權利就將得到確實的保障。

把爭取「出版法」作為我們的第一個目標，有兩個突出的好處。首先，因為「出版」這個目標十分明確具體，當權者必須明確地回答同意或不同意，很難找到藉口搪塞。過去每當談到言論自由問題時，當權者總是以「沒有絕對的自由」這樣一個抽象的哲學命題來搪塞，

使人們誤以爲民主運動是在向政府要求「不受限制的絕對自由」，藉以蒙蔽群衆，分散人們對言論自由問題的注意。當權者就是以這種方式，一次又一次地迴避對言論自由問題作出正面回答，而且居然每一次都讓他們滑了過去。

這次我們提出制訂「出版法」這樣一個非常具體的要求，就是要讓世人知道，民主運動並不是在要求不受限制的自由，而是在要求當權者們明確地說出來，憲法中規定的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到底指的是什麼？人民到底應該享有多大的自由？既然是「出版法」，就一定要對這些問題做出具體規定。這樣，當權者就無法繼續玩弄文字遊戲，一旦公之於世，自然也就難以公開踐踏。

以爭取「出版法」爲中心的第二個好處是，容易獲得大多數人民的擁護和同情。對於「取消四個堅持」、「要求多黨制」或其它一些比較激烈的主張，思想比較正統的人會感到太出格了，一下子難以接受；但是對於出版自由的原則，絕大多數老百姓都會舉雙手贊成。爭取「出版法」只不過是在要求政府對於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作一個具體的解釋，這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是一個十分合情合理的要求，因而必然會得到絕大多數人的理解和同情。

三、有了「出版法」

之後能幹什麼

以「出版法」作爲起點，作爲依托，我們就可以在法律的保障下，一步一步地擴展民主的陣地。如果能夠爭取到「出版法」，就等於在專制主義的陣地上建立了一個民主的橋頭堡，從此，專制主義的節節敗退和民主事業的穩步前進，都將是可以預見的了。

下面我們準備用邏輯推演的方式來說明我們的整體構思，就好像我們與專制主義者在對奕，而對奕的規則就是現行法律，雖然這個規則目前是不公平的，是明顯有利於對方的，但我們將通過巧妙的對策，最終贏得勝利。換句話說，一旦有了「出版法」，我們就有了充分的把握，能夠通過完全合法的鬭爭方式，一步一步地擊敗專制主義。

我們對於未來可能得到的第一部「出版法」的內容並不寄予過高的期望，它很可能是在堂而皇之地承認公民可以興辦出版事業這一原則的同時，又附加上很多苛刻的限制，即他們雖然萬般不情願地把這扇長期關閉的言論自由之門打開，但只肯開一條小縫。不過應當看到，從先前的完全關閉到後來的開一條小縫，將使得局面發生本質的變化，民辦出版物的合法性存在一旦具有了法律上的可能性，那麼這些刊物的真正出現就是指日可待的了。雖然第一批的民辦出版物由於受到「出版法」有關條款的苛刻限制，不能抨擊時政；但重要的是，這些民營出版社不受中宣部控制，只受「出版法」的制約，後者的條文比起前者的控制來，畢竟要明確具體得多，不管這些條文訂得怎樣苛刻，我們總歸是有大量文章好做的。

我們第一步要做的是，介紹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社會狀況，尤其着重介紹保障民主制度的相應的法律體系。要翻譯和介紹美國、英國、法國、西德、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等民主國家的憲法、出版法、新聞法、遊行法、人權法案等重要的法律，使人能夠全面瞭解真正的民主法治的國家是什麼樣的，給人民提供一個與本國情況進行對比的參照系。在這一階段，我們不提出明確的政治綱領，不對國內的政治問題發表意見，對時政採取迴

避的態度，使我們的出版物在法律上處於無懈可擊的地位。

第二步，我們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現行法律可不可以討論？如果當權者說不可以，那麼我們進一步問，法律是由人來制訂的，爲什麼人們不能討論？我們就可以就這個專題，以提問題的方式在我們的刊物上組織討論，提出明確的看法。第一，法律既然是由人來制訂、由人來修改，當然就應當可以由人來討論；第二，法律的實施與對法律的討論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一項法律的生效或廢止只能由最高權力機構，即全國人大來決定，對現行法律的討論並不意味着現行法律立即失效，法律仍然是法律，我們僅僅是討論一下而已。如果大多數人認爲現行法律已經很完善，那麼這種討論可以促進人們對法律的認識；如果大多數人認爲現行法律不夠完善，這種討論可以促請下一屆人大把法律修訂得更完善。這有什麼不好呢？我們這樣一層一層地問下去，當權者一定無法自圓其說，最後不得不承認，現行法律也是可以討論的。

第三步，一旦明確了法律是可以討論的，我們就可以在我們的刊物上對「出版法」展開討論。我們可以組織一批文章對民主國家的「出版法」和我們國家的「出版法」系統地進行比較，指出兩者之間的差異，分析各自的優劣利弊，造成鮮明的對比。在理論方面，我們這一階段將以胡平的「論言論自由」作爲理論基礎，正面闡明言論自由的定義和基本原則，澄清那些似是而非的錯誤理解。我們將從與別國「出版法」的比較和對言論自由原則的理論闡述這兩個方面，指出現行「出版法」的不合理的部份，提出系統的修改意見。

我們可以利用我們的刊物，廣泛地傳播我

們的主張，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們意識到現行「出版法」的不合理以及修改「出版法」的必要性。由於我們的主張是合情合理的，也由於中國人民早已厭惡了長期以來權力控制言論的局面，經過一段時間的宣傳，我們一定能夠在有文化的人民中間爭取一個多數，使得大部份人擁護這些主張。我們可以不失時機地舉辦民意測驗，公布結果，讓統計數字來說話。一旦我們獲得了民意的優勢，我們就可以籲請下一屆人民代表大會討論關於修改「出版法」的提案，促成一部新的、較為民主的「出版法」的誕生。

如果這一努力成功了，那麼新的「出版法」就等於是做開了言論自由的大門，在法律的保護下，我們將可以比較自由地宣傳民主思想，抨擊專制主義，把民主運動大踏步地推向前進。如果第一次沒有成功，譬如新的「出版法」沒有獲得足夠的票數因而沒有被通過，或者修改後的「出版法」仍然包含很多違背言論自由原則的條款，那麼我們將繼續堅持不懈地、更廣泛地宣傳我們的主張。「理論只要徹底，就一定能說服人」，在下一屆全國人大開會時，我們一定會獲得更多的支持，從而通過一部真正保障言論自由的「出版法」。

第四步，修改之後的新的「出版法」雖然不一定就已經給人民的思想言論帶來了完全的自由，但至少這種自由是比前一階段明顯擴大了，人們在新的「出版法」保障下，將可以說得更多，範圍更廣，內容也更深刻。可以預期將會有更多的民辦刊物湧現出來，初步形成一個自由爭鳴的局面，從而打破過去的一黨壟斷。這時，對整個國家體制展開全面討論的時機就已經基本成熟了，我們在全面介紹西方先進國家的國家體制、政治結構和經濟制度的基礎

上，應把討論的重點放在中外對比上。「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這種強烈的對比，可以最有力地戳穿當權者們長期以來所製造的謊言。通過比較研究，客觀公正地介紹各種政治結構的優劣利弊，那麼孰優孰劣就不言自明了。作為民主政治的理論基礎，我們將着重宣傳人權平等的原則和多元化的原則，並有意識地與所謂「一元化領導」的理論和「專政」理論進行對比，以此動搖專制主義的理論基礎。

第五步，民主必須通過法律的形式來體現，中國民主化的每一步深入也一定要找到相應的法律上的目標。我們的第五步有兩個法律目標。首先，我們要在民辦刊物上發起對「刑法」中所謂「反革命罪」的條款進行討論，指出「反革命」這個詞意思極端模糊，涵蓋過寬，不適用於法律定義的用語；同時指出，在過去的幾十年裡，「反革命罪」的刑事案例已經造成了無法計數的冤獄，這個罪名所起到的殘害人、扼殺思想的作用已經遠遠超過了保衛國家安全的作用，「反革命罪」已經成了「言論罪」和「思想罪」的代名詞。我們提出從「刑法」中取消「反革命」這個罪名，把其中保衛國家安定的部分代之以明確定義的「暴亂罪」，而其中涉及思想言論的部分則完全廢止。

第五步的第二個目標是，在前一階段對政治結構全面討論的基礎上，開始對「憲法」進行討論。我們的主要策略仍然是通過對比的方式，比較各自的優劣，讓人民自己得出結論。我們將指出，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大法，所闡述的應當是那些最基本也最必要的原則，所涉及的詞匯概念應當是有明確定義的，並應當盡可能簡單明瞭。而現行「憲法」中的所謂「四項基本原則」不符合上述的要求。首先，其中「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這兩個概念

過於複雜，定義不明確，幾十年來含意一直在變化，同時，國家應當非意識形態化，即「政教分離」，因而上述內容不適合作為憲法的語言；其次，作為一個民主制的國家，就是違背民主的基本原則的。政府的選擇，應當以選民的取捨為唯一途徑，所以堅持某一個政黨的領導沒有理由寫入「憲法」。

我們這一階段要把握的分寸是，我們並不是要評論某一種學說的正確與否，也不是要判斷某一個執政黨的政績如何，更不是試圖推翻某一個政黨的統治而以其它的政黨取而代之。我們只是從抽象的、理性的角度指出，「四個堅持」是與一個民主制的國家背道而馳的，因而沒有必要寫進「憲法」。我們並不認為目前任何一個其它政黨已經有資格有能力來取代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但我們也不認為任何人有理由利用「憲法」來扼殺這種未來的可能性。我們的目標是修改「憲法」，取締「四個堅持」的法律地位，把「黨」和「國家」這兩個概念明確地區分開來。黨就是黨，國家就是國家，不能混為一談。任何政黨只能在「憲法」和法律之內活動，不能凌駕於國家之上。

完成了修改「憲法」的任務，就意味着一個公平競爭的民主制社會的到來具有了法律上的可能性。這之後，我們就可以全面地、明確地、公開地提出我們的政治主張，也可以抨擊時政，發揮言論自由的強大威力，把中國的民主事業越來越快地推向前進。

後記：國務院法制局新近公布的「五年立法規則」，十一個方面共列三百五十多個日後準備制訂的法律法規，但唯獨沒有「出版法」，可見「出版法」正戳到了當局的痛處。由此也可以得到反證，立「出版法」應當作為我們第一個目標。

關於中國中小學

教育的一些討論

布朗大學謝定裕

【編按：本文是布朗大學謝定裕教授，在科技教育協會於哈佛大學主辦的「中國教育討論會」上的發言。原文刊在「華僑日報」，現轉載於此，供關心中國教育的讀者參考】

一九八七年九月號的「人民文學」有一篇報告文學：「神聖憂思錄——中小學教育危境紀實」，在國內知識份子中引起了不小的震蕩。文中的章節有「文明的斷裂」，「師道的殞落」這樣的標題。接著十一月十四日「人民日報」又刊出了冰心的「我請求」，希望大家正視中國中小學教育的危機，但是細讀「神聖憂思錄」後，才發現這篇紀實所報導的，基本上是北京中小學教育的情況。北京是全國首善之區。在許多方面，它的問題與中國大部地區所面臨的問題，幾乎是不同性質的問題。北京市的家長是在為子女操心如何能升入重點中學，重點大學。可是對內地農村中的廣大兒童而言，却是是否成為文盲的問題。北京的師範畢業生所考慮的是較好出路的問題；但大多數內地農村有志青年，却連接受中等以上教育的機會都沒有。北京及其他都市中小學的問題的確嚴重，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可是廣大中國其他地區的教育，是一種更深沉的嚴重。

中小學教育的全貌

表一、小學生入學情形

年份	小學總數	學生人數	入學率%
1949	346,800	24,000,000	25
1965	1,681,900	116,000,000	84.7
1966		103,417,000	
1971		112,112,000	
1972		125,492,000	
1973		135,704,000	
1974		144,814,000	
1975		150,941,000	
1976	1,044,300	150,055,000	95+
1977		146,176,000	
1978		146,240,000	
1979	923,500	146,629,000	93
1980		146,270,000	
1981	894,074	143,328,000	
1982		139,720,000	
1983		135,780,000	
1987		131,800,000	96.4

在討論細節以前，我們且先來看看中國教育的全貌。表一是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八七年全國小學總數及學生總數〔一〕。這一九八七年的九六。四。入學率也許不算太差，但另外可以看出的是無論小學數目以及學生數目，自一九七五年以來都在下降。而且另一擾人的統計數字是：根據一九八二年人口調查，有二三五八二零零零人，也就是三一。九。的人口是文盲及半文盲〔二〕。關於農村小學的情況，有所謂「三六九」的說法。就是入學率是九零。〇，上課率是六零。〇，而及格率是二零。〇。也許這可以說明上面兩組數字所表示的表面上矛盾。

中學可分兩類，一類是普通中學。一類是特別職業學校。表二是普通中學的統計數字〔三〕。表三是特別中等學校的統計數字〔四〕。從這些數字中可以看出小學生與中學生人數的比例大致是一三。五。在中學生裏，就讀特別職業學校的只占十分之一左右；而在普通中學裏，高中生與初中生人數的比例是大約一。六。自一九七七年以後，中學數目及中學生人數也有顯著的下降。

學校及學生數目下降的原因，一部份是由於人口結構的變化，另外主要是兩方面：一是經濟原因，另一是師資的缺乏。後者又與前者有關。經濟原因又有兩方面：一方面是教育經費低；另一方面是學生上學對家庭所造成的經濟負擔。尤其是在農村，學費書費相對而言有些份量，而且兒童如不上學，就是一個勞動力，可以增加家庭收入。

師資的缺乏與教師的待遇有直接關連。够水准的師資的欠缺，自然就影響教學的質量。這也影響家長送子弟上學的熱誠。

過低的經費

現在來看看經費的情形。

表四〔五〕列舉一九七九年各級教育的經費。資料雖比較老，但還是可以得一大致印象。從表四中可以發現下面兩點：

一、小學，中學及高等教育經費所占的百分比是，小學：三四%；中學：三六%；高等教育：三零%。

二、中央教育部提供了六四%的經費，地方及企業提供了二八%；私人提供了八%。

關於第一點，如果我們折合每一學生身上所花費的教育經費，那就是：小學生平均每人二元零美元，中學生為五元零美元，高校生為一五元零美元。（美國一九八零年情形：中小學生大約二元零美元，大學生約五元零美元，人均國民收入大約一元，零零零美元），以一九七九年中國人均國民收入二元零美元來算，每一學生教育費用所占人均收入的比例見表五〔2〕。這裏可以看出，在小學及中學教育上經費的比例實在太低。比起其他開發中國家來，還不及人家的一半。附帶這裏要提醒一下，一九七九年美元與人民幣的匯率是：一：一。五四一。現在的匯率是一：三。七。所以如折合美金計算，現在中國的教育經費不一定比一九七九年高。

為什麼教育經費如此低，而小學生學率還可高達百分之九十六？主要是因為教師工資低。以小學教師而言，其工資只是人均收入的一點四倍。在其他開發中國家，小學教師的工資約有人均收入三四倍甚至更多。（教師工資在中國僅占經常費的百分之六十，在開發中國家，教師工資占經常費的百分之八十五至百分之九十），由此可見，教師工資若與一般開發中國家的中小學教師的相提並論，中國中小學教育的經費比重應自一九七九年的水平提高至少一倍。也就是說全部教育經費的比重應自一九七九年的水平提高百分之七十，一九七九年教育費用占總產值的百分之三點一。所以這一比例應該增加到百分之五點二才能達到這一目的。（教育費用與總產值的比例：一九七九年發展中國家平均是百分之三點九，發達國家是百分之五點七，美國一九八零年是百分之六點五）。

關於第二點，我們應當了解，在高等教育方面，所謂地方及企業基本上就是指省

表二、普通中學情形

年份	學校數	學生人數
1949	4,045	1,039,000
1965	18,102	9,338,000
1966		12,498,000
1968		13,923,000
1970		26,419,000
1972		35,825,000
1974		36,503,000
1975		44,661,000
1976	192,152	58,365,000
		初中：43,529,000 高中：14,836,000
1977		67,799,000
1978		65,483,000
1979	144,233	59,050,000
		初中：46,130,000 高中：12,920,000
1980		55,081,000
1981	106,718	48,595,600
		初中：41,445,800 高中：7,149,800
1982		45,285,000
		初中：38,880,000 高中：6,405,000
1983		43,977,000
1984		45,542,000
1985	93,221	47,060,000

政府及直屬中央的其他部會及企業，以中學而言，地方及企業基本上是指縣政府，都仍然是國家在出錢。可是以小學而言，所謂「省、市、縣、大隊、企業」，就大部分是指大隊或生產隊等集體的資金。在小學總經費的四十四億元中，有十九億元來自集體及私人。又因城市的小學全系統國家負責，可見在鄉村的小學中，其經費大約有一半需要自籌。這也是為什麼農村小學叫做「民辦」小學。換句話說，國家在負責城市居民教育的全部經濟責任，對廣大農村的基本教育，國家只負到一半的經濟責任。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得一很重要的結論。中國教育面臨的第一大問題就是教育經費過低，無論就絕對數字以及中小學教育經費所占國民收入比重而言，與一般開發中國家相比都偏低。有一份資料提到一九八四年全國教育支出所占國民收入比重已自一九七九年的百分之三點一升到百分之四；且有計劃將這比重於一九九零年提高到百分之五點四三，於二零零零年提高到百分之六以上。這自然是一很好的發展。

教師的待遇

教育經費充裕以後，就可著手解決第二個大問題：教師的待遇問題。教師的待遇可以分兩方面來討論：一是教師的工資，另一是教師的工作量。以教師的工資而言，前面已提到，即使與一般發達國家相比，也是偏低。教師實際收入之低於一般人，在國內已是一不爭之事實。三年前一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討論發表時，其中本有一句是「使教師成為人人羨慕的職業」。到最後定稿時，就變成了「使教師成為人人尊敬的職業」。這二字之改，就充份顯露出中國當前令教育界心冷的現實。相形之下，日本於一九七四年就制定法律，規定教師工資應高於一般政府干部〔3〕，日本今日在經濟上的發達，與他們注重教育，用心吸引優秀人員到教育界，是有密切關係的。

以教師的工作量而言，照平均統計數字而言，中國教師的工作量倒並不偏重。以小學而言，學生與教師的比例是廿七比一（一般發展中國家的比例是卅四比一，發達國家是廿三比一）。與學生接觸時間是平均每周十九廿節（一般國家是廿五卅節）。以中學而言，技校學生與教師比例是十比一（普通中學是十九比一）（一般發展中國家是廿一比一）。與學生接觸時間是每周十二十三節（一般國家是廿一廿五節）。

所以從宏觀的角度來看，中國教師的工作量是還可適量提高的。因此可以淘汰一批不稱職的教師，增加教學的效率。如能這樣做，增加教師工資的經濟負擔也就可減輕一些。即使在「神聖憂思錄」中，教師的苦經主要是在工資低，住房擠，工作條件差，社會地位低等，並沒有對工作量有太多的抱怨。

上面所提的「工資」，應該是指「實質工資」。自從經濟改革以來，許多企業及服務單位的「獎金」，「加給」等等往往已超過原來的法定工資。因此，橫向比較標準，自然當以「全部收入」為根據。除了「全部現金收入」以外，住屋條件及其他福利也應計算入在「實質工資」以內，才比較合理。

表三、特別中等學校情形

年份	專業：技術及師範		職業／農業	
	學校數	學生人數	學校數	學生人數
1949	1,171	229,000		
1957	1,320	778,000		
1965	1,265	547,000	61,626	4,433,000
1976	2,443	690,000		
1979	3,033	1,199,000		
1980	3,069	1,243,000	3,314	453,600
			390 ... 職業 2,924 ... 農業	133,600 320,000
1981	3,132	1,069,000	2,655	480,900
			561 ... 職業 2,094 ... 農業	213,100 267,800
1982		1,039,000		704,000
1983		1,143,000		
1984		1,322,000		
1985	3,557	1,571,000	8,070	2,295,000

可是對於教師而言，因為他們要「為人民師表」。除了一「實質工資」以外，還應設法提高他們的社會地位。經濟條件的改善自然也會有助於社會地位的提高。但是因為文革對教師地位的打擊，要恢復過去社會上那種尊師重道的風氣，還需一些其他有實質意義的表示。在中國目前的政治體制中，國家的領導者真有意提倡教育，可以采取下面幾項措施：

一、提高教師在共產黨員中的比例。

二、增加教師在各級人大及政協的比例。

三、將教師的代表選入中共中央委員會，甚至政治局。

教師的水平

由於教師的待遇差，地位低，現在大多數知識份子不願意做中小學教師。一方面學生不願意上師範，因而影響師範學校的水平。另一方面，由於其他行業對知識份子的需要，許多已在教師隊伍中的人才，有機會就設法改行轉業。因此造成了中小學教師隊伍水平的低落。這是今日中國中小學教育的另一大問題。以一九八六年浙江省的情形為例，全省小學教師約一萬四千六百餘人，其中學歷在高中程度以上的佔百分之五十二點五（約七萬六千七百七十人）。全省中學專任教師人數約八萬七千五百人，其中高等學校畢業的佔百分之十五（約一萬三千人）。據教育部抽樣調查，浙江省中小學教師的合格率是達到全國較好水平的，而情況還如此嚴

表四、各級教育經費及來源，1979年

(人民幣：十億元)

	全部經費	省市縣 教育部	大隊、企業等	私人(學費 買書等)
小學	4.4	2.5	1.2	0.7
中學校	4.7	3.4	1.1	0.2
高校	4.0	2.5	1.4	<0.1
總數	13.1	8.4	3.7	1.0
基建	1.4	0.7	0.7	-
經常費	11.7	7.7	3.0	1.3

重，全國一般情況是可想而知。現在全國又在逐步推行九年義務教育，對合格教師的需求量自然更要大量增加。怎麼辦？如果經費可以解決，一個辦法就是實行「師役」制度。

所有文明國家，如果國家有需要，任何公民都有服役的義務。一般人所熟知的是「兵役」。現在是承平時代，國家兵員的需要憑自願就可解決，不需強迫服役。可是服役的義務還是存在的，現在中國顯然有教育危機，而且目前大多數知識青年又不肯去做教師，因此就應該考慮實行「師役」制度。我的建議可以分為兩部

一、所有高等學校的畢業生，在分配工作以前到中等學校去教二年書。以浙江省一九八六年為例。全省高校畢業人數大約是一萬三千。因此平均每年可增加高校畢業的教師二萬六千人；約為目前中學教師的百分之三十，為目前有大學程度的中學教師的百分之二十。

二、所有未考上高等學校的高中畢業生在分配工作以前到小學去教二年書。以浙江省一九八六年為例，高中畢業生約八萬三千四百人，其中約有一萬九千會考入高等學校，尚餘六萬四千四百人。因此每年可增加高中畢業的小學教師約十二萬八千八百人。約為目前全省小學教師的百分之

壇講眾大

八十八；為目前有高中程度的小學教師的百分之二十六十八。

有人也許會提出疑問，這些非師範畢業的學生可能無法勝任當教師。可是仔細審視一下一般師範學校的課程設置，就可發現師範學生所受的與「教育」有關的教育實在很少。以北京師範大學物理系為例，在大約三千五百總學時中，與「教育」有關的課程祇占一百五十學時。小學教師的訓練，如除掉音樂與美術，與「教育」有關的課程也祇占百分之十以下（▲）。另一方面，因為目前師範學生平均水平較低，所以服「師役」的教師隊伍的平均水平，並不一定會低於師範畢業的正式教師。

這一做法還有一點好處，就是可以使社會上很大數目的人，都有直接的教育工作的經驗，使他們有機會親身體驗教師生活的甘苦直接認識到教育事業的重要。

這筆「師役」的經費應該全部由國家來負擔。如果要由「民辦」小學所屬的集體來負擔這些服「師役」的教師的生活，就會又像當年上山下鄉的知青，并不受到當地農民的歡迎。這筆經費數目不小，會需要增加目前教育經費的百分之三十左右。但是如果經費問題能夠解決，這不失為開拓中小學師資來源的一個辦法。

農村的問題

在廣大的農村中，中國的教育還面臨着另一大問題：不上學。不上學的原因很多，但歸根結底就是：上學有什麼好處？對子女未來，又有什麼好處？下面我們來分別討論一下各種原因，並提出如何解決的一些想法。

一、送子女上學在家庭經濟上有雙重負擔：（一）農村小學是「民辦」的，集體的教育開支要更直接的來自農民。另外還要付學費，買書，買文具等等，相對於農民的現金收入，並不太少。（二）在農村，兒童也是一個勞動力，在推行生產責任制的今日，這一經濟意義就更明顯。在這種情形下，只有大家認清教育是一種有利的投資時，才能克服這些阻力。識字的重要性大概

已差不多是全國人民的共識，但如只為識字及簡單的算術，也許三四年小學就差不多夠了，為什麼還要再讀書？

二、就中國的傳統來看，讀書一直是一種提高社會地位的途徑。雖然從來都只有少數人能金榜題名，可是這一機會的存在及可能，是教育一直受到重視的主要原因，在今日中國的政治體制下，戶口把廣大農民拴繫在土地上，唯一能跳出牢籠的途徑就是上大學或者專科學校，這都需要中極低，而許多大學在入學考試錄取分數上，還對內地農村學生歧視。這些冷酷的現實，自會打擊農村有為青年的壯志。

要提高農村青少年向學的動力，除了設法改進農村學校的設備，提高農村教師的水平以外，可以考慮實行下列措施：

表五、不同程度教育的單位開支，1979年（人均國民產值的%）

	中國	其他低發達國家	發達國家
小學	8	15	16
中學校	19	52	21
高校	442	362	55

（一）所有高等學校應面向全國平等開放。

（二）政府及企業招工，凡屬文化及技術者，應該平等的用考試方式全面向農村開放。

三、如果教育不能達到向上移動的目的，是否可以促進學生在本地的經濟發展呢？在目前教育體制中，這一點似乎也無法達到。大部份農村中小學的課程還是與城市中小學課程類似；因此並不能對農村青年將來事業上的發展有什麼特別幫助。教育要與當地實際發展相結合——這一原則，教育當局雖在口頭上提倡；但落實起來却極不容易。因為「與實際結合」是遠比「依照固定教材教書」要困難得多。這就又牽涉到農村教育家與教師的水平問題了。

農村小學既是「民辦」，應該在課程設置方面適當的放權，讓基層單位在教育子弟的方向上多一些自主權，以便配合本地的經濟發展，從而定出相應的教育計劃。

四、即使大家已認識到教育是一種有利的投資，許多父母也還不肯將這一投資放在女兒身上，因為女兒遲早要嫁出去，而只有兒子才是老年的倚靠。農村中女童的失學率遠比男童為高。以一九七九年為例，全國小學生的入學率是九十三%，其中四十八%是男生，四十五%是女生。所以在失學的七%中，有五%是女生，而男生只有二%（▲），也就是說女童失學率是男童的二倍半。現在農村尚無退休制度，農民仍需養兒防老。在這種情況下，除了加強宣傳教育以外，還應制訂法律，使女兒與兒子對父母的遺產與撫養有同樣的權利與義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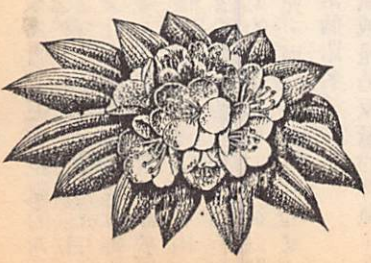
從一九七七年以後，中國教育發展的重點是放在高等教育上，放在城市裡。其構想是儘快培養一批水平高的專門人才，好幫助中國的經濟發展。對廣大內地農村的基層教育，基本上是抱著一種「慈祥的忽略」（BENIGN NEGLECT）的態度。大多數農村學校尚未達到下面的最低標準：「每一所學校都有安全的校舍，每一班級都有自己的課室，每一位學生都有一套桌椅。」「神聖愛思錄」的副題是中小學教育危境紀實。事實上

這一篇振憾人心的報告文學，僅僅觸及中國中小學的真正危境的一角。

其他

中國中小學教育可以討論的問題還有很多，例如課程設置，圖書設備，教學方法，學校管理，師資培養，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的比重等等，都很重要。以上所討論的實在只是更重要的宏觀問題而已。另外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教育的基本方針。一個焦點是普及與提高的問題。這一問題一直是一九四九年以來教育政策辯論的核心。文革期間是「普及」佔絕對優勢。一九七七年以後，却是「提高」更被重視。「普及」與「提高」的平衡，就長遠看，還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尤其是現在，農村經濟的重心要漸漸由個體的小農村轉化到專業的農、副、漁、牧及工業；知識文化的經濟效益會愈來愈大。因此教育普及的意義，除了培養文明國家的有知識的公民的政治作用之外，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也會顯得愈來愈重要。所以有需要重新檢討「普及」與「提高」的適當平衡。

教育方面的許多問題事實上牽連到政治社會各方面，光靠教育當局，教育界，教師是無法解救教育危機的。必須全國上下，齊心一志，才能真正使中國的中小學教育脫離困境。



北京監獄的囚犯

一個老紅衛兵的回憶

劉存

令部。
當頭腦發熱的我和我們（絕大多數的西料成員）清醒過來時，反革命的罪名便由往日的直接指揮者——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欽賜並通告全國。惶恐、懷疑、徘徊、探索，終於悟出了天機：哪裏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個司令部的路線鬥爭呀？分明是排除異己的宮廷傾軋，而我們——天真的而又幼稚的紅衛兵團將們只不過是一群幫兇，而且是戴笠式的幫兇，即使粉身碎骨也得落個罵名千古。

可能是書生的意氣或是造反派的脾氣，我們一氣呵成寫就了質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百問，經黃作珍（原北京軍區政委）送到了江青辦公室的文几。太不自量了！幾個毛娃娃哪裏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對手，幾天之後便落入了人民的「法網」，被北京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刑滿後剝奪政治權利七年。罪名很簡單：「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污蔑中央文革領導同志、咒罵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些已構成反革命罪。

當我經歷了看守所——監獄——勞改農場，熬過了九年又七個月的囚徒歲月後，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下來一紙文書曰：「撤銷原判決，無罪釋放。」

我默默地走出了囚牢，默默地……，法律是被玩弄於股掌的，昨天有罪，今天無罪，明天也許罪上加罪。君不見當年人民日報恨不得用斗大的黑體字寫道「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今天同是人民日報用同樣大的黑體字更正道：「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黨和國家的締造者劉少奇同志」。比起劉少奇的遭遇來，比起至死仍是反革命的來，比起至今仍重刑在身的來，比起九年七個月的所見所聞來，自己的這點不幸又算得什麼？何況冤案已經「平

編者按：這是一篇介紹北京監獄囚犯情況的文章，從中我們可窺見中國大陸的監獄究竟是怎樣對待犯人的？雖然毛澤東曾說過「要把犯人當人看」，周恩來說過對囚犯「不要打罵，不要體罰，不要虐待」，但實際上，在「文化革命」期間，監獄的管理人員對待犯人是慘無人道的。據悉，前幾年在中國大陸開展的「從重、從嚴、從速」打擊刑事犯罪份子活動中，殘酷虐待犯人的情況，也屢見不鮮。我們希望北京政府從人道主義的見地出發，類似的情況不要再在號稱建設社會主義文明的中國大陸發生。

這是一篇高幹出身的老紅衛兵對文革的片斷追憶，在文革發生廿年後的今天發表出來，以使人們永遠銘記文的慘痛教訓。中國大文學家巴金最近建議設立「文革博物館」，我們舉雙手贊成。劉存先生描述的監獄情況，大概可佔巴金想像中的「文革博物館」的一角吧。

假如沒在勞改隊裏滾過十年，就不會知道這些；

假如現實中的人們還活在人間，就不會忘記這些；

假如如此的監獄繼續存在，就不會沒有這些；

假如民主、自由、法治、人權光照華夏，就不會出現這些。

個人的恩恩怨怨是微不足道的

文化大革命之初，我只是一個普通的高中生，和同齡人一起懷著赤誠之心，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加入了北京首批紅衛兵——北京市西城區紅衛兵糾察隊，投身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中。破四舊，立四新，抄家，橫掃了一切「牛鬼蛇神」。又緊跟毛澤東的偉大戰略部署，參加過全國大串聯，煽動文化大革命之風。點文化大革命之火，掀鬥過從中央到地方的大小「走資派」，炮打過劉、鄧、陶資產階級司

反」了！

鮮為人知的

舉世皆知，中國大陸軍隊的數量是世界第一的，我敢說中國大陸的監獄及關押人數也是世界第一的。中國其它省市我不知道，就拿北京來說吧：一九六九年以前，北京市的監獄由北京市公安局第五處直接管轄，下設：北京市第一監獄（宣武區自新路七號）；第二監獄（德勝門外宮德林）；第三監獄（西城區草蘭子）；劉海監獄（西城區劉海胡同）；新都水暖機械廠（德勝門外北頂）；新都機械廠（豐台區良鄉）；科學實驗儀器廠（宣武區里仁街）；清河化工廠（朝陽區）；通縣小金廠（通縣豆店）；北苑農場（朝陽區白廟村）；團河農場（大興縣）；天堂河農場（大興縣）；清河農場（天津市寧河縣）；洮兒河農場（吉林省白城子）；音河農場（黑龍江克山縣）；興凱湖農場（黑龍江省密山縣）；北京市少年犯管教所（朝陽區辛店村）。全部監場所的總計關押能力約十一萬五千人。一九六九年東北邊境珍寶島事件之後，根據林彪發佈的一號通令：北京市除暫時保留第一監獄外，全部在押人犯轉移內地關押。

隨著歷次打擊現行反革命份子及各種刑事罪犯運動的展開，為監管日益倍增的犯人，於一九七〇年以後成立了北京市勞動改造工作管理局。它由原來的局轄處升級為市轄局，其級別與北京市公安局平起平坐，下設：北京市第一監獄（宣武區自新路）；第二監獄（德勝門外宮德林）；團河農場（大興縣）；天堂河農場（大興縣）；清河農場（天津市寧河縣）；雙河農場（即原來的洮兒河、音河兩農場）；

通縣小金廠（通縣豆店）；北京市少年犯管教所（朝陽區辛店村），總計關押能力約六萬五千人。表面上關押能力較過去縮小了，但有相當一部分判決後被送往青海省的青海湖周圍及新疆的阿克蘇地區。

能在北京市第一監獄服刑，真是犯人的莫大幸福，不僅可以得到共產黨的溫暖，更可以沾老外的光，因為它是北京唯一允許外國人參觀的監獄，為了國際影響，為了給洋人看，為了給共產黨的臉上貼金，辦得堪稱「模範」監獄。若被押送到農場或邊疆，就沒有那麼「享福」了，不死也得脫幾層皮，要不然怎麼能體現「脫胎換骨」變成新人呢！

此行何方？

陽春三月，北京市第一監獄內露天廣場上黑白分明而且格外刺眼地坐滿了人群——一身黑色囚服夾身，慘白的臉蛋，鏗亮的禿頭。沒有一絲的聲音，靜的可怕……曾經被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砸爛過「狗頭」的；砸斷過「狗腿」的；砸折過「脊樑骨」的；斬斷過「黑手」的；捅瞎過「賊眼」的犯人們，早已被嚇破了膽，老老實實地等著發配。

「這回要把咱們送到哪去呀？」身旁一個人低聲細語地問。

「愛送哪兒就送哪兒吧，哪兒的黃土不埋人！」不知是誰回答道。

「報告隊長」（監獄裏的管理人員的通稱）另一個人霍地站了起來，「×××散佈反改造言論，他說哪的黃土都埋人。」

所有低著的頭，唰地抬了起來，看著這位檢舉人，是趙洪英？一米五十幾的身材，天生的禿頂，一腦袋禿瘡嘎疤兒，可能是出於對抗

改造的義憤，脖子上的青筋一蹦一蹦地。

跑過來五、六個隊長，像鷹抓兔子似地將×××抬出了人群，「你豁的出死，我就豁的出埋你。」話聲剛落，咻、咻幾聲被剪到背後的手腕上戴上了狗牙銬子（一種細齒、自動緊縮的手銬），接著一腳把×××踢了個嘴啃泥，叮叮噹噹，嘩啦嘩啦，十八斤的腳鍊釘在了腳腕上；還是不解氣，咚咚幾腳踩在手銬上。「他媽的，今兒個便宜你了，請罪去！」獄卒們說著連推帶拉地把×××弄到了敬愛的毛主席像前，「擻著」又是幾巴掌，落在脖梗子上，腰彎成一百五十度，血從腳腕上、手腕上、口裏、鼻裏滴滴而下。×××是請求毛主席他老人家寬恕呢？還是咒罵呢？天曉得。

「現在，我代表政府宣佈，」麥克風裏傳來了一口山東腔，這是第一監獄的頂頭上司、軍管會劉主任的聲音，「根據——改造的需要，把你們押送清河農場強迫勞動，以觀後效。這個這個，剛才，不是跳出了個反改造份子嘛，在押送途中不是還會再跳出個把來？我們的方針是一不怕、二鎮壓，我已命令押送的解放军指戰員，如果誰膽敢以身試法，格殺勿論。」

關於清河農場……

清河農場，全稱是地方國營北京市清河農場，這是公開的名稱。實際上是北京市勞動工作管理局勞改總隊第一支隊。

它座落在天津市寧河縣境內，一面是渤海灣，三面被金鐘河、潮白河、蘆運河環抱的鹽碱灘。東西長約二十公里，南北寬約十公里。它的統治機構叫清河農場管理處，下設一分場（俗稱勞一河東大院）；二分場（勞二南場）

；三分場（勞二北場）；四分場（茶淀東村）；五分場（茶淀西村）；六分場（前進北場）；七分場（前進南場）；八分場（于家峪東村）；九分場（于家峪西村）；十分場（勞一河西大院）；十一分場（581和582）；十二分場（583）；總場園林大隊（女犯）；造紙廠（就業，當年轟動中國的蘇修間諜案的新聞人物李洪書（樞？）亦在此）；機械廠（就業）；碾米廠（就業）；陶磁廠（就業）；在最西端有個叫585的分場，這裏沒有活人，只有死鬼，清河農場的墳地。一眼望不到邊的、密密麻麻豎起的磚頭上刻著號碼，下邊埋著冤死的鬼；打死的鬼；整死的鬼；折磨死的鬼；餓死的鬼；病死的鬼；帶著花崗岩的腦袋見上帝的鬼；什麼樣的死鬼都有，就是沒有壽終正寢的鬼。某年的盛夏，去執行掩埋被擊斃的死鬼，我光顧過一次589分場。聽新舊社會對比時，知道黑暗的舊社會，有萬人坑。可是面對萬人墳，耳邊總覺得只有一個聲音：冤枉呀！冤枉！說吧，快說呀！有冤伸冤、有苦訴苦，可是，可是沒有留下姓名的死鬼們，早已喪失了申訴的權利，任憑風吹雪埋，日晒雨淋……。

毛澤東、周恩來說……

清河農場在全國勞改系統中資格是最老的吧？伴隨著共產紅朝成立的噹噹禮炮，第一批犯人——共產黨的戰利品——國民黨的殘兵敗將們、散了遊勇們、殘渣餘孽們被趕進了四面環水的、只長碱蒿和蘆葦的海灘，接下去一批又一批，直到今天仍源源不斷地，相信今後更多的人會「前仆後繼」地到祖國最艱苦的地方去貢獻自己的青春。

國民黨的稅多、共產黨的會多，在勞改隊裏就多得出奇了。白天，用勞動的汗水沖刷反動的資產階級思想以後，晚上雷打不動的二小時開會。認罪服法會——坦白交代會——揭發檢舉會——批判鬥爭會——思想檢查會——生活檢討會——改造總結會，五花八門光怪離奇。這天清河農場總場管理處下來通知：停止開大會。消息傳來人們樂極了。愛開什麼會就開什麼會，愛講什麼就講什麼，翻來覆去那一套早就聽出繭子來了，最起碼少幹一天活，倒可以一邊晒太陽一邊舒坦舒坦。

會場上高懸足有十五米長的紅幅上寫著：「學習最新指示、宣傳最新指示、執行最新指示、落實最新指示。」台上坐滿了身穿國防綠的軍人們，台下坐滿了黑呼呼的一片。「我代表北京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向你們傳達最高指示。」清河農場的主宰者——軍管會買主任挺著將軍肚一本正經地照本宣讀道：「偉大領袖毛主席最近教導我們說：要把犯人當成人。」

「周總理說：不要打罵、不要體罰、不要虐待，今後如果發生類似的情況允許犯人以上訴。」唸到這裏買主任面帶慚色地環視著台下，這群已經承蒙皇恩升格為「人」的犯人們，竟一點兒感激的表示也沒有。「真把你們當他媽的人看了，怎麼不往人裏走，還不鼓掌！」買主任一邊罵著一邊帶頭拍起手來。叭、叭台上的軍人們拍起巴掌來了，台下的剛取得「人」的資格的犯人們，如夢方醒也隨著台上叭、叭地拍起手來了。光拍手仍覺得沒有熱烈的氣氛，買主任索性振臂一呼：毛主席萬歲！頓時條件反射般地幾千隻胳膊騰空而起：萬歲萬歲萬萬歲！其聲震長空直沖雲漢。買主任滿意地笑了。「我再向你們宣佈一個英明決定……，買主任賣弄地欲言又止。「比秦始皇還秦始皇」的

毛澤東，除了鬥、鬥、鬥，就是殺、關、管，莫非太陽要從西邊升嗎？最好是聽其言、觀其行，共產黨從來說的比梅蘭芳唱的還好聽，誰聽誰上當，誰信誰吃虧。「根據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北京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決定把犯人的伙食費從每月九塊錢提高到十塊另五毛。」邊說邊踱到了台邊「毛主席這麼關心你們，黨和政府這麼挽救你們，你們有什麼感想呀？」買主任和藹可親地啟發道。在這個時候，他多麼想聽幾句歌頌毛澤東、歌頌共產黨、同時也歌頌他本人的讚美詩呀！若是有人能心領神會，來個即席感想獻詞，就像郭老的「兩個太陽」之類的溜鬚拍馬，肯定能得到減刑的恩賞吧？！果然前面不遠的地方，舉起了一隻黑手（因為穿著黑色囚服），不用說這是要求即席發言了。「無恥」我心中罵道。站起來一個人，啊！是他！就是那個在發配之前，曾遭毒打的人，聽說叫韓慶奎。「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市公安局軍管會的決定，太英明偉大了。」韓慶奎結結巴巴地說著，買主任滿意地頭一點一點地聽著。「可是有一件事想向您匯報一下……，」韓慶奎吞吞吐吐地說。「說吧，說什麼都可以。」買主任鼓勵道。「是這麼回事，伙食費長不長倒沒關係，來農場六個月了，天天吃高粱麵窩頭，雖然不像棒子麵那樣拉嗓子眼兒，可是堵屁眼兒，幾天也拉不出屎來……，沒等韓慶奎說完，哈、哈、哈台下幾千人一齊發出了會心的笑聲。

死神向韓慶奎招手了

病從口入，禍從口出，這是中國的一句古話，並非共產黨的專利發明，只不過到了「新中國」更加發揚祖宗傳統、更加光大祖宗精神

、更加肆無忌憚、更加……。韓慶奎鏢、鏢夾身被關進了獄中之獄——小號（禁閉室）。罪名嘛：在宣講偉大領袖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大會上，惡意攻擊黨的勞改政策，煽動反改造情緒，散佈反革命言論。

經過大揭大批會——深揭猛批會——狠揭狠批會——反覆批鬥會——打翻在地批鬥會——踩上千萬隻腳批鬥會以後，總算對他有所了解。

韓慶奎出身於房無一間地無一壠的窮的叮嚀響的貧農家庭，是根紅苗正的紅五類。從小沒上過學，斗大的字認不得百十個。舊社會受窮，那是有地主剝削。可是到了「新中國」，進入了「共產主義的天堂」人民公社以後，不但更窮，四十歲了連老婆也沒娶上。這是為什麼呀？人是有頭腦，會思想的。韓慶奎也不例外，翻來覆去想、今昔對比想，樸實的莊稼漢終於從現時生活中悟出了門道，迸出了語驚四座的，也闖下牢獄之災的妙語：為什麼窮？為什麼娶不上媳婦？就因為「農業學大寨呀，窩頭就鹹菜。」在大寨紅花遍地開的「鶯歌燕舞」的年頭，辦案人員把此案捅到了陳永貴手裏了。這一回可吃不了全得兜起來了。據說陳永貴用那隻拿毛筆比拿鋤把還費勁的手狠狠地批道：「實屬死反革命。」可憐的韓慶奎就這樣以「反革命」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刑滿後剝奪政治權利七年。更可悲的是像中國那幾個拿鋤頭的、賣大白菜的、穿梭引線的、沖床鑽孔的、綁紮鋼筋的人物們，被抬上什麼長之後，什麼事也管不了，但殘害起自己的同胞來，會國藩也得遜色三分。

韓慶奎被關進一分場（勞一河東大院）禁閉室。鏢、鏢幾次和手、腳作伴呢？大概四回吧？二年前一個風高夜黑的寅夜，一伙人破門而入，公安員的短槍、工人民兵的長槍、群眾

專政組的木棒對準了嚇醒在炕頭上的韓慶奎。不容分說手銬腳鐐麻利地栓住了企圖亂動的手與腳，工人民兵們又在胳膊上補上一根尼龍繩，死死地勒進肉裏。「我是貧下中農呀！……：沒等韓慶奎喊完，咚、咚群眾專政的棍棒落在後腦勺上。「你喊什麼？你也配當貧下中農，你是奸臣，你是秦檜，你是叛徒，你這個死反革命！帶走！」公安員氣急敗壞地語無倫次地吼道。於是工人民兵們、群眾專政員們連推帶搽地將連鞋襪也沒來得及穿的韓慶奎押上了去縣大獄的漫長的、崎嶇的、逶迤於七溝八峪的山間小路。有生第一次被戴上腳鐐，怎麼走得了路呢？邁左腳絆右腳，鐵環硌在腳腕上，嗑在腳脖子上，磨在皮肉間，人都是肉長的，怎麼能不痛呢？可是這群「對階級敵人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的毛家大院的衛士們，時而用槍托砸在後腰上，時而用棍棒打在腦袋上，時而飛起一脚踢在屁股上，韓慶奎被砸倒、被打倒、被踢倒，腦袋上六個窟窿咕咕地冒著血、腳腕露著白骨滴滴嗒嗒地淌著血，五星紅旗呀！你是用誰的鮮血染紅的？

第二次是在初次過堂審訊的時候。韓慶奎被帶進房山縣公安局的一間審訊室：雪白的牆壁用墨寫著八個大字：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審訊台正面嵌著一個紅五星，按共產黨的說法，它代表黨和政府。實際上那伸出的五個星尖，真像一隻能把人的五臟六腑掏出來的血淋淋的爪子。審訊台中端坐一位濃眉大眼翻鼻孔的壯漢，旁邊坐著一位細皮嫩肉的娘子軍。兩人身穿一身國防綠，頭頂瓶子蓋（北京人對警察的蔑稱。因警察的帽徽是紅底五個星星，與過去北京有名的五星啤酒的商標相同而得名），無疑這是代表黨、代表政府、代表法律、代表可以任意折磨、拷打……。

「坐下吧，」審訊員很仁義地讓韓慶奎坐在犯人席上——一只矮板櫈。「你姓什麼？住哪？多大歲數？什麼出身？」審訊員劈頭蓋腦地問、韓慶奎如數家珍地答，娘子軍刷刷地記。

自從接到坨裏公社群眾專政組的報告，房山縣公安局的頭頭們樂極了，也忙極了。在自己的管區又能挖出一個新生的現行反革命份子——而且是矛頭直接對準毛主席、對準農業學大寨的反革命份子，上報中央以後肯定能得到嘉獎。因此挑選了幾個屢立奇功的人成立專案小組。內定的方針是：從速審訊、從速上報、從嚴懲處。

望著土頭土腦的韓慶奎，審訊員心中暗自高興：「哼！就這個鄉下佬，量他也尿不出一丈二尺的尿，略施小計就能讓他在口供上押手印。」嘉獎信呀、立功狀呀、慶功會呀呀呀就在明天一樣，審訊員欲醉欲仙地飄飄然起來了。我們中國這幫以整人為職業，以整人邀功請賞，以整人為晉升階梯的惡棍們，什麼時候才能在神州大地絕跡？

「你是貧農出身的人嘛，跟五類份子不一樣，我也是貧下中農，看看自己的階級兄弟犯錯誤，心裏很不好受。」審訊員語出衷腸地說。韓慶奎自從被抓起來，這是第一次聽這樣感人的無產階級語言。「毛主席說過人都會犯錯誤的，只要承認了、改正了就是好同志。你也一樣嘛，不論錯誤有多大，只要承認了，還是階級兄弟嘛，我就是代表廣大貧下中農來挽救你的。」審訊員信口開河地說。韓慶奎真地被感動得哭了，伸出雙腳和雙手，化膿的傷口裏滲出白的膿液紅的血液。「您真是好人，跟他們不一樣，他們又打我，又捆我……：沒容韓慶奎說完審訊員嘆了一口氣，邊看著傷口邊

同情地說：「唉，別提他們了，怎麼能這樣對待犯錯誤的階級兄弟呀！」「小吳，待會等他把問題談清楚了，妳帶他去醫院看看。」審訊員以命令的口吻向身旁的娘子軍指示著。「怎麼樣？只要談清楚攻擊毛主席、攻擊農業學大寨的言論，不但可以治療傷口，還可以從寬處理和家人團聚。」審訊員哄騙著竟忘記了韓慶奎是個還沒有娶上媳婦的光棍。

一聽審訊員讓交代攻擊毛主席的言論，韓慶奎的腦袋嗡地大了。「攻擊毛主席是死罪呀？！說什麼也不能承認。」他心裏暗自盤算著。「我沒有說過毛主席壞話呀！毛主席是俺們貧下中農的大救星，我不是黑良心的人呀！」韓慶奎信誓旦旦地辯解著。我們作中國老百姓的真難呀，嘴上非得有把門的才行，稍有不遜言出微詞輕則蹲牢坐獄、重則以身示法。什麼時候我們中華民族十億人民能像歐美人一樣自由地說，而不用擔心飛來橫禍呢？共產黨什麼時候能傾聽不同政見的聲音呢？無論是善意的還是「別有用心」的。

「不用害怕，攻擊不攻擊先放一邊，就算不滿言論吧。」老奸巨滑的審訊員識破了韓慶奎的小九九。用降了八度的政治語調引誘說：「怎麼樣，竹筒倒豆子來個乾淨利索吧，現在把不滿言論談清了，馬上放你回家。」自由，儘管是毛家大院式的自由，對於關在縣大獄的犯人來說誘惑力是巨大的。望著臉色坦然言出法順的審訊員，韓慶奎真想如實交代了。突然千萬個不幸的結晶的順口溜湧上心間「只要開了口必挨槍子彈；只要不開口神仙難下手。」剛要張開的口，緊緊地閉住了。

「怎麼樣，想抗拒嗎？等待是有限度的，別敬酒不吃吃罰酒。」審訊員陰沉著臉，從牙縫裏一字一字喇出充滿殺機的話。



「我真沒……，韓慶奎剛說出三個字，審訊員那個像蒲扇一樣的大手搥在面頰上，接著啪、啪左右開弓，頓時臉腫了、眼青了、牙活了、耳朵聾了，血從鼻中、口中流了出來。「媽的，鐵嘴鋼牙也得給搥開，比你硬的老子見多了。」審訊員邊罵著邊拿出手銬咣地銬在手腕處，兩隻大手狠狠地將彈簧齒壓緊到最後一檔。「啊！」韓慶奎慘叫了一聲，未癒合的舊銬傷刺骨地發作著。「掀著，老老實實反省。」審訊員說完沖上一杯茉莉花茶，點起一支大前門香煙，蹣跚著二腿悠閒地等待著求饒的乞求。五分鐘、十分鐘、十五分鐘過去了，韓慶奎腫得像饅頭一樣的雙手由紅變紫而柴黑了。「怎麼樣？說吧！」審訊員沉不住氣了厲聲喝問道。回答是死一般的沉默。「狗娘養的，到了狗不理了。」審訊員不知是罵街還是罵自己。一個箭步竄了過去，抓住兩個銬子

之間的鏈子使盡吃奶的勁力上下左右地抖著、抖著，韓慶奎的手像炸裂一樣，胳膊如錐刺般，「說不說？」審訊員歇斯底里地吼叫著。回答仍是死一般的沉默。

一直默不作聲的娘子軍走了過來，遞過又一副手銬，咣地銬在二臂上。接著娘子軍拿著電棍在韓慶奎的前胸、小腹、後背、四肢地亂電著。高壓直流電在全身亂竄著，他抖動著、顫動著、哆嗦著，終於支持不住暈倒了。脚一抽一抽地，大小便不由自主地淌了出來……第三次是發配農場之前，這回是第四次了。

襲骨的朔風從每隔四公分有一條一公分寬的縫隙處灌進六面水泥——四面水泥牆面、水泥地面、水泥頂板的站著得彎腰、躺下須蜷腿的禁閉室。韓慶奎披著棉被團在一堆爛稻草裏。冰涼的手銬、冰涼的腳鍊、凍得疼痛的脚尖，呼出的哈氣在鬍鬚上結了冰霜。他既不渴望自由，也沒憧憬未來，此時此刻只盼望冬天的太陽從東方升起，給他帶來一絲溫暖。他盼呀，盼呀……

飢腸咕咕地叫著。簡直前心都貼後心了。蹲禁閉室的人不勞動不得食，這很符合馬列主義的教義。經過中國的創新，每天三兩七錢五分（十六兩制）足以維持生命所需的熱量。上午十點一碗高粱麵粥加一撮鹽，下午四點一碗高粱麵粥加一撮鹽。不是說高粱麵窩頭吃了拉不出屎嗎？這回連高粱麵窩頭都吃不上。韓慶奎耳朵貼在鐵門上傾聽著腳步聲，他既不奢求魚肉，也不想入非非，此時此刻只盼望鐵桶的叮噠聲，給他送來一口食物，他聽呀，聽呀……

終於鐵門被打開了。「拿碗兒來」專門管理禁閉室的黃隊長——一位從大兵轉業的獄卒

操著一口家鄉話——河北定興腔說著。韓慶奎連忙把還帶著粥吧吧的碗送了出去。嘩，一勺高梁麵粥倒了進來。「黃隊長，這碗還沒洗哪」，韓慶奎說。「你還講究個啥兒，你還想洗碗兒，你也不尿泡尿兒照一照小鏡兒，怪美死你這灰玩意兒了，愛吃不吃就這行子。」黃隊長連卷帶罵地關上了鐵門。捧著一碗高梁麵粥，淚水從眼眶滾滾而下。韓慶奎，這位純樸的莊稼漢遭毒打、挨電刑都沒有哼一聲，望著與豬食槽子沒有區別的碗，傷心地哭了。爲了能活下去，人的尊嚴、人的天性如此地被踐踏，這就是毛澤東說的要犯人當人看？這就是周恩來講的不要打罵、不要體罰、不要虐待？應該理解爲不要把犯人當人才對吧？共產黨從來是、過去是、現在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將來如何呢？

這已是第三十三次批鬥會了。韓慶奎就像茅房的石頭——又臭又硬，經過七鬥八鬥仍然頑固地堅持反動立場，拒不坦白，也不承認「罪惡」，更談不上深刻檢查了。看來非要帶著花崗岩的腦袋去見上帝不可。毛澤東、毛澤東的徒弟徒孫們在殺人時、整人時、鬥人時經常如此大言不慚地宣稱。是的，在獨裁強權制的國度裏，殺人算什麼？就跟踩死個螞蟻一樣，誰讓你跑到人家的腳底下，不踩死你、不踏上千萬隻腳、不讓你永世不得翻身才怪了？！

嘩啦、嘩啦，鐵鍊聲由遠漸漸而近，終於「現行反革命犯」被押上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批鬥台示衆了。哪裏還有人樣呀！細長的脖子上插著一副骷髏，死灰的面容、呆傻的眼睛、凸出的額骨、凹進的腮幫子，黃不溜秋的鬍鬚還沾著粥吧吧，風擺荷葉似地低頭彎腰站著。「打倒現行反革命份子×××！」「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加強無產階級專政！」趙洪英

，就是那個生一腦袋禿瘡，曾揭發檢舉韓慶奎的強姦犯，聲聲氣氣地帶頭喊起了同胞自相殘殺的開場白。在那一呼百應的歲月，孃孃餘音之中清晰可辨：有落井投石的幫兇腔；有事不關己的哼唧腔；有隨聲附和的唯諾腔；也有三兩聲嗤之以鼻的陰陽調。

「毛主席教導我們說，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現行反革命犯韓慶奎就是如此，啊，這個這個……」一分場管教矮矮胖胖的王股長讀著紅寶書打著官腔開了口。「啊……，他是死反革命，是從骨子裏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死反革命，到今天仍死抱著反動立場不放，就是嗎……對這樣的牛鬼蛇神決不能心慈手軟，狠狠地批、狠狠地鬥、批倒批臭不獲全勝決不罷休！」王股長越說越來勁越說越氣粗，梗著脖子咧著嘴唾沫星亂濺地進行「戰前政治動員」。

「說！你的動機是什麼？」「說！快說！老實交代！」此起彼落的幫兇腔，一聲賽過一聲，一陣急似一陣。有幾個人不想踩著別人的肩膀肥上岸呢？眼前只有一個肩膀可踩，急紅眼的落水狗們狂吠著撲了上去。趙洪英最積極、最主動、最堅決地照著本來已經低下的頭玩命地一掌劈了下去，韓慶奎挺了挺愧了的頭倒了。「媽的，要賴皮狗？先整整他的態度。」王股長不以爲然地命令。還是那個趙洪英一把抓起獵物，沖著軟肋、小肚子連珠炮般邊打邊罵：「讓你裝死，讓你反革命，讓你嗜嗜無產階級專政鐵拳的厲害！」韓慶奎癱擊地抽顫著、癱軟著倒了下去。「讓你裝蒜，讓你死魚不張嘴，我就不相信整不服你。」王股長慢條斯理地邊說邊踱近身，猛地抬起穿警靴的右腳狠狠地踢在心口窩上，啊……，隨著一聲慘叫，

韓慶奎被踢翻了個，又是兩腳咚、咚，真跟敲鼓一樣，在後心上，血，殷紅的血順著嘴角流了下來……

第二天傳來噩耗，韓慶奎死了！按照例行公事在死亡囚徒報告書上填完「現行反革命犯韓慶奎於一九××年×月×日監斃」之後，用棉被裹屍埋進「○○○分場」就完事了。

韓慶奎呀！你是怎麼死的？凍死的？餓死的？整死的？王股長最後三腳踢死的？你熬盡了最後一滴骨油，含冤飲恨地離開了人間，留在活著見證人心中只有那塊豎起的磚頭，上面清晰地刻著一七〇八五號。

在革命化的春節裡

一年一度的春節，不，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的傳統佳節，到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牢籠中，被賦予新的意義：「改造思想是沒有假日的。」尤其是七十年代第一春的「大幹苦幹九十天，堅決完成潮白河排灌站引水工程」，一筆勾銷了法定假日。當心呀！再不樂意也得忍住了，千萬別在風口浪尖上當活靶子！彼此知心的「同犯」們互相提醒著，滿腹牢騷地表面又與高采烈地「滾一身泥水、磨一手老繭」去了。

黑壓壓的出工隊列，剛走上河西大橋，頓時氣氛緊張起來了，全身披掛的看押軍隊托著輕機槍、扛著擲彈筒、荷著無後座力砲，瞄準著手無寸鐵的「階級敵人」；自動步槍插著三雙軍刺寒光逼人地直指人群。神經過敏的趙連海戰戰兢兢地說：「今天要唱肉囚墳？」是呀，他怎麼不擔心呢？前幾天接到老婆的來信，大年三十來看他，這麼多的槍砲砲確，萬一走火了那槍子是不長眼的。「爺們兒，別害怕，扎到人堆裏頭走，就是走了火，先打死外邊的

人，反正我們小哥兒幾個也沒老婆。「號稱「小油雞」的劉錦林天不怕地不怕地開起玩笑，逗得旁邊的幾個小弟兒們格格地直樂。

其實趙連海的擔心是多餘的。派出整連的軍隊恰好說明共產黨的心虛理虧，他們清楚其所作所爲是不得人心的，但共產黨歷來就是越不得人心的事越幹，有槍桿子作後盾，還怕造反嗎？我們中國的黨衛隊呀，什麼時候才能成爲祖國的衛士呢？



盼

頂著西北風向北走呀、走呀，「站住」側後方逆風傳來大兵的喝令。噫噫噫一溜小跑幾名自動步槍手越過排頭，轉身一字排開，槍上膛頂門火、鋒利的軍刺昂著頭，「走那麼快幹什麼，搶孝帽去呀！大過年的別找不自在。」領頭的大兵一頓臭罵，把排頭的幾個犯人罵傻了。平時出工時帶班隊長總嫌走得慢，今兒個却嫌走快了。另一個大兵一本正經地補充說：「走慢點又什麼不好？天一黑就得算一天刑期

吧。」還是那個領頭的大兵喝道：「跟在我們後面走，保持五十米距離，誰超出界線就抽死誰。」說完一轉身邁著四方步軋起馬路來了。

排頭的速度頓時減慢了一半，幾千人的黑流像污水一樣蠕動著。趙連海低著頭慢慢地走著，臉角嘴邊時時泛起甜笑，又在想老婆了。別看老趙人長得不濟，可尋了個好老婆。自打判刑以後人家拉扯著一兒二女，四十塊錢出頭的工資，還得照顧蹲大獄的丈夫。多難能可貴的婦女呀！「爺兒們」，小油雞拍著老趙的肩頭說：「別吃獨食嘿，給小哥兒幾個講講你是怎麼弄了個好老婆的？」小油雞剛二十出頭還沒談過戀愛，想取點經驗以備將來吧！「嘿、嘿，有什麼好說的，那還不是王八看綠豆對了眼兒了。」趙連海咧著笑嘴得意地說。哈哈！一幫子小哥兒們開心地樂了起來。「笑什麼！喝了笑老婆尿了，大過年的煩不煩。」一直低頭查拉腦走在一旁的領班孫指導員氣呼呼地罵道。「孫指導員，不煩，真的一點也不煩，抓改造促生產嘛。」小油雞不冷不熱地回了一句。「扯你媽的蛋，你他們的犯了罪，老子沒犯罪……」孫指導員差一點罵出心裏話。這哪裏是罵小油雞、罵犯人，純粹是小共產黨罵大共產黨。本來孫指導員春節準備回家團聚的，革命需要嘛，休假不成還不說，還得領隊帶班，心裏怎能不煩？氣怎能順？火怎能不冒？

架不住小油雞和小哥兒們的央求，趙連海津津有味地講起戀愛史來了，逗得大伙一陣又一陣的笑聲。老趙爲自己有個賢妻而自豪，人們以老趙有個老婆而羨慕，往日幸福片斷的回憶，沖淡了心頭的愁雲，可是歡樂沒好喜呀，樂極生悲。樹林大什麼鳥都有，又是趙洪英悄悄地走近孫指導員身旁，邊走邊打小報告：「報告指導員，趙連海向小年青灌輸亂思想：

：。」「嗯，你仔細盯住他，一舉一動記在心中，……」孫指導員並沒有忘掉自己的職業，何況今天的心情，非得找個出氣筒不可。

太陽歪過樹梢了，送飯的手扶拖拉機連影子也沒有，一上午水米沒打牙的犯人們累得直喘，渴得直燥，餓得直慌。小油雞和趙連海搭檔拾河泥，「伙房這幫王八蛋……」小油雞忍不住罵起來了。老趙連忙攔住說：「急什麼好飯不怕晚，再勒一下褲腰帶吧！」「別作囚夢了，打死也不幹了，小油雞豁出去了。」說完一屁股坐在冰塊上。「千萬別胡來，胳膊扭不過大腿，苦不苦想想長征兩萬五，累不累比比革命老前輩。」趙連海連勸帶鬧地開導著。

飯好不容易送來了，豬肉白菜餡包子，每人四個，外加一碗甩果湯。「不錯、不錯。」孫指導員連聲稱讚著順手搯了五個包子，「指導員，您喝口湯吧！」趙洪英奴顏媚氣地遞過滿滿一盆雞蛋湯。「嗯，」噫得說不出話的指導員，滿意地點點頭，拍馬屁真拍到點上了。別小看作奴才，這裏面是大有學問的，我們中華民族歷來是漢奸輩出的，認賊作父的、賣祖求榮的、賣身投靠的、獻女得寵的、溜鬚拍馬舔屁眼兒的，這民族的劣根性、民族的共同恥辱什麼時候方能根除呢？

長長的一字隊列，領取著共產黨的關懷——充其量不過四個菜肉各半的包子。還差幾個人就輪到趙連海了，孫指導員突然想起了什麼叫道：「趙連海，過來！」老趙跑了過去莫名其妙地站在面前。「好哇，好哇，你也想吃包子，你不是說好飯不怕晚嗎？你不是想吃吃樹皮啃草根嗎？給我擻著反省去！」孫指導員陰陽怪氣地叨叨著。「我、我……」趙連海不知禍從何處而來，想問個明白。啪！啪！趙洪英竄了上去掄圓了兩個大耳光。「你還敢頂撞政

府幹部。」說著又揚起了手，幾千人衆目睽睽之下，無可奈何地放了下來。「去去去！幹活去！」孫指導員連推帶喊把圍觀的人們趕走了。

「你還站著幹什麼？」孫指導員明知故問地喝斥著趙連海。「我，我還沒吃飯哪？」老趙結結巴巴地小心翼翼地解釋說。孫指導員母狗眼一瞪罵開了：「你還想吃飯？作夢取媳婦想得美死了。你散佈淫亂思想，你煽動不滿情緒，你對抗革命化春節，你，你他媽的想上房揭瓦造反？告訴你中午啃免了（啃——清河農場俗語吃飯的意思），下午照樣幹活，少幹一點晚上回去扒了你的皮，滾！」在我們中國，不管有罪沒罪只要被抓進公安局牢房起，就得承受警察的人格侮辱、精神摧殘、身心折磨、肉體懲罰而不能有絲毫的反抗，否則就會落個「死有餘辜」的下場。

小油雞從懷兜裏掏出兩個帶著體溫的包子遞到趙連海面前說：「都怪我跟你貧嘴，讓那個禿賊給扎了一針（噱打小報告），吃吧！有罪同當。」望著跟自己兒子不相上下的小偷，老趙苦笑著說：「你的心領了，再讓人家給扎一針就要連累你了。」小油雞一聽火了，沖著賊禿趙洪英指桑罵槐地說：「讓你扎針，非插瞎你的眼、捅聾你的耳朵、拉斷你的舌頭、砸斷你的腿，讓你看見、聽不清、說不出、走不了。」說完把包子塞在趙連海手裏。人心呀都是肉長的吧！但這肉長的心却有像孫指導員那樣的狠毒之心；像趙洪英那樣卑劣之心；像小油雞那樣拳拳之心。

遠處通向監區的大路上，移動著人群。依稀可見拖兒帶女的，肩扛手提包裹的。可憐天下父母妻女心呀！千里迢迢來探監，何況除夕之日面面相覷於牢籠，喜乎？悲乎？探監的父

老們發現了不遠處正在勞動改造的人群，不由自主地跌跌撞撞地奔去，誰不想早一眼看見親人哪！

盼老婆都盼瘋了的趙連海，直楞楞地注視著，焦急地分辨著，眼睛一亮，終於從越來越近的身影中認出了望眼欲穿的妻子，「啊，來了，來了！」他情出丹田地喊，久久的渴望驅使他忘記了監規，忘記了條例，忘記了一切，丟下扁擔奔了過去，「秀她娘！秀她娘！」邊跑邊嘶力竭地喊著不顧一切地猛跑……。突然後脖子被人死死地拉住，「你找死哪！」小油雞氣喘吁吁地大聲喊著，把趙連海拉住了，還差二步就要邁出四角插著紅旗的警戒線了。「你看！」順著小油雞手指的方向，一位自動步槍手按槍機半跪式瞄準著，只要邁出警戒線一步，追殺越獄犯的子彈就會奪膛而出的。「啊」，趙連海倒吸了一口冷氣，汗從脊樑骨縫嚇了出來。

原來當趙連海丟下扁擔跑去的時候，小油雞根本沒在意，沒有娶老婆的人，是體會不到思妻戀子的滋味的。然而孫指導員，由於革命工作的需要而不能回家團聚，却深深懂得忘情人的心裏，所以當趙連海起步奔跑的時候，不但沒有阻攔，反而向看押大兵高舉起攏著拳頭的左手，然後得意地陰笑著等待著。小油雞看見孫指導員向大兵發出「按越獄潛逃處理」的手式，心裏咚咚直跳，仗義勁油然而生，拚命地追了過去，總算……。

秀她娘，還有秀秀呼著粗氣跑近了、近了，望著丈夫呆傻煞白的臉，不知所措地問：「你，你怎麼了？」老趙魂沒附體，直瞪瞪地看著妻女什麼也說不出來。還是旁觀者清，小油雞盡量用緩和的語調解釋說：「老趙再多邁一步就沒命了，這是警戒線，你們再往裏邁就成

犯人啦！」「滾開」秀她娘還沒完全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就被大兵的喝罵嚇了一跳。眼看二等功槍響即得了，却被背後殺出的小油雞弄吹了。氣惱交加的大兵橫跨著自動步槍走了過來，小油雞知道來者不善，對秀她娘說了一句「有什麼話晚上見面時再說吧！」拉起趙連海頭也不回地向工地走去。

「她爹！」「爸爸！」妻子喊著丈夫、女兒叫著父親，聲淒淒音慘慘。「臭婆娘，叫什麼魂，給我滾！」還在為失去立功機會而耿耿於懷的大兵向母女倆發瘋似地罵。「同志，：沒等秀她娘說完大兵破口大罵：「誰是你的同志，你他媽的是犯人家屬，你他媽的是白骨精，你他媽的是騷貨。」如此的侮辱，如此的污辱，女人的恥辱淚漱漱而下。還是七歲的秀秀天不怕地不怕小嘴巴一噉一噉地質問：「解放軍為什麼罵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為什麼不照辦？」「罵人是輕的，解放軍還殺人哪！你再敢頂嘴捅死你這個狗崽子。」大兵凶神惡煞地端起賊亮的刺刀。可憐呀！我們中國這群「毛主席指到哪裏就打到哪裏」的御林軍，向孤兒寡女要威風英雄嗎？

趙連海和小油雞往回走著，奇怪了，還沒到收工時間，怎麼會集合呢？幾千人的隊列似乎就在等待他倆的歸來。「壞了，弄不好又得吃麵條！」（意思是挨摑）老趙清醒過來，心裏七上八下地捉摸著。

早已嚴陣以待的幫兇們，一窩狗般地撲向趙連海，扒去棉衣，撕開汗褂掛胳膊擡腿，五花大綁地捆個結結實實。「你們看到了吧！」孫指導員用殺雞給猴看的口吻一字一眼地說：「趙連海對抗革命化春節運動，散佈淫亂思想，煽動反改造情緒，最後妄圖越獄潛逃，被劉錦林捉獲未遂，押送禁閉室聽候處理。」一聽

被定成「企圖越獄潛逃」，趙連海急忙分辯：「我真沒想逃跑，我……。」可是蒼白無力的辯解却被埋沒在「打倒越獄潛逃犯！」「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震耳欲聾的口號聲中。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精通秦檜「莫須有」之道的共產黨的黨棍警匪們能把白的說成黑的，把黑的說成白的，不承認嗎？有的是高招讓你領教。



趙連海被送進禁閉室，吊在小院當中的水泥柱子上。這是專門捆犯人用的。殺進肉裏的麻繩，勒得胳膊由麻木而掏心扒肝疼痛，血在血管中憋得噁、噁一蹦一蹦就要炸裂，胸口一起一伏地喘不上氣，凍得由紅而紫而黑的身子起滿了雞皮疙瘩。「冤枉啊！冤枉，我真沒想逃跑呀！」老趙鼻涕淚水交織著哭喊。有誰一顧呢？空蕩蕩的小院裏，只有一盞電燈衝著

嗷嗷叫的西北風眨眼。「秀她娘啊！秀她娘啊！你們在哪呀！你們怎麼不來看我呀！」老趙絕望裏帶著渴望呼喊著妻子。

秀她娘拎著小包袱，秀秀一顛一顛地跟在媽媽後邊，「見到你爹千萬別哭啊！」媽媽叮囑著女兒，其實淚水就在眼珠子旁邊，線一斷就會掉出來的。馬上能見到丈夫的盼望，這線一樣細的希望，希望……。

灌了一肚子「二鍋頭」的孫指導員邁著雲彩步噴著酒氣在辦公室裏來回走著對站在面前的小油雞說：「你馬上寫一份見證材料，趙連海是如何越獄的，你是如何捉他的，馬上寫上交上來。」本來就生悶氣的小油雞乾脆地回答：「我沒抓過越獄犯，我寫不出來。」「什麼？」孫指導員醉眼惺鬆地盯著小油雞說：「你真不識抬舉，寫了見證材料，向上一送加他五年刑，減你三年刑，這麼好的事，你不幹？」酒後吐真言呀！我們中國那幫子專門按照主子旨意寫揭發檢舉呀、旁證材料呀、監視報告之類的奴才們，當你們再動筆害人時，捫心自問一下吧：對得起爹媽給你的人皮嗎？

孫指導員東倒西歪地闖進禁閉室小院。剛喝了悶心酒，也稱得上借酒澆愁愁更愁吧。就因為這幫犯人，害得春節有家不能回。「我不好受，你也別好受。」邊嘟囔著邊指著趙連海問：「想好了嗎？」「指導員，我真沒逃跑呀！」老趙像撈到一根稻草一樣乞求說：「真的，我發誓我是看見老婆了才跑過去的。」「你有老婆，我就沒有老婆？」孫指導員氣呼呼地反問。「我見不著老婆，你也別想見！」孫指導員順理成章地說。「求求您了，大過年的，讓我們見見吧！」老趙哭著、發自內心地哭著乞求。「行，你承認企圖越獄逃跑，馬上就讓你見。」孫指導員奸笑著引誘老趙上鉤。「我

真沒逃跑呀！真的，真的。」老趙恨不得把心都掏出來了。「想見老婆，你太美了，讓你見！」孫指導員咬著後槽牙從大衣兜裏掏出細鉛絲，左一道右一道繞在本來已綁著麻繩的光身上，然後用老虎鉗子解氣地邊吼邊緊鉛絲：「讓你見！讓你見！」「啊……」老趙慘叫著，勒進凍僵痛眼的肉裏的細鉛絲，咬肉般地錐心刺骨。「讓你叫！讓你叫！」孫指導員獸性發作地把老趙棉褲嘩地撕下一條布帶同爛棉套一起塞進了趙連海的嘴裏。「秀她娘！秀她娘！」趙連海喊呀！喊呀！堵住的嘴是傳不出聲音了。血漸漸地慢了，心間歇地跳了，死神一步一逼進了，不能死，不能，還沒見到老婆孩子哪，要挺住，要挺住。老趙掙扎著，心裏喊著：「秀她娘、秀她娘……。」

秀她娘領著女兒隨著探監的人群，剛要邁進張著大嘴的牢門，被滿身酒氣的孫指導員攔住了：「取消你的探監資格。」說著把母女倆推出大門。「爲什麼不讓見呀？」秀她娘吃驚地問。「不讓見就是不讓見，少他媽的廢話。」孫指導員說完朝辦公室走去，還要「二鍋頭」讓著他撒扒子哪。

突來的打擊，秀她娘久久地驚呆了，當她清醒過來時，猛地撲到電動鐵柵欄上發瘋似地喊：「秀她爹！秀她爹！」。秀秀也跟著媽媽喊「爸爸！爸爸！」。撕人心肝的呼喚迴盪在深遠的除夕之夜、迴盪在陰森森的監區、迴盪在……。淚再也忍不住了，掙斷小線湧出眼窩，淌過面頰，撒在衣襟上，秀秀也哭了。母女倆抓住鐵柵欄哭著喊著……。

「500分場」又多了一個死鬼。在一八九〇三號埋著老趙。秀她娘，你不是問「怎麼死的」嗎？你還記得有人曾對你說過：「早晚會知道的，而且會讓全世界知道的」嗎？

火撲蛾飛

五十年代歸國

留學生的命運

陳亞美

是小說？
是真的？
這

最近得知有關中國大陸留學政策的一系列變化，例如對於留學生申請的條件，出國進修

的年限、名額等，作了種種極不合理的限制，引起廣大留學生的反對，這是理所當然的。我作為五十年代歸國的留學生，願以我親身的經歷與體會，以及和我同時期回國留學生的遭遇，來看看我們這一代歸國留學生的命運。

我大學畢業後，去英國倫敦大學，後又去美國紐約大學唸書。我在紐約時，經常和一群約二十人左右，志同道合的朋友，每星期日聚在一起，討論國內外形勢，及個人的前途。我們是一群具有使命感，充滿愛國熱情而又十分單純、誠樸的青年。當時認為應該把我們所學毫無保留地奉獻給我們的祖國，所以當我們學有所成時（有的迫不及待地連學位也沒有得到），就熱情奔放地飛回祖國，熱切地希望能為人民服務。

五十年代，美國政府，特別優待中國留學生，希望我們留在美國，有馬歇爾計劃資助中國留學生。當時，如果我們願意繼續唸書，美國提供學、雜、生活費，如果我們願意工作，也可得到幫助。並且在後期，給所有的中國留學生以永久居留權。可是我們都拒絕了這一切，克服了種種困難，有的甚至繞道歐洲飛回祖國，熱切地盼望着能為人民服務。但是等待我們的却是怎麼樣的命運呢？

我一回國，就要求我寫詳細的自傳，滙報思想并敘述對中國的看法。隨後我被派往滬江大學商學院教書，不久就遇上院系調整和思想改造運動，由思政小組進駐滬江大學領導。當時的氣氛很森嚴，每天早、中、晚三班制進行學習，從早上八時開會直到晚上十點左右。初期聽大報告，一聽就是十數小時。記得有一次聽市委宣傳部長陳其五的報告竟長達十二小時及長期性，把知識份子批判得體無完膚。令人

啼笑皆非的是，陳其五不久即以資產階級思想嚴重，生活腐化而被開除出黨。然後進行小組討論。在思想改造運動後期，每一個人，都要做思想小結，交代自己的思想和歷史，進行自我批判，並互相批判，搞人人過關。有些人一次會通不過的，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進行。有的進行了七、八次會才通過。由於滬江大學是教會學校，大部分教授、講師都是留美歸國人員，所以進駐學校的思政領導小組，一進校就宣佈：全校的主導思想是崇美、親美的洋奴思想。全體教職員工必須以此為主導，挖掘自己的思想根源。其目的務使知識份子顏面掃地，弄得一無是處，從而乖乖地服從分配，以完成院系調整的任務。如當時經濟研究方面較有名望的謝教授，在詳細交代了自己的歷史、社會關係，批判了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後，仍然得不到通過。當時我自命不凡，認為我排除重重困難回國是難能可貴的。誰知領導小組進駐人員對我訓斥大罵一聲，說我利用資本家剝削來的錢——人民的血汗去留學。當人民在受苦受難時，我不在中國也不去蘇聯學習，却去美國學習，因而這是典型的崇美、親美的洋奴思想。我不能接受「洋奴思想」這頂帽子，但在多次通不過的情況下，在大家的「幫助」和領導的不斷「教育」下，我只能痛哭流涕，無可奈何地接受這個強加於我的結論。這次思政運動長達半年之久，每天三班制學習，緊張的氣氛令我感到窒息。由於長期休息不足，心情不愉快，久而久之得了氣喘病。

思想改造完畢後我分配在一個大學教書。一年後領導上就讓我離職半年，參加革大政治學習班。學習內容是聯共（布）黨史，重點是斯大林對布哈林、托洛斯基等「階級敵人」的鬥爭。參加這個學習班的成員有民主黨派成員

、無黨無派人士、資本家、教師、起義人員、歸國人員、小業主、少量黨員、中、下級幹部等。學習成員集中住宿，共同包伙，星期日可讓回家。除聽大會報告、討論聯繫實際外，每週有一次生活會，互相幫助，提意見。這種集體生活使我不習慣，我的室友是一位比我大十歲的小學校長，是一個典型的左傾積極份子，對我常發號施令，對我的談吐、待人接物的方式（如說謝謝，對不起）很看不慣而常批評我。我日夜與她相對，如坐針氈，坐立不安。同時，回想當初，我的行動也很愚蠢而可笑。我不知天高地厚把因嫌木板床太硬而把家中的彈簧墊子搬去；另外八人一桌吃飯（伙食不錯四菜一湯）但不採取分食制。我無法適應，只好乘大家坐下吃飯，還未動筷之前，趕快拿一點，靠近我座位前的菜，匆匆地吃半碗飯，說聲對不起就走了。餓時吃些家中帶來的或在小賣部買的零食。結果我當然被批評為嬌小姐，吃不慣集體伙食，在家一定每天大魚大肉的吃，我無言以對。這一次的改造比上一次更深入，包括個人的生活領域，自己平時的一舉一動都得進行改造。

參加革大學習班後不到一年就遇上肅反運動。由於我父親是資本家，叔父是李宗仁的參謀長，中將銜（至死一直在台灣）母親及六個兄弟姊妹均在國外，因而中共對我的回國動機十分懷疑。因而在肅反時，我理所當然地成為運動重點，遭受隔離。人事處長再三逼問我說：「像你這樣的人，在國外是路路通順，為什麼要回來？」每次審問我提出許多侮辱性的問題，如去過幾次英、美大使館？說些什麼話？交給你什麼任務等？並要我詳細交代社會關係。由於我是抱着赤子之心回國的，心中沒鬼，有什麼就寫什麼。結果更增加對我的懷疑，我

足足寫了二個多星期，反復交代。最後做結論時，人事處長對我說：「你這個人，說你沒問題吧，社會關係如此複雜，接觸範圍如此廣泛，國外有的是路，却一定要回來，叫我怎麼說呢！」那時我萬萬沒有想到對我的結論竟然是特務嫌疑犯。這件事是在文革後期，我平反後，專案小組的領導告訴我才知道的。他說在經過十萬八千里奔走調查後，沒有任何事情，任何人可以證明這個結論，所以他以推論方法推翻了這個跟隨我長達三十年之久的荒謬結論。

反右時我很幸運沒有參加，那是因為我和我丈夫長期分離，我利用當時中央號召歸隊運動（即人才歸本行，做本行工作）要求歸隊，回上海重行分配工作。由於我檔案中有「特嫌」這個可怕的材料，所以沒有單位敢要我。等了九個月後，一所高等院校英語組需要人，才勇敢地要了我。那時反右已近尾聲，我才平安地渡過這一關。但回上海後不久我丈夫却又被調離上海，從此一直到文革他被迫致死，再也沒能回上海工作。

我的這個檔案資料使我受盡苦難，無論是在日常的工作中或在歷次的運動中，使我慘遭種種無情的打擊。具體領導英語組的外語系副主任，是一個對英語一竅不通只會寫二十六個英語字母，但却掌握全系人事大權的女強人。她當然看過我的檔案材料，因而對我十分鄙視。除了經常批評我外，還常給我上課。在外語系升級漲工資好事情從來輪不到我，苦差事却要我一馬當先。我除了參加季節性的夏種秋收，下廠鍛鍊外，還被長期下放農村，把課堂搬到農村去辦。南方的農村，冬天又潮又冷，又沒有火，住的房子漏風，有時還漏雨，泥地，下雨天一片泥濘。睡的板床總是濕濕的，我剛到農村在幫助搬運數十張床舖入屋時不慎摔了

一跤，足踝骨受傷，不能走路。看醫生按規定一次只能開三天病假，在農村也不能每三天來上海看一次病，這樣慢慢地拖着，就得了關節炎，而氣喘病也經常發作，因而也沒有教什麼書。那位副系主任却早已溜回上海。我們在鄉下呆了十個月，系領導最後發覺在農村結合生產（摘棉花等雜活）內容，搞英語教學是荒謬的，就命令我們回來。

一九六二年我患嚴重的氣喘病及神經衰弱等各種疾病，長期請病假近三年後，開始半工作，可不到一年就碰上文化大革命。這次更是劫數難逃。我被隔離審查達十個月之久，蹲牛棚三年，遭受到無數次大會、小會批鬥。數度被抄家，又被送到農村達數月之久。而我丈夫被隔離期間，突然死亡，那當然是「畏罪自殺」，被定為「反革命份子」連骨灰也不能留。我這個「特嫌」又加上了「反革命份子家屬」的頭銜，除了自己受苦受難外，更是遺害於孩子，我小孩常遭鄰居小孩及里弄紅衛兵的欺侮，甚至毒打，使我痛不欲生，我所受到的身心摧殘真是一言難盡。

與我同時或差不多時候回國的二十多名留學生的命運也與我差不多。在反右時有七名（近百分之三十）被打成右派。如刁××在紐約唸書時，是紐約分部中國學生會的主席，為人熱誠，正直，敢說敢做，在我們一群人中是一位非常得人心的人物。他父母兄長都在美國，但他一拿到碩士學位後，就帶着女友，飛奔回國，安家落戶，真心誠意地為人民服務。由於他剛正不阿，在反右中被打成極右份子，發配到北大荒勞動改造。在冰天雪地中，他努力勞動，願意改造思想，希望早日摘帽，可是誰有能力幫他呢？由於勞動强度高，營養不良，又吃不飽，體力日衰……正在毫無辦法解脫危

境時，他向海外的兄長求救。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這個願意放棄美籍，回祖國為人民服務，因而獲罪的留學生，却必須仰賴於他那位不願回國而在美創業有成的美籍兄長的庇護（向中共求情），才能離開幾乎致他死亡的北大荒，回到了美國。我在美國見到他時，他微笑着說：「與你相比我還是幸運的，在一生中只浪費了回國的十年時間」。其他被劃為右派份子的歸國留學生，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陳××與張××是我們一群中最年輕、最漂亮的一對。雙方的父母兄長都在美國，生活富裕。陳××是我見過的最美麗而又聰明、端莊，對人體貼、溫文爾雅的女孩子。她貌如桃李，但性格却堅強無比。她富於使命感、事業感，要立志成爲一名小兒科醫生爲人民服務。她與小張是理想主義者，具有強烈的獻身精神，對前途充滿美好的幻想。當時小陳在美國大學唸書時，只有十八歲。由於熾熱的愛國精神的驅使，這一對金童玉女不聽父母的規勸，手攜手地歌唱着飛馳回國。反右運動開始後，小張由於從小在美國生活，說話自由是他的習性，結果被打成右派，開除學籍，調離原地與他愛妻分開。他被派在上海附近的浦東勞動改造，整天翻地。這位一向自尊心極強，自視甚高，非常瀟灑的小伙子，受不了這個沉重的打擊，日夜思念妻子及父母。遙望未來，前途茫茫，理想破滅，萬念俱灰。在傷心絕望之下，自己結束了生命。這時他才二十多歲。我一九七八年去北京上訪，請求爲我丈夫平反時，見到了小陳，她已成爲一名很出色的小兒科醫生了。但由於過渡的疲勞，長期帶病工作，營養不良，經濟負擔重，才四十多歲的她，昔日的容光煥發已全部消失，只是大眼睛，端莊秀麗的輪廓，依稀可見。她消沉地對我說：「多年來

我拼命地工作，希望能得到黨的承認與接納，但我無論怎樣賣命，無論如何積極，我總是圈外人，總是被批判的對象。我現在想透了，準備帶女兒出國，供養她讀書，這樣也就心滿意足了。」後來她果然毫不回頭的走了。

當時被劃爲右派的還有MIT的尖子李××，當他拿到博士學位後，工作還不到二年，被他在國內的導師一聲叫喚，他就馬上辭退了這兒美國導師所提供的豐厚薪金職位及優良的研究條件，束裝回國。由於當時中國實行「一面倒」、「倒向蘇聯」的政策，而李××則主張採用最先進的美國技術來改進中國的石油工業，因而被斥之爲崇美反蘇，也被定爲右派，降職降薪，擱置一旁不用。雖然他學有專長，能倒而復起，仍能回美做研究工作，但是白白浪費了整整三十年的寶貴時光，一個人能有幾個三十年呢？！

我們中餘下的，能逃過反右關，却無法避免文革的衝擊。在文革中我們都無例外地遭受種種難以形容的苦難與煎熬。如我大學同學將××，是全班最優秀的榮譽生，大學畢業後赴美，得博士學位後，爲了獲得必要的工作經驗，在一所有名的化學公司做研究工作二年。由於他要衷心回國爲人民服務，所以在美國堅決不結婚，以免他的太太不願回國過比較艱苦的生活。五十年代中期他只身回國。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却以「特嫌」被隔離審查，掛牌，罰跪，經年累月遭批鬥，逼他承認爲「國際特務」，哄騙他說，「你承認了就可回家」。但他堅決不承認。在長期隔離後，實在找不出「特嫌」的痕跡，最後才放他回去，但他被扣薪，住房被沒收，全家四口擠在一間房內。直到我們另一位留美同學楊××（他當年沒有回國，現已成爲美國一所有名大學的終身正教授）要

回國講學，提出要看望蔣××時，才讓將搬回二間一套的住房，并爲之油漆一新。事後我祝賀他喬遷之喜，他苦笑着對我說：「一切雖然很好，已有二間房，恢復了工資，并獲得了「解放」，脫去了「特嫌銜」，但我的青春年華是在搞軍訓，搞清潔衛生，打麻雀，滅蚊蠅，下廠鍛鍊，下鄉搞四清，文革十年中虛度了」。我看看他灰白的頭髮，額頭的皺紋，衰弱的身體，回憶當年在美國他那風華正茂，意氣風發的形象，前程萬里，傲視寰宇的氣概，不禁爲之黯然，夫復何言？

顧××回國後在科學院工作，文革時受不了逼供與體刑，又沒有美籍華人拯救，就胡言亂語製造了幾乎包括全體歸國學生在內的「反革命集團」，其株連之廣，爲害之深，嘆爲觀止。歸國留學生都叫苦連天，而顧××也爲此是我們一羣人中最後一個獲「解放」的。

文革中最令我悲傷不已的是同學，摯友楊慧的消逝。楊慧是我中學、大學時校中有名的才女，女狀元，她以最高分在聖約翰大學畢業，留校執教，不久即成爲該校最年輕、最受歡迎的副教授。後赴美在哥倫比亞大學得學位後，即在聯合國秘書處做研究工作。她與夫婿唐迪感情極深。他們是虔誠的基督教徒，爲人善良、慷慨、好客，處處爲別人打算，唐醫生濟貧扶弱，深得病人的嘉許。五十年代初期，楊慧即辭退聯合國豐薪職位，放棄該組織提供的二年一次到世界各國旅遊的良機，及美國舒適的生活享受，與夫婿一起奔赴回國。楊慧和我一樣，經歷了思想改造、院系調整、肅反等運動。她與以往有很大變化，她衣着樸素，冬天穿一套很大的棉布列寧裝棉襖褲，并常常以無黨無派人士身份作報告，提出自己改造思想的體會等。可是在文革時，楊慧由於曾在聯合國

秘書處工作，她的專案小組把她當作聯合國秘書長來批判，進行無窮無盡的鬭爭、迫害。夫婦倆無法忍受，終於雙雙自盡。唐醫生後來雖被搶救過來，但是目擊愛妻之消逝，從此失去精神的依托，聽說他已精神失常了。

與楊慧情況類同的還有李××，他是辭退聯合國秘書處工作後回國的華僑留學生，分配在外交部工作。文革時在有工人參加的小組學習會上，工人聽了他的檢查後，認為李××為聯合國秘書長，出於對所謂「階級敵人」的痛恨，他命李××低頭認罪，並對準他的小肚子猛力踢去，李××當場斃命。當然這僅是文革中的一個小插曲而已。

最令我難以忘懷，一想起他倆就令我憂戚難當的，是楊友鸞與林××夫婦。楊當時是波士頓地區留學生中的佼佼者，有名的才女。她美麗、高雅，中英文極佳，能言善辯，大家都喜愛她。林××是固體物理專家，英俊而才高。他倆是才氣橫溢，器宇萬千，具有崇高信念的一對。五十年代初，他們興高彩烈，熱情洋溢，迫不及待地奔回祖國，希望為國出力。楊在外文出版社，工作傑出，常被嘉獎，大學問家錢鍾書對她也很讚賞。林××在錢學森領導下肩負國家重要軍事工程，長年累月在邊疆地區辛勤工作。他的耀眼的才華，出色的組織能力，忘我的犧牲精神，對我國的國防軍事工程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並得到科學院領導的公認與贊賞。文革開始後不久，林即被召回北京作為審查對象，在回京的火車上，一隊紅衛兵要乘客報出身，把坐在林××對面的一位自報資產階級出身的姑娘，嚴加鞭撻，當場致死，狀態極慘。林心抱不平，難以容忍這種事態的存在，又無能為力，對他精神刺激很大。回北京後，遭隔離。寫不完的交代，作不盡的檢查、批

關，軍隊專案組人員的野蠻、專斷，使他受盡屈辱與折磨。後來據說在一個風雨交加，寒冷的夜晚，林××破門而出，第二天清晨在遠離他被隔離的地點的雨水淺溝中找到了他的屍體，就定為「自殺」，戴上「反革命份子」的帽子。但許多人認為是「他殺」，因為林××沒有自殺的理由，更沒有留下遺書，而且在被隔離期間有人看守，不大可能「破門而出」。況且自殺何必一定要找淺水溝，溝淺也淹不死人。疑點雖多可是誰敢提呢？！

一九七八年我在北京時去看了楊有鸞。她已精神失常（她沒有孩子），但偶而還有清醒的時候。當我進入她房時，她背對我，正在專注地凝視着佔有半面牆壁的巨幅林××的照片。我輕鬆的呼叫她的名字，但她毫無動靜，我沉默地等了很久，她才回過頭來看我，開始她瘦削的臉龐沒有任何表情，但是慢慢地她的秀美深沉的大眼睛轉動了，她認出我了，她緊握我的雙手，修長的睫毛不停地跳抖着，淚水直往下流，我無言以對，傷心地與她同泣。過了一陣子，她背過身，又去注視牆上的照片，而完全忘記我的存在。我只好輕輕地退出。

在這次拜訪後，我沒有機會再見到她，但得知由於她悲傷過度，以及她強迫自己忘却過去而只顧記得林××，她的智力已衰退到只有小學一、二年級的水平。她的妹妹有時陪她出來散步，回家時在離家僅十步之地，友鸞會堅持要雇一輛出租汽車載她回家，或提議要買什麼玩意兒等要求，不滿足她，她就任在人行道上躺下，打滾，取鬧，……唉！可憐的人兒，是誰把你這位美麗、高尚的才女摧殘成這等模樣兒？

我們這批人中的苦難真是說不完道不盡，但最令我惋惜與感慨萬分的，是郭××。他過

去是我們這群人的領頭，在他家每週的聚會，是他組織，討論提綱由他起草，大家有不和意見他調解。誰有困難他幫助。他為人剛毅堅強。回國後郭××在宗教部門工作辦事穩健而妥當，因而不合上海左王柯慶施的胃口，而常遭訓斥。後來柯憑藉藉口與污蔑，堅持要把他打成反革命及腐化墮落份子，並組織專門小組經常對之日夜批鬥。一年之後，郭××被搞得筋疲力盡，無法應付，只好無可奈何地退而求其次，承認為壞份子。他被戴上此帽後，被革職降薪，分配到郊區一個小廠圖書館工作。文革時他和他妻子又常遭暴虐，被鬪得眼青鼻腫，直到文革後期才獲平反。在我離開前，他來看我，近三十年未見他已面目全非，但一如以往，平靜而堅定地對我說，他一切問題都已解決了。目前正在和癌症作鬭爭……

我們這些餘下的幸存者，在經受了地獄般的煎熬，吃盡千辛萬苦，受盡萬般屈辱後，雖然保存了老命，但對我們這一群，其中許多當之無愧為我們一代的菁英。我們失去了生命中最寶貴的青春，虛擲了我們辛勤工作，刻苦學習而得來的寶貴才華。滿腔熱血，却報國無門。我們中許多人所受到的精神創傷無法彌補，這是我們一代的悲劇。

今天中共抱怨留美學生滯留不歸，不免引起我對已逝的親人、摯友的懷念與愁思。前夜風雨交加，把我從睡夢中驚醒，回憶夢中丈夫向我招手，楊慧奔向唐迪，友鸞在地上打滾的情景，不禁腸斷肝裂淚滿面，而喃喃自語：「如果時光能倒流，青春能重現，未來能先知，命運能預卜，我們這些昔日的愛國狂熱份子，有那一個會熱情奔放，毫無顧慮地飛回我們過去夢寐以求的祖國呢？」我反復地問自己，窗外夜雨濛濛愁絲萬千，我默默無言。

與王亞軍

談西藏問題

丹會朗杰



看完您的文章「也談西藏問題」(《中春》八八年四月號)之後，覺得應該和您談談您所提的那些問題。因為我從文章中可以看出，您是不屬於那些明知西藏的實際情況，却在說假話的政客。我在西藏認識很多漢族幹部，他們大都像您一樣，過去對西藏的歷史文化和人民

的實際生活一無所知。到了西藏之後，又由於文化語言的差別，加上中共對人民言論的嚴格控制，因此，對於他們來說，中共當局的宣傳就成了瞭解西藏人民情況的唯一渠道。而這些為了某種政治目的而進行的宣傳，常常把事實歪曲的甚至有些可笑。例如，您參觀過的擺滿毛骨悚然的刑具的布達拉宮，這裡昔日是達賴喇嘛的宮殿。可怕的是這種宣傳在那種社會裡變成了僅有的「歷史知識」。

這裡首先需要說明的是，如果，由於阿沛晉美是貴族的後裔而您覺得不應該信任的話，那麼我是一個出生於貧苦家庭的西藏人。也許您聽說過在拉薩有個叫八則雪的地區，那裡過去住着一些從康區移民來的窮苦貧民，一九五九年之後，雖然憶苦思甜的運動中，我們的一些鄰居可以出出風頭，但平時還是被中共當局遺忘了的角落。像您這樣的漢族幹部是很少到那裡光顧的，更不用說那位大幹部想瞭解我們在過着什麼生活。即使像這樣一位漢族幹部帶着一個翻譯員想瞭解我們也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不願意也不敢冒這個險。

您認為阿沛晉美的文章是憑第二手資料寫成的，而我却從您的文章中發現，您對西藏的瞭解僅僅是一些一眼可見的表面現象。當然，要求一個連這個民族的語言都不懂的人真正瞭解這個民族的歷史文化和心理是不現實的。我感到可惜的是，即使對這些表面的現象，您也沒有加以認真思索過。

在從格爾木通往拉薩的青藏公路上，通過車窗您看到了一輛載着內地物資的車隊源源入藏，而出藏的車隊大都是空空如也。「您所看到的是真實的現象，我在那條公路上不知跑過多少次了。然而我想請問您可曾在長江源頭的茫茫河畔停下來，走進那些在寒風中掙扎的牧

民的帳篷沒有？我想您沒有過，而我們却去過很多次。當你走進這些帳篷時看到的不是這些車隊從這條路上運來的物品，而是他們自製的一些原始生活用品。看看牧民帳篷裡的生活用具，看看離帳篷只有幾十米遠之外的那條公路和那些源源不斷的車隊，我不能不懷疑修建這條公路的作用和目的。且不說這些偏僻的地區，即使在拉薩城裡，在我們藏人聚居的地方，居委會從來沒有給一戶人家發過一張購買這些「緊俏商品」的證券。如果有人能真正地調查的話，我想這條公路給西藏人民帶來的痛苦一定比快樂多百倍。因為殘酷鎮壓西藏人民的那些武器也是從這條公路上運來的。

在西藏您還聽說和看到了「飛機場，發電廠，水泥廠，還有西藏大學，西藏民族學院和西藏師範學院」(西藏師範是西藏大學的前身，西藏大學成立之後不存在什麼西藏師範)，從而斷定中共在西藏的所做所為是為了西藏的社會進步和發展。請問過去日本人在慘無人道地蹂躪中國人民時，不會也在中國的土地上建過許多比西藏水泥廠更大、更有用的工廠嗎？如果您認為用千百萬中國人民的鮮血換來的幾座工廠是一種值得肯定的社會進步的話，我當然不敢說中共當局已殺了那麼多西藏人，因為在西藏自治區境內畢竟還有兩座水泥廠和大學。可惜的只是，昌都水泥廠建在反映四千多年前的原古西藏人的文化生活的卡若遺址上，而所謂的西藏民族學院却設在遠離西藏的咸陽，目前校內的藏族學生寥寥可數。

談到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您舉了一個什麼青海省的「瑪多自治縣」。儘管在青海省沒有什麼「瑪多自治縣」，但我知道您指的是果洛藏族自治州。瑪多縣。有趣的是，當您從「人民日報」上看到瑪多縣的人均收入達四百

元的消息時，我正奔波於黃河源頭的瑪多一帶。在那裡我所看到的不是人均拿着四百元的幸福笑臉。相反，我却看到了一個難以相信的現象，無論走進那個牧民的帳篷，很少能見到三、四十歲以上的男人。後來果洛州政府給我介紹情況時才瞭解到：一九五六年果洛的人口是近十三萬，而到一九六三年時只剩下六萬。我曾希望這一半的人是逃到印度去了。但後來我到印度時瞭解到，能逃到國外的果洛人很少。前些日子我在紐約城裡的一位當年從瑪多縣逃出來的果洛人聊天時他告訴我：當年他們離開瑪多縣時有四千多人，到了拉薩時只剩下兩千多人，而到印度邊境上時除了他們七個人之外全都死了。這個就是瑪多人民的過去和現在。難道這四百元的收入能彌補他們失去丈夫和父親的痛苦嗎？不，做爲一個藏人是永遠不能的。

雖然中共當局也正式宣布所謂的「四最」提法是錯誤的，但您仍認爲西藏是「最野蠻，最落後，最黑暗和最殘酷的」。因爲您在「布達拉宮的刑具室裡」看到了許多可怕的刑具。在西藏實行新的政策之後，我的一個朋友曾對這些刑具做過比較細致的研究，我還曾幫她查找過一些歷史資料，結果她發現這些收藏在西藏展覽館裡的刑具（我想您參觀過的可能是這些）大部分是一七二七年清兵入藏後，隨軍帶的劊子手處死阿·龍，加三位噶倫之後從中國內地傳到西藏的。其中許多刑具的名字中仍可以發現漢語的原音。當然這裡我想說的不是這個而是中共當局爲了顯示自己是西藏人民的救世主而歪曲西藏歷史的實際情況，捏造許多駭人聽聞的假故事，使許多天真無知的人的腦海裡留下可怕的印象。中共天天宣傳說，在舊西藏的社會裡「農奴主」隨便挖眼睛剝手脚。說

實話，您在西藏去過很多地方，可曾見什麼沒眼缺腿缺手的人嗎？在西藏流傳着這樣一個笑話。一個小學生問他的爺爺：「人挖眼睛之後立即會死嗎？」「我想不會，有些人生下就沒有眼睛。」爺爺不加思索地說。孫子又問：「那麼那些被三大領主控掉眼睛的人都到哪裡去了？」爺爺看了看他的孫子，便小聲地說：「都跟着達賴反動集團逃到印度去了。」我想如果您有一些知心的藏族朋友的話，他們一定跟您講過這個笑話。

最後我想告訴您的是，您猜想阿沛晉美可能沒有在西藏生活過，而您做爲一個「跑了幾十個縣，結交了許多藏族朋友的」地質隊員，應該給阿沛晉美介紹一些西藏的「真實情況」，甚至一些西藏的歷史知識。然而事實并非如您猜想的那樣。如果您做爲一個對西藏的礦藏有興趣的地質隊員會到過西藏的話，我相信您會按從美國買來的衛星照片上顯示的不同顏色，曾在荒無人烟的高原上跑過許多日子。您也一定走進過一些牧民的帳篷；還可能通過翻譯員從牧民手裡雇過托地質儀器的牦牛（我哥哥是個地質隊的翻譯）。然而，做爲學習和研究西藏歷史文化的阿沛晉美和我，懷着對西藏人民的愛和西藏文化的情，曾踏遍西藏的山山水水。我們的路線不是按照衛星照片上的顏色，而是千百年來西藏人民的生活足跡。我們走進那些牧民的帳篷，不是由於好奇或雇馬雇牛，而是想瞭解他們的心。我們的工作使我們有機會走進州委縣委的辦公室裡去瞭解中共對人民的政策。又有機會深入到人民中瞭解他們的實際生活。我想正是這種特殊的經歷，使一個被中共政權爲了統治西藏而在奶水裡養起來的人也不能不挺胸爲大多數西藏人民的悲殘命運而鳴不平。這正是阿沛晉美文章的可貴之處。

又一家

China D'Lite Restaurant

環境清靜 · 交通便利 · 免費停車

14107 ST. GERMAINE DR.
CENTERVILLE, VA
TEL: (703) 830-6565

誠徵：週末兼職打雜工近馬大
意者請電 953-8766

14005 LEE JACKSON HIGHWAY
CHANTILY VA
TEL: (703) 631-4512

14252 BALTIMORE AVENUE
LAUREL LAKES CENTRE
LAUREL, MD 20707
(NEXT TO CINEMA 8)
TEL: (301) 490-8111
OR (301) 490-8112

被中共掩蓋的 「民盟」軍事史

中國革命同盟國外特派組

閱讀貴刊四十四期魏桑莉的專文「中國民主同盟的啓示」之後，我們想借貴刊一角，對中共故意掩蓋的「民盟」的一段歷史，做一個介紹。目的是一是選「民盟」真相；二是讓大家一起進一步認清中共的本質。

一九四六年，中國民主同盟爲促進中國早日實現民主，當年夏天在上海南海花園飯店成立（當時是秘密的）了民主同盟軍事組，各民主政黨的主要者都出席了這次會議（農工、九

三、民革、民進、民建、致公等）當時的著名者：有梁漱溟、沈鈞儒、史良、章乃器、羅隆基、章伯鈞、王紹鏊、黃炎培、王造時、張雲川、王平章、姬明心等人。秘密推舉黃競武、王平章擔任民主同盟軍事組長，立即展開地下軍事活動，建立武裝部隊，配合中共行動，協同共軍作戰，促進全國早日成立民主政府。

一九四七年內戰開始，民主同盟軍事組爲擴大軍事行動，在上海愚園路張公館秘密成立中國民主同盟軍事聯合行動委員會，同時成立了中國國民黨軍事行動委員會、中國農工民主黨軍事行動委員會，宣佈迅速建立武裝，配合共軍或獨立作戰。地下武裝番號爲民主聯軍。總指揮：王平章，以下設立各兵團：民革兵團、江南兵團、民主聯軍第一兵團、第二兵團、國民革命軍第三軍等。

由於各民主黨派的政治活動，同盟的軍事組的迅速擴建，和武裝作戰的配合，使共軍得能迅速佔有長江下游各省。例如江西有國民革命軍第三軍配合，浙江有民主聯軍的配合，湖南有民主聯軍的配合，江蘇有江南兵團、民革兵團的配合，上海有民主聯軍一、二兵團的配合。

然而，當中共佔有上海之後，就改變了策略，首先對民主聯軍一兵團下手，因爲民主聯軍總指揮王平章兼任一兵團司令，實力最強。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二日，民主聯軍一兵團直屬第一師強佔上海市，駐軍南市海會寺，五月二十五日，一兵團在上海全市進行了歡迎中共解放軍解放上海的政治宣傳，當時上海申報、大公報、時勢新報，都登有一兵團的新聞報導。五月二十八日，中共解放軍第九兵團派兵包圍一兵團直屬第一師駐防部隊。兩軍相持，

有一觸即發之勢，中共九兵團司令宋時輪及軍政人員等，邀請民主聯軍總指揮兼一兵團司令王平章及軍政人員等，開會協商，並要求王平章對民軍訓話，不要誤會。並請王平章停止軍事行動，所有民軍統一編入中共部隊。如有不願編入的，可自行遣散。

事後，中共分化民主同盟，使原統一在民主同盟內的各政黨相繼獨立，分成八個政黨。民主同盟不再統率各政黨，這就是後來的農工民主黨、民革、民建、民進、致公、九三、台盟、民盟。又利用民盟內部的投機者、投降派，攻擊民盟的軍事實力派。中共在政協中，對民盟政客一律提名，凡有軍事實力者，一律排除，並羅織罪名加以迫害。例如：民主聯軍二兵團司令張雨霖、一兵團副司令宋吉泉等人皆被殺害，而民主聯軍總指揮王平章，予以軟禁。反右後，又羅織罪名加以迫害，囚於獄中。總指揮的部下，即凡民主同盟的軍派人物，屬軍事聯合行動委員會的全體軍政人員，都氣憤不平。民主聯軍的軍政人員大部分遭受迫害。凡留下的，極少數秘密轉爲地下。有轉移到國外的。有仍然留在國內鬭爭的。

附：中國民主同盟軍事聯合行動委員會簡況：

中國民盟（簡稱）軍事聯合會（簡稱）前身是民主同盟軍事組，成立於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七年擴建爲軍事聯合行動委員會。

一九四九年鑑於中共吞嚥民主同盟軍事力量的史實，中國民主同盟革命派繼承軍事聯合行動委員會之民主救國大志，改軍事聯合行動委員會爲革命行動委員會，中國文革浩劫時，因中共各地有革命委員會而更名為中國革命同盟。

裁

李鵬之言

何邊仁

在七屆人大後的記者招待會上，有一段精彩的問答。

美國廣播公司：最近中國領導人對一些知識份子採取壓制態度，不允許方勵之先生公開談論他自己關於如何搞好中國事情的想法。你作為總理是否會允許方勵之公開談他的思想？

李鵬：我不認為中國政府對方勵之先生採取壓制的政策，我們將允許方勵之先生和包括中國一切其他公民

在法律範圍內發表他們自己的意見。

李鵬的回答非常之妙。他壓根否認「壓制」了方勵之。因為方勵之和其他所有中國公民一樣，有着「在法律範圍內發表他們自己意見」的權利。李鵬的答復是「正確」的，在中國，每一個人都有喊「毛主席萬歲」的權利，每一個人都有發表「和黨中央保持一致」的意見的權利。同時，每一個人都沒有發表不同意見、發表「不和黨中央保持一致」的意見的權利。怎麼能指責「黨」「壓制」了方勵之呢？黨不是對每一個中國人都充分「一視同仁」的嗎？黨哪裡是在壓制一個方勵之，它分明是在壓制每一個中國人。

過去毛澤東說過一句「和尚打傘——無法無天」，讓人家抓住了把柄。現在的領導人則處處講「依法辦事」。這還不容易，把領導人說的話寫成法律不就成了。在中國，立法、執法、司法都是同樣的一小批人，他們所作的一切，按定義就都是合法的，誰要是不同意他們的意見，按定義就是非法的。問題就如此簡單。八六年冬大學生上街遊行——遊行權利可是上了憲法的，當局馬上予以壓制，而且是「根據法律」予以壓制。法律在哪兒？很抱歉，還沒制訂。沒關係，趕制它一套就行了。果然，幾天之內，一個由公安局(!?)出頭的「遊行法規」就出來了，於是，取締學生遊行也就成了一樁維護法制的神聖行動了。

有些好心的朋友對我們說，你們批評中國共產黨搞專制，很好，但你們應努力爭取合法鬭爭的形式。這就難了。迄今為止，世界上還沒有一個人找到批評共產黨的「合法形式」呢！因為共產黨把對他們的任何批評——不論你採取什麼形式——都視為非法。什麼是法？法

是「統治階級意志的表現」。有了這個「法的階級性」一說，要想批評共產黨而又不「非法」，真是難於上青天！

「法」的觀念被歪曲，由來已久，要澄清，亦非一日之功。

三年前，中央電視台播出一條引人注目的新聞，中國人民大學一位法律系副教授被請入中南海給我們的領導人們上法制課，出這個點子的人很可能是那位雖然沒讀過幾天書但還好學的胡(前)總書記。可惜的是這個在中南海的法制課却很快就沒了下文。據瞭解，這位被延請的人大副教授，實在是沒什麼水平。他講了一大套，無非是法的階級性的陳詞濫調。估計這也是法制課無疾而終的一個原因——中南海諸公一聽：原來如此，以後把我們的指示通統改稱為法律就好了。一旦悟透了這點道理，其餘便可無師自通，還上課幹什麼？

在中國，懂得「法」的真義者大有人在。這兩年思想解放(應該說是出版界略有放鬆)，也出了幾本有份量的書(只是海外輿論界並未予以重視，由此觀之，海外學術界、輿論界對大陸較深層的變化動向仍是知之甚少，他們往往只被表面上花俏的東西所吸引)。據筆者所知，一本是老學者，北大法律系教授龔祥瑞的「比較行政法研究」，還有一本是青年學者、人大法律教師梁治平和其他幾位年輕人合著的「新波斯人信札」。比較起來，後者更通俗易懂，且十分注意結合中國大陸人的思想實際，是一本深入淺出、老少咸宜的啓蒙讀物。中南海諸公若能抽空讀上一讀，相信會有所收穫。當然，我們也不敢抱有太多的期望。畢竟，搞民主、搞法治這一套，還不僅僅是個知識的問題。■

多向北京施加壓力

愚民

傻徐的文章寫得好，愚民讀了很贊同。

大陸搞經濟改革，常常犯「鞭打快牛」的毛病。你幹得越好，政府找你要得越多，所以，誰也不肯當「快牛」，寧肯當懶牛，甚至當「病牛」、當「死牛」。君不見「破產法」一公佈，一大批單位蜂擁而上申請報破產。

政治上也是如此。海外的學者、政治家們很多，個個都有匡時救世之志。由於名氣大，兩岸的當權者那裡都搭得上話，於是乎，飛來飛去，今日東來明日西，對台北、北京的黨政要人們會談、建言，煞是風光。但是不久大家就發現，和北京方面說話好比對牛彈琴，白費力氣。他不理你，你毫無辦法，大陸又沒有獨立的報紙，你講的話，不管如何頭頭是道，只要當政者不樂意聽，也就沒有一家報紙能夠發。在海外發表吧，他那邊馬上就給你扣一個「反共」帽子，從此後北京就去不成了。反觀台北這方面，情況却是不同，且不說你的建言當局有時會接受，便是不接受轉而登在報紙上，讓老百姓看了叫好，紛紛引用，並向當局施加壓力，造成一股小小的聲勢。那也很有意思。這樣一來，指責台北的人越來越多，批評北京的人倒越來越少。這雖不是欺軟怕硬，也不是「雙重標準」，但畢竟有失公平。

誰都知道，當今中國之事，主要麻煩在北京那邊，在北京方面連半點民主都不講。共產黨連魏京生、王希哲、楊巍、中國之春這幫年輕書生都不放過，居然還有人相信他願意和國民黨和平合作！希望中國和平統一、希望中國自由繁榮，我們就必須首先要首肯、主要地向北京方面施加壓力。什麼時候大陸內部也有了反對派，什麼時候中國的事就好解決了。

建議海外學者政客

學朱高正·到北京去爭民主

／涂松林

自從政府門戶開放以來，海外學者政客一窩蜂，紛紛回到北京城，向最高當局建言或表態，一心想為祖國統一大業盡一分力，立一份功！然而最高當局視若無睹，我行我素，以致這些專家政客近年來心灰意冷，把目標只好轉向國民政府。尤其是民進黨成立以後，眾人似乎把中共的一黨專政、二制謬論、三信危機、四大堅持、五個現代化，都視為次要問題，又一窩蜂地要求台灣民主，更民主！因此當今的統一論調變成：只要台灣更民主，就會迫使中共不得不改變，在雙方民主的步伐接近時，統一問題自然會解決！

海外學者專家們，在推動台灣更進一步的民主化上，也確立了不少大功。然而民主也有一定的限制，要求台灣在民主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時，一定要考慮到它的處境及困難。中共若在民主化上不求進步，或停頓或緩慢，便會直接影響台灣的進步。我們不能做單方面的要求，而更重要又實際的是，應回到北京去，去逼他們趕上台灣。八〇年代初期那一窩蜂以去北京為榮的學者政客們，應當比傻徐更瞭解，更應當知道，要去完成一樁「偉大的任務」或「歷史留名」，一定要貫徹始終，再接再厲。

台灣現在最可喜的一個現象，就是它有二黨相互監督，未來在政治上必定會更進步！反觀大陸的所謂九個民主黨派，完全在黨綱裡白紙黑字，明明地寫着：服從共產黨的領導。這九個黨對共產黨毫無監督作用，統統加起來都抵不過台灣的朱高正，實在沒有存在的必要。

所以，傻徐在此建議各位關心國家統一大業的海外學者教授政客們，回北京去做「朱高正」。套一句陳香梅致「人民信箱」的話：不要空談民主，要以實際的方法去改變，去幫助中共做到真正的民主。

X 狗

「北京人」系列速寫之一

張潤

想聽×狗的故事嗎？您請坐，先飲一杯咖啡……暑期有閒暇，擺擺有關×狗的龍門陣，包您覺得有趣！平時功課重，事情多，您看着我像條死魚（本來就沒有聲帶，何況還是死的！）似的不聲不響，其實，我這肚子裏盡是「北京人」的故事，且聽這第一篇——

×狗並非一條狗，而是一位人，一位聞人。離開大陸以後，我看了不少港台出版的雜書，那裏面透露了不少古今秘聞、中外內幕。當然，真真假假，虛虛實實，不可不信，也不可盡信。有一本名為「上海灘聞人黃金榮」，「聞人」二字用得妙！否則像黃金榮這樣一位人士，如何稱呼他？嘻嘻，「聞人」！——誰能不報以會心的一笑？！

×狗的情況也和黃金榮差不了許多。若是他生於沒名沒姓的草民之家，屬市井之輩，那麼我們儘可以對之進行無情的抨擊，人人都沒有話講。但他却是功名赫赫的×元帥的一位親戚，故而那些貶詞絕不能原封搬用，只能稱他為北京市幹部子弟社交界的一位「聞人」。

也許您是急性人，耐不住要問：「這個又是怎麼回事？元帥的親戚，這是體面事情，何必埋名隱姓？」

呃，這裏面原因有二：其一是×元帥雖然

已晉見馬克思，但畢竟曾是中國政壇的一隻老鼎，不可不為貴人諱。其二是×狗目前滯留美國且行踪飄忽，倘若您在某種場合與該人不期而遇，那局面豈不尷尬？！……

×狗只是一個綽號，其本名叫做×少速。有一年我碰到×狗的父親，他頓足嘆道：「這逆子真不成器！當初他母親望子成龍心切，起了『少速』這個名字，指望他早日成器，唉！……」這位老知識分子的臉上猶如蒙了一層寒霜。

老知識分子？不錯。×狗的父親是留德的數學家，其母是留英的天體力學家——貨真價實的高級知識分子，即文革時期的臭老九。×狗有這樣一雙父母，按理是神氣不起來的，但凡事皆有例外，只因其父與×元帥乃叔伯兄弟，合家雞犬升天。（×帥的叔伯親戚在北京城裏有兩位：一位在國務院華僑事務委員會；一位在科學院，即×狗之父是也。）誰還有心思細究這×狗是否真正革命幹部子弟？什麼事情若是和大頭子沾上邊，就得另當別論。譬如那幾位革命導師（每逢年節都在天安門廣場上跟過路人打打照面），除了斯大林的爹是個皮鞋匠，勉強算得上城市貧民或者流氓無產者，其餘幾位的家譜哪裏經得起人事部門「查三代」？……大家不也睜一眼閉一眼地只管叩頭麼？（噫，我這嘴……快人快語。）

×狗在場面上混，朋友遍京華，點頭之交多如天上星星。人人皆知他是×帥的（叔伯）侄子。至於他的更深一層的底細，却沒有多少人說得上來。×狗的錢包裏有幾張堪稱王牌的黑白照片（那年頭影照尚未傳入中國大陸），全是毛澤東、×帥與其父母的生活照，足令那幫爹娘跟着毛澤東鬧了一輩子革命、却始終撈不到單獨晉見機會的幹部子弟眼熱了！這時候，×狗往往漫不經心地搭上這麼兩句：「我爹每月二百八（科技二級）、我媽每月二百四（科技三級）……」聽者以為這份薪水是行政級別呢，真以為×狗的父母都是部長級高幹！

×狗的廬山真面目外人少知，還由於文革前他就讀於一所默默無聞的中等技術學校（八成是建築工程一類）。倘若他是清華附中、北大附中、男四中、男八中……的學生，那麼祖宗八代都瞞不住了。（那樣一來，×帥這一族祖上因行爲不檢而繁衍出來的某些血親關係，亦將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因為那幾所名牌中學高幹子弟實在太多，紅衛兵組織成立後少不得要進行名目繁多的篩選、甄別，那麼×狗必將退爲二等革命小將，而這又是他那自幼養成的驕橫性格所不能容忍的。幸虧，×狗從小不愛上學，功課一塌糊塗，屢屢考不上高中。父母一商議，便把這位「扶不起的阿斗」送進了技校。技校學生絕大多數都是寒門子弟，圖的是每月能領到十三元津貼。像×狗這樣的瀾少爺，簡直是絕無僅有。是年，精明過人的周恩來總理在政協會上對此進行了口頭表揚：「×委員（指×狗之母）把孩子送進了技校，這種模範帶頭作用值得我們大家學習嘛……」他是被矇在了鼓裏還是另有用心？天曉得！然而，我很瞭解他——文革最混亂的那兩年，我一度是他的「鐵哥兒們」（1）。

我們倆的交情發端於當年在北京市中學生界名噪一時的「西城區老紅衛兵合唱團」。掛名是西城區，實則面向全市各路幹部子弟。那當兒，文化大革命已搞了一年有餘，最初曾以雷霆之勢登上歷史舞台的紅衛兵運動已然幾起幾落，元氣大傷。我們的革命激情經過盲目的衝騰和發洩之後業已消失殆盡。苦悶與徬徨成了取代一切的時髦思想，人人都在找尋新的精神出路。於是，「西城老紅衛兵合唱團」即應運而生。她既不若「聯合行動委員會」那樣富於濃厚的政治色彩，也不像當時已初具規模的樣板團那樣熱衷於宣傳工農兵文藝，而是個主要發揮聯誼作用的大俱樂部。參加者抱着各不相同的動機：失意的小政客們打算借此保留一塊日後東山再起的地盤（林彪曾說過：人的因素第一。）；有幾分姿色或文藝天賦的人材苗子想抓住機會出出風頭（本團曾以慶祝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為名，演出了許多蘇聯早期革命歌曲。這在北京城裏是狗肉包子——獨一份呀！）；無所事事者到這裏來消磨大塊時間，還有一批什麼也不是的角色乾脆就是瞎起哄。至於我，則是想擴大自己的社會交遊面，以便覓得一位中意的女朋友。

×狗是本團的幕後大老板之一。別看他其貌不揚：門樓腦門，細小眼睛，高顴骨，矮個頭——頗為典型的，×縣人。却是十分「局氣」。(2)。我本無文藝專長，只因推荐人是個威震四城的「大份兒」(3)，×狗便分派我去拉大幕。「明天我們這幫人在『萃華樓』聚餐，給我的『婆子』（女朋友的別稱）過生日——十五歲。……」×狗見面就熟，親親熱熱地道，「哥兒幾個樂一樂。每人交五塊錢份子！……」我露出為難之色。父母早已下獄，我是靠每月十二元五角的基本生活費過活（每月五號

，還要屈辱地到造反派那裏領取），而又十分清高，不肯幹竊書以外的壞事。這五塊錢如同割一塊肉呀！

×狗見勢把話頭一轉，「得，你那一份我兜着了！咱們往後日子還長哩！……」

就這麼着，我和×狗交上了朋友。我那時候窮得叮嚀亂響，吃生活費吃成了個瘦鬼。自從認識了×狗，肚裏的油水多了一些，腮幫上也豐滿了許多。

您或許要發問：「×狗哪來這麼多錢哩？」

對呀，我那時心裏也犯嘔咕哩。有一回，×狗邀上那位芳齡一十五歲的女友再加上我去了「全聚德」。幾杯加飯酒落肚，×狗露了底牌：「……吃喝隨便！咱們有座金山哩，一輩子受用不盡！」

×狗的女友年紀雖小，却生得粗胳膊壯腿，跟半截石碑差不多。她是北京城裏有名的武門之花，曾創下一口氣用武裝帶「花」(4)了十多個人的紀錄。那年頭，女性美表現在勇敢、魯莽，而與溫柔、嫵媚無緣。她好奇地追問：「金山在哪兒？你倒是快說呀！……」

原來，西城區××街「抄家物資管理辦公室」的鑰匙落到了×狗手裏。老北京人都知道「東貴西富」的說法。西城區住着許多財主，而這條××街更是廟小神仙多，淨是歷朝歷代遺下的肉頭戶。紅八月（一九六六年八月）「破四舊」時，這裏自然成了紅衛兵們大顯身手的好去處。當時，人人心中都燒着一團聖火，抬手動腳固然比較粗野（這條街上鬧出不止一條人命），却都十分清廉。沒有什麼中飽私囊的劣迹（誰稀罕資產階級的臭錢？！）。經過這一年多的折騰，大家恍然悟出革命目標遠不及吃喝玩樂實在時，已經晚了——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發佈了所謂「六、六通告」：自即日

起，抄家活動一律按「打砸搶」論處，違者交公安局軍管會懲處！……

而×狗的這把鑰匙正好彌補了往日清廉造成的缺憾。他常常大模大樣地光臨那個辦公室，宣諭一條關係捏造的「最高指示」：「紅衛兵組織的活動經費，以從抄家物資中撥發為好。」……然後自行進入倉庫取錢。據×狗說，倉庫裏金銀財寶如山，單是人民幣現鈔，就是「大鼻子的爸爸——老鼻子」了！

這天晚上，我們三人邊吃邊談，直到「全聚德」打烊還沒有盡興。於是決定找個地方一同「刷夜」(5)。×狗說他在百萬莊一帶有個「死窩」(6)。

誰知，我們騎着自行車剛穿過西四磚塔胡同，便遭遇了一伙強人。那時，整個社會處於無政府狀態，遍地盜匪，歹徒如毛。

十幾根大棒橫在馬路當中，我們只得下車。只見這幫人——總數在二十至二十五之間，年紀不過十五、六歲——一律口叨香烟，罵罵咧咧……

為首的是個少年老成的傢伙，他用與其言談內容截然相反的和藹聲音道：「嘿，借你們幾位的『鑽』(7)戴戴！……」

我有些心慌，忙看×狗的反應——

×狗若無其事地道：「噢，怎麼惹到太歲頭上了？……」

他的女友聞言從腰間抽出有個大銅環的武裝帶，舞將起來：「想借『鑽』？行哇，你問問它答應不答應？……」

這伙強人大怒，噉噉而上……好幾個人手裏都握着「半頭磚」(8)，眼着就要劈頭蓋臉地扔過來了！

×狗亦大怒，發出一聲燕人張翼德單騎拒曹兵似的斷喝：「滾他媽遠遠的去！……這兒

是西四，是個有王法的地方——你們到扎西那兒打聽打聽老×狗是誰？……」

這位扎西是西四地區的一位「聞人」，是一位部長級藏族高幹的兒子，却自幼混迹於地痞無賴中間，惡名昭著。平日×狗不屑與之交往，眼下却扛出這塊牌子來應急。

「扎西？……」為首者頓了一下，「咱是阜成門的玩主(9)……」

「阜成門？」×狗撇開兩片不薄的嘴唇，笑着，話板又急又快，點水不漏。「好嘛，咱倆手牽手去天寧寺路四十二號中央監委宿舍大孩家，看看大孩管誰叫大哥！……」這大孩是和扎西情況相仿的一名「聞人」。

這伙強人軟下來了。為首者一見腦袋，其餘人便讓出了一條「胡同」……

「小吉，你受驚了吧？……」是夜，我們在×狗的「死窩」——一個獨居室的小單元——住下。×狗的女友先在裏面睡下了，我倆還在過道說話。他安慰着我。

「還行……年頭太亂，走夜道淨碰上鬼。」我裝作滿不在乎地說。

「我從小就恨玩主。」×狗裸着左肩膀，讓我看那裏的一塊鋸齒形傷疤。「初一那年，我看了幾本三十年代的武俠小說，想尋訪高人學飛牆走壁。有一天我逃學跑到地壇公園，正碰上兩幫玩主打群架剛散，輸了的那幫傢伙就拿我撒氣，用飛輪給了我一下子！……」

「飛輪？」

「就是自行車的齒輪。用砂輪把一邊的齒打得尖尖的，扎在身上能捲出肉絲來……這是文革前打架使用的最厲害的兇器。哼，這二年搞武鬥，真槍真炮都上了陣，也就沒人使飛輪了，淘汰了……」

「唉，說是文化大革命，其實野蠻透了！」

「我不禁搖頭嘆息。」

安排睡覺床位時，我和×狗意見分歧：我建議在寬敞的過道上搭兩張行軍床，而他執意只給我搭一張，自己和那位把拿武裝帶打架當成家常便飯的女孩子滾一宿……

我那冬烘腦袋一時轉不過彎來：「那怎行？！你倆還沒登記結婚呀？……」

×狗戲謔地彈了一下我的腦門：「結婚？我們×縣人對女人一向是又喜歡又輕視的，比方我伯父……」他順便又講了×帥的幾件風流軼事，哈哈一笑，管自走進內室……

我那時還相當正統，把男女關係上的毛病列為人世間名列第一的首惡。於是有意疏遠了×狗，僅維持着見面頭點的泛泛之交。

轉過年來，到了一九六八年二月。這是首都中學紅衛兵運動史上值得大書一筆的浪漫月。催人相思的早春天氣加上對於曠日持久的文革的徹底失望，使得混亂從街頭擴展進了兩性關係領域。濫交異性朋友的新風尚給紅衛兵組織分裂出一個新的派系：飄派。這一派系與「天派」（北京航空學院「紅旗」）、「地派」（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等等完全不同：沒有政治觀點，只是由一種對人生的玩世不恭的態度而匯聚的一批人。

×狗於是乎成爲飄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關於他的種種傳說可以編著一本新的「拍案驚奇」。我在降低了自身的所謂道德標準之後，也同×狗過從甚密。可惜，這時他遭了生平第一次沉重打擊：入獄了。原因是他喜新厭舊，甩了那位擅使武裝帶的女友，滿世界尋花覓柳。（作為對毛澤東「不愛紅裝愛武裝」說法的反動，崇武好鬥的女孩子漸漸不吃香了，擇女友時開宗明義要問對方的「盤」(10)和「條」(11)究竟如何……)於是麻煩鬧了出來：那位芳

齡十六（過了年增加一歲）的勇女子到處告狀，揭發×狗貪污了抄家物資……漏屋又逢黃梅雨，×帥在中央也落了價錢——「二月逆流」的老賬被重新翻起，又被林彪弦外有音地指為「楊、余、付」的黑後台……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連×帥的女兒、女婿都蹲了班房，何況×狗？

×狗蹲的地全稱叫「北京市犯罪少年管教所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簡稱「少管所學習班」。那裏關着許多的元帥、副總理、中央委員的子女，十分了得。據一位短期「學員」出來後透露，×狗在裏面受了不少皮肉之苦——看守們不敢狠打那些中央首長家的少爺、千金（怕日後人家死灰復燃），就拿×狗這種半吊子角色出氣……有一個專好練習拼刺刀的看守索性把×狗當成活靶子，每日必持木槍從「預備用槍」練到「突刺——刺！」，結果將×狗的肋骨砸斷了一根……

我們失去了聯繫。幾個月後，北京城裏發生了兩件大事，前後相距不足一月：毛澤東一聲令下，「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浩浩蕩蕩開進清華大學，制止兩派武鬥；還有就是一個綽號叫「小混蛋」本名叫周長生的玩主被一群如狼似虎的幹部子弟活活打死……

您覺得把兩件事擺在一起挺奇怪是不是？非也。這兩件事情在首都紅衛兵運動史上同樣具有無比深遠的影響，等於把「紅衛兵」三字送進了歷史的垃圾堆！

前一件大家都清楚：工宣隊開進學校，取代作威作福的紅衛兵成了草頭王。後一件事由於未經當局大肆宣傳，儘管在當時也曾轟動一時，日久却爲公眾所遺忘，而且始終沒有得到應有的評價。

這「小混蛋」是文革初期的「狗崽子」，全家人被附近石油部的紅衛兵揍得夠嗆。他因此恨透了幹部子弟，發誓要報仇雪恨，並揚言「不想活到二十歲」。他心黑手毒，左右都是亡命之徒，在德勝門一帶（他是德勝門外安德里中學的初一學生）堪稱霸主。漸漸地，他的黑手伸向了全市各處，「專打幹部子弟」的宗旨不變。由於他的存在，業已墮落的紅衛兵與街道上的玩主們尚不能公開勾結，為禍社會：

「小混蛋」之死則導致了北京市的「（紅衛）兵（土）匪大聯合」……紅衛兵與流氓小偷偷公開發流了！從此，被公安局通緝的「佛爺」（扒手）竟然大模大樣地進入高幹住宅，被窩藏起來，而「聞人」們在養花、養魚、養鳥、養「婆子」之外又增添了一項嗜好：養佛。更不堪的是，一些在紅八月間並肩造反的戰友們，竟然搖身一變成爲「東單一條龍」、「北新橋壇子」了！……

嗚呼哀哉！

這當口，×狗獲釋了——八屆十二中全會即將召開，×帥的行情回升。因此×狗恢復自由乃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他看上去黑瘦了許多，但是那股目空一切的傲氣有如當初。他不談獄裏的事，我自然也不好打聽人家走麥城的經歷。他對於紅衛兵的墮落憤憤不已：「難怪老百姓說自古兵匪一家哩。」

我總算找到了知音：「北京城太亂了。沒意思。我想去農村老家避一避。」

×狗吸吸鼻子：「避一避也好。」他沙着嗓子唱起革命樣板戲「紅燈記」裏李玉和的著名唱段：「同志！一路上多保重，山高水遠……」然後脫下腕上的「奧樂瑪」手錶——正是

那幫阜成門玩主爲之垂涎而不可得的——塞進我的手裏：「留着作個紀念吧。」

手錶上還有他的體溫。這份友情令我沒齒難忘。

這以後我們有兩年沒有見面。不過自從「九大」以後，×帥在中央政治局裏穩穩佔了一把交椅，地位日臻鞏固。由此，我想×狗的境況也不會太糟。

一九七〇年冬天，幹部子弟掀起了參軍熱。大凡家裏有點門路的都棄農從戎，披上了國防綠軍裝。我父母還在獄中，本不該存痴心妄想，但是眼看著連首長家裏嫗姆的子女都當上了「後門兵」，也想混水摸魚試一試。

湊巧，我和×狗在八路公共汽車上不期而遇。他成了我的救星。

「想當兵還不容易？我包了！……」言談中我得知這兩年他一直在廣東享清福。當我講出自己的打算時，×狗拍着厚實的胸脯，大包大攬。「太原附近××軍的政委是我們×家的碎炊，我帶你找他去！得，先到『康樂』下館子，然後搭晚上的火車上太原！……」

好一個老×狗，法力無邊啊！

我們在八面槽下車，直奔「康樂」餐館。這家餐館雖小，當時在北京城裏却是大大有名——有個名叫陳翠鳳的女服務員長得挺漂亮，人也風騷；不少「聞人」跟他勾勾搭搭，還惹出好幾場爭風吃醋的火拼。提起「康樂小陳」，誰不知道啊！

「小陳呢？」×狗點菜已畢，很遺憾地問。「早進公安局了！……」一位冬瓜似的胖女人沒好氣地回答。

×狗大爲掃興，快快不樂。於是只顧低頭扒飯，喝悶酒，一言不發。

當晚，我們搭夜車前往太原。因鐵路局兩

派武門正酣，火車走走停停，抵達太原時晚點達整整一天一夜，我們都疲憊不堪了。

走出火車站，正是下半夜，×狗帶我來到一個居民院前，說：「咱們先在這兒睡會兒覺，我他媽眼睛都睜不開……」

「你認識這家人？……」
「不認識。看我的……」他重重地叩門，一下比一下更急。

門開了。戶主——一對老實巴拉的中年夫婦——睡眼惺忪地出現在我們面前。

「老鄉，」×狗運用這一稱呼，儼若當年的老八路。「我是×帥的親侄子。這次來太原，是介紹朋友去××軍當兵。我打算找×政委。現在我們太困啦，先在你們家休息一下……」說罷，不待對方表態，他自行入戶……我也只得硬着頭皮跟進。

「咱倆輪班睡覺。」×狗用很嚴肅的聲音對我說，他並不避諱戶主夫婦。「現在社會上階級鬥爭這麼激烈，要是壞人搞階級報復怎麼辦？……」

想不到，累乏成了這副熊樣子，他腦子裏階級鬥爭那根弦還是繃得緊緊的！

「讓我先睡半個鐘頭……」我已然站不住了。

「行，」×狗很義氣地慨然應允，「你先睡，我給你守着……」

我像一灘爛泥似地倒在主人的床上，呼呼大睡。×狗像一扇擋風牆似地坐在床沿，使我有安全感，能夠放心地睡去……

就這樣，我們倆鳩佔鵲巢，輪番休息；而戶主夫婦却像外人似地蹲在屋角，呆呆地看着我們……

第二天清早，我們精神抖擻地來到××軍駐地。政委聽說是×帥家來的人，忙不迭地迎

出來，熱情無比，一說即合——

「就是你這個小子要當兵麼？我看是可以的勒……」

從這天起，我成了解放軍這個「毛澤東思想大學校」的一名後門兵（正規兵是通過武裝部入伍的，而後門兵則是所謂「幹部子弟零星入伍」）。

×狗又急着返回北京。我們來到迎澤公園話別，望着近乎荒蕪的園景，我說：「老×狗，我真不知怎樣感激你才好。」

×狗很灑脫地一揮手：「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咱倆的日子還長着哩……」

我又說：「你自己的出路，也要多考慮……」

×狗達觀地拍拍厚實的胸脯：「怕啥。只要我伯父在，一句話抄百總，我才不愁呢。」

他的話有道理。幾年後，當我作為工農兵學員被「推荐」到××大學外文系時，驚喜地發現×狗亦被「推荐」在該系，老友重逢，何其快樂！

×狗天生不是上學的材料，一唸書就頭痛。雖然他在系裏註了冊，却很少露面——時不時交來病假條，誰也拿他沒辦法。

不料，一九七四年初，平地又鬧起一場「批林批孔」運動，更絕的是，夾進了「批走後門」的內容。於是我們這幫名義上是由工農兵推荐上來的、其實得益於各自父母或監護人的學員們，個個都心裏發麻。×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就「走後門」給革命事業帶來的危害作了表態性的發言。於是×狗被校方勸告退學了。

這個突如其來的打擊把×狗弄得悻悻轉頭向。病假休不下去了，「戀愛」（這是比較文明的說法）談不下去了，他到校長那裏哭天抹淚地鬧了幾回，沒有產生實效，只得窩在宿舍裏

罵大街……

「我日你奶奶的！全校有多少走後門進來的？！拿老太爺開刀，拿老太爺墊背……」他雖然不愛唸書，却捨不得「工農兵大學生」這名號呀！

我在公用浴室裏碰見×狗，他自稱是要洗掉本校帶給他的一身晦氣，肩頭那塊用飛輪扎出的傷疤顯得格外刺眼。

「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處處不留爺，爺去搞偷渡！」×狗的情緒變得真快，他拍着胸脯，豪爽地唸出一首打油詩。

從此，我們這種「哥兒們加同學」的雙料親密關係變得只剩下一層了。他仍然滯留京華，終日東遊西蕩，花錢如流水一般，天知道他是哪個單位的工作人員……不過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帥三天兩頭在報上露面，（老實說，×狗一年也難得親見×帥一面）人雖老，虎威在。這就夠×狗受用了！

光陰飛逝。到了一九七六年十月，由于×帥的神機妙算，現代中國史揭開了新的一頁。×狗也因之達到了有生以來最風光、最得意的頂峰。他倒賣黃金、包攬訟詞（當時正逢文革、假、錯案平反，有門路的人可以大撈一票）、聚賭抽頭、坐地分贓。誰也奈何他不得，連公安局也懼他三分之一——前任北京市公安局長劉傳新是四人幫走狗，許多公安幹警因鎮壓天安門事件兩手沾滿人民的鮮血……老百姓看見警察就沒好氣。他們哪敢得罪×帥家的人哩！再說，這也是上行下效：×帥八十大壽揮霍無度，全然不顧國庫空虛、蟻民啼飢……×狗為啥不能趁機撈些外快呢？！強者必勝嘛。

這時，我和×狗已是「兩股道上跑的車」——走的不是是一條路。（這是李玉和的又一著名台詞，連三歲娃娃都會說）我走的是為眾人

所認可的求學道路：為了摘掉「工農兵學員」這頂歷史贈予的不光彩的帽子，發憤考取了北師大一位名教授的研究員！

為慶賀這一人生旅途上的飛躍，我在西單絨綫胡同的「成都飯店」席開十桌宴友。次日，又單請了×狗一次——而今，我的朋友清一色都是書呆子，把×狗這位「聞人」放在裏面，於雙方均不合適。

「小吉，你行。呃……」×狗開懷痛飲，兩眼汪着淚，打着酒隔。「不過話說回來，我他媽也不白給——往後你若是缺錢花，找我……」

「你這樣用不是長久之計啊……」我誠心誠意地規勸他，「×帥那麼大歲數了，天有不測風雲……我看你還是見好就收吧。」

「不怕！」×狗又是一拍肥厚的胸脯，然後用筷子逐盤挑揀鮮菇、冬筍之類，却避開暈腥。我猜想他是要減肥。「還可以幹一陣子呢……不等他翹辮子，咱就腳底抹油啦。」

他指的是出國。眼着着就是八十年代了，社會上流行着這樣的說法：五十年代——攻副博士、六十年代——學雷鋒、七十年代——反潮流、八十年代——出國……

他肯定能出去。且不說廣東人有海外關係不稀奇，憑他×家這種地位，攀交情的洋人、華僑還少得了？！

我則不一定。聽天由命！

人生的際遇有時鬼神難測。幾年以後，當我作為公費留學生飛來美國，在紐約曼哈頓西四十二街的中國領事館裏與×狗意外重逢時，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領事館四樓餐廳供應費用計入住宿費的、不吃白不吃的中式自助餐。我們用榨菜炒肉絲送下大米飯，談興正濃——

「他媽的，我不走不行啦。這條命是撿來的……」他口無遮攔地說，根本不管牆上貼的謹防竊聽器的告示。「跟我一起的哥兒們全『折』(14)進去了！就剩我一個在外邊——證據不充份，再加上我伯父的老面子……你講話：見好就收。有道理！×他奶奶的，再不收就沒命了！……」

我忙要他壓低音量：「瞧你，人家都看咱們……你是以什麼身份來美國的？」

「假結婚。」×狗直言不諱，「這兒唐人街有個劉小姐，她爸爸是個跳船的老粗，靠當廚子辦了身份，熬成了公民。這劉小姐帶我出來，要了這個數……」他左右手迅疾地一比劃，還沒容我看清楚又收了，「辦成綠卡以後又說想跟我真結婚，表示願意把那筆錢吐出來，補辦婚禮。呸！就憑我老×狗，能娶個廚子的女兒？！養下一堆粗兒爛女？！……」

我暗吃一驚：「這傢伙，一點沒變樣，擺譜(15)擺到了美利堅！」

×狗畢竟是×狗。走到哪兒都想糾集一伙人，自立為王，以滿足其強烈的領袖慾。開初，他想玩政治，就跟一個宗旨為「和平統一祖國」的組織掛上鉤。這組織是由一位國民黨起義將領打頭，滙合了一批台灣反水人物。×狗加入後，原封不動地要開了當年辦「西城區紅衛兵合唱團」的手腕，一心一意想當大拿，不屑幹交派給他的小事情：散發呼籲信、放映國內故事影片什麼的……更糟的是，與帥府沾親的優越感使他看不起那些父親被共產黨槍斃了却不記仇的「碼頭蟲」，而人家按月從××部拿美元津貼，也不賣×狗的賬。沒幹兩天，×狗就被轟了出來：強龍不壓地頭蛇嘛。

×狗失意落魄了許多日子。我獻策道：「到大使館去晃晃，說不定能幫你謀個美差……」

他悶悶不樂地說：「我他媽去過了。他們不拿我當神仙……」

我這才猛地想起×帥已經接受「致敬電」光榮去職了……就說：「那你打算怎麼辦？」

「腳踩西瓜皮——溜到哪兒算哪兒。」×狗故作談諧地打趣，那門樓腦門却皺得像個沒有水份的苦瓜。

×狗，這個北京城裏的永遠不甘寂寞的「聞人」，來到美國後卻像一條被拋上海灘的鯊魚，難以施其技。他的本事在美國派不上用場：這裏的黑社會自有幫派，各佔「堂口」，×

狗算老幾？再說他年齡一大把，若從小嘍囉幹起，哪年哪月才能熬出頭來？又加上英語極差，華人社會之外的機遇與他概無緣分。他真是苦悶極了。

我是他在美國唯一的知心人。說實話，我挺同情他。雖然今天的我們已經沒有多少共同之處，但畢竟是一起從那風雨飄搖的歲月走過來的！……

×狗從國內帶出來一筆美金。他就靠吃老本混日子。我曾建議：「你還是用這筆本錢開個洗衣店或外賣店吧。這是資本主義社會，得變着法子讓資本運動起來呀……」

他正色道：「做小買賣？我們×家的人餓死也不能幹這個！」

然而，「坐吃山空」這話畢竟是可畏的眞諦。爲了扭轉這種有出無入的局面，×狗也會去過幾個OFFICE亮相，結果自然是不歡而散。能夠包涵×狗這樣一位北京「聞人」的老板，八成還在他媽媽肚子裏轉筋呢。

就這樣，×狗在美東幾個大城市裏遊蕩蕩，不務正業。我經常接到他在半夜打來的滅費長途電話、耐心地聽他訴苦或是吹牛，然後

鼓勵他堅持活下去……，都是中國人嘛。

有天深夜，我又接到×狗的電話，他的嗓門宏亮非凡：「蓋帽(16)了，蓋帽了！……我是在大西洋城給你打電話！他媽的，我贏了五百塊錢，玩的是吃角子機器！告訴你訣竅：人家往裏扔角子你躲在一旁看，人家中了彩你可千萬別上；若是人家連連落空，你再一氣扔進幾十個角子，準能撞上好運氣！……這也是在美生活的小常識，記住了！……」

我在這邊無聲地笑了——這才是北京城裏老×狗的英雄本色！

「……明天晚上七點咱們聚聚——唐人街『江浙四五六』餐館！……什麼什麼？你沒聽說過？眞土！……到了唐人街一打聽誰都知道！得，明晚見！」

次日晚上，我們坐在「江浙四五六」餐館裏，享受着本店的招牌菜「梅花大烏參」和「腐衣黃魚」，天南海北地扯談……

「×狗，」我相機說出自己的想法，「久賭無勝家。你還是見好就收吧……染上賭癮就不得了啦，多少人都死在這上面！」

×狗把一塊炸成嫩黃的魚塊投進口中：「我巴不得早死呀。美國根本不是人呆的地方！眞他媽的苦不堪言……不怕你笑話，在北京還以爲一出國就如何長短，到了美國一下飛機就LET'S BEGIN TO PLAY——(讓我們開始玩吧！)誰知美國這社會根本不把我當金剛鑽！以前在國內只要一亮我伯父的牌子，走到哪兒都吃香的喝辣的，女人跟着蠅似地叮着我不放……哪像在美國：按摩院裏那幫婊子認錢不認人，少一個考特(二角五分美金)她也不幹呀。他媽的！NO MONEY (金錢) NO HONEY (甜

蜜)！男女之間一點情份不講還有什麼意思？！……」

催

他聳着結實的肩膀——我注意到，他時常以聳肩加重語氣。這雖然有些做作，終歸較之昔日的拍胸要高雅一些。

我也陪着他嘆氣：「說到底，這裏是人家的國家呀。我看，你還是回國吧——北京不愛呆，就去深圳……」

「回國？門兒也沒有！」×狗切齒道：「吃柿子揀軟的捏。我這輩子沒少吃這個虧：飛輪、少管所學習班、走後門的工農兵學員……」他傷感地哀聲嘆氣，想必是勾起了許多不為人知的隱情、打落門牙往肚裏吞的傷心事……

此後，我和×狗失去了聯繫。幾個月來，我在學習之餘、讀書之際常常覺得生活裏似乎減少了一項活動，認真想一想，發現是×狗不再來電話了！……

我無處尋覓他的音訊。也許，您能偶然聽到他的下落？請打個電話給我……OK？

註：(1)鐵哥兒們：土話。意即死黨。

(2)局氣：土話。意即江湖義氣。

(3)大份兒：土話。意即有勢力者。

(4)花：黑話。指打得頭破血流。

(5)刷夜：黑話。指在自家以外處過夜。

(6)死窩：黑話。指安全可靠之地。

(7)鑽：黑話。指手錶。

(8)半頭磚：專門用以鬥毆的半塊磚頭。

(9)玩主：黑話。一切跑江湖者的自稱。

(10)盤：黑話。指臉盤。

(11)條：黑話。指身材。

(12)碎：土話。指嘍囉。

(13)墊背：土話。指胡亂充數。

(14)折：黑話。指入獄。

(15)擺譜：土話。指擺架子。

(16)蓋帽：土話。意即絕妙。

自由的訣竅在於勇敢

—「中國大陸政治避難者協會啓事」

準備尋求、正在尋求或已經得到美國政府政治庇護的中國人，組織起來！我們要能發揮更大的力量；我們要幫助自己和一切苦難中的同胞獲得自由；我們要爭取世界民主人士的關注和支持，就只有組織起來！

在這個協會中，我們將：

- 交流有關政治庇護的經驗；
- 提供政治庇護必要的資料和知識；
- 爭取各界同情人士的聲援；
- 加強與專業律師的接觸和聯繫；
- 動員新聞界的支持和輿論的力量。

一年來，本會曾幫助某些人士獲得了政治庇護，我們具有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打算尋求政治庇護的人士，請與我們聯絡，我們將為你提供諮詢服務。

追求自由的大陸人士，請加入我們的組織，團結就是力量，未來將屬於勇敢而自由的靈魂！



本會通訊處：Chinese Political Refugee Association 聯繫人：王思蜀（會長）（已獲得政治庇護）
 76-11 Roosevelt Ave. Box 162 Jackson Heights 朱永祥（理事）（已獲得政治庇護）
 New York 11372 TEL: (718)898-9700 劉翔（理事）（正申請政治庇護）

請您訂閱 中國之春 月刊

訂費（每年）

姓名：英文 _____ 中文 _____	寄達地區
地址： _____	北美和世界其他地區 (港、澳地區)
_____	機關：60美元 200港元
_____	普通訂戶：24美元 96港元
_____	學生訂戶：20美元 84港元

寄上 _____ 幣 _____ 元，訂閱由 _____ 年 _____ 月（第 _____ 期）開始

北美地區：P. O. Box 243, New York, N. Y. 10185 贊助200美元或港澳地區500港元以上之訂戶為永久訂戶
 支票抬頭請寫：China Spring

香港及世界其他地區：3-7710410 除北美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區，另加郵費：
 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611號萬隆大廈1206室 航空：10美元 平郵：5美元
 支票抬頭請寫：CHINA SPRING BOOK STORE

有遠見的廣告

效果預想不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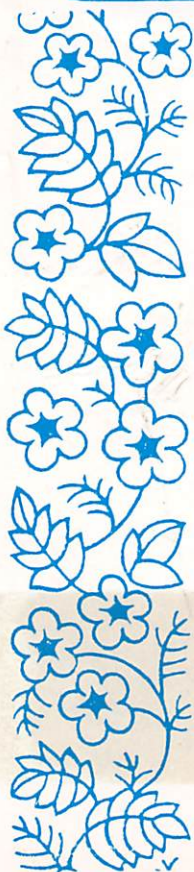
「中國之春」行銷北美、歐洲、澳洲、日本、香港，擁有大量讀者，尤其為大陸訪問學者、留學生、新移民及關心中國的華僑所喜讀愛看。她是北美地區銷量最大的中文雜誌之一。

大陸訪問學者、留學生、新移民的購買力正逐年快速上昇，而且通過他們的宣傳，您可進入十億人民的大陸市場。

在「中國之春」上刊登廣告，會有您預想不到的效果！

中國之春雜誌廣告價目表

版面	規格	顏色	價格
封底	1/2頁	套色	450
		彩色	650
封面裡	全頁	套色	380
	半頁		190
封底裡	全頁	套色	380
	半頁		190
內頁	一欄	黑白	80
	二欄		160
	半頁		120
	全頁		240



SOS! 中國之春向各界呼籲

中國之春基金會賬號公開

捐助可辦自動轉賬滙款

親愛的讀者：

中國之春，正處於危機之中，由於財政困難，編輯人員和工作人員已大量裁減，英文版已宣佈停刊。中文版現正靠義工的維持，隨時將面臨停刊的危險。

承蒙各位長期支持，「中國之春」得有今日之成就、影響，成為中國大陸民主運動之一面旗幟。今天我們再次向各位民主運動的支持者呼救，請慷慨解囊，救中國民主運動的萌芽於危難之中。

您的捐助、認股，可寄支票、滙票到中國之春編輯部。為您方便，我們在此公佈中國之春基金會的賬號，您可以在銀行辦理自動轉帳手續和滙款手續。我們相信，中春的財務困難一定會在各方的支援下得到克服。您的捐款可獲減稅。

中國之春基金會的銀行帳戶如下：

戶頭：CHINA SPRING RESEARCH INC

帳號：96 — 666 — 53143

銀行：BARCLAY BANK OF NEW YORK N. A.

77 — 01 31ST AVE

JACKSON HEIGHTS, N. Y. 11370

中國之春編輯部

民主 • 法治 • 自由 • 人權 • 多元

■ 主辦：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CHINESE ALLIANCE FOR DEMOCRACY)

■ 編輯：中國之春雜誌編輯部

■ 通訊處：(美洲) P. O. BOX 4873, NEW YORK, N. Y. 10185, USA

(香港) 香港九龍旺角郵政信箱 79047 號

(日本) 東京都小金井市小金井郵便局46號信箱

(歐洲) ALLIANCE CHINOISE POUR LA DEMOCRATIE

B. P. 169 77315 Marne la Vallée Cedex 2, France

(澳洲) G. P. O. BOX 376F, MELBOURNE (3001) AUSTRALIA

■ 電話：(美洲) (718) 429-6777；

《香港》3-7710410

■ 零售價：(美) 2.50 美元 (加) 3.00 加幣 (港) 10.00 港幣

≡ SECOND CLASS ≡
≡ POSTAGE PAID ≡
≡ FLUSHING N. Y. ≡
≡ ISSN 0735-8237 ≡

POSTMASTER: Please send Address Changes to China Spring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